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

人物

第四卷

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丛书

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

(第四卷)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贾喜学 梁星亮

副 主 编 许发宏

责任编辑 许发宏 刘景巍

责任校对 张春梅

审 稿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审稿委员会

编辑说明

一、随着中共党史资料,特别是陕西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大多数党的历史人物的革命活动经历也基本清楚。为了真实系统地记述革命和建设时期陕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领导人和有关重要人物的活动史实,弘扬他们为党、为国、为人民利益而献身奋斗、忘我工作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我们编辑出版《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丛书。这既是党史研究领域内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本丛书收录的范围和标准,大体包括:(1)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著名活动家、党团组织的创建人和组织成员、群众团体组织的主要成员、其他知名人士和著名活动家。(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陕西地区特(地)委以上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革命根据地和地方红军的创建人或主要领导人;其他重要独立武装的军政指挥者;有重大贡献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烈士。(3)抗日战争时期省级和省级以上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成员;著名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烈士;著名英雄劳模、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4)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解放区、国统区和陕南

解放区省级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同级政、军、群组织主要负责人；著名战役、战斗或重大军事行动的最高军政指挥员；著名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革命烈士。(5)全国解放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机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以上)；省级人大、政府、政协、军区正副职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有重大突出贡献的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著名革命烈士。

三、内容上以传主在陕西的活动为主，以传主与党有联系的活动为主。

四、本丛书暂收入已经去世的人物传稿。丛书目录从第四卷起，按姓氏笔画排序。

五、本丛书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共同编写，并以多卷本陆续编辑出版，公开发行。

目 录

马锡五	(1)
王世英	(12)
王柏栋	(36)
王复生	(43)
孙作宾	(51)
刘林圃	(93)
刘威诚	(101)
刘愿庵	(124)
肖 明	(148)
张仲实	(156)
张寒晖	(202)
李妙斋	(235)
欧阳钦	(246)
赵 搏	(279)
赵伯经	(302)
南汉宸	(312)
贾拓夫	(336)

龚逢春	(376)
焦启铠	(391)
傅鹤峰	(400)

马 锡 五

(1888—1962)

马锡五，原名马文章。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35年12月入党。1930年参加革命，从事兵运工作。后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做军需工作。1933年后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管理科长。1935年4月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委员长，11月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1936年6月，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任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陕

甘宁边区庆环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曲子县县长，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法院分庭庭长。他采用的群众性的公开审判方式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拥护，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2年4月10日在北京病逝。

马锡五，就是《刘巧儿》里的马专员的原型。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共产党在司法战线上树立了一面旗帜，其故事至今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他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一)

马锡五,原名马文章,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芦草沟村人,生于1899年1月8日。

马锡五祖籍陕西延川县马家圪塔。祖父在世时由延川迁至延安,后来祖父病死,其父年幼无法生活,被张某收为养子,改名张得元。为了寻求生活出路,张得元夫妇由延安逃荒到保安县城为人做工。长年省吃俭用,添置了一院房产和十来亩山地,一边开店房,一边种地维持生活。马锡五就在这时出生在保安县城。后来由于县城遭受土匪骚扰,不得安宁,举家又被迫迁到保安农村,靠租种他人田地过活。

马锡五于1909年上学读书,1916年毕业于保安县模范小学。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只好在家放羊做零活。由于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在旧社会命运似乎总是与他作对。为了生计,他士农工商,样样都干过,结果是处处碰壁。最初,他在保安县当警兵,因不堪警佐的欺压而告假离开。回家后,母亲拿出多年的积蓄让他做生意,一年下来,不仅本钱赔光,反而欠下一身债。此后,他到甘肃合水县太白镇李家油房当学徒,因遭兵匪抢劫,掌柜不仅将他除名,还强令他赔偿损失。这时,父母年迈,胞兄病故,全家生活重担,完全落在他的肩上,他只好又到县里当警察。其间,因干涉土豪李某不法行为,反而受诬坐牢三个月,经群众具保始得出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身南下数百公里外的关中朝邑,在朝邑县政府当了三年职员。接着,到旧军队当排长,但不久因抗拒连长欺压而被撤职。他也曾参加过哥老会,可是这种落后的群众性自发组织,也不可能为青年人指明前进的方向。当时,陕北五县农民曾为

反对军阀井岳秀征收“羊捐地款”，举行过农民暴动，马锡五对此深表同情。但这次暴动，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以失败儿告终。总之，青年时代的马锡五，饱尝失业的痛苦，历尽人间世态炎凉的酸辛。他接触过旧社会的“三教九流”，也看到旧军警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黑幕，使他感到在这些军阀豪绅的统治下，既不会使正直的青年人找到真正的出路，更不会给国家民族带来任何希望。他深深地陷入苦恼失望之中。

马锡五正在徘徊之际，听说本县有个刘志丹（景桂），组织穷苦人民，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专打军阀豪绅。这支队伍虽然受到反动军警的“通缉”和“围剿”，仍然转战南北，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马锡五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地寻找刘志丹，跟随共产党闹革命。

1930年春，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县境组织军队。马锡五闻讯后喜出望外，便在农历四月初赶到金汤镇，见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最初，他在部队中担任军需工作，转战于陕甘边界各地，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到旧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马锡五被分配到军事委员会任管理科科长，负责管理修械厂、医院和白区小商贩的工作。1935年春，敌人围攻南梁，红军虽从南梁撤退，但却解放了七个县城，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1935年4月，为了加强地方政府的工作，马锡五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委员会委员长，亦称粮食部部长。1935年冬，又转到富县套筒塬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12月，马锡五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6月决定成立陕甘宁省，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

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困难很多,但他认真学习,不懂的事就随时请示省委,遇到问题和群众商量,终于很好地完成了省苏维埃政府的各项重要任务。

红军西征后,根据前方报告,甘肃的哥老会势力很大。因此,做好哥老会的工作至关重要。马锡五主动向省委报告,说明自己在22岁时参加过哥老会,对哥老会情况比较熟悉。省委研究决定,派马锡五到环县、曲子一带去做哥老会的工作。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向哥老会群众宣传革命主张,耐心进行教育争取,工作颇有成效,为后来巩固陇东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原属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管辖的地区,划分为三边和庆环两个专区(后改为陇东专区)。1937年10月,马锡五被任命为庆环专区专员兼曲子县县长;1940年春至1946年春,又担任陇东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等职。在1939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

马锡五在陇东担任专员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特别是1941年组织运盐,成绩卓著,受到边区政府的嘉奖。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边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急需将定边和盐池县出产的食盐(当时食盐占边区出口额的90%)运出去,以便换回所需的物资。因此,边区政府决定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完成运盐任务,分配给陇东分区的运盐任务是22万驮。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陇东分区抱定

“党的决定必须坚决完成”的态度，立即动员起来。马锡五多次赴曲子、华池、合水、环县等地，一面向对运盐的工作缺乏信心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同时也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实际困难，如陇东牛无鼻环，车无铁瓦，很难进行长途运输；庆阳、合水、镇原三县的驴子不放青，必须喂草料才能驮运，但地处运输线上的曲子、华池、环县正值灾荒，草料昂贵，增加了牲畜的死亡事故，因而引起部分运盐群众的不满。在这一系列的困难面前，马锡五除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外，便和群众一起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接着，他不辞辛劳，翻山越岭，经过数百里的崎岖山路，前往定边订立运盐合同。一路上，他同运输队的群众一起研究运输方式，勘查道路，规划修路工程，研究设立供人畜食宿的店站，并与三边专署商定分工负责，互相协作。为了方便运盐群众和减轻群众负担，专署制定了统一的客店管理办法。这一切都为顺利完成运盐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久，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陇东分区的运盐任务，更加增强了干部群众完成运盐任务的信心。由于上下团结一致，经过艰苦的奋斗，最后陇东分区完成了全边区运输公盐总额二分之一的光荣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表彰书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在马锡五等同志的积极领导下，陇东分区胜利地完成运盐任务，“不仅做到了调剂民间需要、平衡收支与稳定金融的作用，而且直接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建设事业得以支持，这种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三)

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各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由专员兼

任分庭庭长。依照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的规定,马锡五即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分,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他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并能虚心学习。他不愿当挂名的庭长,经常抽出时间直接参加一些案件的审判。在司法实践中,他遵循党的教导,牢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的题词^①,深入群众进行巡回审判。他依靠群众,及时纠正了一些错案,解决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使违法者受到制裁,无辜者获得释放,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边区政府把这种贯彻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的办案方法,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刘巧儿”——华池县女青年封捧的婚姻上诉案,就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典型案例之一。

有一天,马锡五来到华池县巡视工作,突然遇见一个年轻的姑娘拦路告状,声言她对县司法处的一审判决不服,要求马专员秉公处断。马锡五经过初步询问后,又深入到当地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原来,这个姑娘名叫封捧,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封捧长大成人,经介绍曾与张柏见过面,双方都愿意结为姻缘。但此时,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得“彩礼”(实为变相买卖婚姻),便与张家退了婚,将女儿准备卖给庆阳财主朱寿昌。张家得知此讯,立即纠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将封捧抢回成亲。封彦贵告到县司法处,裁判员没有经过调查,便宣布张柏与封捧的婚姻无效,对抢亲的主犯判处徒刑,草草结案。封捧不服,便拦路上告。马锡五掌握了上述案情后,又重点了解了封捧的态度,她坚决不嫁朱寿昌,“死也要与张柏结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马锡五召开群众性的公开审判大会,广泛听

^① 1943年2月3日毛泽东为马锡五亲笔题词。

取了群众意见,最后做出如下判决:一、封捧与张柏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等黑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张金才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和者给予严厉批评,以明法制;三、封彦贵屡次高价出卖女儿,违犯婚姻法令,科处劳役,以示警戒。这一判决,打击了封建买卖婚姻,保护了正当的婚姻关系,也惩办了违法者,因此,当事人无不表示服判,群众也认为二审判决是非分明,入情人理,热烈拥护。

马锡五在陇东分庭工作期间,还亲自审理或直接领导处理了大量案件。譬如,果断排除曲子县苏发云兄弟“谋财杀人”的嫌疑,将真正凶手捉拿归案;指导审判员依靠群众细心调解了合水县丁、丑两家缠讼多年的土地争议案;实地勘查并正确解决了王治宽企图霸占王统一的场院地基案等。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普遍受到群众的好评,因而马锡五被当地群众称颂为“马青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结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发布文件和社论,在全边区加以推广,为解放区的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

(四)

马锡五在1946年4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和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离开陇东到延安,领导全边区的司法审判工作。

马锡五到边区高等法院后,仍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好传统。他将高等法院的工作安排就绪后,就又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当他来到延安县司法处时,审判员向他汇报了一件长期缠讼不知如何处理的棘手案件,即杨兆云控告区乡干部多收公粮的行政诉讼案。马锡五听了审判员的汇报,经过实地调查,发

现本案的事实是：杨兆云应交公粮一石多，家里麦垛一直未脱粒，乡干部催他数次，他既不交粮，也不打麦，引起乡干部的不满，便报告区上说杨抗粮不交，影响公粮入仓，并提出如杨再不打麦，就派民兵前去打麦交粮。杨兆云见乡干部态度愈来愈强硬，就叫他儿子背上二斗麦子送到粮库。打了收条。而乡干部得到区上批准后，即派民兵将杨家麦垛拆开，打了一石多交了公粮，加上杨家自交的二斗，多收了一斗多。因此，杨兆云先向区、县政府提出控告，没有解决，才正式向司法机关起诉，并提出三点理由和质问：一、头一天他已交了二斗麦子，为什么说抗粮不交？二、为什么要多收他家的麦子？三、民兵强打民粮，是否违法？

马锡五掌握了上述案情，认为区乡干部强迫杨家多交了公粮，确属违犯征粮法令，同时也暴露了区乡干部中存在严重强迫命令和官僚主义作风。杨兆云将在区县政府未解决的问题而起诉到司法机关，完全是他应有的权利。特别是杨兆云提出的三点质问，确实抓住了要害。此案长期拖延的主要原因，是区乡干部不肯正视自己在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因此，马锡五便到区公署召开干部会议，首先批评区乡干部强迫命令、不深入调查研究的官僚主义作风，特别是区干部竟然批准民兵强打杨家的麦子，纯属违犯政府法令的行动。最后决定：区乡干部应主动向杨道歉；多收的公粮必须如数退还；杨家是军属，如生活确有困难，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以适当照顾。这样，便为全案的解决，扫清了道路。

(五)

1949年2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改为边区人民法院。同年5月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进驻西安。1949年12月，

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1952年8月,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8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后相继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1955年召开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时,紧紧握着马锡五的手,热情而风趣地说:“马锡五你来喽!你来了,事情就好办啦。”此后,马锡五在谢觉哉院长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最高审判机关担负的各项任务。

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董必武多次向他提出要认真总结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丰富经验,并从理论上加以提高。根据这一要求,马锡五陆续写了一些文章。一篇是《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发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系统地回忆了自陕北红色政权创建以来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发展概况,以及法院各项工作制度的创立和发展;一篇是《政法研究》1956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当前审判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着重总结了建国以来全国审判工作积累的重要经验和各项工作制度。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对于继承和发扬革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一步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提高审判工作和书记员工作的质量,逐步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锡五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仍然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他经常教育司法干部,调查研究要有群众观点,要体贴群众的困难,处处方便群众。他到基层了解情况,不论到哪里,都能平等待人,和群众打成一片。1959年春季的一天,湖北省孝感县花园人民法庭来了一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同志,他们拿出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张敏二同志前来了

解情况。”县法院的同志将他们安置好后，每天和这位和蔼的“老头”一起饮食起居，毫无拘束。这位老同志有时到派出所了解社会情况，有时到附近农村与社员一起劳动和聊天。群众见他说话和气，同他也就无话不谈。半个月后，县法院接到上级电话，大家才知道这个“老头”原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马锡五副院长。这件事情虽然很平常，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一位了解这一情况的同志所说：“人们每回忆起这些情景，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那种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优良作风，对于某些领导干部下来时那种蜻蜓点水，主观武断，前呼后拥，吃喝受礼的‘钦差大臣’作风，难道不是一面镜子吗？”^①

1962年4月10日，马锡五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7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4月11日写了《锡五同志千古》的悼词：

昨日惊闻噩耗传，
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
风雨同舟十二年。
未即病床谈片语，
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
道马青天不置焉。

马锡五病逝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锡五同志今晨三时逝世，悼以诗。

^① 参见《回忆马锡五同志在花园法庭》，1981年1月23日《中国法制报》。

锡五同志：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一棵树，
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
你做司法工作：
不为陈规束缚，
不被形式纠缠。
能深入、能显出；
既细致、又自然，
人民叫你马青天。
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
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
‘马锡五审判方式’贯彻到许多案例，
《刘巧儿》只是个小小的流传。
病，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的品质、智慧、作风，
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锡五同志：永别了！
记起了在瓦窑堡初次认识你，
到而今已有了二十七年。”^①

在这两首悼诗中提出的“法曹英贤”，“马青天”，“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边区惠爱人思念”，“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这些字字珠玑的诗句，代表了党和人民对马锡五革命一生的崇高评价和诚挚的怀念。

（张希坡）

^① 引自谢觉哉日记（1962年4月10日）。

王世英

(1905—1978)

王世英，字子杰，山西省洪洞县人，1925年2月入党。1924年北京政变后，太原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搞“抗税运动”，王世英积极参加了反对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斗争。1927年3月，王世英被党组织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团党代表办公室任主任。1930年1月，阎、冯反蒋战争即将开始之时，王世英接不上党的关系，参加了阎军。1931年10月，王世英经党组织考察后，被派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1938年1月，王世英调延安，进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1945年4月，王世英出席了党的七大。1950年王世英先后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长等职。1968年3月26日含冤去世。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王世英平反昭雪。

(一)

王世英，字子杰，1905年11月13日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杜戍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21年高小毕业后，适逢太原国民师范招生，他步行600里去应考，被录取。国民师范学校是官费，实行半工半读，每天做两小时工，王世英非常珍惜这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勤奋。当时，学校里禁看介绍新思想的书刊，王世英

带头反抗,联络了一些同学互相掩护偷着看,并经常在一块儿商讨怎样开展斗争。

1924年北京政变后,太原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搞“抗税运动”,国民师范的学生也纷纷起来闹学潮。王世英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对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斗争。他鼓动同学利用学校寒假考试的机会进行罢考,以示抗议。斗争取得了胜利,赶走了校总干事以及各班的班主任,改组了学生会,但寒假结束后,他却因带头闹事,被校方开除。

被开除后,王世英到开封考入国民军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办的学兵营。学兵营营长刘天章是共产党员,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教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王世英在这里更加广泛地阅读革命书刊。共产党员高维翰(后叛变)发现他追求进步,便经常找他谈话,并介绍他看《共产党宣言》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书籍。1925年2月,由刘天章、高维翰二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常委。4月间,胡景翼病故,部队中旧势力的代表岳维峻上台,对革命势力严加压迫。党组织决定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分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学习。王世英于1925年八九月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

王世英入黄埔不到一个月,就随入伍生团出征,打下惠州后,即驻防惠州训练。1926年2月,王世英升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二团学习,曾在二团七连任班长。在紧张的军训中,他仍积极进行党的工作,除定期过党组织生活外,每周还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一次党的政治时事报告。

1926年11月,王世英由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担任三中队分队长和党支部委员。纠察队收入低微,生活很苦,曾有人想拉他到别的军队当连长。他一口

拒绝,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升官发财。”

1927年3月,党决定把一部分干部调到部队去,王世英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团党代表办公室任主任。这支部队比较进步,驻在广东北江的韶关、英德、清远一带。这时,蒋介石已决心背叛革命,形势非常紧张。教导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做了战斗准备,计划武装农民,同部队配合,必要时占据北江。

4月初,党组织计划搞农民暴动,派王世英到广州去买手枪。他带了一千多元,买好七枝枪,正准备返回时,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水陆交通全部断绝。王世英急着想赶回教导队交待任务,便雇民船沿北江而上。到了清远县内,被叛军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在清远县监狱关了三个月,后被驻在该县的黄埔同学杨振亚保释。出狱后,王世英托辞身体有病,对杨振亚说他先到广州看病,再回来报答救命之恩。杨振亚答应借给他20元钱,看完病后再回来。王世英到广州后,便隐藏到省港罢工工人的宿舍里,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7月,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乘船到了上海。不料上海党的交通机关刚遭到破坏,王世英接不上关系,随即秘密转到武汉。

这时的武汉,形势也很紧张。王世英到后,与军委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叶挺师当连长。上午刚到连队,下午又接到命令,让他到河南十九军高桂滋部工作,一块去的有曾晓渊、张庆孚、张友清等30余人。他们经过两个月的辗转,9月间才由高桂滋的秘书胡纶接送到高部,王世英被任命为营政治指导员。后来,部队由河南移至皖北。不久,杨虎城第二十军也由陇海路转移至皖北太和一带,共产党员魏野畴任政治部主任。是年冬,中共皖北二届特委成立,王世英任皖北特委、亳州特分委委员。不久,杨虎城也积极要求我党派人去工作,王世英便由高桂滋部调到杨虎城部冯钦哉

师当参谋。

1928年2月,皖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决议。暴动前,王世英化名王敞,利用驻军之便,经常深入亳州一带农村发动农民,住在谷堆集东约七八里的一个姓梁的党员家里。4月8日,皖北暴动的命令传来后,他积极组织农民武装,不分白天黑夜,印传单、贴标语,召集农民开会,鼓动农民的革命勇气。这次暴动因力量不够、准备不充分而失败。王世英当天晚上跑到谷堆集一位同乡的店铺内住了一夜,第二天赶到太和找到部队。由于暴动失败,部队里的一些党员也开始动摇,甚至还有两人企图叛变,王世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枪毙了这两个人,拿了一枝枪离开了部队。

王世英由太和跑到河南开封,这里形势也很紧张,不凑巧他又染上了疟疾,既无人照料,又无钱医治,只好向朋友借了点路费,暂回山西洪洞老家养病。回家后,王世英看到《山西日报》也登载了缉捕自己的通缉令,只好假称报上通缉的是崞县的王世英,不是自己。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他每日躲到地洞里。

一个月后,病还未好,王世英又改名王子杰,跑到北平寻找党的组织。阎锡山在北平的势力很大,其中有不少国民师范的学生。王世英在一些左派同学的掩护下,一面找工作维持生活,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听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成立政治部,需要人,他便在此觅得了一个科员的位置。与此同时,党的关系也接上了,交给他的主要工作是了解蒋桂冯阎各军阀之间的关系,联络各地失散同志,并在军队里搞兵运及发展党的组织。

1929年5月,第三集团军政治部派王世英到阎军山西卫生团政治部担任主任。这时,阎锡山、冯玉祥同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阎、冯暗里积极进行反蒋活动。按照党的指示,王世英在部队

积极开展反蒋宣传。到了8月间,卫生团结束,王世英又返回北平。

9月,王世英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接连三次审讯,王世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过了三个月,敌人还没有抓到证据。党组织通过王世英的老乡、河北省建设厅厅长温寿泉,向阎锡山驻北平代表赵培廉求情保释,王世英始得出狱,但他又一次同党失掉了联系。

1930年1月,阎、冯反蒋战争即将开始,阎锡山大量扩编部队。王世英接不上党的关系,遇到阎军中同村的一位营长郝礼耕。郝邀他当副营长。王世英勉强接受,参加了阎军。

同年七八月间,阎锡山的这支部队开到河南安阳一带驻防。这里中共组织的活动很明显,到处可以看到用粉笔写的革命标语。一天,北平宪兵司令部发来密报,要部队到一个地方搜查捕人。营长命令二连连长王风山去。王世英为找到党组织,同时也好作掩护,便要求同行。去后,见有几个铁路工人在打牌,可能是借打牌为掩护在开会。搜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王连长要把在场的人抓走,王世英说:“没搜出证据,先不要带人,以免引起铁路工人不满,造成罢工。”实际上他是在保护这些同志。回来后,营长拿着命令还要去逮捕那几个人,王世英又说不如先稳住,第二天再去捕。这样,中午乘营长午睡时,他拿上命令到那个地方,通知了那里的同志,催他们快走,并要求他们同自己联系。第二天,搜捕的部队去时扑了空,但因情况紧张,党的关系还是没有接上。此后,这支部队在山东作战被打败,王世英于12月返回山西小住,复于1931年2月到西安寻找党组织,经人介绍在杨虎城部严沛霖团任副营长。此时,他曾同一些党员联系,但因种种原因,组织关系仍未接上。同年秋,王世英同上海中央军委的刘子华(刘仲华)取得

了通信联系，遂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二)

1931年10月，王世英到了上海。经党组织考察后，同年底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党的情报关系。王世英在南京同学多，熟人多，他本人一向为人正派，在同学中有相当高的威信；加上正值蒋介石要下野，南京很混乱，所以，工作进展很快。当时，打入复兴社的人最多，其他如中央党部、外交部、立法院、铁道部、军校、铁甲车纵队等部门，都建立了党的情报关系和外围关系。1932年，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成立，王世英提议派人打进去，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先后派七八个同志打了进去，这样一来，蓝衣社的很多活动情况，党组织都能很快知道，工作很顺利。王世英在南京一年，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要去上海一次，向党请示汇报工作。这期间，他曾奉命去西安一次，与杨虎城部的骑兵团团长、正酝酿准备率部起义的王泰吉联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夜，他正在上海汇报工作，曾奉命留在十九路军工作了一段时间，停战后才返回南京。

由于当时中央“左”的错误指导，对南京的工作要求过急，加上王世英在南京活动较久，引起敌人的注意。一天深夜，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同乡简北昌送来敌人抓他的密信，王世英连夜转移了住址，把工作移交给卢育英，于1933年2月奉调回上海。

王世英到上海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迁往江西苏区，不久成立了上海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白区工作。王世英被分配在军委情报部工作，任务是向外派遣人员，接头、谈话，编辑情报供中央参考。此时，他的原配妻子在老家病逝，他同共产党员

李果毅结婚。

1934年,上海中央局对国民党江西德安专署专员莫雄做了许多工作。莫雄是孙中山时代的老国民党员,不满意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同情共产党。他在德安专署当专员期间,王世英曾派了很多同志到那里去工作。当时敌人加紧对苏区封锁围攻,采用碉堡政策,步步为营,使红军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上海中央局决定炸毁南浔路之德安铁路和南昌飞机场、油库。王世英和其他同志全力以赴布置这一项工作。除在德安专署内和南昌市建立据点外,又在南京、九江布置了交通站,如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就是他们与江西来往、通讯、汇款和转运东西的重要交通站。

这时,蒋介石正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气焰十分嚣张。敌人一方面加强进攻苏区,一方面加紧后方的“清理”,以上海为重点,提出前方“剿匪”和后方“剿匪”同时并进的口号。中共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1935年不断遭到破坏。在白色恐怖下,王世英不顾个人安危,在新成立的上海临时中央局领导下,努力为党工作。他认真研究白区工作的特点,从血的教训中不断改进工作,减少党的损失。在斗争中,他学会了机智灵活的斗争方法。过去发展了地方关系,便转交给地方,但因地方党的关系经常被敌人破坏,而且每次破坏就直接牵连到情报部门,王世英就决定以后不再轻易转交关系。

1935年7月,上海临时中央局被敌人大破坏,有40人被捕。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王世英等仍坚持斗争。“8月26日,临时中央局接到了王明、康生5月3日和5月5日发自莫斯科的两封信,其中5月3日的信中指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遵照这个指示,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宣告结束。”临时中央局的

同志有的去了武汉，王世英等转移到天津，在上海只留一个交通站，由邱吉夫负责。王世英到天津后，仍经常同邱吉夫（化名小张）联系。

接着，许多在外地无法立足的同志，纷纷来到天津。他们要住房，要吃饭，要继续向外转移的路费。但当时国际关系、苏区关系均已断绝，经费完全没有来源。王世英依靠大家努力，使这批干部保存了下来，并且使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据后来统计，在王世英的领导下保存下来的干部约有500多人，其中有毛齐华、王文学、南汉宸、刘道衡、陈雷、刘贯一、张友渔等。

不久，王世英担任了中共北方局的情报部部长。他曾让南汉宸通过申伯纯作杨虎城的工作，鼓动杨虎城抗日救国。1935年底，长征初到陕北的党中央，派汪锋持毛泽东信去西安找杨虎城，谈判联合抗日问题。杨虎城因不了解汪锋的来历，遂派省府秘书崔孟博（地下党员）去天津寻找南汉宸查证。适逢南汉宸当时不在天津，北方局便派王世英随同崔孟博，于1936年2月秘密前往西安。王世英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是亲自和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的具体办法；二是取道西安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几年来白区工作的情况。到西安后，崔孟博告诉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说他带回一个比南汉宸更为重要的人物。王菊人把王世英带到九府街（今青年路）杨虎城别墅止园的客厅。为了不走漏风声，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王菊人先把王世英锁在客厅东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又到新城把钥匙交给杨虎城。中午，杨虎城去止园，先到自己的卧室更衣，装着要睡午觉的样子，等警卫人员离开后，悄悄打开那间小房子的门与王世英商谈，王世英还向杨虎城证实，汪锋确是自己的同志。双方以南汉宸过去所提六条建议为基础，进一步作了具体协商，达成了四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况。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几天之后,杨虎城给王世英和汪锋 500 元路费,送他们去陕北。2月下旬,王世英到达瓦窑堡。这时,中央多数同志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过黄河到了山西,他又赶赴山西前线,向党中央汇报了白区工作和同杨虎城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对王世英的谈判很满意,中央同意王杨协议。于是,共产党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三个军部设立了三个交通站,人员来往很方便。共产党员在杨处换上十七路军军服,就可以自由出入,军用品及其他物资都可以由此通过。

王世英在山西前线汇报完工作后,党中央决定他仍回天津工作。4月,他到天津时,党中央已派刘少奇(化名胡服)担任北方局书记,领导白区工作。

为了恢复两广的党组织关系,刘少奇曾派王学文、宣侠父去香港,但当时留在香港的胡某等不予接头。刘少奇又派云清(云广英)去港,亦遭到胡某等的排斥。王世英到天津后,刘少奇再派他去两广联系。王世英于7月抵香港,胡某已离港去了广西。此时,他接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这个宣言支持两广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对两广党的工作提出了方向。王世英从香

港到广西后，把中央的“宣言”印成传单，交给胡某，但胡不让传单与群众见面，也不敢给李宗仁看。王世英将胡某拒不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中央把胡某等二人开除出党。

王世英在香港期间，还通过一位姓陈的同志，和当时在澳门的叶挺建立了直接联系。

1937年上半年，王世英从天津到北平时，获悉宋哲元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既想保存其实力，不想撤走，又不想当汉奸，还想抗日。针对这种情况，王世英和肖明等通过宋的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地下党员）转达了我党的意见：希望宋能抗日；军官学校不能只读四书五经等，要积极地培养抗日干部，准备抗战。宋表示同意，并要求我党予以帮助。于是党即派张友渔和温建公以大学教授名义，到军官学校教政治课，讲授国际时事和抗日救国道理，激发了下级军官的抗日救国热情。接着，王世英又负责起草了给宋哲元的建议书，经刘少奇修改过后，送给宋哲元，建议他实行以攻为守，积极防御的方针，当日寇侵犯时，先发制人，占领山海关，缩短防线，可以迫蒋抗日。宋哲元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大加赞赏。随后，王世英还把靖任秋派到宋部任情报处处长，从而使我党掌握了宋哲元的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北方局从天津迁往北平，不久又迁到太原。在太原时，王世英曾接代彭雪枫负责过一段红军办事处的工作。

这一时期，王世英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一些地方势力中，广泛结交上层爱国进步人士，扩大党的影响。在他的领导下，编印了《情报三日刊》和《广闻通讯》。前一刊物主要供中央负责同志参阅；后一刊物主要反映文化界及上层文化人士如李公朴、郝梦九、续范亭等人的情况。他还领导和组织了对上层人物如杨彰武等的工作，为党中央收集了大量重要机密情报，如蒋介石的《国民党抗日战争

战时战地组织条例》、《国民党战时反共灭共办法》等秘密反共条件，曾受到中央社会部书面表扬。

(三)

1938年1月，王世英调延安，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进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长期的白区工作，使他很少有机会钻研理论问题，这一次，他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组织生活方面的知识，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这期间，他听说毛泽东和江青要结婚，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他在上海中央局工作时，了解江青的不光彩的历史。出于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在小组里首先提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不要同江青结婚。这封信由他起草，并头一个签名，接着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谢祥荫、申伯纯、肖明、邱吉夫、刘子华、阎揆要、王超北、梁明德、邹大鹏、朱大鹏、余宗彦等。后来又由他把信交给了中央领导人张闻天。

1938年8月，朱德总司令从晋东南回延安不久，由王世英陪同又到山西吉县古贤村拜访了阎锡山。双方商定，第十八集团军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地设立办事处。朱德当场指定由王世英任处长。阎锡山表示同意。于是，1938年10月，王世英到山西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临行前，朱德代表党中央同王世英作了一次长谈，指出：办事处对阎锡山要采取拉的政策，具体做法是：一是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他若投降日寇，将在战场上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二是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因为他可以在八路军与中央军之间起一些缓冲作用，他若被蒋介石吞并掉，我们陕甘宁边区的东南翼将会遭到蒋介石更严密的封锁；三是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

告。

王世英在八路军山西办事处工作期间，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这一决策，同阎锡山进行了机智灵活、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都是公开身份，王世英和同志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抓住各种机会，给阎锡山的高、中、下各级干部做抗日工作。他首先从做上层的联络工作开始，同阎锡山的高级官员孙楚、赵戴文、王靖国、赵承绥、郭宗汾、杨爱源等经常来往，同时也和阎锡山的五妹夫梁延物、国民党省党部书记李光洋有来往。这样中层看上层，下层看中层，很快上中下层都开始和办事处来往，尤其是阎锡山司令部的许多青年人，经常到办事处找王世英了解前方情况。王世英利用同这些人接触的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利用阎、蒋矛盾，争取阎锡山抗日，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间，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布致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皓”、“齐”两电，勒令八路军撤到黄河以北，企图逼阎锡山“剿共”。阎锡山接电后，征求高级部属的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世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面见阎锡山，陈述团结抗战反共倒退的利弊。他以大量事实说明，蒋介石此举目的是把自己同八路军的矛盾转嫁给阎锡山，利用阎锡山的势力来同八路军作战，造成两败俱伤。王世英还利用我党的内线力量，向阎锡山展开“劝说”，终于使阎锡山置何、白电报于不理，保持了中立，为我党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反共高潮，积极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11月，阎锡山与日寇勾结愈加频繁。王世英将此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指示要向阎锡山面陈我党坚持抗日的主张。阎锡山平时很爱听人讲形势，王世英就以报告形势为由，同

阎锡山约定了十五分钟的会见时间。会见时，王世英给阎锡山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他指出：日寇现在已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西伯利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的西伯利亚是个穷地方，人烟稀少，气候也很寒冷，日寇现在是缺少人力物力，进攻和占领西伯利亚，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对他毫无益处。但他还不想停战，要配合德国进攻，发动新的战争，就要找资源丰富的地方，不会找人烟稀少的地方。阎锡山问：“委员长（蒋介石）如果同日本人妥协谈判怎么办？”王世英说：“蒋介石打得是抗日旗子，他如果丢下抗日的旗子，投降日本人，那正好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的政治资本就要失掉了，他的假面具就被揭穿了，人民会唾弃他，忠奸就分明了。”阎锡山又问：“你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怎样？”王世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抗日一定要抗到底，谁投降日本人，我们都不能坐视不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多钟头，使阎锡山很受震动，他的降日计划开始动摇了。不久，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阎锡山的部下背后讲：“上次八路军王世英处长的谈话是对的。”他们更佩服我党我军，提起王世英，都称赞他是个有本事人。在王世英的努力工作以及客观形势的逼迫下，阎锡山对日本人的妥协投降活动不得不暂时停止。

王世英巧妙地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随时掌握阎锡山的动向，及时向党中央提供各类军事、经济等情报。他在阎锡山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高级部门都发展和安排了共产党员，如赵宗复利用其父赵戴文同阎锡山的密切关系，经常出入于阎锡山的高级部门；张友清在办事处掩护下，以秘书长的名义做党的工作；杜任之也曾在国民党省党部为共产党工作过。王世英还在这些机构中联络了许多同情者，如阎锡山的

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的杨大山、警备司令阎家凡、中央社记者郭路旁等。通过这些内线人物，阎锡山的一些秘密活动和机密文件，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及时知道，报送党中央。1939年，蒋介石发的三个消灭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就是他们搞到后送往延安的。1942年夏，日寇和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派人到山西吉县和阎锡山秘密谈判，欢迎阎锡山进太原。阎锡山犹豫不定，想投靠日寇，保住自己的势力。这一情报，很快被我方通过内线关系搞到手，王世英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决定，以斗争求团结，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公开揭露了阎锡山投降日寇的企图。在二战区，王世英领导办事处的同志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利用内线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散发报纸，大造舆论，联系阎锡山内部的爱国人士向阎锡山规劝。为了不使阎锡山投降日寇和被蒋介石吃掉，办事处和有关党组织还利用阎锡山集团内部进步力量，成立了“同志会”，以此拉住阎锡山。结果，迫使阎锡山未敢投降日寇。

为了支持阎锡山不被蒋介石吞并，王世英针对蒋介石在经济上卡阎锡山的情况，主动向阎锡山提出同陕甘宁边区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经济往来的主张。阎锡山这时只占晋西、吉县等几个小县，一无工业，二无资金，听说中共愿意同他搞经济往来，非常高兴，立即派他的妻弟徐士琪同王世英接触，谈判具体事宜。阎锡山需要煤油、盐等物资，我们边区有延长炼油厂，有花马池的食盐，就同意用这些东西换取他们的布匹、印钞票的道林纸、小五金、电料、电器、钢铁、汽车等。协议达成后，每天双方都有四五个骡子运货物。为了躲开蒋介石嫡系军队，交货地点都设在比较隐蔽的黄河渡口，如吉县龙王山北边的马头关、凉水源、秋林等渡口。货到渡口，双方都用羊皮筏子来回运送。

王世英常对办事处的同志说，做内线工作是提着脑袋工作的，

万一被捕,即使牺牲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不能叛变。1940年11月27日黄昏,胡宗南宜川驻军突然进入阵地,关了宜川城门,包围了八路军办事处,把办事处的同志们全绑了起来,并进行殴打、侮辱。王世英的爱人李果毅也在其中。此时,王世英碰巧到阎锡山克难坡司令部去了。听到消息,他立即采取营救措施,向阎锡山和有关方面提出抗议,进行交涉;同时给被押的同志传递消息,鼓励他们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军只得全部释放了被押同志。这次事件中,同志们没有一个惊慌失措、失节叛变的,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

王世英非常注意培养干部,经常亲自传授搞内线工作的经验。他还从二战区介绍了一批青年到延安学习,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王世英在八路军山西办事处工作三年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多次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表扬。1944年,毛泽东和朱德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四)

1942年初,王世英奉命调回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先参加了中央军委学习委员会的工作,以后又调到中央党校工作了一个时期。他后来回忆说:“这时候最忙,又要审查材料,又要写证明,又要谈话,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帮助一些同志把问题弄清楚,确实起了不少作用。对于组织原则的掌握和运用上,以及对敌人提高警惕性方面,均有所提高,可以说是入党以来最大的收获。”

整风运动的后期,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

“抢救运动”一开始，王世英发现他所在的支部被确定为“特务”的几个同志，经调查核实后并不是事实；在别的单位，有几个他很了解的好同志，也被指控为特务。因此，在一次支部会上，他提出运动有些过“左”，应该赶快纠正。但是王世英这次发言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却被一些同志认为是“右倾”。王世英想，许多好同志遭诬陷，对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理由对党说假话。于是，他又大胆地向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写了一份报告，说运动的发展有些“左”，请中央纠正。在这封信中，他根据自己了解的事实，为已被指定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即魏巍）、周峻烈、钱来苏（民主人士）等六同志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这些人都是好同志。

这封信刚发出，其中有两个同志已被迫“坦白自首”。这一下，触怒了康生。他半夜给王世英复了一封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并威胁王世英要把党票好好收起来。在杨家岭中央学委会上，康生曾指着王世英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逞英雄，说：“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你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在党校千人以上的干部会上，更公开诬陷王世英和孔原等是“大特务”。但王世英并没有就此害怕低头。他态度坚决，神情坦然。会后，有的被点名的同志找康生作解释，王世英谁也没去找。他心里无愧，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一次，毛泽东见了王世英问道：“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王世英笑着说：“说我什么都可以，过十年后再看，十年之内可以做出点工作成绩吧！到那时再看王世英是不是特务。”毛泽东听后鼓励他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这句话对王世英的鼓舞很大。这说明中央是了解和信任他的，是关心和爱护他的。

在整风运动中，王世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

敢于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事后，陶铸曾对王世英说：“在那个时候，你敢出来说话，这一点我很佩服你！”

1945年4月，王世英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以后不久，中央决定王世英担任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专做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945年12月，王世英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停战协定签字后，王世英奉命去徐州建立军调部三人小组，3月回延安汇报工作。同年夏，他因脚气病复发并继发感染，在延安医治，不料由于用药过量，致血液中毒，数月不能行动。中央送他到北平、张家口治疗。10月，蒋介石占领张家口，王世英先回延安，继又奉命经晋绥解放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对沿途各地的国民党军工作做了深入的检查和具体的部署。不久，中央任命王世英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部长，专管国民党军工作。1947年夏，为配合刘、邓大军渡河南下，他一方面在部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通过各种内线关系对国民党军队发动宣传攻势，在开展“高树勋运动”，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8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王世英仍做国民党工作，任副参谋长。他召集了这两个军区的国民党军工作会议，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任务。

同年9月，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进攻太原，在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王世英又率有关人员进驻榆次，除大批训练、释放阎锡山及黄樵松部被俘虏军官外，还积极策动国民党第三十军黄樵松部在太原起义。就在起义前几个小时，由于黄樵松部副军长出卖，黄樵松军长和解放军派去的一个参谋处长被阎锡山逮捕，被送往南京枪杀了，致使起义失败。解放军暂时放弃攻城。之后，王世英回到

华北军区,配合第四野战军攻打天津。

1949年1月,解放军攻克天津。王世英奉命参加了天津军管会工作,任军管会参谋长,后兼任警备副司令员,党内职务是市委常委。

(五)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派王世英回山西工作,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兼政法委员会主任等职。

从白区工作、军队工作转做政权工作,对王世英来说是个崭新的课题。他深深感到自己需要学习,并制定了学习计划。他很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经常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断改进工作。当时交通不便,他常骑着毛驴,从这县转到那县,从这山转到那山,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基层。

他在农村看到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形势很好。他给基层的干部们讲,要珍惜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千万不能挫伤,要帮助贫苦的农民富裕起来。

这一时期,王世英主要分管政法工作。他深入群众,亲自翻阅案卷,细心研究,查证了一些重大案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数百件冤、假、错案。

1954年,王世英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利用休息时间,找许多同志谈工作,每天都谈到深夜。由于长期连续紧张劳累地工作,在会议结束返回太原的列车上,他突患脑溢血,致使身体左侧半身不遂。

1955年,病情稍有好转,他又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

省省长。此后由于身体情况仍然不好,为了不影响工作,他在1958年主动辞去了省长职务。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调到了北京。

从1958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王世英经常到外地去休养。他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1959年11月,他到广东海南岛等地;1960年夏天,他北上东北三省,参观了大庆、小兴安岭、牡丹江和一些军垦农场;又越秦岭入四川,南抵贵州、广西等地;1962年7月,他经大同到内蒙古,参观了百灵庙等地的牧区和包钢、白云鄂博铁矿;之后,又西去宁夏、青海,在柴达木盆地、盐湖、露天铜矿、盐锅峡水利工程工地度过了一个夏秋;同年11月,他又南下到了上海、福建等地。短短几年,他踏遍祖国南北东西,每次从外地回来,都要给中央递上一份专题报告,而且每次报告都是他亲笔写的。

1958年“大跃进”时,正在鞍钢视察的王世英,看到外地的人都大批来到鞍山,安营扎寨,大炼钢铁。他对此提出意见,说:“光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行啊!”随后他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反映。

1962年夏,王世英回到山西农村搞调查研究。他认真听取老农意见,和基层干部广泛交流思想,研究生产。他给山西和中央写了《晋南观察报告》,主张棉花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都应包产到户,对劳动致富的农民不要管的太严,不要“鞭打快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全国解放后,王世英身居高位,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他工资不低,可是穿的衣服经常打补丁,对家人孩子,要求也很严格。他一家和工作人员和睦相处,关系非常亲密。还经常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有时一送就是几百元。

1962年,王世英任中央监委专职委员。他对党内生活不正常

的情况,尤其对康生的卑劣行径,毫不隐讳地提出过反对意见。

当时,康生诬陷国家进口货易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王超北曾和王世英在抗战时期一起工作,王世英很了解他,便赶去向康生当面说明情况。当康生不理睬他的劝说时,他生气地说:“这个人(指王超北)在抗战时期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当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这样做我觉得不对,太伤同志的心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同志。”康生当时主管中央组织部,让安子文转告王世英,不要再管这个事。王世英对此非常反感。他不能看着一位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而不管,也不畏康生的权势,曾多次给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康生对此非常恼火,双方关系闹得很僵。

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对江青、康生的情况很熟悉,康生极力想拉住王世英。一次,康生到王世英家,送给他一副端砚,说可能是岳飞用过的。秉性耿直的王世英根本不买他的账,照样在原则问题上和他相持不下。一次,王世英从康生家出来,坐到车上,脸气得通红,双手抽搐得很厉害,服务员小武知道他又生气了,便劝他:“王老,人家那样大的职位,你能闹过人家吗?”王世英毫不畏惧地说:“我不怕,我说的全是事实,他不能怎么我!”1960年国庆节,王世英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王世英和江青走了个迎面,旁边的小武低声提醒他:“王老,江青过来了。”他没吭声,低着头照直向前走去。回家的路上,小武问王世英:“王老,人家都争着和江青打招呼,您咋理都不理?”王世英轻蔑地“哼”了一声:“这种女人不值得理!”

王世英对逆境中的同志非常关心。有一次,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给刘亚洁作了历史结论,定为叛徒、特务。王世英在北京见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苏谦益时就毫不客气地问:“你们这样做,进

行过详细调查吗？”苏谦益说：“据调查材料是这么写的！”王世英说：“刘亚洁是我领导下的同志，叛变没叛变，我还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不向我调查就给人家定性？你们这样做太不负责任了。”黄克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王世英经常到他家去，和他谈心。王世英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去开导他们，给他们点温暖。他们要在台上时，我还不一定找他们呢。”1960年秋天，黄克诚来见王世英，他在车上对迎出来王世英说：“我给你带来点油，你敢不敢吃？”王世英开玩笑地说：“是我吃油，还是油吃我，有什么不敢？”说着哈哈大笑把油接下来。周小舟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联盟”的成员以后，别的人怕涉嫌，不敢和他来往，可王世英却不怕这些。他1962年冬和1964年冬两次到广东，都找周小舟会面，而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王世英这种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党内外广大同志的钦佩和爱戴，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党内“海瑞”。

也由于王世英正直无私、敢于斗争，使康生、江青对他更加仇恨。他们给王世英扣上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等罪名。王世英对康生一伙倒行逆施的行为非常气愤。1962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首斥责康生的诗：

阿谀逢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六)

1966年元旦的晚上，年逾花甲、半身不遂的王世英，似乎预感

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将要发生一起难以想象的事件。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首诗：

漫长岁月中，斗争从未停。
任何艰险路，总是先驱行。
一心向着党，同人皆知情。
赤胆照日月，事事可查清。
任何毁誉事，亦难伤吾衷。
心怀党国事，生怕弯路行。

就在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世英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也说了些过头话。12月，康生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身份，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给王世英劈头盖脑地扣上了“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等一大堆帽子。王世英从此遭到残酷的批斗和折磨。然而王世英始终没有改变对党、对人民的信赖，始终没有低过头。这时，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党的利益、革命的事业。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对守护在身旁的儿子王敏清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并当即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种急切心情。

1967年7月，王世英患了肺癌，住进北京医院。“造反派”仍然不放松对他的批斗，并且禁止家属护理。同年9月，北京医院被迫让王世英出院。江青为了胁迫王世英“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从此，王世英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记下了一篇日记：“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派，打也打不

倒。要经得起考验。”

2月2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27日，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写道：“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

专案组的人员逼王世英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王世英坚决地回答：“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还毫不隐讳地向看守他的两名军人说：“康生有问题。”

为此，江青大发雷霆，她在1968年3月召开的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道：“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相，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按照江青的指示，专案组在王世英临终前夕，吸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还在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1968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

王世英死后，江青、康生不许保留王世英的骨灰。他的骨灰盒里，只放着他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他在1962年痛斥康生的那首诗。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江青、康生一伙终于得到了历史的惩罚。王世英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

1979年1月24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为王世英等八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单位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了悼词。悼词说：王世英“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

党，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西北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联络、军运和统战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反共倒退的阴谋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为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巨大的功绩。”

(药英 段建国)

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访问了一些革命老前辈、王世英的亲属、生前友好和在他身边的同志，以及一些有关人员，他们是程子华、杜任之、曹言行、王敏清、刘贯一、陈雷、师哲、罗青长、朱玉林、余宗彦、梁寒冰、聂元素、董维平、杨大三、王定南、郭雁声、曹秋恒、王野风、张进才、武政元、宋鸿飞、徐振纲、周树一、武志平、徐彬如、吉瑞芝、陈养山、张稼夫、王超北、曾三、张友渔、郭则沉、徐超山、徐占林、韩照型、于林等。此外，还得到了张守宪、熊合周、殷鲁谦等的帮助，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王 柏 栋

(1910—1938)

王柏栋，陕西丹凤人。1927年随国民军联军出师河南，后目睹了该部的反共行径，又愤然离开，重新入学就读。1929年毕业于商洛镇西的两岭小学，后到杨子恒旅任见习警卫排长，旋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后，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警卫队政委，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分队长，红二十六军第四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中共商洛工委书记。

1937年，在商洛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敌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1938年7月25日在商洛逝世。

1910年8月3日，王柏栋出生于陕西商洛山区的商县显神庙村(今属丹凤县)。父亲王克明，是一个读过书的农民，以农为本，间或也经营点生意。清末民初的商洛山区，兵匪如麻，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王老先生从亲身的经历中体会到，只有经商才可以少遭兵匪的侵扰。因此，在王柏栋来到这个家庭后，父亲一心一意地供养他上学，希望他有了文化后再出外学商。10岁开始，王柏栋就读于舅父家所在地龙驹寨百顷湾私塾，因为他比较好学，深得塾师喜爱。除了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子曰诗云外，他还爱读课外书籍，就连小说《水浒传》等也成了不可缺少的课余读物。他常向同学们讲述，像李逵、林冲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1927年

春，国民军联军孙连仲部途经龙驹寨，他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出师河南。后因目睹了该部的反共行径，又愤然离开，重新入学就读。1929年夏，王柏栋毕业于商洛镇西的两岭小学。因为他当过一次兵，吃粮打枪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在王克明先生的思想里，兵是最可怕。儿子毕业了，即把他送到河南荆紫关其岳父处做学徒、学生意。父命难逆，王柏栋虽然进了生意铺，却十分厌恶递烟端水、算账卖货的经商生活。他勉强当了四个月学徒，便瞒着岳父，来到杨虎城属下的杨子恒部当兵。因他勤奋努力，又有文化，被当时任补充第四旅旅长的杨子恒所赏识，留在身边当勤务兵。不久，适逢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教导队，杨子恒便保送王柏栋去南阳参加学习。由于教导队的骨干多为共产党员，他的心情十分舒畅，政治觉悟大为提高。1930年6月在南阳教导队第二中队，经阚维良、王允端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年春节，王柏栋返乡探亲，对当兵一事向父亲做了耐心的解释。父亲说：“自古当兵没好人，你为啥不学生意去吃粮？”王柏栋答：“兵有蠢有好，梁山上好汉也是当兵，您说是蠢是好？”父亲说：“要说梁山上的兵，当然是好的。”王柏栋答：“我当的这兵，比梁山的兵还好得多。”父亲说：“这么讲，你这次当兵当对了。”王老先生打消了疑虑，对儿子表示了由衷的支持。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中原，此时附蒋的杨虎城奉命率部讨伐冯玉祥，由南阳开赴洛阳，继而进驻西安。这年10月，经十七路军中党组织介绍，王柏栋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士兵工作委员会接上了党的关系。根据组织安排，在教导队学习结束后，王柏栋仍回杨子恒旅。这时，该旅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王柏栋先后任见习警卫排长、连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侵我国土。“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古城西安抗日怒潮风起云涌。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积极

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驱逐日本侵略者。王柏栋通过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学友米信公将《告西安各界人士书》、苏联《真理报》(中译版)等抗日救国传单秘密地散发到学生中，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爱国师生的斗争积极性。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二中，以及市高中等校广大师生，先后掀起了诸如“驱逐师范学校校长侯培苍”、“反对蒋介石在西安设建陪都”等学潮。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王柏栋任警卫队政委。1933年调任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分队长。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后，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等职。不久，王柏栋奉命到陕北苏区工作。11月，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1934年春，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直属机炮连连长。

1934年秋，王柏栋回陕南一带了解地方情况。在故乡商洛镇，他利用一切机会做群众工作，给其学友米信公、刘焕尧等送《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给其二弟王柏桢赠《政治常识读本》；给商洛镇民团头目、他的故旧张虎森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劝说在地方民团当班长的三弟王柏梁多学军事技能，待将来时机成熟时拉部队参加革命。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他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付的革命工作。白天，走亲串邻，东村进，西村出；夜间，总是在鸡叫后才和衣而睡。妻子埋怨，他劝释；父母不解，他道歉。他感受到的是革命斗争的幸福。10月29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他心潮激奋，用墨笔在其家西厦房檐墙上写了“为了人类未来的光荣，终要度此血的惨事生涯”等誓言，表示了革命者为全人类的解放，不怕困难、视死如归的决心。就在王柏栋回乡了解情况期间，红二十五军长征转战到陕南商洛，大部队西进后，留下的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在队长程启文领导下，活动于洛南与商县交界的孙家山(今属丹凤县)一带，而国民党军队亦准备三路“围剿”。

得知这一情况后，王柏栋一方面给商洛镇民团团总张虎森晓以大义，要他帮助红军小分队；然后，又冒雪奔上 30 余里外的孙家山，和程启文取得了联系，促成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后当国民党军“围剿”孙家山时，由于张虎森事前送了情报，小分队立即转移到外线作战，避免了损失。

1935 年 3 月底，王柏栋离开家乡赴陕北。9 月，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10 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下令纠正错误肃反，释放被关押人员。王柏栋被释放后到红一方面军工作，后任总政治部地方科科长。1936 年 6 月又调任红十五军团总政治部地方科工作，后任敌工部部长。西安事变后，王柏栋随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因他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仍搞地方工作。

1937 年 2 月初，红十五军团北上甘肃庆阳整训，准备抗日。王柏栋因身体状况不佳，奉命留陕西省委做地方工作（对外是中国工农红军驻云阳镇的前敌总指挥部民运部干部）。8 月底，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后，开赴抗日前线，遂在云阳镇建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王柏栋任地方科科长。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通电，抗日烽火遍燃祖国大地。此时，王柏栋正患病在床，但他丝毫未考虑自己的身体，一再向组织要求赴斗争第一线杀敌。根据工作需要，中共陕西省委派时为省委地方科科长的王柏栋为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于是，他立即于 1937 年 11 月返回故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2 月下旬，即参加了省委在泾阳云阳镇召开的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洛川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虽然，早在 1927 年中国共产党曾于商县、龙驹寨建立过两个特别支部；1932 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过境商洛；1934 年红二十五军入陕建立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苏区，但是，自红军撤离后，这里的斗争又变得复杂险峻起来，地主阶级勾结国民党地方政权，疯狂地向苏区人民举起了屠刀。原来建立

的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一些党员也因之和党组织失掉了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王柏栋依据群众受红军影响易发动的特点，采取深入一点取得成绩，逐步推开的战略部署。以两岭小学为据点，向师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从中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接着，又把活动范围扩大到龙驹寨、商县的一些学校及商洛镇一带的农村和联保组织内。经过一段工作，先后建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敌促进会、国难研究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发展了王连成、刘丹东、彭一民、米信公、周文斌、王士哲、巩德芳、薛兴军等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商洛镇、两岭村、商县中学三个党支部和龙驹寨党小组。到1938年6月底，中共商洛工委发展党员30余名。并有计划地把王连成、刘丹东等共产党员和部分民先队员派往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安吴堡青训班及省委党员训练班学习，为了商洛山区其后的艰苦斗争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力量。

在积极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王柏栋面对现实，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生动地运用于商洛山区的实际，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和党员们广泛结识具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子王佑卿、刘清源、刘筱斋。和地方民团头目及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如王建三、刘松林等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在龙驹寨一带工作有了进展后，他又及时把工作范围扩大到豫鄂陕边界地区及商洛西部山区。先是派其弟王柏梁和谢华等去商南大岭观，和在这里活动的共产党员魏志毅联系，筹建豫鄂陕抗日游击纵队事宜，虽因敌人破坏未果，但扩大了党的影响。后又派谢华等回到杨家斜山区进行活动，组织抗日力量。1938年4月中旬，商县第六、七区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为了扩充他的势力，煽动龙驹寨的国民党驻军收了商洛镇联的100余枝枪。足智多谋的王柏栋，组织了商洛镇周围1000多人，向当地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彪请

愿,他亦被群众选为请愿代表,用大量的事实据理说服了马师长,悉数归还了枪支,大长了抗日民众的志气;灭了顽固派的威风。这样,他在当地名气顿时大增,极受民众的拥护,被选为商洛镇联的联队附。接着,他便把共产党员彭一民、张银治等三人派进常备队里任班长。正在这时,商洛山区出现了汉奸组织“复兴倒蒋保皇堂”(俗称黑煞道),企图利用农历月初古会全面暴乱。王柏栋察觉到这一阴谋,即与当地驻军联系剿灭。在驻军的支持下,龙驹寨的道首陈会明所领的数百暴徒刚一起事就遭到了灭顶之灾。道首何根庆、薛长有在夜村起事,刚杀羊祭旗,就被驻军剿灭。事后,王柏栋即组织商洛镇周围数千民众,赴龙驹寨慰问驻军。在慰问大会上,他发表了鼓动人心的抗日演讲。

王柏栋在商洛山区点燃的抗日烈火愈烧愈旺,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温良儒如坐针毡,曾几次找王柏栋进行“谈话”,而王柏栋则义正辞严地据理给予驳斥。驳得温良儒哑口无言。特别是第三次温良儒把王柏栋“请”到龙驹寨下榻之处,两个人带着各自的观点,唇枪舌剑,从傍晚一直辩论到深夜。说到龙驹寨请愿要枪的事。温说:“你宣传抗日很好,不该弄得民众都上街示威。”王柏栋说:“国难当头,要抗日必先有武器。商洛镇的武器被冯麟生收了,民众们赤手空拳,怎么去抗日?”温又发难道:“你搞抗日,我不反对,可你回来为啥不向我打招呼?”王柏栋当即严正申明:“我回来就向当地保甲组织说过了,至于他们是不是禀告你,那不干我的事。”温良儒被激怒了,便使出无赖手段:“你要抗日到别处去,我这里不容你胡闹。”而王柏栋则用蒋介石的话堵他:“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南北东西,都有守土抗日之责。这是谁说的,专员一定知晓。拿这话衡量,你不觉得你的话说错了吗?”接着,他又说:“若专员不许我宣传抗日,就给我出个证明。”过后,王柏栋舌战温良儒的故事,在商洛山里不胫而走,尽人皆知。

1938年6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希愚赴商洛视察工作。经过调查了解,证明王柏栋回商洛开展工作七个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他的缺点:在慰问骑兵第一师的会上,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搞得太暴露。考虑到今后的工作和他本人的安全,组织决定他立即返回省委。热情似火的王柏栋,经过冷静的考虑之后,诚恳地接受了省委的批评,表示服从组织。同时立即指示各地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注意在学校、地方军队、保甲、农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积极积蓄力量,慎重发展党员,坚决防止搞得太暴露。

安排好了工作,王柏栋打算很快返回省委。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时,敌人已准备向他下毒手。温良儒指示冯麟生买通土匪头子曹建勋,伺机暗杀王柏栋。7月25日黎明,曹率匪众到显神庙村,向王柏栋连击数枪。党的好儿子、民族的精英、商洛地区革命事业的播火者王柏栋牺牲了,英年28岁。

噩耗传出,山河悲痛。8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举行了追悼王柏栋大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汪锋代表省委致悼词:“王柏栋同志的牺牲,不仅是共产党的一个损失,而且是民族解放运动中不可补救的损失!”第二年,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德生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写的《纪念“七一”与陕西共产党》一文中,颂扬了王柏栋,以及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子洲等著名烈士。他说:“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队员、中华民族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好汉。”

(屈超耘 贺云龙 冀振峰)

王 复 生

(1896—1936)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化名甄海（亦名振海）。云南祥云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1922年任教于陕西华县咸林中学。1925年任

教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陕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1926年被国民党中央派往云南工作，参加筹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云南省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组织派往东北，以教师、记者、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等社会职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6月在齐齐哈尔被日军逮捕入狱，8月15日惨遭杀害。

1936年8月15日上午10时刚过，在日本宪兵队警戒森严的齐齐哈尔北较场的刑场上，一辆刑车呼啸而至。车门打开，一位囚犯双脚拖着沉重的铁镣，昂首挺胸，从容地走下车来。他神色镇定，炯炯的目光深情地望着祖国大地。他就是在敌人屠刀面前英勇不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白山黑水间革命之歌的

烈士王复生^①。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化名王甄海(振海)、郭其瑛、郭毅,笔名苏醒、止庵,1896年9月27日生于云南省祥云县下川坝王家庄一个读书人家的大家庭。祖父王美西,前清时被举为贡生,一生在乡设馆办学,是一位受人尊敬、被誉为“滇西人瑞”的老先生。父亲王之淮是清末的庠生,也在乡里从事教育事业。

王复生童年时代,随祖父在家乡读书。1912年春天,他离开家乡到达滇西的文化名城大理,考入云南省立第二中学第八班,开始学习资产阶级新学。他才思敏捷,在学习刻苦自励,甚得老师、同学的称许。1916年春,王复生中学毕业后,在父亲和亲友的支持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备班,后升入法国文学系。

王复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想、各个学派交相争论,十分活跃。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了扩大新思想的宣传,促进新思想的学习和研究,组织了一些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同学,将馆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外文书籍进行编目整理,撰写提要,以方便同学借阅。王复生同罗章龙、李梅羹、范鸿劼、商承祖、宋天放等人参加了这项工作。通过这项工作,王复生接触到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王复生在这场斗争中,为了与旧我彻底决裂,“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特地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给自己取名“复生”。此后,他在思想上、学习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同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的频繁交往中,

^① 访问韩世杰的谈话记录。

深受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政治主张及其见解,极表赞同。他在日记中写道:“访毛润之言:‘湘人与张敬尧势不两立……’与吾意同。”“仲灏渭:人当勇往任事,真实求学,洵属见到语。”他还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剖自己的思想,如说:“我受老庄余毒固矣。……近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心稍知物质社会(道德、法律、风俗)亦不可侮也。”这些,都表明了他在追求革命真理,探索社会解放的道路上,正一步一步向马克思主义靠近。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王复生和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何孟雄、刘仁静、高尚德等北大同学,首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讨论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会议决定研究会暂时处于秘密状态,待条件成熟后再行公开。这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1921年11月17日,由王复生等19人署名,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宣布公开成立。

研究会一公开成立,即旗帜鲜明地宣布:“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为此,研究会组织有翻译能力的会员,设立了英、德、法文翻译组,译介马列原著。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同时,研究会还组织会员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开展工人运动。王复生多次到北京丰台铁路工人区和门头沟煤矿进行访问调查,一方面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将访问情况写成笔记,返校后向会员作“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

1920年冬天,王复生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工人举行隆重纪念大会,喊出了“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正式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北京市区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宣传纪念活动。具体筹备组织这一活动的,就是由王复生等七人组成的“五一运动委员会”。1921年7月中国共

产党成立后,王复生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

王复生入党后,以更大的热情继续投身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他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为宣传和组织工人竭尽全力,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一位得力的工作者。

1922年3月,王复生经北大同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杨钟健的介绍,离开北京,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当时的咸林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教员薪金微薄,校舍和教学设备极其简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复生自编教材,改革教学内容,向学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向学生介绍党创办的《先驱》等革命刊物以及党的政治主张,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也深得当时担任教务主任的魏野畴的赞赏。魏野畴在给友人的信中称道王复生说:“新教员王先生讲一点社会主义,我极力欢迎这样人物来陕。”

1923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咸林中学。王复生发动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血腥罪行,并在华县县城举行了示威游行。此前,他还和魏野畴在学校中组织了学生会、体育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群众组织。魏野畴离开咸林中学以后,他又与在渭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赤水初等小学、职业学校校长、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王尚德取得联系,共同成立了青年励志社(一说赤社)。在王复生、王尚德等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初等小学、职业学校的进步师生阅读进步刊物,讨论革命问题,并组织讲演团到高塘、下邳等乡进行宣传,开展革命活动。这是党的创立时期陕东革命力量开始联合战斗的标志,也为尔后渭南、华县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1923年7月,王复生回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同时在北大开展

学生运动。1925年,他和王德三、杨蓝春等人发起成立了云南旅京学生的进步组织云南革新社,出版《革新》周刊,揭露和批判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反动统治,致力于云南的政治改革。这个组织发展很快,第二年就在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分社,并与天津、唐山等地的云南籍学生取得了联系,在各地的云南籍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年夏,王复生受党的派遣到陕北,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任教,参与陕北早期的建团建党活动。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绥德后,团的陕北特别支部立即组织四师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开展抵制英货日货、援沪募捐等活动,随后又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基督教运动”。王复生积极投入了这些斗争,特别在“反基督教运动”中,他为陕北基督教大同盟(陕北反基督教运动的领导机关)撰写了《耶稣是什么东西?》等宣传文章,对陕北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26年春,王复生奉命离开陕北,回到北京,继续在云南革新社(后改名为新滇社)工作。

1926年3月18日,在党的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北京3万多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径。会后,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前往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请愿,要求段政府严正驳复八国通牒。王复生组织在京的云南籍学生参加了集会和示威。在请愿示威遭到段祺瑞政府野蛮镇压后,他以无比的义愤写了《新滇社“三一八”流血宣言》,揭露和声讨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血腥罪行,深切哀悼死难烈士,并代表新滇社提出解除“三一八”惨案罪魁祸首段祺瑞、贾德耀等人公职,交法庭审判,为死难烈士举行国葬等严正主张。在稍后发表的《“三一八”流血的代价》一文中,他尖锐地指

出，“三一八”流血的代价，是使人们认清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是人民的仇敌，欲求中国的独立和自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及国内的军阀官僚。“三一八”事件以后，王复生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云南青年南下参加北伐战争和回云南开展革命活动。他也随即离开北京，到达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参加了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原滇军）政治部名义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工作。

1926年夏，为了开展云南的革命斗争，党组织通过国民党中央，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员的名义，派王复生和杨青田回云南工作。王复生到云南后，对云南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积极筹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同时，协同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利用云南军阀唐继尧与部属的矛盾，组织讨唐统一战线，进行推翻唐继尧封建统治的“倒唐”政治斗争。不久，在党的领导下，唐继尧的封建统治被推翻，扫除了云南革命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在这个基础上，1927年3月，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云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王复生为负责人。在他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昆明、滇东北和滇西的国民党各级党部；云南各地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这时，王复生虽然在党内没有担任职务，但积极参加了云南党组织的建设工作。他曾经为中共云南省临委举办的党团员训练班讲课，始终关切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云南地方反动势力追随蒋介石，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实行大逮捕。王复生和云南党组织负责人李鑫、赵祚传等在敌人5月11日的大逮捕中被捕。敌人视他们为“赤色乱党要犯”，电请南京政府批准枪决。后经党组织利用云南地方反动势力内讧以及当权者下野之机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出狱。当时，为庆祝王复

生等出狱，曾在省教育会礼堂隆重举行有 2000 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祝贺胜利。

不久，又发生了“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云南地方反动势力进一步与蒋、汪勾结，在云南各地实行“清党”。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云南全省。由于王复生身分已经暴露，不便继续留在云南工作，遂于 1927 年秋末离开昆明，前往上海。

1928 年 6 月，王复生由上海北上，到达哈尔滨。经云南籍共产党员楚图南的介绍，先后在哈尔滨第一中学、第三中学从事教学工作。因他同楚图南等一起在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教育，组织进步社团，引起了哈尔滨特区反动当局的注视。在敌人的监视下，他被迫转移到齐齐哈尔、吉林等地，以电报局职员、报纸主笔和中学教师等职业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党积极组织领导了东北工人、农民、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并团结各抗日武装力量开始进行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王复生按照党的部署，与苏联驻黑河领事馆取得联系，奔走于洮河、黑河等地，帮助解决北满抗日义勇军粮食和武器的供应问题，进行过不少抗日救亡工作。北满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后，王复生从黑河历尽艰险，徒步绕返齐齐哈尔，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34 年底，他利用担任黑龙江省《民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通过报纸这个宣传工具，同金剑啸等一起，进行了多方面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民报》文艺副刊作为阵地，先后发表《王二之死》、《瘦骨头》、《兴安岭的风雪》等文艺作品，从侧面揭露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利用《民报》出刊二千号的纪念日，组织白光社剧团，演出了《钱》、《母与子》、《黄昏》等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宣传抗日救国。此外，他们还在报社内外组织了

漪澜读书会、同仁会、人生改善会、经济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活动。

王复生、金剑啸等人的抗日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1936年6月13日，日伪在齐齐哈尔地区实行“大检举”，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王复生不幸被捕。在狱中，日本宪兵队为使王复生供出党的组织及其抗日活动，对他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审讯，使用了灌凉水、压杠子、上大挂、夹手指等酷刑，但王复生始终坚不吐实。凶残的敌人无可奈何，宣判王复生、金剑啸等五人死刑。王复生牺牲时，年仅40岁。

(汪涵清)

孙作宾

(1909—2002)

孙作宾，字相臣，西安市灞桥豁口村人。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杨虎城部十七师中共军委书记。1932年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四支队司令兼政委，1932年12月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1933年至1936年任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1942

年4月任中共甘宁工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兼中共陇东地委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1949年7月至1952年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统战部部长。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54年7月至1958年3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被错划为右派，蒙冤二十余年。1978年平反后，调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2002年8月1日在西安病逝。

孙作宾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青地区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他长期战斗在多民族地区，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白色恐

怖的生死搏斗,也经历过硝烟弥漫的南征北战;经历过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更经历过多次身处逆境的坎坷风雨。但他坚持真理的松柏气节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挠,忠贞不渝,堪称真正的共产党人。

(一)

孙作宾自幼聪敏好学。七岁入豁口私塾,15岁考入长安新筑镇高级小学。先读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继读《论语》、《诗经》和《古文观止》等。由于家贫,读书不易,他就奋发图强,刻苦攻读。宁可少睡少玩,也不在学习上有所懈怠。每读一书,必诵十数遍。通过熟读熟背,加深记忆和理解。有些脍炙人口的古文诗词,耄耋之年仍可一字不差地原原本本背读下来。

孙作宾读书,从小就好奇求新。对于富有民主共和思想的新文化,他一听就爱。当时教育部门颁布的《国语读本》,私塾老师不愿教,他却爱不释手。这套需要四年读完的八册课本,他自学两年就读完了。上新筑高小时,受五四运动和进步教师的影响,曾和同学们一起进行爱国反帝宣传。他对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上的爱国志士非常钦佩。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也很有兴趣,企盼着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能够实现。特别是针对当时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他写了一篇《论廉颇与蔺相如》的作文,力劝军阀各派,以国家社稷为重,勿蹈“两虎相斗,势不俱生”之覆辙。效相如忍辱顾全大局之胸怀,鼓廉颇负荆请罪之

勇气,止干戈,将相和,“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①孙作宾当时虽然还不懂得政治斗争之严酷与复杂,但他纯真幼稚的良苦用心,却博得了国文老师的倍加赞许:人小志高,心忧天下,长大有为,必成大器^②。

1926年春,孙作宾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入校不久,直系军阀刘镇华在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一年之后,乘国民二军豫西失利之机,又率镇嵩军8个师号称10万人,于4月中旬围困西安,妄图再次祸陕。当时西安各大中学校,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学生在“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下,支持陕军杨虎城和李虎臣将军,坚持反围城斗争。孙作宾先后参加了“西安五九雪耻大会”和“西安五卅周年纪念会”等组织发启成立的学生宣传队,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唱着爱国反帝的歌曲,深入街头巷尾,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援守城部队。西安解围后,学校不仅恢复正常上课,而且各种进步的政治活动也非常活跃。特别是随着国共合作的陕西临时军政府——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成立,西安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陕西省立三中并入省立一中后,由共产党员雷晋笙任校长,形成了一批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骨干教师队伍,在学校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利用各种形式向学生灌输革命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和引导学生提高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这时的孙作宾有机会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共产主义ABC》、《苏俄视察记》和介绍列宁生平的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觉悟有很大提高。1927年2月由同学罗全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孙作宾不仅努力学习,重视学业,而且成为宣传革命思

^① ^②孙作宾 1995 年谈话记录。

想,站在革命斗争前列的尖兵。5月5日西安市莲花池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雷晋笙带领省立一中学生高举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的画像,以英姿焕发的整齐的队伍出现在会场,最引人注目。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为了纪念守城死难革命志士和西安解围的胜利,把皇城(今新城)改为红城的纪念活动中,孙作宾和省立一中的同学先后都参加了多种政治性、群众性的宣传活动,省立一中几乎成了当时吸引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心^①。“四二八”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绞杀的噩耗传到西安后,5月16日雷晋笙在省立一中召开的追悼李大钊大会上悲愤陈词,痛斥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都是扑灭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一丘之貉,号召师生继承烈士遗志,坚定革命信心,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这次会议对孙作宾教育很大,使他清醒地认识到新老军阀都是国民革命的真正敌人。特别是6月12日在省立一中成立“非基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组织)大会上,邓希贤(邓小平,时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应邀到会讲演,从政策和策略上给“非基同盟”指明了斗争方向^②。孙作宾和与会同学都受到了很大鼓舞,懂得了“非基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斗争。

(二)

1927年6月蒋冯合流后,陕西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西安各学校的进步组织被勒令解散,党团组织基本瘫痪。孙作宾无奈,遂考

^① 西安党史资料丛书:《坚守西安》。

^②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国民革命在陕西》。

人已改变了革命学校性质的西安中山学院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冯玉祥的豫陕甘农村组织训练处当见习员。1928年7月又随孙蔚如到山东单县入杨虎城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六个月后,分配到杨部刘威诚骑兵营任司务长,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军营生活。1929年初,部队移防湖北陆安县,孙作宾在部队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从事秘密工作,并利用他担任刘威诚营九连排长的有利条件,与驻地附近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准备拉出部队与游击队汇合。因有人泄密未成,但党组织不但没有责怪孙作宾,反而对他的忠诚与勇敢更加信任了,认为孙作宾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军事政治人才。后经团部政训员、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董林哲介绍,于192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团副官。1929年冬,部队移防河南南阳,孙作宾在杨虎城创办的宛南日报社当记者,与报社社长冯异僧(中共宛南特委书记)、主编宋绮云和编辑王尚德(王璋峰)等共产党员一起,共同掌握舆论工具。当时《宛南日报》的宣传方针是: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对广大官兵和民众进行团结、民主和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军民合作。报纸经常揭露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惨状,抨击地主豪绅欺压劳苦大众的恶行,为苦难百姓鸣不平。有时也编印一些革命传单,和报纸夹在一起发出。孙作宾亲自印发的一份传单是:“我们的目标——共产主义,我们的领袖——马克思、列宁,我们的方法——工农专政,我们的力量——劳苦大众。”^① 这些简明而蕴意深刻的传单,对激发军民的革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

1930年春,中共中央派孙永康来到宛南报社,与孙作宾同住一室,耳濡目染,孙作宾受教非浅。当孙永康得知他与孙蔚如的亲族

^① 孙作宾 1974 年谈话记录。

关系后，一再劝勉他“何不借他人炉灶，做自己的佳肴？”孙永康与报社党组织研究决定，选派孙作宾到杨虎城兼队长、孙蔚如任队附的南阳教导队学习。这个教导队有中共组织，下设四个中队，其中三个中队长是共产党员。孙作宾担任第一中队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边学习边搞兵运宣传工作。开始是通过士兵委员会反对克扣粮饷和打骂士兵，进行经济斗争和保护人权斗争，随后逐步引向政治斗争。同年11月，孙作宾随杨部入陕驻防西安。1931年1月他从教导队毕业后，被分配到杨部孙蔚如的十七师宣传队工作。2月底，十七师成立中共军委，孙作宾任书记，李慕愚、胡振家为委员，统一领导十七师地下党的工作。不久，十七师分驻汉中与凤翔两地，师的中共军委也分组为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前方军委由李慕愚任书记，后方军委由孙作宾任书记。这时孙蔚如为了培养和提高下级军官的政治军事才能，创办了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自兼主任，下设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孙作宾和胡振家都担任分队长，吕剑人担任随营军官训练班的中共支部书记。训练班学员，大部分是由部队选送的军士，个别也有招收的社会知识青年。党的后方军委和训练班党支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通过训练班“抓带兵权”的指示精神，在学员中广交朋友，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教育学员认真地学文化、学军事、学技术，积极开展各种有利于启发学员政治觉悟的革命活动。孙作宾还专门给学员教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等革命歌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又即时向学员揭露日寇侵占东北的罪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反对不抵抗的卖国行为。孙作宾、吕剑人等还把在学员中发展新党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训练班的重要议事日程，利用各种机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先后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毕业后大都担任连排长以上军职，掌握了基层带兵

权,为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①。

针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窜入兰州,拉拢西北军阀势力,企图东山再起的严峻形势,杨虎城为稳定西北大局,遂于1931年11月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率部入甘驱吴。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在这支入甘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培植革命力量,即指派靖任秋、孙作宾、李慕愚等一批共产党员随军赴甘。部队一路平陇东、战会宁,破定西,于12月中旬全师进入兰州,吴佩孚逃往宁夏转赴天津,地方军阀慑服,甘肃局势稳定。1932年春,孙蔚如就任甘肃省宣慰使,旋即由靖任秋、姚绍芳、孙作宾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点验王子元部,将该部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孙蔚如任命王子元为旅长,张东皎(共产党员)为副旅长,姚绍芳为参谋长,孙作宾为中校参谋主任。孙作宾和警备第三旅的共产党员一起,以合法军职在部队中建立起团党委和校官、士兵、教导队三个党支部。孙作宾为校官党支部领导成员,与其他党支部一起,在进步青年官兵中积极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到靖远起义前夕,全旅已发展党员近百名,其中连以上军官达30多名。同年4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唯炽来到靖远警备第三旅,向党组织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兵变的指示,并由各党支部负责人深入到士兵中作宣传鼓动工作。5月3日,党组织发动各营连以请愿形式要求王子元限期补发士兵的军饷。王子元鉴于以往压制士兵而闹哗变的教训,立即答应了请愿要求。从而鼓舞了士气,坚定了起义信心。但第二天王子元得知他的老友谢子长来靖远见张东皎而不见他,疑窦顿生,立即翻脸扣押了张东皎。谢子长闻讯,当机立断,决定起义于5月5日晚提前行动。孙作宾由于一直未暴露身份,又有与孙蔚如的亲族

^① 吕剑人:《我的回忆》。

关系,王子元遇事都敬畏他三分。所以党组织决定,孙作宾继续留在旅部了解敌情,以防后患。起义原计划拉出队伍400人,实际只有一营营长吕振华和连长张秀山拉出200多人。当起义部队向海原进发时,途中遭“围剿”而失败,张秀山被俘。王子元问孙作宾:“你是省宣慰使署派来的中校参谋主任,是把张秀山押送到兰州交军法处处置呢,还是在靖远就地枪决?!”孙作宾抓住张秀山曾在定西救过王子元性命一事,向他晓以大义,苦口相劝:“人家过去能救一命,你今日就不能饶人一命?古人讲,无度不丈夫,难道你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何况人家还救过你!”王子元心有所动地说:“省宣慰使署知道了怎么办?”孙作宾低声而又风趣地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患之有!”于是王子元把张秀山叫进房子,歇斯底里地大骂了一通,摆手示意“走!”最后由孙作宾资助,张离开了靖远^①。

5月下旬,以谢子长为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在靖远水泉堡正式宣告成立,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王子元闻讯,先后两次派兵“围剿”。第一次被游击队击退。第二次在敌人未行动前,留守在靖远的孙作宾借外出侦察之机,赶到糜子滩向游击队介绍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情况,要游击队严阵以待。后来王子元调防海原,接防靖远的王云山想用“一箭双雕”的手法,派孙作宾收编游击队。如果收编成功,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吃掉游击队;如果收编不成,又可嫁祸于人,推卸责任。孙作宾权衡利弊,认为这是和游击队接触的好机会,便将计就计。孙作宾到了水泉,给游击队讲了敌人的险恶用心,虽然也派代表进城同敌人谈判,但他却下决心脱离敌营,留在水泉参与了游击队的领导工

^① 孙作宾:《回忆靖远起义》。

作。在以后的转战活动中,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的 200 多人猛增至 400 多人。1932 年 6 月在原三支队的基础上又增编了四支队,由孙作宾任支队司令兼政委。这时王云山扣押了游击队的谈判代表,倾巢出动,扑向水泉,游击队虽英勇反击,顽强战斗,但在突围时又遭到敌骑兵旅长冶成章的袭击,损失惨重。于是孙作宾和杜润滋等商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重新转入地下斗争。

1932 年 8 月,孙作宾和杜润滋从水泉回到兰州后商定,他留在兰州继续开展工作,由杜润滋回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工作。省委分析研究了甘肃的革命形势,决定于 1932 年 12 月初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区委员会,吴鸿宾为特委书记,孙作宾为特委军委书记,马豫章为组织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长,常黎夫为秘书长。根据当时的斗争特点,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逐步建立起由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深入开展武装斗争。为了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孙作宾和特委军委决定,由原靖远兵变领导人之一的王儒林出面,把农村转入地下斗争的游击队员重新组织起来。为实现这个任务,特委采取公开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手段,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给王儒林安排了一个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到靖远县名为“招募”新兵,实则串联转入地下的游击队员,为组建革命武装聚集力量。散居在农村的游击队员,一听又组织游击队,纷纷携枪持刀,结伙投奔。连与孙作宾相识的国民党某部营长薛宝山也要求找孙作宾面谈。孙作宾给薛写了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志同道合皆朋友”的复信,约薛在榆中县兴隆山脚下密谈,晓以大义,薛心悦诚服,随即带领全部人马枪支投奔游击队^①。到

^① 孙作宾:《回忆靖远起义》。

1933年3月,游击队员扩充到三四百人,于是就在靖远西南的园子岔(今属榆中县)正式宣布成立甘肃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西北抗日义勇军。由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孙作宾以特委军委书记身份参与领导,加强领导。义勇军成立后,到处张贴告人民书,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打破牢笼,消灭一切不平等,驱逐日寇出中国!”与此同时,特委在兰州城内也发动领导了兰州水北门兵变,拉出了一部分士兵和枪支,与义勇军在皋兰县后长川汇合。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和兰州水北门兵变的发生,震惊了甘肃军政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立即下令组织甘宁青三省联军,“围剿”义勇军。敌人从南、西、北三面包围了义勇军驻地红砂岷。在十倍于我的敌军围攻下,王儒林率一中队兵力在前山抵抗,孙作宾、李慕愚率主力据守山后,战斗十分激烈。后因弹尽粮绝,突围失败,20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孙作宾、王儒林、李慕愚等30多人被俘。在敌人押解途中,除王儒林脱险外,其余全部押解至兰州。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孙作宾、李慕愚等得以获释。

(三)

1933年6月,孙作宾离甘返陕,向省委汇报了甘宁青特委的工作,并留在省委军委参与领导兵运工作。7月28日省委领导人袁岳栋、杜衡被捕叛变后,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以后的两三年中,孙作宾等冒着生命危险,曾多次组织临时省委继续开展工作。尽管斗争异常艰难,但党的组织一直没有中断,党的活动从未停止。1933年9月,刘映胜组建的临时省委遭到破坏后,孙作宾联络余海丰、崔廷儒、胡振家等继续坚持斗争,重新组建临时省委。

10月初,由孙作宾主持在西安莲花池街和江苏义园连续开会,决定成立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组织孙作宾,宣传管玉祥,军事胡振家,秘书长崔廷儒。在这次临时省委成立会议上,孙作宾作了省委遭破坏后的组建情况报告,并着重研究讨论了开展兵运工作等问题。11月余海丰被捕后,临时省委由孙作宾负责。11月9日,韩学亚在渭南背坡村召开关中各县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陕西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韩学亚任书记。1934年1月5日,韩学亚、孙作宾等在西安开会,进一步商讨成立陕西党的统一组织。4月上旬,魏光波从上海返回西安后,由孙作宾、魏光波主持在西安盐店街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书记魏光波,委员有严克伦、崔廷儒、孙作宾、苗建平等。不久,因敌人通缉孙作宾,他便转赴汉中,在孙蔚如的三十八军中做党的兵运工作,并参与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工作。汪锋调上海后,陕南特委军委工作即由孙作宾负责。10月,张德生为了完成上海中央局要他给川北红四方面军送文件的任务,即找孙作宾安排,由三十八军密探队的共产党员唐益民护送到川北苏区,后来张德生就参加了红军长征。11月,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白耀卿被捕,特委工作遂由孙作宾负责。后因红四方面军进军汉中,孙蔚如既怨张国焘违约不守信用,又恐孙作宾里应外合,即强令孙作宾离开汉中回西安。孙作宾在西安与王超北、阎揆要等取得联系,并将阎搞到的一批药品和枪支弹药,从灞桥运往陕北苏区。1935年8月,孙作宾又与上海中央局派来的高克林取得联系,商定成立临时省委,书记高克林,组织孙作宾,秘书长崔廷儒。在此期间,陕西临时省委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与渭北工委一起,经过周密的具体安排,保护刘少奇由陕北经临潼,安全转赴华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9日陕西临时

省委即派谈国帆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带回《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件，由孙作宾和严克伦印发给各级党组织学习。1936年6月，孙作宾去陕北，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他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给党中央传话，说他们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孙作宾立即找孙蔚如面谈。孙蔚如对作宾说：“现在日寇侵华日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进行内战。去年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今年又发表‘五五通电’（即毛泽东、朱德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宾对孙蔚如的谈话由衷推许，并请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①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向叶剑英、罗迈汇报了工作，然后由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接见孙作宾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孙作宾向主席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写信的原因时，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张国焘那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主席对孙蔚如的心情甚为谅解，并答应一定给孙蔚如先生复信。9月3日，毛泽东写好了一封密信，交孙作宾“面陈孙军长。”信中写道：“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结团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

^① 孙作宾：回忆给毛主席送信。

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①毛泽东高度赞扬孙蔚如深明大义的爱国的热忧，并对孙作宾的传话甚感欣慰。一纸复信，三次提及作宾，充分说明孙作宾在友我双方联合问题上确实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毛泽东接见孙作宾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也接见了孙作宾。特别对阎揆要特务二团的情况问得很详细。当汇报到阎揆要特务二团的一些党员连长要求搞兵变，并对阎揆要让他们唱革命歌曲、办革命墙报很有意见，说阎揆要胆子太小时，周恩来严肃地说：“这是十七路军，不是红军。要那样搞，阎揆要还怎么当团长！”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在十七路军中，是搞兵变，抓几条枪好呢？还是按照党的政策，搭好桥，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特务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呢？要告诉阎揆要，对杨虎城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部队拉出来搞红军！”^②周恩来的“不搞兵变搞搭桥”，既是对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的革命急性病的尖锐批评，更是在友军中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及时良药。孙作宾埋在心中多年一个“兵暴兵暴再兵暴”的疑团也一下子解开了。9月23日，周恩来在致阎揆要的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作宾兄来，道及你的努力，我们无限敬佩。”“你的工作，关系极重，应善用现在的地位，将特务二团造成十七路军中的抗日中心力量。为达到此任务，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一切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

① 中央档案馆：毛泽东1936年9月3日致孙蔚如的信。

② 孙作宾：回忆给毛主席送信。

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① 这封信由汪锋转给阎揆要,对以后在十七路军中开展军事统战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6年10月,孙作宾在西安把毛泽东的信面交孙蔚如以后,又接受新的任务返保安(今志丹,当时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因为沿途要经过三十八军王劲哉旅驻防的富县、甘泉、延安等地,所以作宾又请孙蔚如按照毛泽东信中关于“保证双方来往人员安全”的要求,给予方便。孙蔚如遵守承诺,当即给王劲哉旅长写了“孙作宾负有特殊任务,途经你旅驻防地区,望给以通行方便”的手谕。孙作宾到富县取得王劲哉给予通行的方便后,就径直赶到甘泉下寺湾陕甘工委机关,同工委书记欧阳钦交谈了工作情况。就在孙作宾到达富县的11月10日这天,甘洛游击队五支队与王劲哉旅某营于富县油坊原发生了不幸流血冲突,需要协商调解。欧阳钦鉴于孙作宾曾在十七路军中做过党的地下工作,既有孙蔚如的关系,又同王劲哉相识,所以就再三挽留孙作宾协助工委军事部申力生参加同王劲哉的谈判。孙作宾盛情难却,就于11月11日同申力生一起到富县同王劲哉谈判。由于双方都有诚意,一致认识到“如果再打起来,不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而且是自己打自己,朋友打朋友,于公于私都不利。”因此,就在相互谅解、和谐、友好的基础上,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捐弃前嫌,顺利地签订了关于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通情报和友好往来的协议。王劲哉再三表示,三十八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靠红军存在的。如果没有红军,三十八军早就被吃掉了。因此,他们真诚也愿意履行协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统一战线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

议,枪口对外,联合抗日^①。

(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开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并派孙作宾到兰州负责筹建。孙作宾化名孙新华,以《西北日报》记者的身份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开展党的工作。在孙作宾等一批党员未来到兰州之前,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已经成立。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谢觉哉于8月8日、18日两次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中央选派熟悉甘肃情况的同志,到甘肃国统区开展工作。毛泽东于8月19日复电:“此间选派干部在准备中,但难得最适当之人。”^②后来中央派到甘肃的孙作宾等一批同志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最适当之人”^③。1937年10月26日,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正式成立,谢觉哉向张闻天和毛泽东报告了甘肃工委的组成和分工,由孙作宾任书记。甘肃工委与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关系很密切,但不公开来往。办事处主要搞合法斗争,工委主要搞秘密斗争。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通过办事处转告工委,工委给中央和西北局的报告请示经过办事处转报中央。谢老作为党中央的代表,经常参加工委会议,指导工作。1938年春,中央派罗云鹏来兰州任甘肃工委副书记。当时国民党甘肃省府规定,单身男女不能在兰州市内租用房屋。罗云鹏初

^① 孙作宾:《回忆同王劲哉谈判》。

^② ^③ 《毛泽东与甘肃》第15页、19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来乍到，既无社会职业，又无固定住址，国民党警察局又接二连三地稽查户口，工作很不方便，极易暴露。有一次，工委在谢老家开会，大家都为解决这个难题犯愁。孙作宾灵机一动，提出给罗云鹏找个爱人，组织个家庭岂不是一举两得。谢觉哉听了，连声说：“好！这个主意好！”谢觉哉夫人王定国也在一旁大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就把协助刘杰做妇女工作的樊桂英介绍给罗云鹏结为伴侣，为保护甘肃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贡献。

中共甘肃工委成立后，孙作宾带领工委一班人，以极大的努力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从1937年冬到1939年春，先后在兰州、榆中等20多个县市和大中专院校建立起党的组织，党员发展到数百人。为了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针对部分党员在对敌斗争面前悲观怯懦、精神不振的实际情况，孙作宾用革命烈士特别是甘肃革命烈士王孝锡就义前“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的英雄事迹，教育青年党员树立“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宁可砍头颅，信仰不能丢！”使每个党员懂得，没有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抗战初期，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中心工作就是以公开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与基层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组织和发动起来，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谢觉哉曾给孙作宾讲：我们两个拳头一齐打，我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你做基层群众的发动工作，上下夹攻，把甘肃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烧得旺旺的。1937年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祖，开始对群众的抗日救亡行动不支持，甚至还有阻挠。谢觉哉利用他和贺耀祖是同乡老友的关系，给贺做了艰苦的工作后才开始有所转变。接着谢觉哉和孙作

宾一起又争取团结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民政厅长施奎龄(周恩来在南开的同学)和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等一批上层人士,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文艺宣传团体和进步报刊纷纷创立,为团结抗日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特别是孙作宾把一批有文化、有经验的共产党员派到甘肃青年抗战团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工作做得很出色。仅三个月时间,全省从兰州到县城,先后建立起青年抗战分团72个,团员发展到3000多人,成为青年学生中最有影响、最受信任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当时的《新华日报》在《今日的兰州》这篇报道中曾高度评价甘肃人民“充满了高涨的抗日激情,把不言抗日的一潭死水激活了”^①。

(五)

1939年6月,孙作宾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即调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调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1941年7月至年底,调任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常委兼统战部长。1942年4月6日,西北局决定组建甘宁工委,任命孙作宾为书记,并派出干部分别到甘肃、青海、宁夏调查了解国统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地下党组织情况,为进一步开展全面工作做好准备。1943年夏,康生一手制造的“红旗党”和“抢救运动”,把孙作宾等一批甘肃地下党员和工委负责人逮捕关押,长期审讯,给开展甘宁青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早在1940年6月甘肃工委遭敌破坏后,康生就无中生有地指控甘肃地下党内“有好细特务混入”。所以,这次整风审干,康生

^①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中共甘肃史研究》。

就以甘肃地下党组织为重点,首先把一名年仅19岁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甘肃地下党员张克勤关押起来,轮番审讯,并以假枪毙的恐吓手段,威逼张克勤按照他们的指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特务”,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康生据此推断“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从而人为地制造了“张克勤事件”。并在陇东地区逮捕了另一名年轻的甘肃地下党员万良才,威逼他供认了甘肃一批党员干部都是“特务”,把孙作宾、李铁轮、郑重远、刘杰等甘肃工委领导人以及在延安、陇东工作的近40名甘肃地下党员干部全部逮捕,统统戴上“红旗党特务”的帽子关押,刑讯逼供,备受折磨。特别在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逼供信的手法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审讯孙作宾时,从连续几天不让休息的“疲劳刑讯”,发展到拳打脚踢、压杠子、泼冷水、站冰地等“皮肉刑讯”,惨不堪言。但孙作宾始终不承认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心地坦然,宁折不弯。并在审讯中饶有兴趣地写了两首讥讽“抢救”运动的打油诗。其一:主观主义害死人,可惜至今尚犹存;调查研究不周密,硬把同志当敌人。其二:世间事情真复杂,革命人受革命法;千里骏马知路遥,赤金何惧浪淘砂^①。诗以言志,志以明心。孙作宾的这两首诗,字字句句,掷地有声,既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抢救”错误的要害,又十分自信地表露了自己一身清白的坦荡胸怀。当年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在《我所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一文中说,当时在被“抢救”的对象中,假口供百出,但“也有坚定的,如孙作宾,就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吃苦也就最多。”正因为这样,孙作宾就被当作“最顽固

^① 孙作宾:《忆赵伯平同志》。

分子”，以“特号”犯对待，指定专人，严加看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现“抢救”的错误后，不断采取措施进行纠正，直至停止“抢救”，进行甄别。但康生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消极应付。虽然各地区各部门被“抢救”的同志都甄别了，但在边区保安处关押的孙作宾等一批“特号”犯在抗战胜利前夕仍未甄别。对此，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们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①这样，在1945年“八一五”以后，关押了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孙作宾等才得以获释。谢觉哉见到孙作宾后十分恳切地说：“你关押期间，我一直关心你，也很相信你。共产党人要能经得住委屈。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孙作宾确实是既能经受委屈又能经得住考验的共产党人。更有趣的是，有一位在边区保安处工作的青年同志，在“抢救”中曾动手打过孙作宾。甄别平反后，他又被分配在孙作宾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思想负担很重。孙作宾知道他的心思后，诚恳又风趣地劝他说：“你奉命打我为革命，我为革命挨打，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不能计较。”孙作宾又进一步比喻说：“你知道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吗？他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当了齐国国君后，仍用管仲为相，史称用贤不避仇，何况咱们是革命同志呢？你就放胆工作吧。”^②孙作宾豁达大度的宽阔胸怀，使这位同志很受感动，一时在陇原大地传为佳话。

(六)

解放战争期间，孙作宾任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兼陇东地委第一副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

② 1976年孙作宾访谈录。

书记、代理书记等职，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与陇东地委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甘肃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6年8月，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部队，经陕南进入陇南地区。西北局准备让三五九旅留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陇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逐步向甘陕川三省交界地区发展，开辟新的敌后游击根据地。为此，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陇南特委和陇南游击队，由孙作宾任特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率游击队向国民党统治区主动出击，以便打开甘肃工作的新局面。8月22日，三五九旅主力部队到达陇南边境地区，其中一部已进入徽县。从8月20日到24日，西北局连续四次电示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要求陇南、平西、华平三支武装力量立即出动，与三五九旅联系配合。8月29日，三五九旅在彭德怀指挥的“迎王战役”配合下已进入陕甘宁边区，西北局原拟留三五九旅一部配合开辟根据地的指示已无法实现。因此，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决定改原定的三支武装分头出击为联合行动。由陇南特委和平西工委组成临时指挥部，马思义为司令员，孙作宾为政委，于9月3日向敌区出击。部队初出边区，指战员斗志旺盛，一夜行军150里，连打胜仗。到达六盘山地区后，平西武装队伍留当地活动。孙作宾率陇南武装队伍穿越西兰公路向泾源挺进，途中与敌平凉保安队遭遇，经平西武装队伍增援，冲出敌人堵截，行至老龙潭后，又被数倍于我之敌包围。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两支队伍终于突围，付出了一定代价。另一支华平工委的部队，在华亭境内也遭到强敌围攻，损失惨重。这样，三支武装部队被迫撤回边区。中共甘肃工委和陇东地委认真总结了这次出击的经验教训，并于11月1日向西北局写了检查报告。孙作宾亲自到延安向习仲勋当面汇报说：“部队撤回边区的命令是我下的，如果有错，我一人承担。”并自请处分。习仲勋对作宾说：“你没有错，

撤得对!”这次出击,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它的意义和影响远比损失大得多。它不仅在军事上牵制了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以秋毫无犯的组织纪律性扩大了党在白区群众中的影响,使游击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更重要的是为甘肃工委进一步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找到了正确途径。孙作宾从延安返回到庆阳后,一些干部对三支武装力量南下出击失利的是与非,仍有争论。习仲勋得知后,于1947年2月4日特致电孙作宾,指出三支武装力量南下“出征失利,盖因客观环境不利,我们估计不足,指导上有不当处,非兄之过也。语云失败为成功之母,更使我们益加奋勉,一时得失不必介怀。”^①西北局为三支武装力量南下出击失利承担了责任,澄清了是非,这对孙作宾和甘肃工委干部既是勉励,更是鞭策。他们吸取这次失利的经验教训,在后来多次开展的敌后武装斗争中,机动灵活地运用了就地生根和分散隐蔽等多种斗争形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1948年到1949年陇右工委领导的敌后游击队,无论是袭击敌军据点,还是打击土豪恶霸,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他们对外从没有公开宣布过“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当时,不仅国民党把他们叫“土匪”,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称他们为“土匪”。要不要去掉“土匪”的骂名而公开打出“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陇右工委把两种不同意见上报甘肃工委裁决。孙作宾主持甘肃工委会议研究,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认为陇右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力量还不很强大,而国民党在甘肃不仅每个县有地方武装自卫大队,而且还驻有数万用美国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发现几十几百个人的“土匪”活动,还可以容忍下去,即使消灭不了,也可以不了了之。如果发现一支共产党的

^① 甘肃省档案馆:习仲勋《致孙作宾、任达电》。

游击队,即使人数不多,也会穷追猛打,非置游击队于死地不可。这样,游击队就会遭到“图虚名而招实祸”的厄运。因此,孙作宾和甘肃工委断然决定,还是以暂不公开打出共产党游击队的旗号为更有利^①。至于国民党骂游击队为“土匪”,就让他们去骂吧,这丝毫无损于游击队的一根毫毛。也正因为游击队采取了隐蔽分散活动的方针,才得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到陇右地区时,这支被骂为“土匪”的游击队,才一鸣惊人,打出了“陇右人民游击队”旗号,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扶眉大捷后即进军甘肃,于8月26日解放兰州。孙作宾和甘肃工委的同志也随军西进,并在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和收缴散兵游勇枪支等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表彰,被誉为“支援解放大军的好后勤”。

(七)

1949年7月至1952年12月,孙作宾任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协助省委书记张德生负责处理省委常务工作,并主管党的组织和民族统战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接管和改造,建立起全省各级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为医治战争创伤,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新甘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甘肃省从1951年9月开始到1952年6月,基本完成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进行土改中,孙作宾不仅协助省

^① 孙作宾回忆录。

委领导了土改,而且直接参加了临夏地区的土改试点。特别在放手发动群众,贯彻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等方面,临夏地区做出了成绩,取得了经验,对全省土地改革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指导作用。在放手发动群众中,孙作宾发现一些同志有简单急躁情绪,认为要放手发动群众,就不要怕“过火”。当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对地主、富农“打几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孙作宾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多年来,党内怕右的人多,怕“左”的人少,总认为“左”比右好,其实防“左”比防右更重要。群众起来了,对地主、富农“打几下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来说,他们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指责的。但作为土改工作组干部,绝不能将自己的水平降低到普通农民的水平。走路要防跌,赶车怕离辙。我们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要放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的正确之手,不能放错误之手,一切违反政策的错误之手,都不能放^①。孙作宾的观点有理有节,既给土改干部敲了警钟,也给土改工作指明了方向,因而在临夏地区土改中很少有强迫命令的打人现象发生。同时,他们根据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同特点,充分运用民族形式发动群众。这就是习仲勋指示的:“先做好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因为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是把本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都看作是自己的代表,甚至视为“神圣”。我们首先争取上层赞助土改,实际上就是为了顺利争取群众参加土改。不争取上层,就不可能有效地取得接近以至发动群众的便利。在划订或斗争回民地主时,也主要由当地土生土长的回民干部领导,以回民群众为主来进行,以免地主阶级借口挑拨

^① 孙作宾 1951年8月17日在中共甘肃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民族关系。遇有群众提到历史上的民族仇杀问题时,主要引导群众“挖仇恨”,把仇恨集中到回汉农民的共同敌人——反动统治者和地主阶级身上,不记兄弟民族仇恨。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孙作宾特别强调,要严格遵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为有些汉族干部认为风俗习惯是生活小节,甚至把一些积极分子脱离群众,改变风俗习惯的错误行为也当成进步表现。对此,临夏地区十分注意。在没收地主财物时,对有关宗教器具一律不没收。在分配斗争果实时,回民地主的房屋,一般分给回民居住,免生民族纠葛。孙作宾更进一步教育干部说,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尊重民族的平等权利。因为少数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都和宗教习惯相联系,许多宗教习惯也成为民族习惯。如果不尊重,就必然会伤害民族感情,妨碍宗教信仰自由,这不仅是民族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孙作宾还批评一些人患有左派幼稚病,他们把宗教信仰同封建制度混为一谈,企图在消灭封建制度的同时也消灭宗教信仰。这种盲目的反宗教情绪,完全是政治无知的表现。这些问题刚一露头时,孙作宾就及时进行了坚决纠正,没有发生大的偏差。但在处理回民宗教土地问题时,由于对清真寺、拱北、道堂的土地作了“一般不予没收”的原则规定,这样在具体执行中就出现了“不征收、征收一部分或征收大部分”等三种不同的情况,引起了矛盾,产生了误解。后经孙作宾和张德生提出并经西北局同意,在土改复查时,明确宣布:对清真寺、拱北、道堂、喇嘛庙的土地一律不征收,已经征收的予以补退,生活上有困难的予以照顾^①。并组织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参加土改复查,落实政策,从而消除了误解,促进了民族团结。

甘肃解放初期,在回族聚居区的临夏、平凉、西吉、皋兰和藏区

^① 张德生、孙作宾关于土改复查问题给西北局的报告。

的阿木去乎等地,先后都发生了武装叛乱,其中最严重的波及五个县,被裹胁和受害群众达二三十万人。当时主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孙作宾,不仅协助省委主持处理了这件事,而且多次亲临叛乱地区,深入调查,精心指导,积极而又慎重地平息了这些叛乱,争取了民族上层分子,打击了特务反革命分子,教育了广大群众,加强了民族团结。这几次叛乱,都有血的教训。孙作宾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为这些叛乱之所以发生,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匪特利用我们在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中的缺点错误,披着宗教外衣而煽动起来的带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武装叛乱。因此,平息这些叛乱的方针,都是在坚持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只有在政治争取无效或不施军事压力就不可能开展政治争取的情况下,才实行军事清剿。但在军事清剿之后,仍然坚持政治争取。当时孙作宾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先劝后打,劝中有打,打后再劝。”^①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清剿是为政治争取作后盾的,只有配合得宜,才能取胜。任何片面的做法,都会犯错误。西吉叛乱发生后,为了打击匪特的嚣张气焰,有利于争取群众,孤立反革命分子,西北军区和甘肃省委决定,以军事清剿为主,配合政治争取。但因我军未及时出击,致使匪势扩大,损失惨重。后来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匪特一部被歼,大部溃散。在这种情况下,又及时决定,以政治争取为主。明令宣布:叛乱分子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从宽处理;凡群众被骗为匪者,只要回家生产,一律不咎既往,不戴土匪帽子;家属生产和生活有困难者,给以救济和照顾。这样以来,部分匪首纷纷投诚,绝大多数被骗群众回家生产。但匪首司令马国瑗等并未归降,人心仍不安定。“匪首不擒,

^① 1952年4月18日孙作宾在部署平叛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祸乱不止。”这是当时群众最大的忧虑。为此，孙作宾和马震武等宗教上层人士商定，由马震武以教主身份向马国瑗等发出“叛乱即叛教”，“谁不脱离叛乱，我即与之脱离两世关系”的口唤（意为指令），劝其迷途知返。特别是习仲勋当面给孙作宾与马震武讲清了对叛乱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那怕他昨天还拿枪和我们对抗，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的“来降免死”政策以后，孙作宾与马震武立即孤身闯入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西吉叛乱始告平息^①。孙作宾在总结平叛的经验教训时说，民族地区的叛乱，一般都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有一定联系，因此，不能把民族地区的叛乱当作一般土匪问题或一般反革命叛乱去处理，而应主要当作民族问题去处理。必要时就是要通过特殊人物来解决问题。如藏区阿木去乎事件和回区西吉事件，就是通过回藏上层代表人物马震武和黄正清以“慰问团”和“口唤信”等方式做了大量说服争取工作之后，才和平解决的。这个作用，决不能低估。至于在具体处理中，则主要是把民族宗教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区别开来。对民族宗教问题，坚持用民族宗教政策解决；对反革命问题，特别是外来反革命分子则用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解决，而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当地民族上层分子坚持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的政策，尽量扩大团结面，把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尽量争取团结过来。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阻力，增加助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外来反革命分子。

甘肃是个多民族地区。孙作宾从抗日战争开始，先后在甘肃工作了二十多年，对甘肃的回、藏、蒙等十多个少数民族，曾多次进

^① 1952年11月10日西北局批转孙作宾关于西吉平叛的报告。

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发展了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顺利地开展了地下党的工作。甘肃解放以后,他又联系实际,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全省少数民族工作。他深感甘肃不仅是个多民族地区,而且也是历史上民族仇杀比较突出的地区。不仅回汉仇杀,回藏仇杀,而且各民族内部也屡有仇杀。孙作宾形象地说,民族问题在甘肃就像一把锁子,而党的民族政策正是解开这把锁子的钥匙。西吉和阿木去乎等地叛乱的和平解决证明了这一点,全省几十起长期械斗的草山纠纷,在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调解下,一一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在甘肃工作,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关键。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不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就一定会出乱子,犯错误。这就是孙作宾在甘肃多年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1952年12月初,孙作宾到北京向中央统战部汇报了甘肃的民族统战工作。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认为孙作宾的汇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有情况,有分析,对其他地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很有借鉴,要求孙作宾加以整理,写出书面报告。12月8日,孙作宾写了《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送中央统战部。12月23日,毛泽东看了孙作宾的报告后,认为“很有用”,随即在原报告上写出转发各地参考的批语:

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区委:

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统一战线部长孙作宾同志这个报告很有用,转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12月23日

孙作宾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安子

文阅后，由杨尚昆用“加急”电报于1953年1月2日发给省以上各级党委^①。当时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看了孙作宾的报告后称赞不已，认为孙作宾对民族统战工作有研究，有见地，写了一个好报告。198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给孙作宾写信说：“你写的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我看时隔30年，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把它转给宋平同志，请他参考。”谁能料到，毛泽东批转孙作宾这个“很有用”的报告，在1957年12月至1958年2月的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竟有人臆造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毛泽东批示的“很有用”是“反面意思”，是“整孙作宾有用”。于是会议上大鸣大放，大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把孙作宾报告中讲的每个问题、每句话都反其意而用之。一个“很有用”的报告竟然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党纲领”。把报告强调的“民族特点”诬为“鼓吹地方民族主义”；把“做好民族统战工作”诬为“搞阶级投降”；把“团结民主人士”诬为“不要阶级斗争”，等等。当时孙作宾虽早已调离甘肃，但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把甘肃几个领导干部打成“反党集团”后，竟说孙作宾“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奠基人和总后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时孙作宾自信“我的报告没有错”，他义正词严地对批判他的人说：“你们有你们的理解，我也有我的理解。我的报告，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有不够确切之处，但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是用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各级党委的，绝无反意，更无整人之意！”历史的迷误，让人们迷误了历史。共产党员和党的会议，对党中央文件完全从“反面”来歪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只能是“左”的思潮对党性和党的组织原则的扭曲，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批转孙作宾关于甘肃民族统战工作的报告》。

实在可悲。

(八)

1953年1月至1954年6月,孙作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对西北地区的民族统战工作颇有建树。1954年7月至1958年3月,调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团结各族各界人民,为完成青海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呕心沥血,运筹决策,卓有成效。1958年5月,孙作宾被错划为右派贬职后,忍辱负重,在任青海省图书馆馆长的平凡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了20个春秋,充分表现了他逆境弥坚的高尚品德。

从1957年夏季到1958年夏季,在全党全国进行的整风反右斗争中,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在这种“左”的思想影响下,青海省的反右斗争也愈演愈烈,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做敌我矛盾,把许多探索性的意见和善意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从而冤枉了孙作宾等一大批好同志。1958年1月13日至3月8日,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法,集中揭发批判孙作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右派言论”,以至采取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进行人身攻击。他们把孙作宾的一些报告、讲话和文章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横加批判,把孙作宾批评省委个别领导人在领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说成是“对党不满”、“向省委闹

独立”等等。甚至上挂下联,把孙作宾的秘书和公务员在整风中向省委办公厅提出克服“五多”的问题,也说成是孙作宾发动秘书和公务员一起“向党进攻”。孙作宾的秘书屈养生,是个作风正派、求真务实的好同志,因在日常工作中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中肯意见,被视为反党,要划右派。办公厅一位负责人征求孙作宾的意见,孙作宾问“为什么要划右派?”答曰:“有缺点错误”。孙作宾反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缺点错误就划右派,是什么逻辑?”后来屈养生还是被错划为右派。孙作宾也因“包庇右派”而罪加一等。

孙作宾一贯是个刚直不阿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说实话不说假话的正直性格。他自己不说假话,也不容许别人用假言惑众。他在批判会上,一听到与事实不符的谎言,就立即反驳辩解。为此,会议的组织者竟责令他在批判会上“只能认罪,不能辩解”,给你扣上什么罪名,就得承认什么罪名。于是,把孙作宾提出的“按照民族特点处理民族矛盾”的观点,诬为“夸大民族矛盾,否认阶级斗争”;把“慎重稳进,适当放缓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子”,诬为“要党让位于剥削阶级”,指责孙作宾“完全背叛了党,成为剥削阶级牧主、头人在党内的代理人”;把“争取了上层,就争取了群众”,诬为“向剥削阶级投降”等等。这些“莫须有”的批判,其实都是“指鹿为马”式的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孙作宾在青海的实际工作中,由于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严格求实的态度,对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好的建议和见解,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贵的。但在以“左”为正的人眼里,这一切都是右。因而对孙作宾不公正的处理逐步升级。1958年1月27日,中共青海省委作出《关于停止孙作宾党内一切职务的决定》。3月8日,省委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又作出《关于开除孙作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诬称孙作宾是“反党集团的主帅”,定为“极

右分子”。这次会议全盘否定了孙作宾的历史功绩，一棍子打死。5月，孙作宾被贬职为青海省图书馆馆长。8月20日，中共青海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又作出《关于同意清除右派分子孙作宾出党的决定》，确认省委二届五次全委会将孙作宾清除出党“是完全正确的”。从此，一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被无情地剥夺了，长期受到委屈和压抑。然而，“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孙作宾离开了省委书记、省长的领导岗位，来到青海省图书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的意志是坚强的，对党的忠诚是不变的。他一如既往，仍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对待新的工作。他团结图书馆的广大干部和职工，一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提高干部职工的政治理论水平；一面认真钻研图书业务，搞好业务建设，使图书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在孙作宾和全馆职工的艰苦努力下，把一个藏书不多，设备不全的图书馆终于建设成粗具规模的门类齐全的图书馆。馆藏图书由1958年的20万册到1978年增加到70万册。藏书质量也大大提高。不仅有大量实用的现代图书，而且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线装古籍书，以及俄、英、德、法、日等外文书刊和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等。孙作宾在抓业务建设中，首先从青海的实际出发，除建立学习毛泽东著作阅览室外，又专门增设了少数民族阅览室和科技宣传服务阅览室，为少数民族学习提供了方便，为传播科技信息提供了场所。特别是开设了夜间阅览室，更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在孙作宾的倡导下，青海省图书馆不仅与各州县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定期交流经验，还普遍开展图书下乡，送图书上门活动。特别是把有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刊及时送到少数民族地区，送到少数民族手中。孙作宾身在图书馆，心想全省少数民族兄弟。他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不能只满足于实行区域自治,还要帮助少数民族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只有经济发展了,文化水平提高了,才能逐步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孙作宾在图书馆工作中,每办一件事,都把少数民族挂在心上,教育干部和职工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和促进民族团结而尽心尽力,千方百计地把少数民族服务工作做好。

孙作宾在青海省图书馆工作的20年中,既顶着“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主帅”的政治压力,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分坎坷。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信邪,不畏难,扎扎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图书馆的同志有口皆碑,无不称赞孙作宾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当时他虽然被剥夺了党籍,但他的一言一行却“比党员更党员”;他虽然不是图书馆的党支部书记,但他非常支持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历届党支部书记也都非常尊重他,经常征求他对支部工作的意见。他常常以十分谦逊的态度,向党支部谈看法,提建议,每件大事都由党支部讨论决定,实际上真正起决策作用的还是孙作宾。所以图书馆的群众都说孙作宾成了“不是党员的党员,不是支部书记的书记。”^①

十年浩劫中,孙作宾多次遭批斗,又被“军事监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同康生和“四人帮”的斗争始终坚贞不渝。“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红卫兵借口图书馆是封资修的老巢,要烧毁藏书时,他挺身而出,一方面组织馆内同志将一些确无保存价值的图书集中起来,应付红卫兵;另一方面又积极请示上级党政军部门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制止“过火”行动,从而使馆藏图书完好地保

^① 1996年8月青海省图书馆干部座谈记录。

存了下来。在“斗批改”期间，每天找孙作宾调查材料的人很多，而每份材料又都关系着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孙作宾坚持一条，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负责。说实话，说真话，不说假话，更不投其所好，人云亦云。有一次，有个外调人员要孙作宾证明一位负责同志是“叛徒”，被他严词拒绝。那个外调人员恼羞成怒，训斥孙作宾是“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孙作宾针锋相对：“我是顽固到底了，假材料一个字也不能写！”有些监管人员，也软硬兼施，责问孙作宾“你这样顽抗，难道就不顾自己的前途命运？”孙作宾正告他们：“我从入党之日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党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这理直气壮的回答，惊得监管人员也瞠目结舌。

长期处在逆境中的孙作宾对任何邪恶从不低头。但对自己的同志，即使曾经给自己留下严重创伤的同志，也抱着宽容的态度，理解一切。他懂得“只有谅解才可以挽回感情上的损失。”“文化大革命”后期，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患重病在北京住院，他对1958年错误处理孙作宾深感内疚，弥留之际，托人带信，很想当面表示歉意。孙作宾闻讯，立即让人转告：“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时间已经把我们之间的创伤治愈了，还是一笑泯恩仇。”^①肺腑之言，使高峰流泪不止。

(九)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同意青海省委《关于孙作宾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对孙作宾的原处分决定，彻底平反。1979年2月，中央决定调孙作宾回陕西工作，先

^① 1996年青海省图书馆干部座谈记录。

后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时他虽年届古稀，仍然精神焕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全省一百多个县市。无论是贫困山区，还是穷乡僻壤，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或访贫问苦，或开诸葛亮会，尽量让群众讲心里话，倾听群众呼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指示精神传达后，农民纷纷奔走相告，“中央松绑放权了，可以自主生产了”。但在陕西地区，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仍然不主张在小麦主产区特别是关中小麦主产区实行联产到劳或包产到户，甚至有的地方对已经实行了联产到劳的也宣布收回。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是“放”还是“收”争论确实很大。一些人主要是怕右怕变，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甚至提出“现在不是搞不搞生产责任制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怕字很多，帽子很大。孙作宾从长安、礼泉、延安、榆林等18个县市的二十多个生产队的调查实践中证明，农民是生产的主人，也是农村生产力的主体，他们多年来不仅吃够了“做活一窝蜂，出工不出力”的苦头，而且对全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很恼火。农民种庄稼，种什么，何时种，种多少，怎样种，都是一个模式，由县上的广播喇叭指挥，“不会种庄稼的把会种庄稼的整扎啦！”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官”办生产责任制，咋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咋能把生产搞上去？孙作宾认为，关中小麦主产区是陕西的粮仓，要把全省的粮食生产搞上去，非调动小麦主产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可。因此，对小麦主产区的联产到组、到劳或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放”还是“收”，孙作宾断然提出“把政策交

给农民,由群众自己选择,哪种办法对生产有利就采取哪种办法,不要和生产力作对!”^①孙作宾的意见一针见血,也最符合农民的心愿。他深有体会地说,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办事。符合这个规律,就能促进生产发展;违反这个规律,就要受到历史惩罚,给农民带来苦头。

1980年9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孙作宾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83年6月,他又被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此期间,他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贯彻执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民主党派人士密切合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积极作用。

孙作宾是个做民族统战工作的行家里手,社会交往很多,统战朋友也很多。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同民主党派朋友合作共事,对他来说自然是驾轻就熟。这些年,在他的家里或办公室,经常有各民主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或其他各阶层人士来来往往,同他交谈,向他反映情况,或提批评,或提建议,他都热情接待,赤诚相见。所以,很多民主人士,无论是陕西的、甘肃的、青海的,都愿意同他倾心交谈。而孙作宾与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就是一个字——诚。诚则无伪,诚则有信,诚则能招天下士。你能以真诚待人,人家就愿意同你肝胆相照。提起这个“诚”字,孙作宾可以从甘肃讲到青海,从青海讲到陕西,如数家珍,津津乐道。解放初期,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担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这样的职务,仍然

^① 孙作宾关于农村生产问题的调查报告。

心存疑虑,工作畏首畏尾,孙作宾在同他们交往中,一条最深切的体会,就是“竭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弥谗诉。”(唐·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对他们不要盛气凌人,不要以胜利者自居,而要以“座上宾”的礼仪善待他们。以至诚的态度尊重他们,这样才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和卑微心理,真正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①。孙作宾在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无论是开政协委员会,还是开政协常委会,他几乎每会必到,到必发言,言必有中。因为在每次大会之前,他都按照会议的主题,同在陕西的全国政协委员一起,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1987年春,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作的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发言,就是他在会前对西安、宝鸡、咸阳等几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的结果。这几个城市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指引下,吸取“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抓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迈开了新的步伐,创出了新的经验,取得了可喜成效。孙作宾认为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首先搞好文明城市的建设更为重要。因为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就能够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推动周围地区和广大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示范和导向的作用。西安和宝鸡在创建文明城市活动的实践中,把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作为塑造文明城市形象和创建文明小区活动的主要内容,探索出一条从基层入手,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新路子,发挥了典型示范的辐射作用。孙作宾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介绍宝鸡市的情况说,全市1986年就有各级干部6万多人次走访了城乡居

^① 1997年3月邓成城访谈录。

民户,有3970个包户服务组,对4700多户军人家属、残废军人和鳏寡孤独户实行包户服务,不仅使这些人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而且也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教育,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

孙作宾是个有7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对陕、甘、宁、青地下党组织的建设有重要贡献。中共中央从1987年至1997年,曾三次邀请孙作宾为“特邀代表”,享有同正式代表一样的权利,出席了党的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作宾兴奋地说,这是党给予他的最高荣誉,也是党对他70多年革命历史的最好评价。他一生经受了多次坎坷,三次遭到错误路线的折磨,但他风吹不倒,浪打不沉,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历史还了他的清白,给了他公正评价后,他兴奋不已,无限感慨:“东风已压西风倒,好事常由坏事成。”^① 在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会议上,他都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盛赞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特别在十四大陕西代表团会议上关于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言,朱镕基总理和与会代表,都一致称赞“孙老讲得好!”孙作宾说,姓“资”姓“社”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左”和右的问题,就像禁锢人们头脑的三把锁子,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使我们受了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错过了一些良好的机遇,延缓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步伐。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就像一把金钥匙,把一河水解开了。今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改革开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当有右反右,有“左”反

^① 1996年孙作宾访谈录。

“左”，反“左”反右，都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准绳，绝不能以“左”为正，以正为右，从一种错误倾向走到另一种错误倾向^①。

(十)

“一身正气无媚骨，两袖清风不染尘。”这是很多长期与孙作宾风雨同舟的老战友，对他做人做事的两句朴素而又中肯贴切的赞词。

孙作宾一生，秉正刚直，具有鲜明的秦人性格。他为人处事，快人快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来不做违心事，事无不可以对人言。他常说：“曹操一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疑心重重，头痛而死；我是反其道而行之，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坦坦荡荡，问心无愧。”^②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自己则淡泊名利，不为权惑，不为物使，一贯反对巴结逢迎，从不损人利己。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始终表里如一，坦荡自然。他信守“人我之际要看得平，平则不忤；功名之际要看得淡，淡则不求；生死之际要看得破，破则不惧。”^③他经常教育后人说：“共产党人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这些活着的幸存者，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呢？！”他在担任省委书记、省长的领导岗位上，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老百姓，从来不摆“官架子”。无论是在游牧民的帐篷里，还是在农家田舍里，他都和人民心连心。或割麦打场，或放马牧羊，农牧民都说他是做庄稼的内行人。在青海省的一次农村

^① 孙作宾在党的十四大陕西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

^② 1976年5月孙作宾访谈录。

^③ 孙作宾集录戴安澜将军警策辞。

蹲点调查中,当农牧民得知他是省上的大干部时,有人问:“他的官有多大?”回答的人悄悄说:“同马步芳一样大!”农牧民们几乎一拥而起,稽首称颂他是草原上当官不像官的“平民省长”^①。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孙作宾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青海高原整整工作了25年。无论是当省长,还是当图书馆长,他都为青海人民办了不少实事好事。青海的干部和群众至今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台上台下都是人民公仆的老馆长、老省长。因为他的心始终是和青海人民相通的。青海的干部和群众清楚地看到,孙作宾在青海遭受过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折磨,吃尽了苦头。但他对个人的得失淡然处之,对人民的疾苦却忧心忡忡。他一向是个坚强而有泪不轻弹的人。但在事关青海人民疾苦的问题上,他曾三次流了泪^②。一次是1959年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时,乡里人向他反映,食堂天天吃大锅清水汤,农民端上饭碗照影影,完全处于饥饿状态。他恨自己身处逆境,言不见省,自感愧对人民而落泪了。一次是1961年,当他得知由于省上主要领导人的严重浮夸,造成“粮食卫星上了天,农民吃不上饭”,饿死的人以数十万计时,他痛心地失声大哭了。再一次是1978年,他将调回陕西时,在青海省委召开的欢送会上,他深情地说:“作为个人,我一无所求;作为党员,我有愧于青海人民。”他的眼眶湿润了。青海的历史忘不了,青海的历史不能忘。人们对他在青海领导工作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的精神是倍加赞许的,说青海诸多“左”的错误都与他无关。而孙作宾则诚恳地说:“这不是我高明,而是错误的历史把我推到了正确的一面;如果我在台上,同样会干

^① ^②1996年8月14日青海省图书馆干部座谈记录。

出一些错事蠢事的！”^①

孙作宾是个务实而勤奋的人。他坚信“勤奋可以成就一切”。五六十年代，他除了正常的工作学习之外，在锻炼身体和学习书法艺术上，也是持之以恒，从不间断。他不仅能够娴熟地习拳舞剑，而且在“耳顺之年”，仍然坚持长途走步，风雨无阻。他学习书法，非常刻苦认真。在他的书桌上经常摆着许多历代书法名家的字帖，一有空就利用废报纸练字，写了正面写反面，每天不写十数张不罢休。他尤其喜爱颜体，每个方方正正、苍劲有力的字迹上，都凝结着他的辛劳和汗水。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的字果然出师成名了，被推举为中国书画研究院西北分院名誉院长、于右任书法协会名誉副会长，经常同一些书画名家切磋交流，怡然自得。有人求他写字，他都欣然应允，从不推辞。他说这是他联系群众的一个好形式、好渠道，也是他陶冶情操、奉献余热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有求必应，更不取任何报酬。有一次，有个书法爱好者请他写了几幅字，随手把500元的润笔费放在桌上说：“这是你老的劳务报酬。”孙作宾顿然失色，不高兴地说：“拿回去！我的字认人认情不认钱！”当这个同志把钱收回后，孙作宾又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我的字是尊重我，我给你写字也是尊重你，这就是翰墨铸情。今后我们之间就以书法交流增进友谊吧。”^②

孙作宾一生为人，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健康成长。他的几个孩子大多出生在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里，是唱着《东方红》和《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成长的，对党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厚感情。但孙作宾和老伴刘杰，从不放松对孩子的学习和思

^① 1996年8月青海省部分干部座谈记录。

^② 孙作宾子女访谈录。

想品德教育。即使在很小的问题上,也严格要求,举一反三。解放战争中,他的大儿子在地里踏坏了农民的几株玉米苗,他立即领上孩子向农民认错,并教育孩子牢牢记住“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绝对不能侵犯的。”他住的机关院落里有很多果树,每当果子成熟时,他不仅教育孩子不能摘食,就是地上的落果,也要拾起来交公。他说:“孩子从小养成了公私分明,就会终生受用。”他教育孩子除学好文化知识外,更注意从马列主义理论和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他经常提醒孩子的三句警句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这几乎成了每个孩子的座右铭,对他们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改造都起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他的七个孩子,六个是大学或大专毕业,在各自工作的岗位上都较出色。但他们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遵循父母亲的教诲“服从组织分配,甘当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没有一个是“走后门”工作的。他的三女儿,有一段时间对搞医务工作不安心,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到行政单位工作。孙作宾耐心地劝慰女儿说:“国家培养一个医生是很不容易的,通过你的工作给病人解除了痛苦,这是很高尚的。还是安心医务工作好。”现在他的这个当医生的女儿在二十多年的默默奉献中,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能为别人解除痛苦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

孙作宾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和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生活简朴,饮食清淡,吃饭只要有面条、馒头、油泼辣子加大蒜,就吃得香,吃得可口。无论什么五谷杂粮,或精或粗,他都爱吃。三年困难时期,他虽然患有胃病,仍然同全家人一起摘榆钱,挖野菜,喝菜糊糊,吃菜团子,同甘共苦。他穿衣服不讲究什么质料,只要干净就好。平时穿的衬衣多处有补丁。在青海工作时,家里用的桌椅板凳,有损坏或不结实时,他修修钉钉,照常使用,始

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他经常教育孩子饱时莫忘饿时饥，现在日子好了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要善于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他的子女从小都养成了劳动习惯，常常在家里帮助保姆洗菜、洗衣服、擦地板，没有一点儿骄娇之气。有几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或优秀少先队员。学校也多次称赞他们的家长是教子有方的好家长。孩子们也深感父母崇俭黜奢，对他们耳濡目染的熏陶，正是留给他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们始终拥有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生活得很充实。他们更懂得这种精神财富是用父母亲的高贵品质铸造的，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而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1983年孙作宾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壮心不已，官休志不休，名休实未休，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他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和十分珍贵的党史资料，为陕、甘、宁、青党史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财富。他在双目失明后，天天坚持听广播，听新闻，让秘书给他念报纸，读文件，时刻关心着党和国家大事。他风趣地说：“两眼看不见，耳朵当眼睛，多问天下事，目盲脑子清。”孙作宾一生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计名利的坚强党性，他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他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他的以诚待人、广交朋友、团结各界人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永远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刘云岳 王一士)

刘 林 圃

(1909—1932)

刘林圃，陕西耀县人。1928年在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员。1930年在平津地区组织城市群众斗争时被捕入狱。1931年出狱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后返回耀县，与当地中共组织接上关系，任中共耀县特支委员，分管军事工作。1932年1月上书中共陕西省委，建议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对部队建设提出意见。2月，调往中共陕西省委工作，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常委。同年四五月间，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甘肃，与习仲勋等人共同组织领导“两当兵变”。失败后回到西安，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9月26日在西安习武园英勇就义。

“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刘志丹于1933年为悼念刘林圃烈士而敬献的挽联题词，是刘志丹对刘林圃烈士为革命献身精神的高度赞扬。

刘林圃，陕西省耀县刘家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领导过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在两当兵变失败后，不幸被杀害于西安市习武园。

1909年，刘林圃出生在耀县刘家河，兄弟四个，刘林圃排行为二，兄林山，弟林榆、林溪。他幼年丧父，母亲拉扯着他弟兄四人苦

度日月。家有破房两间，土窑一孔，无钱维修，难以居住。母亲只好拖着他们栖身在邻的油坊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1920年，刘林圃入耀县石人小学读书。家中除了租种地主家的土地外，母亲还利用农闲时间扎纸花、绑灯笼卖钱来维持生活，供刘林圃上学。刘林圃上学时年已12岁，深知家庭的贫寒，读书格外刻苦，孜孜好学，15岁时考入耀县高小。

1925年秋冬，渭北各校学潮风起，耀县高小也闹学潮。在闹学潮中，刘林圃同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发生矛盾，被开除学籍，辍学回家。失学以后，他在家刻苦自学，关心国内时事政治，忧国忧民。他目睹旧社会的黑暗和阶级压迫、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现实悲境，从进步书刊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刘林圃年轻的心灵中萌发出追求光明的抱负，他为探寻真理，实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四处奔波。

刘林圃16岁时跟随一个旧军官到了河南，参加国民军胡景翼部，任团部司书。次年北伐战争顺利发展时，黄埔军校湖南分校开学。刘林圃闻讯后十分高兴，遂考入该校学习。学习期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共产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刘林圃辗转于唐山、天津、北平一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努力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刘林圃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期间，认识了陕北的谢子长。在谢子长的领导下，他在平津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0年，蒋、冯、阎战争爆发。此时党中央“左”的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提出了争取“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首先发动中心城市起义”的口号。在这种“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平津地区地下党发动城市革命，群众举行“飞行集会”、“飞行暴动”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刘林圃满怀革命激情投入到了这一斗

争。在斗争中，不幸被捕入狱，被关押 11 个月。此间敌人对他进行多次刑讯，他始终坚不吐实，没有出卖党的机密，也没有出卖同志。敌人没有真凭实据，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刘林圃出狱以后，同平津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外闯荡的五年多时间里刘林圃面对刀光剑影，他不仅刻苦学习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英、俄两门外语。在错综复杂的恶劣逆境中，懂得了用马列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审时度势，研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写下了不少学习马列主义的体会文章。

1931 年春夏，刘林圃在颠沛流离中，由天津回到阔别六个年头的耀县家乡。这年夏季的一天，分别多年的老同学张仲良、杨再泉从泾阳县回耀县。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叙旧谈新，情投意合，在张仲良、杨再泉的介绍下，刘林圃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刘林圃彻夜难眠，热血沸腾。面对民族危亡的灾难，他愤笔挥毫写出了《满洲问题与中国》的论文，倾吐了他爱国的心声。他在文中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了发生侵略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如何解救满洲，解救中国的途径。他在文章中指出：“世界走入一个创伤的劫运，一切都在错综的矛盾过程中发展着。帝国主义要竞争市场，竞争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之来源。这两种竞争对象之取得，便是广大的殖民地之占有。……他们要分割地球表面的殖民地，能够维持某种状态之平衡或想得到某种状态之暂时结束，便只有诉诸战争。”“我们不希望仁慈的上帝来救我们……我们认为日内瓦是分赃厅，是屠宰场，是柜台，是鱼市。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相信中华民族自己可以胜利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拿自己的力量寻找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些精辟的论点至今读起来仍然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可惜的是这篇

文章未最后完成,他又忙于更紧迫的工作。因此,他当时未将文章呈交组织。全国解放以后,由他的亲属将遗稿呈交陕西省委。现今,仍珍藏在陕西省档案馆。

刘林圃对西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十分关心。

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师后,于当年11月7日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是党领导的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后来转战陕甘广大地区,为而后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1932年1月,刘林圃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曾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西北反帝同盟军驻地走了一趟,住了几天。他敏锐地发现了这支年轻的革命部队,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从三嘉原回到耀县后,立即向陕西省委写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在《意见书》中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称谓有些灰色,旗帜不鲜明,不能更有效地吸引广大贫苦民众参加革命队伍。因此,他建议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林圃在这个《意见书》中还指出:这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都比较薄弱,建议予以加强。他将这份《意见书》交给耀县特支书记张仲良。张仲良看了《意见书》后觉得这些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要,就将它送交给渭北特委,请渭北特委转交省委。1932年农历正月三十,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石人小学。杜衡对张仲良说:“刘林圃同志的《意见书》写得很好,省委研究完全同意他的建议,现已议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将采取措施加强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杜衡提出要找刘林圃面谈。他们谈话后,杜衡说要把刘林圃调到省委作秘书长。刘林圃准备了行装,第二天就到西安陕西省委工作了。当时在王明路线严重干扰、党内生活很

不正常的情况下，刘林圃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这种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刘林圃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后，任省委军委常委。

1932年4月，陕西省委决定，要在国民党杨虎城部驻甘肃两当县的警三旅二团一营发动兵变，兵变后将部队拉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壮大红军力量。

省委特派刘林圃去领导和指挥这次兵变。刘林圃到达部队时，适逢一营即将由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向甘肃徽县、成县一带调防。当部队行军到两当县城宿营后，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兵变问题。当时，一营的三个连有地下党的组织，并设有营党委，党委书记是习仲勋，委员有李秉云、李特生等。营党委会议开始以后，习仲勋简要向大家说明，省委特派老刘同志前来领导兵变。接着刘林圃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还分析了发动这次兵变的有利条件：一是部队中党的力量较强；二是敌军内部军官克扣军饷，士兵生活甚苦，官兵矛盾尖锐；三是一营士兵不愿远离家乡，向徽县、成县一带转移，等等。他富有说服力的讲话，对参加兵变会议的干部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在研究两当兵变问题的党委会议上，刘林圃对贯彻执行省委决定，不仅思想明确，态度坚决，而且善于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在讨论如何举行兵变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要当晚在两当举行；一种意见认为等一营调防到徽县、成县以后再搞。一时定不下来。刘林圃反复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去徽县、成县以后，部队距敌团部很近，举行兵变的困难可能增大。再说到了那里，距陕北更远了，兵变后部队北进更加不

利。于是，他作出决断，就在当晚于两当县城举行兵变，并部署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指定了各连临时负责人，分配了具体任务，确定了对敌军官的不同政策。散会以后立即开始行动，经过一段战斗，到鸡叫时分，刘林圃又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他在会上简单说明了有关情况，决定把三个连的士兵集合起来，很快拉出两当县城。这一行动搞得干脆利索，打死几名反动军官，士兵无一伤亡，拉出的三个连约有200人左右，胜利实现了省委决定举行兵变的第一步任务。

第二天上午，部队行军到太阳寺宿营吃饭。营党委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洁为支队长，习仲勋为政委，并指令吕剑人、高祥生、左文辉为一、二、三连连长。会议还决定由刘林圃给全体官兵讲话，以鼓舞士气。刘林圃给大家讲了形势、任务和纪律。他说，我们不是土匪而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去陕北当红军，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已编为红军游击队，大家要守纪律，不要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要打骂群众，不要侮辱妇女，这样才能打胜仗。他还代表党组织宣布了部队番号和人员任命名单。他的讲话，鼓舞了士气，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刘林圃和营党委领导的这次整编，使广大士兵初步知道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大家表示，要战胜一切困难，去陕北当红军，做一个光荣的红军战士，这就为北上途中数次战斗，克敌制胜，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和思想基础。

两当兵变在陕西兵运史上，是一次重要事件。这次兵变，后来虽因敌强我弱，距离陕甘边根据地太远以及工作上的失误等原因而失败，但它在国民党西北军和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生气勃勃的战斗力量，鼓舞了广大革命人民勇往直前夺取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

部队经太阳寺整编之后，立即北进。行军途中，多次遇到敌伪民团的阻挡。不打垮或消灭他们，部队就不能前进。部队沿途经过的地方主要有香泉、赤沙、通洞、高崖、花花庙和页岭等地。历经大小战斗六七次之多。这些战斗实际上是刘林圃指挥的。他是黄埔军校湖南分校的学生，懂得一些作战指挥，又曾当过兵，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例如在通过香泉时，敌民团占据着山头，控制了通道，部队打了半天，打不垮敌人，刘林圃认真地观察了地形，决定派小部兵力迂回到敌人背后，抢占山头。敌人两面被攻，军心动摇，很快逃之夭夭，部队顺利通过香泉。战斗中，刘林圃不但和干部一道指挥，而且和大家并肩作战。他指挥战斗机智灵活，善于动脑子，给指战员讲了不少办法，要求尽量避开敌人，少打仗，节约子弹，加速向泾河以北行军。

部队在行军到千阳县高崖镇之前，了解到镇上驻有民团武装。为了通过高崖，刘林圃提出，要采取奔袭的办法。于是就在一个夜间袭击了高崖民团，虽未全歼敌人，但却占领了镇子，并有少量缴获。当部队行军到页岭时，被敌正规军截住前进道路，经过半天战斗，仍未击退敌人，这就不能再沿原来的路线前进了。经过讨论，决定绕道前进至麟游的岳御寺，休整部队，准备一举胜利越过西兰公路和泾河，与陕甘游击队会合。不料，部队行至麟游后遇到大批包围过来的敌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敌强我弱，在敌人节节合围中，在麟游兵变受挫失败。

两当兵变失败后，刘林圃经乾县于9月回到西安。回家以后，妻生一子名叫刘东元。由于刘林圃不在家，生活很困难，妻子营养不良，奶水不够孩子吃，小东元的身体特别瘦弱。当刘林圃见到孩子后，高兴地说：“我们有儿子了，将来一定是好样的。”他劝妻子：“孩子奶水不够吃，身体不太好，不要紧，一切会好起来的。”来不及

再和妻子说几句温情话，他又赶忙去省委汇报两当兵变的工作情况去了。

一天，他在西安街上买催奶药，行至北大街教育馆门前的阅报栏处，看上边贴有新报纸，便停下来看报纸新闻。不料，刘林圃被参加过两当兵变的一名副班长马腾云发现并出卖，被敌人扭送到国民党部队的团部关押起来。敌人审问时，他说自己姓张，叫张庆云，是山东人，拒不承认领导两当兵变之事。敌人用残酷的刑罚轮番折磨他，要刘林圃按照叛徒马腾云的供词“认罪”。刘林圃硬骨铮铮，坚强不屈。

1932年9月26日(农历八月二十六日)，敌人将刘林圃从监狱提出，押上军车，要对刘林圃处以死刑，遍体鳞伤的刘林圃，被敌人拉上在西安市游街示众。他面对敌人的枪口，忍着周身的疼痛，昂首挺胸，面无惧色，朝着沿街两边观看的群众，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对共产主义理想毫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沿街两旁观看的群众，不少人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说刘林圃是好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好样的。最后，刘林圃被敌人押送到习武园，英勇就义，终年23岁。

半年后，刘林圃之子刘东元因出麻疹无钱医治而夭折。其兄刘林山为使胞弟后继有人，将儿子刘志刚过继给刘林圃，以怀念骨肉之情。在敌人大肆清剿刘林圃亲属的情况下，刘林山携子迁徙同官县城南关洞子沟。刘志丹等到同官吊唁，写下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条幅和“英勇就义”的中堂，褒扬刘林圃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郭清文 任双全)

刘 威 诚

(1904—1992)

刘威诚，陕西省蒲城县人，1910年，刘威诚在本县上私塾，高小毕业后，考入运城山西省立二中。1924年夏初，刘威诚通过友人介绍，参加了杨虎城在陕北三边的教导队当学兵。1927年秋，刘威诚经张汉民介绍，在杨虎城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刘威诚任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一旅第三团团团长，在陕西安康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并选派了一批

连排级军官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党培养干部。1945年7月率部起义，参加人民军队行列。1946年9月任西北民主联军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威诚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西安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人大副主任等。1992年8月17日逝世，终年89岁。

(一)

刘威诚，1904年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马湖乡（今洛滨镇）刘家湖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马湖地处渭北干旱丘陵地带，经年少雨，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年馑不断，民流游徙，饿殍载道，古有“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民谣。祖辈过着清苦的生活。加之反动腐朽的清政府是“无年不加捐，无款不剥民”，差官巡勇横行霸道，

欺压勒索，胜似虎狼，老百姓的穷日子苦不堪言，反地捐地税的斗争，此起彼伏。

刘威诚的父亲刘仲廉是清末武秀才，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会员，在动荡的年月，带领农民抗暴锄奸，被反动势力杀害，家仇国恨给刘威诚幼小的心灵打下复仇的烙印。

1910年，刘威诚在本县上私塾，而后到蒲城县读高小。高小时期受进步体育老师的影响，带领同学抵制反动教育。由于反动势力杀害了父亲并扬言要斩草除根，因此，刘威诚小学毕业，决心当兵报仇，毅然离开家乡，考入运城山西省立二中。在家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靠母亲纺线织布及亲戚资助，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在运城山西省立二中学习期间，受其班主任（北大毕业生）影响，参加山西运城学生运动，反对反动当局卖国行径（将一煤矿卖给英帝国主义），组织罢课游行，刘威诚是班上学生代表。此间受“一二·九”运动和进步书刊的影响，革命思想有很大提高，在其作文“中国社会的弊病是什么”文章中提出：“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等治国策略，得到老师的好评。老师说：“文章写得好，但不能贴堂，否则是杀头之罪。”时值辛亥年，陕西蒲城县知县李体仁因仇视革命活动，借故捣毁县教育分会，捕押刑讯蒲城县立高等小学师生，企图破获革命组织而制造出来的惨案，“蒲案”。“蒲案”不仅在陕西，而且在全国各地闻名，全国各学堂中更甚，因受害的学生原斯健为刘威诚的同乡，对于年少的刘威诚，对这些似懂非懂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更多的是疑问。

高等小学毕业后，刘威诚考入运城山西省立二中学习时，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西安乃至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热烈响应，自动组织起来，进行请愿、罢课、游行、宣传，并联合商界抵制日货，通电支援北京学生的反帝斗争，刘威诚积极参与其中，经受了锻

炼。在陕西的靖国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物，还带头参与了这些活动。于右任、胡笠僧（景翼）、杨虎城、李仲三、李仲特、李宜之（仪祉）等这些名字，对求知欲特强，性情豪爽的刘威诚来讲，如雷贯耳，经常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惟一的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杨虎城是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1年间，由于直系军阀的大军进入陕境，陕西靖国军各部在处境困难情况下，经不起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大部靖国军易帜改编，惟杨虎城仍坚持靖国军旗帜，不避艰险，孤军与数倍之敌周旋于渭北一带。但众寡悬殊，四面受敌，械弹粮草一切补给无着，同时为了保存实力，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杨虎城乃于1922年夏率部队北上三边，从事整训。在整训期间，首先感到由于大部分军官都出身行伍，缺乏军事知识，作战尚可，但对于训练队伍颇感困难。遂于1924年夏初，在安边成立教导队，隶属于团部，当时邀请具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担任训练工作，邀请到原在冯玉祥部工作的赵寿山等人担任训练工作，同时派人到陕北、关中各地招考青年学生12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程度，刘威诚这个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应召其中，成了一名学兵。刘威诚通过李德升之弟介绍，参加了杨虎城的学兵教导队，学兵教导队的教官是赵寿山和段象武。初到部队，刘威诚既感陌生，生活又不习惯，训练不但紧张，而且要求严格，正式操课的时间在12小时以上，还不包括跳高、跳远等课外活动，但他克服一切困难，坚定意志，安心学习操练。

当时陕北的统治者是镇守使井岳秀。辛亥革命后，井岳秀在陕北拥兵坐大，但他与靖国军的于右任、井勿幕等有联系。杨虎城此时引退在榆林休养，军队由李德升带领，杨虎城在榆林城并没有闲着，他结识了杜斌丞、魏野畴、惠友光、呼延震东、李子洲及杨明

轩等民主斗士和共产党人，尤其是接受了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刘威诚在杨虎城部队所办教导队当中，自然而然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

1925年冬，杨虎城任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队于农历十一月间出山南下，进驻关中渭北一带，教导队隶属于总指挥部，随同总部南下驻耀县，由于刘威诚与李德升同乡，李又与杨虎城同乡，所以刘威诚很得他们的信任，杨虎城经过刘威诚之手，在此地资助了西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王韵清、李祥生、杨天章等青年知识分子。

在杨虎城驱逐北洋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战斗中，二支队司令李德升率部进攻盘踞大荔、合阳、韩城等地的麻振武匪部时，担任排长的刘威诚勇敢机智地率全排战士冲杀在前，稳定了战局，使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在西府驿门镇战斗中刘威诚不幸负伤。这时，国民三军军长孙岳率部入陕，杨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任师长，师部驻虢镇，师政治处刘品三、宋树藩等人对刘威诚的影响很大，刘威诚了解到岐山职工学校校长雷星阶是共产党员，为了解究竟，他便有意与其接触，建立友谊。

1925年秋季，中共北方区执委和团组织派方仲如（干才）回陕西开展革命工作。方到陕后，通过共进社组织，到渭南固市镇渭阳中学担任训育主任兼数学教员，他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和帮助学生举办读书会、讲演会、辩论会，辅导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浅说》、《帝国主义浅说》和《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并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团员，成立了共青团固市特别支部，方仲如任书记，当时影响不小，很得进步师生仰慕。1926年2月，刘威诚随杨部转进泾阳、三原一带驻防，吴新田部和刘在任的第十团成胶着状态。刘威诚利用担任固市以东警戒任务的机

会，他闻知方仲如的才干，乘机到渭阳中学与方仲如结识，向方执教，方仲如则耐心细致，由浅到深，入情入理地给刘威诚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刘如鱼得水，相识恨晚，这对他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作用，使他终生难忘。

4月，直奉军阀向北方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发动进攻，4月7日，刘镇华由潼关长驱入陕，率8万之众西犯。17日，刘镇华占领陕西各县后，进抵西安城下，连日猛攻，围困西安，企图一举占领西安。同时，又派兵围攻三原、高陵、泾阳等县。杨虎城、李虎臣率领部队，坚持反围城斗争，由于中共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使这次反围城斗争从西安到三原、从城内到城外，坚持了八个月，终于战胜了刘镇华等军阀的猖狂进攻，坚持和保卫了陕西的革命阵地。时任排长的刘威诚，随骑兵连驻西安北院门的师部附近，担任杨虎城的护卫任务，他亲历了反围城斗争，受到了革命斗争的洗礼。

1926年5月，刘威诚曾奉命到三原，7月有幸参加了学生暑期补习会，刘威诚和副官杨永赉同第三师范、渭北中学、第三职工学校等近千名学生一同听了由共产党员蒲克敏（子政）讲的《资本论》，严信民（曾留学苏联）教他们唱国际歌及少年先锋队歌，魏野畴、张仲实等给他们讲唯物史观及社会科学等课程，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高涨，景况盛极一时。魏野畴告诉大家：“革命潮流不可阻挡，一个大好的革命形势将要到来。”刘威诚听了自己倾慕已久的魏野畴的报告，好像在黑暗中寻到了光明，好像自己这条生命的航船找到了指引航程的灯塔。时间只有短暂的一个月，但学习收获是“胜读十年书”，刘威诚的思想的确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奠定了他加入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1927年冬，国民军二、三军联合举行拥护于右任任联军总司令

的大会，会址在三原东关胡家花园。大会由史可轩主持，史指挥部队高唱《国民革命歌》，并招呼一部分客人约四五十人，到主席台前唱《国际歌》，炮兵营副营长张汉民拉刘威诚一同参加了“客人队”，刚刚学会不久的国际歌便有了用场，着实让刘威诚激动。尽着嗓门吼唱，抒发了自己对革命的热情。

西安解围以后，刘威诚在杨虎城引退之时，也一度离开部队数月。作为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参谋长马耀西的客人，参加了西安举行的“三一八”惨案一周年大会，倾听了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和惠友光的讲话。这使他眼界大开，寻求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学习的主动性不断提高。他常到第二军官学校、中山学院阅读《西安日报》社论及该报主编蒋听松的文章。期间，他四处打听，参加革命部队，苦不得其门，只好又回原部队任排长。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巩固反动统治，对共产党人实行了血腥的屠杀，1927年7月29日，史可轩率保卫队及中山学校学生从西安向临潼出发，30日刚到富平美原镇，便被国民党反动派爪牙田生春杀害。刘威诚心急如火，悲痛无比，暗暗下决心，自己绝对不能被眼下的一切吓倒，一定要振作起来，积极寻找能够发挥自己力量的机会。

(二)

1927年秋，刘威诚所在骑兵连随副军长李德升驻三原西潭巷，因此，他经常和驻防三郎庙的老熟人炮兵营营附张汉民见面，互相倾吐心声，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了解，他和张汉民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由张汉民介绍，刘威诚于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

的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夙愿。

当时党的上级领导是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张秉仁（性初），部队的直接负责人是张汉民。刘威诚入党后，继续努力学习党的原则，培养发展新的党员，经他介绍的党员有：张益三、李生林、张志仁、范岐山等。由于工作表现积极勇敢，又有组织能力，他被张汉民指派为党支部书记，该支部的党员有谷俊德、李作梁、刘宗汉、张奎耀、李金铎、贾仲余、张世泽、刘英三、刘俊甫等。

1928年春，刘威诚在张汉民处结识了12岁的儿童刘复红，刘复红经常到其连队给士兵演唱革命歌曲，刘复红的母亲武彩霞是一个地下党员。刘复红经常担任地下组织的交通，刘威诚发现刘复红机灵果断，很有前途，很得他的喜爱和赏识，1943年，刘威诚资助刘复红夫妇去了延安。

在三原共产党员孟芳洲、黄子文等领导下，以抗议交粮款杂税为口号，发动了1万多农民游行示威，以“交农”方式包围县城达四天之久，伪县长慑于群众威力，被迫答应减免粮款，这就是有名的三原武字区农民暴动。在此次交农斗争中，刘威诚利用自己部队担任城防的有利条件，为参加这次暴动的三原高职学生雷展如、马文献等多名学生传达党中央的八七会议精神，送去枪支弹药。

同年春，陕西军政长官宋哲元勒令留守司令、副军长李德升将与击毙三职校长尹聘三有牵连的张汉民解送西安。得此消息，刘威诚心急如焚，特托团长赵寿山及前任参谋长蒙浚僧疏通营救。因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张秉仁错误决定：由刘威诚和谷俊德、李作梁立即组织军事委员会，首先以武力收缴副军长李德升手枪队和第二师师长姬汇百自卫队的枪械，使张汉民脱险，然后将部队拉向淳化等地山区，与渭华暴动相呼应。对此，刘威诚与张再三研究，认为只能组织两个连的兵力，寡不敌众，且政治保证不足，暴

动很难进行,于是推翻原决定,避免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

后张汉民免于刑事追究暂回原籍山西稷山县。此时刘威诚升任骑兵营营附。

在张汉民回原籍期间,刘威诚日思夜想,茶饭不思,张是部队党组织的负责人,精神力量的支柱。经过刘威诚出面请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的斡旋和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得到杨虎城的慨允,答应张汉民回部队,刘迫不及待地函邀张快速归来,张汉民收到信后,回到部队,杨虎城即任张汉民为第九团一连连长,后任杨的随从副官,使张免了一场劫难,又得到了杨的信任,刘威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年冬,杨虎城部队移防山东,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发生变化,组织不健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威诚经过熟人联系,安排部分党的干部在其所部骑兵营任职或暂住,保护了革命同志。张汉民回到部队后,刘威诚与张又借机保护了一大批党员,魏志坚、宋仰山、汪季衡、乔启惠、孙作宾等先后在刘威诚营任排长或司务员,他还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吴柏畅、崔启敬、白景琦、李明轩、翟松生、孟浩、祁右珍、刘光智等。在杨虎城部队进剿胶东土匪时,刘威诚所率骑兵营均为先头部队,为胶东人民清除匪患立下了战功,但对于那些混饭吃的下层人员,刘威诚主张不得加害他们,一律放走回家,这样就既清除了匪患,又安置了难民。

1931年11月,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委孙蔚如为西安行营参谋长,率十七师两个旅和独立团、炮兵营直属部队入甘肃。十七师在平凉稍事休整,经大道以南通渭县直向定西,刘威诚营长英勇作战,奋勇强攻,夺取敌人碉堡,战斗取得胜利。定西战斗后,刘威诚在兰州二十里以东,东岗坡保护炮兵到甘草店以西,与其他友邻部队一同攻下兰州。在定西、兰州两次战役中立下战功,迫使吴佩

孚、雷中田离开甘肃。

1932年春，杨部奉命开回陕南汉中。5月间，刘威诚为了尽快和陕西地下党接上关系，闻讯城固二里坝地区属川汉往来交通要道，归陕南特委直接领导，他同五十一旅党员连长刘英三一起前往二里坝去寻找党的组织关系。

1935年5月，刘威诚调至警一旅三团任团长，杨虎城找他谈话，要他“一定要学习红军的战斗精神，否则，既不能完成当前任务，更不能在将来打我们更大的敌人（指日寇）”。不久，刘威诚奉命调往蓝田一带追击红军，他在党组织的安排指示下，名为追击，实则跟进，巧妙布兵避免红军伤亡。并派人找党组织与红军联系。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即八一宣言），在社会引起极大反响。在东北军、西北军上层军人中，秘密流传着宣传抗日小册子《活路》，杨虎城派秘书将这种刊物送给刘威诚，并要他做其他进步军官的工作，进行秘密的抗日准备。为了刘威诚的工作顺利和方便保密，杨虎城又指派共产党员周至仁到其团协助工作，周亦是蒲城县西人，与刘过从甚密，周到刘团后积极配合该团内的党员任耕三、王晓时、唐建章、傅廷栋、王警中、沙成轩、陈省珊、安子玉等进行秘密的抗日教育。

当昔日的战友、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汉民被红二十五军错杀的消息传来后刘威诚十分悲痛，张汉民那英俊的容貌，勇敢忠诚的品质，一幕幕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梦里，久久挥之不去。为此刘威诚痛苦过，困惑过，失落过，最终还是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决心跟党奋斗终身。

1936年春节，红七十四师陈先瑞部由涝峪出山，沿秦岭西进，总部派刘威诚团和骑兵两个连追击。刘佯装追击，实则跟进，避免接触，礼送陈师进入辛子口，继而转进陕北。在这个过程中，有一

个连长向刘报告，他发现了红军，在追击中负了伤，被刘狠狠地痛骂了一顿，结果没领到赏，反挨了骂，感到莫明其妙，这其中奥秘只有刘威诚自己清楚。这年春，刘团受命维护西(安)汉(中)公路，先后驻宝鸡、凤县、留坝等地。在驻防时，刘威诚收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来信，信中力陈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其实他并不知刘的地下党员身份，刘旋即复信：“我们同为抗日部队，何必自相煎迫，我将凤县、宝鸡腾出，让贵部接防。”刘使用一切办法，终取得较好效果，使过往红军安全通过。西安事变时期，刘奉命驻防宝鸡、凤翔、陇县一带，与蒋介石的嫡系四十九师、十三师相对峙，后期调回西安担任城防。

在西安事变中期，杨虎城深感到在十七路军中如不成立一个进步组织，将无法执行政治任务，因此成立了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杨虎城、孙蔚如分别为正副会长，共产党员南汉宸、崔仲远、江隆基为科长。这个组织，还以团或独立营为单位设分会，共产党员、特务二团团团长阎揆要和警备第一旅三团团团长刘威诚都是分会会长。这个组织实际上起到了地下党与杨虎城等上层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刘威诚借机积极工作，这个组织在抗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7年6月，刘威诚任警备一旅第三团团团长，旅长是王俊。8月，刘团驻防安康。当时的安康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官僚豪绅狼狈为奸，人民思想受蒙蔽，生活困苦，何言抗日。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派王力在安康建党，刘威诚吩咐该团地下党员石畅、安子玉、马常芬等，配合王力的工作，有很大成效，吸收了一批党员，还发展了民先队组织，大力进行抗日宣传，推动了安康地区几所中等学校包括安康师范、七中、安康中学的学生运动，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当时刘还利用军车的方便，从外地运进了一批《解放》、

《救亡》等期刊和生活书店发行的战时读物，交太华书店梁华堂代售并广为散发，群众争相传阅，轰动一时，地方的抗日形势为之一新。

在安康时，刘威诚和旅长王俊、副旅长二团团长王子伟商谈如何改造部队以适应抗日需要的问题。经王俊同意，曾先后选送了几批连排级军官去延安抗大学习，其中有崔一民、赵茂华、韩文钦、张瑞生、李东林、张尚文、魏一镠、侯夫贞、刘新、刘书堂、周新民、马常芬等，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为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

刘威诚团在安康地区的一系列活动，很快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安康地区专员魏席儒、国民党安康县党部负责人王禹九，向西安控告刘，十七路军总部从西安来电责备刘说：“据行营方面人员报称，你团教育多取资于第八路军，且派下级军官到陕北受训”等语。旅长也来电说：“行营对我部不满，尤以对你团为甚。”蒋鼎文也亲自来电，指责刘团“该团剿匪不力”。一时间，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有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人乱发牢骚，有的怨恨，而刘威诚却镇静自若。蒋鼎文深恐安康地区不安康，为了去掉这一块心病，迅即派员率部开抵安康监视刘团，威慑安康人民。

(三)

1938年2月，日寇以同蒲路沿线之兵力南犯，占领黄河天险风陵渡，与潼关隔岸对峙。刘威诚团于8月奉命开赴陕东沿河一线，担任黄河防务，与日寇隔河炮战，刘威诚冒着生命危险，常在阵地前沿观察日军阵地。为制约日军大炮轰炸该团阵地，刘威诚命令迫击炮排长将炮拉上黄河岸布防，趁日军不防，加大火力，瞄准敌人的大炮筒，两炮就炸掉了日军一门大炮筒，使日军再不敢轻易地

向其团阵地开炮。刘团与友邻部队共同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激励军民的爱国热情。当时，从延安抗大毕业的侯宛廉、牟介贞、爱国青年王绍骞、安步超、刘夫洪，共产党员王晓时、傅廷栋、李东林、张守身等十余人，深入连队向官兵进行抗日宣传教育，部队的觉悟和战斗情绪大为提高。

12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国共两党、两军间加剧摩擦。会后，置所谓的杂牌军于对日作战第一线，置其嫡系部队于第二线，胡宗南部留陕西包围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对杨虎城旧部三十八军的仇视和压迫也日甚一日。从1938年底派张泰祥为政治部主任开始，陆续派大批特工及中央军校学生到第三十八军以指导员名义分配到连队，进行反共活动，破坏部队的抗日和进步活动，妄图“化掉”这支抗日力量。他们强迫撤销了部队中的中坚宣传力量血花剧团、战地服务团，不准《战地》报出版，扣发《新华日报》、《解放周刊》，没收进步书籍，阻挠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和进步力量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战地服务团和血花剧团被撤销，就将部分同志送回边区，其余人员分配到连队继续工作。并公开组织战地视导团，由赵寿山军长担任团长，刘威诚团长担任副团长，到各部队检查部队训练，生活检讨会和小组学习会执行情况，视导团成员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军官组成。看到刘威诚这样的活动，蒋鼎文是恨之人骨，一定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1939年1月，蒋鼎文即电令免去刘威诚团长职务。

刘威诚被免职后，当时有人说：陕西军管区某要人讲了：刘威诚团长是西安事变的中坚分子，又和延安有关系，前程不妙呀！刘威诚暗地自忖，作为党的一分子，一切应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能在前方抗战，就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无奈之际，他一面先到三原，在中共党员黎之淦团的防地暂住，一

面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想法。不久，接中条山前线赵寿山军长电召，经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省委派汪锋同志到三原党员武云绮家中，向刘传达了不同意他去陕北的决定，要刘仍回三十八军，继续隐蔽，保持团长职位，维护这支革命力量。这样刘威诚服从组织决定，又回到了中条山。

刘威诚兴冲冲到中条山后，先后向赵寿山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复命，在见总司令时，总司令开口就问：“你是共产党员吗？”刘威诚机智地回答：“张汉民是共产党员，还叫共产党杀了，共产党还能杀共产党吗？”巧妙回答了孙蔚如。总司令颇为不满，这时赵也不能公开庇护他。刘威诚看到一时难以安排到位的情况下，稍事收拾便托病暂回陕西老家隐蔽，等待时机。

1940年6月，赵寿山向刘发出电报，限六天之内到达中条山前方。在孙蔚如的许诺下，刘威诚先到孔从周的独立四十六旅，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附员的名义去协助工作。这时，大革命时期《西安日报》的主编蒋听松在总部任高级参议，党员成子慎在总部参谋处任上校科长，刘与其经常联系，共同商议如何进行对孙蔚如等高级将领的工作。

1941年1月，刘威诚又被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列为三十八军内异党活动猖獗分子的黑名单，要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将他们一律送重庆受审。这牵扯到一批共产党员的安全，当时赵寿山军长复电蒋介石以身家性命担保，出具甘结，说刘威诚等不是共产党员，从而又使刘免受了一次劫难。

是年春，当刘威诚仍以总部上校附员名义，在孔从周的独立四十六旅工作时，赵寿山在和刘威诚的谈话中说：“我干脆交给你一个团，你好好训练，不管将来时局如何变化，只要你把一团人训练好，到时候就可以顶几个团使用。”后即派刘到一〇二团任团长。

是年底，蒋介石下令整编，把十七师由五个团缩编为三个团，取消了旅的建制，国民党军委会调刘威诚到重庆中训团党政班18期受训，同去的有申及智副师长和两个团长，1942年春，刘威诚受训一个月后回部队任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这个五十一团，先后有赵寿山、刘威诚、陈居莘、张进修、项志毅担任团长。

1942年日寇大举渡河进犯时，三十八军在百余里防线上孤军奋战，在日寇优势火力下伤亡惨重，黄河铁桥南岸为日军突破。日军继续推进，又占了广武、荥泽等地区。刘威诚不畏艰危，与左邻部队配合，在黄河南平汉线以西对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与敌肉搏。为了保存战斗力，刘威诚率团主动撤出广武。经两天侦察，刘威诚团在拂晓突然向日军进攻，于上午九时一举收复广武，后又激战一夜，将日军赶到黄河边。蒋介石不但不追查担任防务的嫡系孙桐萱部的责任，反而乘机以丢失河防的罪名，追查赵寿山军长的责任，并下令撤职查办刘威诚等人，以期借机追查刘威诚的中共党员身份。

在此期间，有一次，赵寿山军长应汤恩伯之邀赴宴，实际上是“鸿门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极端仇视和嫉恨三十八军，赵寿山为防不测，特意带刘威诚团长一同前往，刘威诚也深知赵军长对他的信任，同时也感到身上责任的重大，愉快地奉命陪同。开会前，各主官互相介绍自己和随员的军衔职务，当介绍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一位廖姓师长时，赵寿山一语双关诙谐地戏说：哟，廖师长的廖，就是寥寥无几的廖吧！使该师长和在座的各位非常尴尬，又无言以应答。

1943年冬，蒋介石令第四集团军抽调四个团（包括刘威诚团）回关中接新兵。赵寿山军长和刘威诚研究对策时指出：“××团长不能去，我怕到陕西会被胡宗南火并了。我相信你，就是胡宗南把

你打得只剩一二百人，你也不会屈服缴械的。”刘威诚心领神会，接令后，回陕选择交通要道，眉县以西蔡家坡作为后调地址，并派党员王晓时进行侦察联络，做好一切应变准备。

1944年初，蒋介石以调虎离山之计，调赵寿山到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陕西接兵的刘威诚在西安见赵寿山时，向老军长报告道：“奉你的命令开回关中后，我把接兵基地选在宝鸡蔡家坡。这里位置地形很好。当地没有中央军而只有高树勋的留守部队和军火仓库。北面与咱们的陕甘宁边区接近。耿（景惠）师长在凤彬师管区当司令，距我们也不远。如果胡宗南胆敢再制造一个槐芽沟事件（指暗杀许权中、任耕三），我们就坚决还击！如果他大规模进攻，我就把部队拉进山区。”老军长听后满意地对刘讲：“威诚呀，委员长又向我们的十七路军开刀啦。他们手中有刀，我们手中也有刀，决不能任人宰割，今后，你们任重道远。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坚决拥护孔从周干。从周虑事较细，你要拥护他干，必要时，你们可以把三十八军两师拉出来单独干，行动要坚决，为党保存一点革命力量。”老军长一番肺腑之言，刘威诚牢记在心。老军长走后，中共三十八军工委负责人交给刘威诚数十枝手枪，刘将枪带到岐山蔡家坡后，交给了党组织。

4月，刘威诚在西安与杨明轩研究对胡宗南的对策。刘说：“胡如西退，我可以截断三刀岭予以打击，联系耿景惠和宝凤、岐山一带地下党的武装力量，联合插红旗。”杨即表示同意，并愿侦察西安动向，及时提供，还对刘说，坚定行动时要及时告知我，我一定连夜赶到，协助工作。杨的革命精神和胆略，令刘威诚非常钦佩，后因时机不到，起义未果。

6月，刘威诚带接收的新兵到达豫西卢氏县，归还建制，驻军部附近的范里镇。按党组织和老军长的指示，刘威诚利用一切机

会,尽力与孔从周合作,并与友军搞好关系,以利互为依托,保证部队安全。此时,中央也加紧了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和为起义做准备。

(四)

中央派去三十八军组织起义的周仲英后来回忆说:“当我到达刘威诚团时,张西鼎已在那里等候我。他让我先到警卫排休息。天黑后,他领我到团部,那是一座很讲究的地主院落,刘威诚严肃地站在门口迎接。刘团长默默地领我和张西鼎从旁门绕进他的住处,等我们进了房门,他立刻变得热情,同夫人一起亲手给我们泡茶备饭,使我们非常感动。刘威诚体格健壮,很有军人气度,文化水平也比较高,一见面,他就提出许多问题要我解答,他的热情感染了我,我们立即开始长谈。”

1945年2月,三十八军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徐又彬对刘威诚指示:“党内决定,日寇如进攻,第四集团军可能西退商洛,十七师应采取侧击,伏击日寇,避免正面作战,以减少伤亡,保存实力,必要时撤往敌后,和八路军联合。已指定了各团的负责人,军事行动由你指挥。”刘威诚欣然接受了党中央的这一神圣使命,开始了一系列周密扎实细致和果敢的工作,随时准备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1945年7月初,刘威诚奉命到卢氏第四集团军总部欢送孙蔚如“荣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到总部后,孙蔚如召刘威诚谈话:“调你任十七师师附,把三个营分拨出去,应当执行。张耀明对你很好,你以后可以到重庆将校班学习,或者到六战区长官部找我。”刘威诚首先警觉地意识到:蒋介石、张耀明要消灭十七师,从肢解五十一团开刀了。为了不引起外面怀疑,刘威诚严守机密,只牢记

着党的指示,继续向孔从周多次进行工作,探听事态的发展,在和地下党负责人梁励生研究后不久,梁派雷展如代表党组织通知刘:“决定行动,由你负责指挥。”在7月15日十七师代师长李维民传达肢解刘团的命令的同时,刘威诚告诉该团党员营长刘侠僧:“行动之日,我预先来,以你的营部作为指挥所。”刘威诚所率领的十七师起义的军事行动,是利用肢解拨编五十一团归还新建制作为掩护进行的。部队行动佯为归还新建制,实际照兹去解决师司令部和起义前的集结。

7月17日下午,刘威诚按计划赶到指挥所,开始进行紧张的行动和战斗准备,彻夜不停,起义部队于18日凌晨在师部门前集结。

起义部队集结后,由刘威诚、张复振、梁励生、徐又彬组成指挥部,代师长李维民不愿意随部队起义,按照党的政策,给他留下卫兵、马匹和枪支,允其自由离开。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宣布了行军序列: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委刘威诚、副师长梁励生、参谋长李慕愚。十七师官兵喜气洋洋、精神抖擞地听了刘威诚政委等的讲话后,迎着鲜红的晨曦,浩浩荡荡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当时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有72名之多,后来担任党政军高级职务的有程建家、陈光舜、项志毅、陈嘉谋等人。

建国后,原十七师等部队整建制地转业到石油战线,全国石油系统的大多领导干部,都是由原十七师起义回归的指战员担任。他们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做出卓越贡献。

7月18日,十七师以战备行军姿态到达宿营地娘娘庙,新三十五师的中共党员、营长李慕愚前来参加起义,并带来孔从周亲笔信,略云:兄等此举,弟甚同意,兹派李慕愚前来联系等语。暮时,新三十五师前来参加起义的有中共党员尚经纬、姚杰、孙卜义、刘济民、刘正印和进步军官万良基等。

经过艰苦的行军,部队到达李村澗池时,受到贺崇升专员、韩均司令员、刘聚奎政委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经过的所有村庄,都有很多群众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晚上宿营时,村里很多妇女给战士缝洗衣服,所到之处,歌声、欢笑声与掌声响彻原野。慰问品品种数量之多,为十七师官兵所罕见,使刘威诚和广大官兵十分感动,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随后又举行了极为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此情此景,刘威诚深深感受到了回到党的怀抱的温暖,彻夜难眠,浮想联翩,想起自己过去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打出红旗,自己干革命……那种白皮萝卜心里红的“丹心素裹”日子,现在是里外都红的革命军队,真是天渊之别,怎能不感慨万分。

张复振、刘威诚等率起义部队到达豫西解放区后,立即发电报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部队胜利地回到党的怀抱的喜讯。7月25日,中央复电:“慰问十七师起义……转张复振、刘威诚诸同志率部奋斗参加人民战争,深表欢迎慰问之意。望团结一切于部战士,择适当地点进行休整教育,然后参加作战,已通知关中分区,设法照顾干部家属。”

9月初,十七师部队奉命北调进入太岳解放区,受到陈赓、王新亭和太岳几位军政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和招待。嗣即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陈锡联等的亲切慰勉。刘威诚通过与解放区部队并肩作战等接触,耳濡目染,自己扩大了眼界,受益匪浅,因此,他带领部队向老八路学习打仗,学习优良作风,学习民运工作和加紧改造的心情顿时高涨起来。这支新部队在党和人民的热情关怀下,大家的情绪十分愉快和振奋。学唱新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是大家最爱唱的歌,歌声处处可闻。刘威诚深深感到与解放区军民相比,这支部队

在各方面都落后了，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思想，改造部队，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学习和教育中，举行过多次官兵诉苦大会，抽调出许多干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

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沿平汉线进犯华北解放区，企图打通平汉路北段。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还击，高树勋将军率部1万余人，在邯郸以南的马头镇高举义旗，震惊国民党军队，影响波及全国。刘伯承到刘威诚部驻地马头车站与高树勋通话。通话后，刘威诚陪同刘伯承司令员会见了高树勋。与此同时，中共很关心杨虎城将军创建的尚留在蒋管区的旧部三个师的命运。邯郸战役后不久，刘伯承、邓小平召见了刘威诚，说：“中央指示，必须把原十七路军尚留在蒋管区的三个师拉回解放区。你负责动员孔从周统一指挥，西北局派沙夫、杨信分别动员上述各师党组织的力量，配合孔从周的统一领导。完成任务，给孔以总司令名义。”小平政委还交给刘威诚一份在三十八军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有团长崔治堂、殷义盛、王汝昭，营长徐凤岐、申定远、姜树德、白士斌、祁有珍等人。

1945年11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致刘少奇、习仲勋转张德生电：“……(2)我们已派十七师政委刘威诚、参谋长李慕愚两同志去濮阳，进行该军工作。”12月22日，刘少奇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电：“……该部有三个团长、五个营长系党员，据云如搞好时，全军大部可以起义，望刘即派十七师政委刘威诚、参谋长李慕愚前去濮阳等候与杨信接头，并请切实注意配合该部起义。”

刘威诚接受刘、邓首长交给的组织三十八军起义的任务后，决定借参谋长李慕愚并率步兵一个连及工作人员席尚儒、鱼化龙、刘

克成、韦永昌、马生发、王拯中等党员，还有中共陕西省工委派来的杨信、沙夫和王国等共百余人出发，先到濮阳，再上菏泽，了解三十八军三个师所驻地点。经再三侦察，知王汝昭的团驻兰封，孔从周的五十五师驻商丘、殷义盛团驻延泽，十七师崔治堂驻徐州。于是，派席尚儒、鱼化龙分别和孔、王、崔接头。沙夫回到濮阳向刘威诚汇报时说：蒋介石已通知其驻陇海线部队，“共匪”派出工作人员，携带巨款来作兵运工作，对象是五十五师，应严加防范。

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三十八军三个师的驻防位置西移，刘威诚赶到豫北温县、孟县一带，继续进行策动工作。1946年初，三十八军被整编为三十八师，孔从周调任三十八师副师长，被夺去兵权，5月15日，孔从周率五十五旅通电全国，宣告：为反内战，脱离蒋军。1946年9月13日，奉中共中央命令，十七路军起义部队在邯郸宣布成立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孔从周任军长，刘威诚任副军长，汪锋任政委。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刘伯承、邓小平等热忱电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将军暨全体官兵公鉴：值兹我解放区自卫反击战争大捷之时，欣闻贵军在邯郸军次成立，……闻讯莫不欢腾鼓舞，……望你们发扬西北军为人民服务之传统精神，与全国为独立和平民主奋斗之人士站在一起，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内战之罪恶行为。胜利是我们的。”

1946年9月17日，孔从周、刘威诚致电全国同胞：……本军为杨虎城将军亲手创之西北人民革命武装，受故总理中山先生之领导，初为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30年来，始终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革命而奋斗……公举从周为军长、威诚为副军长，均于9月13日在邯郸军次宣誓就职，本一向主张，愿与反对独裁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友党友军携手前进，誓为民族国家之生存及全国人民之企望而牺牲到底！

1946年9月25日,朱德电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成立:“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军长、刘副军长勋鉴:欣悉贵军已在邯郸成立,西北与全国人民深庆又得一生力军;人民力量日益团结与壮大,于此又得一新证,特电申贺……”

1947年3月7日,赵寿山将军进入解放区冶陶镇后,受到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薄一波等的热烈欢迎,在薄一波的安排下,赵寿山到冶陶镇附近的夏庄同在河南洛宁起义的三十八军十七师和在巩县起义的三十八军五十五师的孔从周、刘威诚以及广大官兵亲切会见。孔从周、刘威诚向老军长赵寿山汇报了部队起义的经过和回到革命大家庭后受到的热烈欢迎、亲切关怀和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后整顿学习进步情况,赵寿山听了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满意,他满怀激情地鼓励大家:“我们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同志们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啊!希望大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虚心向解放军老大哥学习,努力提高政治觉悟,提高军事技术,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解放全国人民勇敢战斗,多打胜仗,作出新的贡献。8月,陈谢大军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西进纵队由三十八军配属八纵二十二旅组成,刘威诚任西进纵队指挥,西路纵队胜利渡河后,派五十五师参加陕州战役,解放了陕州,十七师向西直至以东,转战洛宁,解放陕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五)

新中国成立后,刘威诚历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司令为张经武),西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西北公安司令部副参谋长,为我军建设和巩固革命政权而努力工作。1952年转业到地

方工作。在任西安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为捍卫革命队伍的纯洁性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任西安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为开创西安体育事业奠定了基础。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刘威诚感到非常难过,很不理解,面对陕西受彭德怀和习仲勋“反党集团”受牵连的同志,他更是愤愤不平,结果厄运降临,在“左”的路线影响下,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残酷斗争,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但在20多年的逆境中,刘威诚始终坚贞不渝,相信党、相信群众,痛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十分困难和凄惨的环境下,他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自己身上绝不失掉党员的尊严,人的尊严。刘威诚一生以党的利益为重,时刻不忘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以致养成了习惯,“党内”、“组织”成了刘威诚的口头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为很多蒙冤受屈的同志提供了证明材料,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1979年刘威诚的冤案终于平反,他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特别的要求,坚持回到他热爱的体育事业中,任西安市体委主任。1980年,刘威诚当选为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西安市人大常委会的组建和推进西安市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81年中央批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杨虎城和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的同志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三十八军地下党的光荣事迹重新成为党的历史的重要一页,刘威诚才从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解放。

1982年刘威诚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离休后,克服年迈多病的重重困难,以极大的革命同情心,为平反冤假错案,奋笔疾书,解决了许多遗留问题。他还担任了原十七

路军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的顾问,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撰写党史、军史资料,澄清历史是非,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革命遗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竟看不出一丝倦怠,眉宇间依稀可见军人的英武,挺阔的肩膀书写出军人特有的刚毅。他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光明磊落的优秀品质顶天立地;他爱憎分明,对那些势利小人、沐猴而冠者深恶痛绝;他疾恶如仇,勤俭节约,性情耿直。一位刘威诚的老部下说:“刘老人品端正,一生戎马生涯,不嗜烟酒茶,真是清白的到家了。”对党内的贪污腐化、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和整人的卑鄙行径嗤之以鼻;他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一生,受到世人的尊敬。

刘威诚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最佩服杨虎城将军和赵寿山将军,直至暮年,每当担起杨将军时还叹赏不绝,赞誉赵将军为“三秦之骄”。

1992年8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威诚在西安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89岁。在西安市三兆公墓为其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近500人前去为老人送行,中央一些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刘威诚精心培养的老五十一团发来唁电并派人专程来西安表示悼念,缅怀他们的老团长,他工作过的单位和省、市领导及群众纷纷悼念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党和人民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李正义)

刘愿庵

(1895—1930)

刘愿庵，原名孝友，字坚予，陕西咸阳人，幼年移居成都。辛亥革命后参加学生军。1922年任四川丰都县县长。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被推举为叙州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1926年冬被派往合川陈书农部开展兵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1928年改任临时省委组织局主任。同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委员会、教育训练委员会书记。1929年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党报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30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刘愿庵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他自1925年入党后，历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秘书长、代理书记、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发展四川党的组织，发动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义等，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30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重庆英勇就义。

(一)

刘愿庵，原名孝友，字坚予，1895年12月6日出生在陕西咸阳，其父刘次候是个军人，驻防西康，全家随其移居四川成都。刘次候知识渊博，阅历丰富，并擅长医术，为人正直廉洁，虽在军界任职，却很少积蓄，加之乐于助人，常周济亲友，因而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刘愿庵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对他后来走向革命道路有一定的影响。

1908年，13岁的刘愿庵随父去南昌，进入大同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刘愿庵弃学参加了学生军。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学生军被解散，刘愿庵又回到四川，在乐山电报局担任长途电话线路的勘测工作。他同工人在一起，并常与附近农村的贫苦农民接触，深感人间之不平，思想感情发生了急剧变化。

1919年，刘愿庵经人介绍，到驻万县的军阀卢锡卿部当参谋。他博学广闻，能写善辩，深得卢锡卿的赞赏，凡是难办的事情，卢都要他去办。当时，在卢锡卿管辖区内的一个深山老林里，有一股土匪，颇有势力，卢想去招安，苦于没有办法，于是派刘愿庵去做招抚工作。刘愿庵进山后，住在一所寺庙里，与和尚谈佛论经，甚为投机。待混熟后，他动员长老说：劝匪投诚是化恶为善，希望长老能大力帮助。并先奖励给了寺庙一笔现金。长老被说服后，去见土匪头子，以官位利禄相许诺，规劝土匪头目投诚，获得成功。刘愿庵怕土匪投诚有诈，先要他们去平定另一股土匪，以作归顺的“进见礼”。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惟命是从，奋勇登山，终将另一股土匪荡平。时值数九寒冬，土匪头目见刘愿庵穿着单薄的衣衫，即以狐皮袄子相送。刘愿庵婉言谢绝说：“我个性耐寒，不需此物，可

分给军中无衣者。”后来他对人讲：“盗贼赃物，岂能污吾身！”平匪任务完成后，卢锡卿更加器重刘愿庵，先调他任杨春芳部秘书，1922年又委任丰都县县长。

刘愿庵到丰都县上任时，身着布衣，脚穿草鞋，进县城后先住在旅馆里，调查社会，了解民情。当地豪绅为了向新县长献殷勤，纷纷送来厚礼，均被刘愿庵谢绝。上任后，他首先复查案件，清理冤狱，将一些无辜受害的劳动群众释放回家；对各种徭役赋税一一清查，将那些残酷盘剥劳动群众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将一些欺压人民群众的团总，贪赃枉法的官吏，分别给以撤职、警告和罚款等处分。他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深得群众拥护，人民称他为“刘清官”^①。

刘愿庵的行动，引起了当地劣绅和驻军团长的憎恨，纷纷跑到杨春芳那里去告状。杨春芳对刘愿庵的做法也早已不满，便下令革除了刘愿庵的县长职务。刘愿庵愤然离开丰都，去成都刘泗英办的西南公学当国语教员，从事教育事业，开展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活动。丰都人民对新县长遭到排斥打击，愤愤不平。为了表彰刘愿庵的功德，群众自动给他立了“德政碑”。

(二)

1923年初，恽代英由泸州经重庆到成都从事革命活动。他约集成都的先进知识分子刘愿庵、邹进贤、刘春晖、刘竹贤等，组织学行励进会，以切磋学习，砥砺品行，不吸烟，不嫖赌，勤俭节约等规

^① 见朱挹清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

范相约束；并发行《励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①。后又建立起蓉社，发展社员二十多人。这期间，刘愿庵与恽代英接触频繁，相知渐深，遂结为好友，立志“以谋求中国人民及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解放为终身事业”。经恽代英介绍，刘愿庵去川南师范教书。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逐步高涨的革命运动从广州波及全国时，刘愿庵到宜宾，任刘光辉第九师司令部咨议官、兼《叙州日报》总编辑^②。此前，刘春晖回到宜宾，已先后邀集同盟会员陈宣三、尹绍州和郑量澄、黄雨岩、潘学海、张立如等人，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刘愿庵来后，由于他活动能力强，又在师部和报社工作，接触面广，联系群众多，很快就介绍了叙州联中等校师生多人参加读书会。他们在宜宾东街天顺祥旧址内阅读进步书刊，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不仅提高了所有参加者的思想觉悟，而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③。

接着，刘愿庵同郑佑之、许培高、熊吉安、张立如等，在将军街曾家祠设立通俗讲演所，吸收当地教育局长韩敬元参加。每天傍晚，他们分别到街头讲演，向老百姓讲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行径，揭露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群众很喜欢听刘愿庵等人的讲演，听众日益增多，常常挤满街头。可是，群众的爱国热情被当地军阀视为洪水猛兽，派军队进行干预和镇压，讲演活动进行了几个月就被迫停止。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宜宾等地。在宜宾，成立了叙州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推选同盟会会员尹绍州、郑量澄和刘愿庵负责领导。刘愿庵等贴标语，散传单，进行街头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屠杀蹂躏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组织群众示威游

^① ^② ^③张立如：《关于宜宾青年读书会成立的经过》（讲话记录，1964年）。

行,坚决抵制英、日仇货,实行经济绝交。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宜宾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长江上游的侵略势力。

五卅惨案发生不久,党派尹伯明和郑则龙回宜宾发展党团组织。行前,恽代英对尹、郑说,刘愿庵“忠诚朴实,善读书,笔下很快,一直倾向党。当县长时所挣的一点钱,都为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学术团体和创办刊物花掉了。虽现在还未成为我们的同志,可却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要他们“回宜宾后一定要把刘愿庵吸收到党组织里面来”。^① 1925年夏,经尹伯明、郑则龙等介绍,刘愿庵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1925年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四川的部分共产党员在重庆中法大学内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由杨闇公任书记,统一领导全川的党团工作和群众运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把四川党组织的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刘愿庵任地委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他在成都期间,以办报为社会职业,后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1926年初,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化,四川国民党右派依附四川军阀猖狂地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进攻。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又以四川为大本营,纠合党徒与共产党公开对立。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国家主义派公

^① 郑则龙:《宜宾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载《宜宾地区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期。

然跳出来为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辩护，明火执仗地诬蔑中国共产党，刘愿庵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次，成都的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公开的群众性讲演会，刘愿庵和李璜等人都被邀请参加。李璜自命为思想界的权威，在台上大演反共卖国丑剧。听众谴责他不像中国人在讲中国问题，完全是一副奴才相。刘愿庵走上讲台，虽然衣着朴素，看起来“土里土气”，但他谈笑自若的态度、坚定正确的立场、犀利而流畅的言词，对李璜卖国反共的谬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听众纷纷为他叫好，拍手称快。李璜招架不住，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这时，由徐佑根主办、张秀熟任义务主笔的《西陲日报》，亦发表了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社论，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在“三一八”惨案后充当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帮凶的罪行。刘愿庵很重视《西陲日报》，积极协助报社工作，撰写文章、代审稿件，抨击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出卖民族利益，破坏国共合作和反对北伐战争的丑恶行径。

1926年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刘愿庵以成都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会议开幕的第二天，刘愿庵在省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宴会上，代表全省出席会议的代表致答词，指出：“四川政治局面的推行，是由于中国全部政治之推进而演进的，我们不能以现在政治形势稍好便高兴得不得了。并且在军事方面，虽然迭告胜利，而对于宣传组织工作，却丝毫未有进展。现在四川将领所以只知有蒋介石，而不知有国民党，只晓得派遣代表与蒋介石接洽，而不晓得与莲花池省党部发生关系，一般群众所以只听着蒋介石打胜仗，而未听着国民政府之职能……”

这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①

刘愿庵提出国民党(左派)各级组织应加强宣传组织工作,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而不能让蒋介石树立个人的威信和特权的问题,是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愿庵的政治眼光是十分敏锐的。

刘愿庵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两点建议,他说:“过去各县同志往往在工作进行中发生了许多错误,不是注意上层忽略了下层,就是注意下层而忽略了上层,结果这两种都成了党务进行上的障碍,代表大会应当对此有特别之注意而加以决定,……一党之下,集合多人,所以各人的言语举动未必都皆一致,其所以能够统一,就是靠一个纪律。本党是一个民主集中制者,就是未决议以前,任随个人发表意见,只要决议以后,无论任何人都应当绝对服从,没有丝毫迟疑的余地。”

大会期间,刘愿庵担任文牍股主任,起草大会宣言、决议和其他文件。在他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在中国必须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民族才能复兴,国家才能强盛,民众才能翻身。号召各阶层民众团结一致,奋斗益力,遵照先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嘱,力争国民革命早日胜利。会上,刘愿庵还同一些代表提出“组织平民教育机关和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案”,建议省执行委员会成立四川平民教育协会;请省党部宣传部编定平民读物;吸收成年的工农群众、店员和学徒等参加学习。大会通过了刘愿庵等人的提案,后因政局恶化,“平民教育案”未能实现。

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重庆地委为加强民

^① 《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1926年11月27日。

众工作,积极开展兵运、农运和工运,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派刘愿庵到陈书农部作兵运工作,以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顺泸起义。陈书农是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下面的一个师长,思想比较开明,赞同国民革命。刘愿庵到陈部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常给官兵上政治课,讲述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和一些政治常识。他讲的课有理论,有实际,生动具体,很受官兵欢迎。刘愿庵在部队中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没有旧军人的坏习气,官兵中不少人都愿意接近他。不久,党又调刘愿庵回成都,负责川西的工作。

大革命时期,刘愿庵十分重视各种力量的组织与联合。他曾根据党的指示,对军阀部队的上层军官作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国民革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邓锡侯、刘文辉部下的高级将领陈离、夏仲实、吴景伯等,后来不同程度地倾向革命和同情中国共产党。对后期的赤心评论社,刘愿庵也采取了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赤心评论社的前期,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后来在傅双无等政治投机分子的操纵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使成都地区出现了两个工会的局面,阻碍了成都工人阶级组织的统一。然而,赤心评论社仍同共产党有一致的一面。他们同样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赞成国民革命。当时一些党员十分憎恨该社的错误行动,甚至抱着敌视的态度。由于刘愿庵坚持了正确的方针,终于使成都两个工会达到了行动的统一,共同组织了左派国民党成都市党部,从而推进了国民革命运动^①。刘愿庵对科技、文艺和教育等界朋友也作了很多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进而参加革命。20世纪20年

^① 任白戈:《蜀中英华 功垂史册》,载1981年6月21日《重庆日报》。

代,在重庆、成都、泸州和宜宾等地受到刘愿庵的教育和影响,从而参加革命队伍或倾向革命的知识界人士为数不少。如著名作家李劫人在1951年7月1日撰写的《纪念先烈赵世炎》一文中说:“我听见这个消息(即赵世炎牺牲)后,一如听见刘愿庵在重庆就义的消息一样;好多天不舒服,因而更引起我对共产党的同情,更增强了我对蒋贼中正和他那一伙的仇恨。我很感谢两位先烈!我敢于说,自我从法国回国以后,我确实受了他两位的无形影响,使我愈明确坚定我这二十几年来的行动方向!”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之前,密谋策划四川军阀反共反人民。驻重庆军阀刘湘首先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月31日,中共重庆地委通过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出面,组织各进步团体,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暴行,声援南京人民。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开枪镇压到会群众,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血案。这次血案遭惨杀的有数百名革命群众,四川省委的负责干部和革命志士杨闇公、冉钧、漆树棻、陈达三等或当场遇难,或会后遭逮捕而英勇就义。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刘愿庵领导的中共成都特支,与上级失去联系。但他们毫不畏惧,仍然带领党员和群众坚持斗争。4月4日,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成都地区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和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等15个进步团体联合组成重庆“三三一”惨案省会援会,选出刘愿庵、孙壶东、李献亭、唐伯焜、袁亚群等为省会成都援助重庆惨案各界代表,同时作出如下决定:(一)电请中央(国民政府)派特派专员来川会同办理此案;(二)警告刘湘及渝中各将领,并责成将王、蓝、曹、申等监禁查办;(三)质问向育仁并要求他表明态度;(四)推举代表与邓、刘两军长交涉,请负省会治

安全责^①。

4月8日早上9点钟,成都各民众团体代表在商业场集中,然后由刘愿庵率领赴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刘文辉、邓锡侯到场后,刘愿庵首先发言,痛斥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背叛国民革命,在重庆制造“三三一”大血案,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罪行,要求刘、邓两军长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讨伐刘湘,并切实维持省会治安,以杜绝类似重庆事件发生。刘文辉坐不住了。他毫无表情地说:“各位请惩办王(陵基)、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四人究竟有何证据,能说明彼等系此案祸首?”邓锡侯也帮腔说:“近日省会忽发现有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民自卫军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的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害社会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负责。”邓以此托词,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说:“明白点讲,在青天白日下之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刘愿庵据理驳斥邓、刘二人的谬论,指出:向育仁系蒋介石派回四川来进行“清党”的要员,他在重庆与刘湘密谋,制造“三三一”惨案,回到成都后,又企图镇压群众。他干了不少反对国共合作和破坏国民革命的事,要求两位军长将向育仁驱逐出境。邓锡侯听后,淡淡地说:啥子驱逐啊,警告一下就是了。而刘文辉则不然,怒冲冲地讲道:“全川清乡团务总办向育仁,系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及本军代表,又得蒋总司令委派四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所给予行使。”进而刘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威胁说:“现在汉口、南昌闹意见,我们管不着,打开窗子说亮话,在我们防区内讲纯三民主义可以,掺沙的可不行。”说

^① 夏以容:《大革命末期成都地区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纪略》,载《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总第10期。

后拂袖而去。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恐吓威胁，刘愿庵等无所畏惧，但认为：要想通过他们解决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发动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才有胜利的希望。

成都各界群众开展声援重庆人民的活动和派出代表到第二十八军军部请愿，引起了军阀们的惶恐和憎恨。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在附署刘湘的“反共拥蒋”通电之后，于4月9日急忙加委向育仁为省会城防司令，以加强对成都地区的军事控制。

几天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霎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月24日，向育仁以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处长、省会城防司令和四川团练副委员长四重身分，在成都导演了“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的反共丑剧。他们唆使党徒，网罗一批工贼、流氓和社会渣滓，在街上贴标语、喊口号，狂呼乱叫，反对国民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并将成都市工会捣毁，叫嚣要将刘愿庵、钟善辅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捉拿归案惩办。至此，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迫转入地下。

大革命失败后，四川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脱党离川，有的叛党充当敌人的走卒。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毫不动摇。他将“三三一”惨案后从重庆等地来成都的任煜（白戈）、朱挹清等组织起来，转入地下，开展对敌斗争。在成都附近县份，刘愿庵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选派从广州、武汉农民讲习所毕业归来的同志，去加强对农会的领导。在成都市内，刘愿庵领导钟善辅、刘亚雄（后叛变）、李宗材、朱挹清等积极开展工人运动，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劳动时间等口号，以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斗争。刘愿庵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工人的疾苦。针对当时人力车工人工资极低、房租很高的情况，刘愿庵提出开展一场为减低房租而斗争的运动。在刘愿庵等的努力

下,成都一度消沉的工会工作又活跃起来。工人俱乐部、工人读书会和夜校又恢复活动。人力车工人减低车租的罢工斗争和长机工人、生纱工人要求就业的示威游行相继爆发。

这期间刘愿庵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资产阶级、军政界和文教界的中上层人士,除极端反动者外,都要尽量争取。对于军阀、团阀^①等势力,要利用矛盾,作个别的争取工作。刘愿庵的姐夫周竹虚是刘湘部的一个团长,常常通过姐姐和亲属来进行“规劝”,要他向刘湘作某些妥协。有一天,周竹虚亲自来信写道:如果不反对刘湘,既可公开工作,无碍革命,又能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帮助。刘愿庵见信很生气,但他仍耐心地给姐夫晓以革命的道理,并对其错误的言论给予严肃的批评。有的同志劝刘愿庵割断与姐夫的关系,他笑着说:“用不着,他又不妨碍我革命,通过这点私人关系,有时还可透露点消息,如果关系搞坏了,党的机关能住在家里吗?”^②

(四)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派傅烈、周贡植等到重庆,建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恢复、整顿和发展四川党的组织。1928年2月10日,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中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代表有来自成都、宜宾、涪陵、江津、重庆等地的二十余人。会议根据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着重讨论了四川全省春荒暴动问题,制定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决定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正式选举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傅烈

^① 四川人民把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组织的的地方武装头子叫团阀。

^② 当时中共成都特支机关就设在黄瓦街刘愿庵家中。

任书记，周贡植任组织，刘愿庵任宣传，牛大鸣任秘书长；还选举了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正式代表刘愿庵，候补代表刘远翔、刘披云。会后，代表们赴各地开展工作，重点是把各地党员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成立县委；发动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斗争；开展兵运，准备武装起义。

省委为了能集中全力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决定成立巴县县委。3月9日，中共巴县县委成立会议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傅烈、周贡植、牛大鸣等到会指导，不幸，会议被敌人发觉，除牛大鸣巧妙脱险外，其余10人全都被捕。刘愿庵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通知各地党组织加强秘密工作，保存好党的文件，调整干部，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紧急会议推选刘愿庵为代理省委书记。他临危就任，肩负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的重担。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虽经多方努力，终归无效。4月3日，傅烈、周贡植等九人，被军阀刘湘杀害于朝天门。此前，四川军阀亦在成都制造了“二一六”下莲池惨案，屠杀党、团员和革命青年袁诗尧（川西特委宣传部长）、钱祥芳等14人。就在这时，刘愿庵又获知其七弟刘孝佑在河南被军阀杀害的噩耗。他悲愤交集，决心加倍工作，向蒋介石和封建军阀讨还血债。

1928年5月，省委派刘愿庵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要求派负责干部到四川加强领导。刘愿庵在上海汇报工作后，即北上哈尔滨，经满洲里抵达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党中央根据刘愿庵的报告和四川省委的要求，于1928年5月，派穆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四川指导工作。不久，又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军委书记，负责军事和保卫工作。同年10月初，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在重庆不幸被捕，党、团省

委机关遭到破坏。

刘愿庵在党的六大闭幕之后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他千方百计联系当时在上海读书或工作的四川同志，鼓励他们战胜暂时的黑暗，渡过难关。当刘愿庵了解到任白戈在招商局公学教书时，就托人将他找到旅馆中见面。刘愿庵关切地问：“你的组织关系接上了没有？”任说：接上了。刘愿庵感到很高兴。接着，刘愿庵向任白戈扼要介绍了六大决议精神，说明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①。刘愿庵又约孙壶东在肖华清、陈觉仁家相见。旧友在患难中重逢，格外亲热。他仔细了解几位同志在上海的生活、工作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然后给大家讲述在莫斯科等地的见闻和党的六大的基本精神。他说：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回四川后要积极发展组织，大力开展工农武装斗争。他还对孙壶东说：“我们希望同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共同反蒋。我们现在同国民党右派是公开地干，而你们可以在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可算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

刘愿庵在上海没停多久，就匆匆返回重庆，并于10月25日在重庆成立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在川南视察的穆青尚不知道刘愿庵已经回川。他在得知省委受到破坏后，急奔成都，再赴潼南双江镇，约集川西特委等几个地区的负责干部开会，成立了临时省委，穆青任书记，省委机关设在成都。刘愿庵和穆青分别得知情况后，于12月18日在成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穆青、刘愿庵、程子健、陈俊山、刘远翔五人组成统一的临时省委，穆

^① 任白戈：《蜀中英华 功垂史册》，载1981年6月21日《重庆日报》。

青任书记兼省军委书记，刘愿庵任宣传鼓动部主任兼党报编辑，程子健任组织部主任。

1929年，中共四川临时省委认真贯彻六大决议，无论在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或是工农群众运动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2月12日，临时省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刘愿庵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会议结合四川的实际指出：国内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四川革命高潮有到来之可能，应该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并总结了四川革命的经验，提出纠正盲目暴动的盲动主义倾向。会议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穆青任组织部长，刘披云任宣传部长，李鸣珂任军委书记，牛大鸣任临委书记兼秘书长。

为了恢复健全各地党的组织，经省委决定，派出巡视员分赴川东、川南、川北各地，宣传六大精神，贯彻六大决议，教育审查原有党员，恢复组织，吸收新党员。巡视员出发前，刘愿庵给他们布置工作，交待工作方法，要求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

经过刘愿庵等的艰苦工作，四川各级党组织恢复发展很快。是年冬，全省党员发展到近3000人，其中工人党员约占20%，农民党员约占40%，知识分子约占30%。广大党员在各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

刘愿庵等在动员工人怠工、罢工和争取生存的合法权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9年3月26日，临时省委发出通告指出：夺取城市最重要的是城市工作，尤其是工人群众较多的城市。目前工作的重心应该是重庆、成都、万县等以及几个重要的工人区域，如自贡、五通桥。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和以最大的努力去建立这几个区域的工作。6月7日至11日，省委在成都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特委，建立成都、重庆、自贡、万县等四个特区和宜宾、嘉

定、泸州、三台、顺庆、遂宁、涪陵、绥定等八个中心县委，以建立起这些地区革命工作的坚实的基础^①。

刘愿庵亲自抓工人运动，他挑选培养工运干部，派往各工人群众较多的城市去开展工作。1929年2月省委扩大会议后，他派团省委负责人郝谦到自贡帮助中共自贡特支领导广大工人开展罢工斗争。郝谦到自贡后，同特支书记程攸生一道，领导了4月自贡工人为反对解雇的罢工和8月自贡盐业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取得了被解雇工人回原厂工作、增加工资、工资以米价为标准，以及改善劳动条件等成果。

6月10日，驻成都军阀借口保护路面，不准独轮车^②行走公路，并派军队砸毁了几百辆独轮车，致使大量工人失业。刘愿庵领导川西独轮车总工会，发动独轮车工人到成都进行游行示威，砸烂二十四军的两部汽车，挖毁成都到新津的公路，使汽车无法通行。23日，川西独轮车工人举行罢工，激起各界群众对二十四军的强烈不满，驻军被迫撤销禁令^③。

在组织领导农村武装起义和兵变方面，刘愿庵和李鸣珂、穆青等分赴四川各地区，进行思想动员，配备干部，建立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等。川东北的宣汉、万源、达县一带，经王维舟、李家俊等几年辛勤工作，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省委决定首先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并于1929年3月成立了由李家俊任组长的起义领导小组。4月下旬，万源固军坝起义成功，在川东地区树立起一面武

①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印：《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大事年表》（1983年9月）。

② 独轮车又叫鸡公车，是当时成都至川西各地的主要运输工具。

③ 四川省总工会工运史资料组编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工人运动大事记》（1981年6月）。

装的旗帜。1929年6月,共产党员邝继勋、罗世文等发动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遂(宁)蓬(溪)边界起义。起义前,刘愿庵是同意的,他认为四川城市的工运、学运和妇运工作还很薄弱,有的地方刚刚开始,农运更差一些,只有李家俊领导的川东北游击武装和下川东梁(山)开(县)万(县)等地的情况比较好,总的白色恐怖严重,缺乏群众基础,起义时机不成熟。后来,由于部队处境危急,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又要求迫切,刘愿庵等才同意了,并派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罗世文、邹进贤等去该部参加指挥,加强领导。6月29日邝继勋率全旅起义,成立中国共产党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此举震惊了四川的大小军阀,鼓舞了全川的受苦群众。

以刘愿庵为首的四川省委,不但重视武装起义,掌握枪杆子,而且也十分注意宣传工作。1929年春,刘愿庵、李鸣珂等通过驻军师长、共产党员张清平出面筹集经费,创办《新社会日报》,由罗承烈任社长,川东特委书记项鼎任主编,刘愿庵、李鸣珂经常为其撰稿。该报猛烈地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的种种罪行和劣迹,并联合各报向国家主义派展开斗争,深受群众欢迎,发行量为全市各报之冠。5月1日,四川省政府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查封《新社会日报》,党领导该报坚持斗争,并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团体的积极支持。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央训练部长何应钦再次电令查封,该报终于被迫停刊。为此事,重庆报界协会和各进步团体发起请愿,声援《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民众力争言论自由大同盟。

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刘愿庵等在工作中也曾有过失误。1929年秋,他们根据当时中央指示精神,由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组织“飞行集会”领导小组,发动赤色群众在重庆会仙桥、都邮街等繁华闹市举行“飞行集会”,发表演讲,呼口号,散传单等,使革命力量过早暴露。

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布置今后工作,1929年11月,刘愿庵在重庆主持了省委第二次全委会议。这次会议认为,四川总的政治任务仍是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根据8月中央《关于四川组织问题给四川省委的信》的精神,作出了《省委二次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发展产业支部,增加干部中的工人成分,彻底改造党的基础,建立和加强中心区域的工作;加强党内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加强党员职业化、军事化,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作好准备等。

正当四川党的工作向前胜利发展的时候,四川军阀刘湘首先采取了罪恶的“自首”政策,利用党内叛徒充当爪牙,从内部来破坏四川党组织。驻重庆第二十一军军部下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各县、市也建立了清共组织,收买一些叛徒组织侦缉队,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成立“反省院”,开展所谓“心理战”。党内一些动摇分子如江(北)巴(县)士兵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易觉先、团省委负责人宋毓萍,以及游曼谷、游洪钧等先后叛党,充当刘湘侦缉队的凶恶鹰犬。

由于叛徒的出卖,1930年春夏之间,驻在重庆的省委几次遭受重大的损失。3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回水沟街被叛徒出卖而遭逮捕,5月壮烈牺牲。4月中旬,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外出办事,在朝天门碰上叛徒易觉先和一伙特务。狭路相逢,李鸣珂临危不惧,开枪打死易觉先,并打伤敌特三人,终因寡不敌众,被敌逮捕,英勇就义。5月5日,刘愿庵与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四人,在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叛徒陈茂华写了一张纸条,叫一个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警察,警察知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报告第六区警察所长郭晴岚。郭立即派巡

官王建之等率领便衣特务多人前往搜捕。突如其来的搜查,使大家措手不及,但都立即镇定下来。邹进贤将记录揉成一团,并高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警察吼道:“搜查。”此时,刘愿庵、程攸生等见上楼的特务警察越来越多,便主动出击,争取脱险。刘愿庵因身患肺病,体质较弱,与警察搏斗时被打倒在地,脸被打肿,眼睛亦被击伤,不幸被捕。程攸生与一便衣特务摔打滚下楼梯,也被捕。邹进贤在搏斗的混乱中跑出,因眼睛近视,不慎被门栏杆绊倒在地而被捕,只有一人跳窗脱险。

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的才华和他在四川共产党组织中的地位,妄图采取“蜜糖”的策略收买这位坚贞的共产党人。刘湘先后派刘愿庵早年的朋友、巴县县长冯均逸,刘愿庵的亲戚、某师参谋长等劝降,以院长、厅长等高位和每月200元大洋的薪俸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什么升官发财,早已视为粪土。敌人的劝降骗局遭到破产后,5月6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据理驳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刘愿庵的姓名、职业和住址的时候,他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答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军法官愣了一下,连忙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达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

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军法官仍耐着性子说：“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法官说完，刘愿庵轻蔑地笑了一笑，说道：“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军法官见引诱不成，遂以死相威胁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

敌人的威吓，激起了刘愿庵极大的愤怒。他高声斥责道：“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们面前说清楚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误入歧途的不是我刘愿庵，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

军法官们见刘愿庵正义凛然，威武不屈，毫无办法，只得草草收场，宣布闭庭。

(五)

敌人的劝降失败了，法庭上的斗争刘愿庵胜利了。这时，刘愿庵预感到敌人将采取最后的手段，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提笔给爱人写了如下的遗书：

我最亲爱的：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我个人的责任算是尽到了。所不释然的是此次我的轻易，我的没有注意一切技术，使我们的党受了很大损失。这不仅是一种错误，简直是一种对革命的罪过。我虽然死了，但还是应当受党处罚的。不过我的身体太坏，在这样烦剧的受迫害的环境中，我的身体和精神，表现非常疲惫，所以许多地方是忽略了。但我不敢求一切同志原谅，只有你——我的最亲爱的人，你曾经看见我一切勉强挣扎的困苦情形，只有希望你给我以原谅，原谅我不能如你的期望，很努力地、很致密地保护我们的阶级先锋队，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

对于你，我尤其觉得太对不住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以你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再四的问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地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践言，把死别的痛苦丢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应该懈怠、消极。你的弱点也不少，所对一切因循、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极大的补救，你必须像《士敏土》里的黛莎一样，有铁一样的心。

对于你的今后，必须要努力作一个改革的职业家，一切教书谋生活等个人主义的倾向，当力求铲除，这才是真正地爱我。……假如我死后有知，我俩心灵惟一的联系，是建筑在你

能继续我们的工作与事业，而不是联系在你为我忧伤和忠贞不贰上面，这是我理性的自觉，决不是饰词，或者故意如此说，以坚定你的信念，望你绝不要错认了！

对于我们的工作，如果能给我以机会，我或者可以写出许多话来，但现在是不可能。不过这一切问题，历来的决议说得很多了……。然而我们的许多同志总是借口许多理由，说在实行上，事实上有某种困难，把他修改或者取消了，这充分表现出畏难苟安的小布尔乔亚的恶习。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困难，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是需用一切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决不是对于困难屈服（修改原则或取消主义）。这是我理应能够而又必须最后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

对于我的家庭，难说，难说，尤其是贫困衰老的父亲，……整个社会无量数的老人在困苦颠连中，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不过（是）无量数之一分子而已。我的努力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然而毕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是太不孝了。社会是这样，又复何说。此后你若有力，望你于可能时给父亲以安慰和孝养，尤其是小弟妹，当设法教之成人，这是我个人用以累你的一件事。不过对于我死的消息，目前对家庭，可暂秘密不宣，你写信去说我已到上海或出国去了，你随时编造些消息去欺骗父亲好了。不过，可怜的父亲，是有两个儿子的生或死，永远不能知道了。五弟不自振作，可以说，五弟媳当使工作，不需她始终有个依赖丈夫想做所谓太太的观念，你应在可能时，在教育方面帮助她。

端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孩子，也是我们兄弟存留的一个独孩子，你在不妨碍工作范围内，可以抚养她，五弟媳是不会教育孩子的。只是我未免太累你了，然而这也是无法可想的，

你能原谅我。

望你不要时刻想起我，……更不要无谓的思量留念，这样足以妨害工作，伤害身体，只希望你时时刻刻记起工作，工作，工作！

我被捕是在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生(日)晨九点钟。我曾经用我的力量想销毁文件，与警察搏斗，可恨我是太书生气了，没有力量如我的期望，反被他们殴伤了眼睛，并按在地上毒打了一顿，以致未能将主要的文件销毁，不免稍有牵连，这是我这两日心中最难过的地方。只希望同志们领取这一经验，努力军事化，武装每个人的身体。

你的身体太弱，这是我不放心的。身体弱会影响到意志不坚决与缺乏勇气，望你特别锻炼你的身体。主要方法是习劳，吃药是不相干的，望切记。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地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的一线曙光，我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自愿和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的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书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这封遗书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烈士对祖国的未来和共产主义前景充满了希望,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

敌人在施展种种诡计均未得逞后,决定杀害刘愿庵。1930年5月7日,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刘愿庵与邹进贤、程攸生一道,高呼口号,走向刑场。此时,监狱内外,群情愤慨。刘愿庵等在刑场上呼喊革命口号,难友们在牢中呼应,极其悲壮激昂。刽子手行刑后,群众一拥而上,瞻仰刘愿庵等烈士的遗容。当他们看到刘愿庵因用力高呼口号而喷在墙上的斑斑热血,十分感动,有的不禁落泪,赞扬烈士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王 斌)

肖 明

(1896—1959)

肖明,原名肖鸣,湖南省新田县,1922年入党。1919年至1921年,他与蔡和森、李立三、肖子暉(肖三)等出国,在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肖明回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读书,并积极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924年秋,中共北方区委选送肖明等到苏联留学。1926年秋,党派遣肖明与刘伯坚等经蒙古回国,任冯玉祥部国民军(即国民革命军北

路军)工作,任北路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部长和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委书记,随军南下。1927年夏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1937年底,肖明到达延安。1949年1月,肖明随军进入北平,担任了北平市委委员,市工委书记等职。1956年,肖明因多年劳瘁成疾,于1959年逝世。

肖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白区一些地方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是渭华起义和我党推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起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并长期从事对冯玉祥将军及其部属的统一战线工作。第一次解放张家口时期,担任张家口市总工会主任;北京解放后担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1959年病逝。

肖明,原名肖鸣,曾用名彭明、肖筱文、晓明、肖振声。1896年12月生,湖南省新田县上户北村人。

1916年至1919年,肖明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参加湘南

学生联合会,担任常委。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潮的激荡下,他积极参加了湖南驱张(张敬尧,北洋军阀,时任湖南省省长)运动,被开除学籍。

1919年至1921年,他与蔡和森、李立三、肖子璋(肖三)等出国,在法勤工俭学。1921年秋,参加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当选为代表团代表,被中国反动政府勾结法国帝国主义者拘禁,后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起被押送回国。

1921年冬,肖明回到北京,进入中法大学读书,并积极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922年,他在陈为人领导下,参加《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还同何孟雄等指导京绥铁路和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来往于张垣至西直门之间。同年,肖明由邓中夏、陈为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法大学,他担任陆漠克学院中共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并参加北京学联宣传部的工作。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他参与指导长辛店工人的罢工运动和京绥铁路工人声援“二七”运动的斗争。随后,同肖三一起,指导了张家口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1924年秋,中共北方区委送肖明等到苏联学习。他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转入中山大学学习了二年,在中山大学任党的小组长和共青团指导员。

1926年秋,党派肖明与刘伯坚等经蒙古回国,到绥远五原,参加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即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工作,任北路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部长和总政治部的中共党委书记,随军南下。

1927年6月,冯玉祥将军受蒋介石拉拢背离革命,大批功勋卓著的共产党人被迫脱离冯部。肖明由甘肃赴陕西,被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为渭南县委书记。渭南县委设在渭南中学,肖明化名彭明,以渭南中学教师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为整顿恢复大革命失败后的

党团组织而辛勤工作。到1928年2月,全县有党团员达千人以上。3月,陕东特委成立,领导渭南、华县、华阴、蓝田、临潼等五县的农民运动。肖明任特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这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力量都较雄厚,差不多每一个大村都有农民协会,三个县的中学、十来个小学都有党和团的组织。1928年春,肖明(彭明)传达陕西省委决定:“割据渭华,恢复农会,实行土地革命”。县委组织了农民武装,发动学生与农民联合,积极准备武装起义。5月,中国共产党掌握的许权中、唐澍、刘景桂(志丹)、谢子长、高克林等领导的一个旅,同陕东特委刘继曾、肖明等领导的陕东赤卫队相配合,举行了著名的渭华起义,成立了几十个村苏维埃政权,崇凝等区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积极筹备建立渭南等县苏维埃政权。肖明分工抓地方工作,领导农民分房屋、粮食、农具,草拟土地革命纲领和划分阶级条例。6月中旬,宋哲元部反动军队进攻,肖明带领陕东赤卫队和农民武装英勇战斗。敌军攻势甚猛,起义军不支,肖明率残部退至华山南部;唐澍等率起义部队退至洛南一带。不久,唐澍牺牲,肖明又潜回渭华敌后,召开党团会议,处理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善后问题。7月底,他从风陵渡渡河到山西榆次,转到北平后又去上海。9月6日,肖明给党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他离甘赴陕一年多时间的工作情况^①。

1928年冬,党即派他去天津参加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43人,在天津“法租界”的弗照旅馆开会。会上,周恩来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刘少奇根据顺直党的具体情

^① 肖明给党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6日)。关于渭华起义的情况,参见陕西省档案馆资料和1950年春肖明主持,同王孝慈、李慕愚、李锦峰、向宗仁等座谈渭华起义的记录(胡华、冯拾记录)。

况作重要报告。会议改组省委,张昆弟被选为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肖明和傅茂公(彭真)等被选为省委委员;郝清玉被选为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兆丰被选为省委军委书记。

1929年,肖明又兼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秘密领导工人的斗争。是年8月31日至9月4日,顺直省委两次召开扩大会议,改选省委,张兆丰连任军委书记,肖明(时化名肖鸣)和童长荣等被选为省委军委委员。

1930年,肖明兼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李立三为首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他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人力车工人的斗争。肖明后来回忆说:那时,提出减车租、增工资的要求偏高,许多工人认为有轨电车夺了人力车工人的生意,发生了打电车这样的蠢事,以致斗争失败了。当时党领导斗争很不讲策略,助长群众的自发性。在实践中才慢慢懂得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①。

1931年,肖明担任中共华北特委(又称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组织部长。为了掩护工作,他化名肖筱文,任朝阳大学教授、民国大学附中主任。9月,他与冯玉祥派到北平的代表赵彦卿取得联系。冯玉祥自1930年中原大战反蒋失败以后,带其家属随员蛰居在山西汾阳城西的峪道河山村,曾派员到各地联络反蒋力量,并表示欢迎共产党方面的人到峪道河与他晤面。5月,赵彦卿陪肖明到汾阳峪道河,以给冯玉祥讲政治经济学的名义,与冯玉祥谈联合抗日反蒋问题。冯向肖表示:“徐州会议以后,由于对蒋介石认识不足,做了亲痛仇快的事情,把自己最敬佩的而且对自己帮助很大

^① 肖明:《自传》(未刊稿),藏肖鸣夫人高翔处。

的好朋友刘伯坚等人送走，确是半生以来的大错……。”^①

肖明同冯玉祥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分析了各地多种政治势力的情况，约定以后由赵彦卿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与肖明联系，定期在北平新街口西赵彦卿家（原冯部将领田凯的深宅大院）交换北方反蒋运动的情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肖明曾请赵彦卿到山西绛州找住在那里的冯玉祥，请冯玉祥抓紧这一民族危机时刻出山抗日，中共对他的抗日行动将全力支持。与此同时，肖明等认为汾阳军官学校的队长和学生是接受冯玉祥的爱国、抗日、联共、反蒋主张的一支力量，便从北京派了共产党员赵梅生等一批人去做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在那里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2年夏秋，肖明参与了动员安排冯玉祥由泰山到张家口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工作。10月9日，冯玉祥到张家口后，肖明专程到张垣与冯再次晤面，商议筹组抗日同盟军大计。不久，党的华北特委（华北政治保卫局）即派吴化之、武止戈、朱其文、张存实，以及张金刃（即张慕陶）等陆续前往张家口，与冯玉祥等共同组织抗日同盟军。1933年3月初，日本侵略军占承德，向长城各口进攻。3月中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奋起抵抗日军。此时吉鸿昌将军到达张家口。中国共产党所派军事干部宣侠父、许权中也相继到达张家口。5月，方振武率部到达张家口。于是，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正式揭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义旗。

1934年，上海党组织遭到大破坏。肖明被派到上海坚持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他积极联络原西北军旧部，从事抗日兵运工作，也

^① 陈天秩：《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未刊稿）。陈天秩先生系冯将军的多年随从。

从事文化界的救亡运动。

1936年春,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天津,重新组织北方局。肖明由沪调回天津,在中共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并担任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兼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6年4月,肖明按北方局的指示,由李连山(中共党员,冯玉祥的内弟)陪同,到南京会见冯玉祥。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肖明按党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冯玉祥表示:共产党对冯玉祥将军到南京来促成一致抗日的精神,十分理解,要求冯将军努力以自己的影响,团结南京爱国人士一致抗日。冯玉祥听了肖明谈话后表示:一定按照1931年在峪道河肖明代表中共与他晤谈的初衷,在抗日的旗帜下,坚持与中共保持朋友关系^①。

1937年,肖明继续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从事发动二十九军抗日的活动。5月间,中共北方局获得日本军部特务机关拟于6月间在平、津一带发动军事侵略阴谋的机密计划,并侦知冀东汉奸殷汝耕伪组织正在通州紧急训练一批特务。肖明将此紧急情报通知担任二十九军参谋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由张克侠转告宋哲元下令紧急防范。6月底,果然通州一带日军以“演习”为名进驻北平城郊,城内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也武装埋伏,殷汝耕派遣二十几名武装特务,化装成北大、师大、燕大等校学生,怀藏短枪,潜入城内,准备至深夜12时后,鸣枪骚动,制造所谓“学生、士兵反日暴动”事件,届时城内外日军借口镇压暴动,突然袭击二十九军司令部,进而解除二十九军武装,制造第二个沈阳事件,乘机占领北平和华北。由于二十九军得讯后严密防范,这批特务进城后就被跟

^① 陈天秩:《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未刊稿)。

踪,傍晚,将这批特务全部逮捕。结果,该夜日军在城内城外白白地埋伏了一夜,阴谋落了空。

日军不甘心失败,拼命采取报复行动。一星期后,日军制造了炮轰卢沟桥、宛平县的“七七事变”,二十九军何基沣师长率部奋起抵抗。7月8日、9日,何基沣派四五百名大刀队夜袭卢沟桥西北面小树林中的日本军营,砍杀几百个日本兵^①。日军受此打击,被迫采用缓兵之计,放出“局部解决”、“不扩大主义”的烟幕。于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紧急电令宋哲元率二十九军立即退守保定以南,由南京政府与日方交涉“双方撤兵”。这时,中共北方局由肖明找张克侠,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个“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就是趁日军大量援军尚未开到,平、津、唐山只一两万日军之际,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其武装,至少可以把日军驱逐到滦河的东北,以滦河为保卫平津的最前线。这个战略计划由张克侠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结果,宋哲元既不甘心接受由南京政府来与日方谈判妥协的所谓“以退为守”的方针,也没有勇气实行中国共产党向他建议的“以攻为守”的积极方针。他拿起红铅笔在地图上一划说:我们就“以守为守”吧。但他又没有坚决守卫北平的决心和措施。不久,日本大量援军开到,28日北平失守。

1937年底,肖明到达延安。1938年,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他有渊博的马列主义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讲课生动活泼,联系实际,语音铿锵有力,间或在课程内容中穿插故事和笑话,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

1938年底,他出发到前方,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宣教委员会书记,兼管分局党校的工作,并在党校亲自担课。

^① 何基沣 1950 年的回忆。

为了发展边区的工业生产,开发自然资源,解决经济困难以支持长期战争,1924年,肖明调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工矿局副局长兼总支部书记和边区政府总支部组织委员。他对开发和建设阜平县北部炭灰铺煤矿,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5年8月日军投降,肖明随军接收解放了的张家口市,担任张家口市市委委员、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主任。1945年12月21日,他在张家口市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解放三个月的张家口市工人运动》的著名报告。他指出:解放三个月来,张垣工人阶级在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下,英勇地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共一百三十一次,参加人数达一万一千七百零三人,先后都取得了胜利,形成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荣的奇迹”。他还指出:有革命传统的张市工友们配合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现在正“站在民主自卫战争的最前线,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他为创造和总结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工业城市的经验而日夜操劳。此时,他还兼任晋察冀边区总工会常委。

1946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张家口后,肖明担任张家口地下市委书记,在张家口市郊外坚持斗争。以后,他又兼任察哈尔省委城工部长、敌工部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发动群众,配合我解放大军胜利进行平、津、张战役。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肖明随军进城,担任了北平市委委员,市委工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等职,领导首都工人阶级为建设新首都而昼夜操劳。1956年,肖明因多年劳瘁成疾,患高血压病。1959年逝世,终年63岁。北京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致悼词,深切悼念这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鞠躬尽瘁的党的忠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指导者。

(胡 华)

张 仲 实

(1903—1987)

张仲实,原名安人,陕西陇县人。1925年底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毕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和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三原特支书记、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和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60多年间,他从西北农村的一个穷学生成长为一位中国

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他“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成就显著,影响深远,不仅功在当代,而且泽及后人。

马列主义将他引上了革命之路

1903年7月15日,张仲实出生在陕西省陇县城北店子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

店子村是西北农村的一个普通村庄。它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西北角,温水河贯穿店子村东西,在村东与由北而南的杜河相聚,然后携手向母亲河渭河奔去。然而,在旧中国这里既是一块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沃野,又是一块官匪骚扰,民生困苦的穷乡。在清末民初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和全国各省农村一样,这里

的贫苦农民饱受政府官吏、土豪劣绅及土匪驻军的压迫剥削和骚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张仲实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

张仲实的祖父是个忠厚老实的贫苦农民，他一生务农却终生贫困。父亲务农之外兼做“脚夫”，常年在外为全家人的生活奔波。母亲聪慧善良、吃苦肯干，但不幸在张仲实两岁那年因病去世。父亲无奈，只好将张仲实交由兄嫂抚养成人。

张仲实 10 岁那年，店子村设立私塾，伯父伯母始送他人塾读书。他勤奋好学，深得塾师喜爱。1916 年，塾师欲送儿子去陇县县城读高级小学，因无人作伴，遂极力鼓动张仲实祖父让其孙儿陪其子伴读。

在县高小就学四年多时间，张家常为每月两吊钱（约折合银元 1 元）的伙食费发愁。而张仲实因交不起膳食费不知流了多少泪。

值得庆幸的是，在此期间，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16 岁的张仲实懂得了睁眼看世界，开始思索个人的出路问题。

1920 年冬，张仲实从县高小毕业。因学业优异，他被留校担任司书生，每月工资两吊钱。其时，实业救国的呼声在陕西各县越来越高，西安、三原、高陵和泾阳桥头镇还先后兴办了一些人力纱厂。由此，张仲实便萌生了实业救国的想法。

1922 年夏，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张仲实考入省立三原甲种工业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三职业学校）纺织科，他准备毕业后返乡开办纱厂，造福乡梓。

三原地处八百里秦川腹地，系陕西连接东南和西北的枢纽。在 1935 年陇海铁路贯通西安以前，该县系全省经济文化重点地区。自明清以来，这里素有“秦中商埠”和“西北药埠”之称。进入民国，这里广种棉花，又有“西北棉库”之誉。当时，三原共有新式

中等学校五所,学生 1500 多人,校数和学生人数在全省仅次于西安。

张仲实入学后不久发现,离母校不远的渭北中学大门左侧的公共阅览室里,陈列着全国各地出版的一些革命和进步的报刊书籍供学生借阅。于是,张仲实暇时常去那里借阅《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共进》和《共产党宣言》。通过阅读,他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渭北中学、省立三师、县立中学和县立女中的贾怀庚、王之鼎和王爱玉等进步学生。

在上学期期间,让张仲实头痛的仍然是吃饭问题。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招生时许诺公费,但从第二学期便借口财政困难停发膳食费,随后优秀学生每月 4 元的奖学金也因故停发。在此情况下,张仲实从 1923 年下半年起在三原五校代售《向导》(每期五六十份)和《中国青年》(每期一百多份)等革命刊物,一面借以谋生,一面传播革命思想。

1923 年下半年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三原各校得到广泛传播,进步师生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这一情况表明,在三原各校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了。

1925 年 1 月,受共青团中央派遣,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三原籍学生李子健回到三原,于 2 月下旬建立了共青团三原特别支部,姚志哲为特支书记,张仲实为组织委员,特支直属团中央领导。共青团三原特支成立后,张仲实同特支其他负责人在三原各校努力发展团员,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促使了各校团支部和学生会的成立。3 月,三原五校学生会联合成立“渭北学生联合会”,张仲实当选学联主席。

从这年春开始,在张仲实等人的领导下,三原各校进步学生纷

纷投身革命洪流，先后参加了拥护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追悼孙中山大会和驱逐军阀吴新田出陕等一系列革命活动。

驱吴斗争胜利后，张仲实趁热打铁，先后与渭北学联负责人赵宗润、李子健等人创办了《渭北青年》和《三原学生》等机关刊物，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渭北地区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10月下旬，张仲实和张含辉二人以陕西学生代表身份，出席了全国学联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会后，张仲实奉命以全国学联特派员的身份，赴开封、郑州和西安传达会议精神，指导这些地区学联反帝反封建斗争。

12月底，中共西安特支书记、共青团西安地委书记吴化之来到三原，根据团中央121号通知精神，张仲实等8名18岁以上的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三原特支，选举张仲实为特支书记。初建时隶属中共豫陕区委领导，不久改为西安地委领导。

1926年春，在中共三原特支的领导下，渭北各县进步师生积极参加全省要求教育独立、反对基督教和声援“二七”大罢工等革命斗争。

1926年5月，张仲实从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毕业，但因军阀刘镇华部围困西安、三原，他还要主持中共三原特支工作等，因此他暂时仍滞留母校。

7月，刘镇华在猛攻西安的同时，又派部四面围攻三原、泾阳。乘敌军尚未对三原形成合围之际，张仲实与朝邑（今大荔）同学唐金满趁机潜出三原北门，经富平、蒲城、大荔步行300余里至朝邑，从朝邑过黄河，经山西辗转赴上海。

在上海接上党组织关系后，张仲实考入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成为该系二年级的一个插班生。

一个多月后，张仲实闻知中共中央正在通过考试选拔赴苏学习俄语的中共党员学生，遂报名参加考试，经考试他被录取。

10月10日，张仲实化装成一名工人，登上一艘停泊在黄浦江的货船，同行者共60多人。从此，他踏上了赴苏留学的旅程。

11月，经过万里奔波，张仲实等60多人经海参崴等地到达莫斯科。张仲实先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俄语，两年后转入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大）翻译教材。初步接触翻译工作。

在东大学习期间，张仲实努力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党建和苏维埃建设等课程外，还刻苦学习俄语。

在赴苏留学之前，张仲实虽无一点俄语基础，但却有学好俄语的决心。为此，出国前夕，他倾囊在上海购买了一部《露和大辞典》。从此，这部俄汉大辞典就成为他一生形影不离的良师益友。

当然，有一部好辞典固然很重要，但关键还要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在东大的近两年内，张仲实一有空就查辞典，读俄语。除每周三节的俄语课外，他几乎将谈天、看电影、游公园等空闲时间，都用在读写俄语上。甚至在节假日，他也到学校的一间空教室关起门来朗读俄语，研究文法。经过勤学苦练，他的俄语听读写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转入中大后，在张闻天的领导下，张仲实先后参加翻译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党史等教材和有关资料。这样以来，不仅巩固和提高了他的俄语水平，而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许多基本知识。凡此一切，都为他的职业革命家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8月，张仲实从莫斯科经海参崴返回上海。10月，他

被中共北方局任命为中共京东特委宣传部长，分工到唐山马家沟煤矿搞工运工作，再次扮演了职业革命家的角色。

当时，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中共京东特委某些人热衷于搞“飞行集会”等冒险活动。由于长期离开中国缺乏领导工运经验和性格内向等原因，张仲实显得对这个新工作岗位很不适应，一直未能进入角色，多次交了白卷。从客观上讲，主要则是由于张仲实对这种“左”的做法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因而遭到特委某些领导排斥和打击。

1931年1月，矛盾终于爆发。某天，在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汇报会上，张仲实因是否应搞“飞行集会”等问题与京东特委组织部长李××发生激烈争吵，并要求调动工作。数天后，经中共北方局派员调查了解，同意将张仲实调回中共天津市委重新分配工作。

然而，由于没有及时办理调动手续，赴天津时又未携带中共京东特委介绍信，加之人地两生，张仲实从此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成为一名孤军奋战的共产党员。同年2月，张仲实被迫南下镇海，寄居岳母家，探索角色转换的途径。

主编《世界知识》 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8月，张仲实和妻子樊英从镇海返回上海，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一干就是七年。

在上海的七年，张仲实先在神州国光社当校对，继给中山文化教育馆撰译稿件，后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知识》等进步刊物，出版进步读物，并与抗日“七君子”邹韬奋等人秘密交往，从事革命活动。1984年9月，张仲实在《纪念〈世界知识〉创刊50周年》一文中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编辑《世界知识》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

大影响,使我在暂时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能够投身在生活书店这个上海进步的文化堡垒中锻炼成长。”

在镇海的半年多内,张仲实与妻子樊英均未找到合适工作,主要依靠岳母资助艰难度日。迫于生活压力,张仲实日夜翻译俄文版的《美国征服英国》一书,试图换点稿费。此书系美国记者邓尼斯著,约30万字。8月,张仲实虽千辛万苦译完此书,但却无人愿意出版,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岳母资助下与樊英重返上海。

张仲实夫妻到上海后,身上只剩下3元钱,为了自谋生计,只得整天四处奔波。

一天,张仲实从《申报》上看到了神州国光社招收校对生的一则启事,忙从杨树浦步行十多里赶到四马路该社门市部报名应招。经考试,幸被录取,被分配到校对科,每月工资8元(伙食除外),主要工作为校对新书排样。

神州国光社是国民党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开办的一家书店,总编辑是王礼锡,校对科科长为刘执之。张仲实因对陈、王存有戒心,且为了寻找党组织,故除日常工作外,很少与他们往来。

张仲实在神州国光社一年零八个月,其间虽与中共中央多方联系,但均未果。

1933年4月,因妻子樊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张仲实遂辞去神州国光社校对生一职,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半年时间,他编译了一本《苏联的教育》小册子,撰写翻译了多篇有关苏联工农业生产和国际问题的论文和通讯。但由于中间人陈彬和的盘剥,张并未得到多少稿费。

9月,陈彬和打着孙中山的幌子,在上海法租界福照路挂出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牌子。为了狐假虎威,陈又抬出孙科挂名馆长。

在陈彬和的一再鼓动下，张仲实应邀出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主办的《时事类编》旬刊特约翻译兼编辑，主要任务是从苏联报刊上翻译国际时事或有关问题的文章，以供该刊随时采用。这虽是个应景差事，但却为张仲实日后翻译马列著作和主编进步刊物打下了一点基础。

工作之余，为了谋生，张仲实又与妻子樊英抽空翻译了拉比杜斯和奥斯特维强诺夫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书。虽然此书的稿酬大半被书商陈彬和贪污，但却使张仲实在上海文化界初露头角。

1935年2月，在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的介绍下，张仲实到上海生活书店，主编《世界知识》半月刊。

生活书店是由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社下属的书报代办部逐渐扩充而成的。《生活周刊》1931年创办时仅有两三个人，1932年改为生活书店时已有数十人。截至1935年，该店在全国各大城市已拥有分支店50多个，工作人员多达数百人。该店系民办进步社团，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由全体工作人员任免。

张仲实到生活书店不久，就被全体工作人员选为理事会理事。从这时起到1936年1月，张仲实应邹韬奋之邀一直致力主编《世界知识》。随后，张仲实接替邹韬奋担任该店总编辑，又为出版发行革命进步出版物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11月，由于日军占领上海，张仲实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至汉口，继续在国统区坚持传播进步文化。

1938年10月初，在日军围攻武汉前夕，张仲实又被迫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至重庆。从此，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监控下，生活书店的出版事业遂处于瘫痪状态。

张仲实主编进步刊物始于1925年。是年8月，他与赵宗润、李子健等人创办了渭北学联的机关刊物《渭北青年》。不过，作为一种职业而长期主编进步刊物，则是从1935年2月主编《世界知识》半月刊开始的。

《世界知识》半月刊是一种以论述国际时事和世界形势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刊物。其宗旨是“认识世界”，其方针是“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它创刊于1934年9月，创办人为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在当时“万马齐瘖究可哀”的国统区，这个间接传播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信息的进步刊物，遂成为思想敏锐、要求革命的青年人喜爱的读物。

自接手主编《世界知识》半月刊后，张仲实一面继续联系钱俊瑞、金仲华、邵宗汉等国际问题专家撰写时事评论，介绍国际知识，一面亲自撰写当前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述评，帮助革命青年了解世界革命形势和动向，启发鼓舞人们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而奋起斗争。正因为这样，该刊越来越受到革命青年的注意和欢迎。全国人大原常委、中宣部原副部长、《红旗》杂志主编熊复在1991年2月28日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一文中写道：“张仲实主编的《世界知识》在上海出版后，就以它丰富的内容，精辟的论述，贯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红线的思想，对纷繁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局势所作的深刻分析，吸引着我这个当时只有20来岁的青年。”

与此同时，张仲实又十分注意《世界知识》的版面，努力使它具有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和专栏众多等特点，故深受读者欢迎。如每期封面的“瞭望台”、封底的“风云志”和中间的各种“讲座”等专栏，就深受读者喜爱，印成单行本后销路很好。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仲实自主编《世界知识》半月刊后，坚持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和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因而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称赞。1949年9月，为表彰该刊的历史功绩，周恩来亲笔题写了《世界知识》刊头。1964年，陈毅副总理撰文指出：《世界知识》解放前在国统区“是有进步作用的”。

1935年春后，张仲实还先后参加了十多种进步刊物的编辑工作。它们主要是：《新生》周刊、《大众生活》周刊、《永生》周刊、《生活星期刊》、《国民》周刊、《抗战》三日刊、《中华公论》月刊、《国民公论》旬刊、《读书与出版》月刊、《反帝战线》和《新艺》月刊等。这些进步刊物大多系国统区左翼文化名人主编，在宣传抗日救国和国共合作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30年代，生活书店是邹韬奋等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思想政治斗争的文化堡垒。而张仲实主编的《世界知识》和参编的上述多种进步刊物，则将这一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时，邹韬奋就明确指出：自1935年2月“张仲实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

1936年1月，邹韬奋因响应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支持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被迫逃亡香港。邹临行前夕，将生活书店总编辑一职交给张仲实接任。在此之前，该店虽出版发行过一些理论和文艺读物，但范围既小，又无既定计划。

张仲实接任生活书店总编辑一职后，为了宣传革命理论，适应青少年追求真理的渴望，遂有计划地扩大了出书范围，先后出版发行了青年自学丛书、黑白丛书、救亡丛书、百科小译丛、世界文库（文学作品）、世界名著译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问题与答案丛刊等。其中由张仲实主编的主要有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问题与答案丛刊等。

青年自学丛书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古今中外的各个文明领域,其中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主。代表作主要有: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1937年1月初版;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问题论战》,1937年7月初版;何干之著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12月版;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939年3月版;茅盾著的《创作的准备》,1936年11月版;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1937年1月再版;钱俊瑞著的《怎样研究中国经济》,1936年9月版;胡绳著的《新哲学的人生观》,1937年2月版等。这类图书以何干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四部著作最为著名。由于这些专著论证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工农大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等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故在当时影响颇大,多次再版。

世界名著译丛这类图书几乎是清一色的马列经典著作和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撰写的准马列著作。代表作主要是:张仲实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论》,1937年8月版;吴理屏译的恩格斯《反杜林论》,1938年9月三版;沈志远译的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939年8月版;王唯真译的列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39年7月版;冯雪峰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1938年再版等。这些马列著作和准马列著作,影响了当时的一代青年。

百科小译丛内容十分广泛,波及文史哲各个方面。代表作主要有:张仲实译的米丁(苏)《哲学》,1937年12月版;沈志远译的拉苏·莫夫斯基(苏)《社会经济形态》,1938年10月版;张仲实译的柯斯明斯基(苏)《封建主义》,1938年9月版;沈志远译的李昂吉叶夫(苏)《资本主义》,1940年1月版;刘执之译的卢西诺夫(苏)《文学》,1942年10月版等。这类图书通俗易懂,在提高广大青年社科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问题与答案丛刊这类图书均为探析当时中国现实问题的专著或论文,内容以中国抗战为主,它们对宣传抗战,坚定人们抗战必胜信心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代表作主要是:凌青著的《抗战可以同时建国吗》,1938年5月版;曹伯韩著的《在抗战时期能否实现民主》,1938年6月版;张铁生著的《我们要不要承认意大利并吞阿比西尼亚》,1938年4月版;黄维健著的《究竟有没有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1938年4月版;胡绳著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否冲突》,1938年6月版等。

上列丛书均由上海书店出版发行,代表作多为马列著作和进步读物。据当年与张仲实在生活书店共事的林默涵、邵公文等人后来回忆:张仲实主编的这些丛书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追求真理、坚持抗战的时代要求,故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青年的热烈欢迎,对促进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和投身抗战洪流发挥了重大作用。1991年2月28日,熊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一文中现身说法地写道:“张仲实担任总编辑后的生活书店出版了一系列进步读物,特别是《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名著译丛》、《百科大译丛》等等。我自己就是受到这种教育而走上这条道路(指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见证人。”

与此同时,张仲实还出版发行了一些进步月刊,如傅东华主编的《文学》,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鲁迅主编的《译文》,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和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等。1978年11月,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一文中指出:“这些杂志都大受读者欢迎,它们实际上在当时全国的杂志界居于领导地位,在团结作家读者方面曾经起了巨大的宣传组织作用。”

在生活书店时期,张仲实在激扬文字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各项抗日救亡革命活动。

1935年春,张仲实出任《世界知识》半月刊主编后,通过提供信息选题、预支稿费和资助食宿川资等方式,努力将生活书店变成团结进步作家,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阵地,变成帮助广大读者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基地。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目睹国民党卖国残民的罪行和革命师生奋起救国的壮举,张仲实挺身而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27日,他与上海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等280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该会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公布过去外交经过”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认为中华民族今后的惟一出路是:“尽量地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枪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张仲实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鲁迅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大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并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随后,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国统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极大恐惧与仇视,11月28日凌晨,以“危害民国”的莫须有罪名,下令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常委。是为轰动全国的抗日“七君子”事件。12月4日,“七君子”被当地军警移囚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并开始了所谓的“审判”。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仲实及时向报界披露有关真相,大造

爱国无罪舆论,呼请各界爱国人士声援。张仲实曾多次赴苏州旁听“审讯”,并聘请律师为沈钧儒等人辩护。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联系有关方面设法营救“七君子”。

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坚决要求下,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七君子。在此情况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上海生活书店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邹韬奋、张仲实等人的领导和影响下,该店职员钱亦石和与该店有联系的许多作家、读者,纷纷走出书斋、工厂和学校,投身全民抗日洪流,为保卫上海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11月,由于蒋介石的干扰破坏,上海抗战失败,张仲实被迫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迁往武汉。在武汉期间,张仲实先后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博古、周恩来等人取得联系,并介绍邹韬奋与周恩来见面,使生活书店接受了中共的政治领导。在此情况下,张仲实加紧进行马列主义和抗战必胜的宣传活动。他通过举办时事座谈会、演说和谈心等方法,积极向人民群众特别是进步青年宣传革命真理。

翌年12月,应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先生邀请,经中共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博古等人同意,张仲实和著名文学家茅盾启程赴新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3月,张仲实和茅盾等人辗转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张仲实出任新疆文化协会副委员长兼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主任,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暑假期间,张仲实协助杜重远带学生赴伊犁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和社会调查,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这年秋,张、茅等人积极帮助由沪赴新疆的艺术家赵丹等人成立实验话剧团,共同将新疆地区的抗日救亡文艺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然而,张仲实、茅盾等人的爱国言行,却遭到伪装进步实质仇视革命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嫉恨。盛不仅派人监视张、茅等人的革命活动,甚至企图栽赃杀害他们。情况十分危机,必须当机立断。194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茅先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兰州,后又转乘汽车经西安进入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延安。

翻译马列著作 传播革命理论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翻译工作,认为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伟业。1885年,恩格斯在致贝克尔的一封信中指出:翻译工作是一种宣传革命理论和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作,因此,“如果能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总是令人高兴的”。1943年春,毛泽东在谈到翻译马列著作工作重要性时指出: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两年以后,他在中共七大闭幕式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

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后,在半个世纪内,翻译马列著作和各类进步书籍文章300多万字,为传播革命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五十周年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王震和杨尚昆等人到会祝贺。

3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记者杨建业的新闻稿这样写道:“张仲实今天端坐在大会主席台的中央,当大会把著名书法家舒同为庆贺他专门写的‘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

义’的题词给他时,张仲实同志满面春风,愉快地笑了”。

张仲实一生从事的翻译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上海时期(1934.4—1940.5)。张仲实翻译马列著作始于1934年4月,当时,他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时事类编》旬刊。他的第一篇马列著作译文是《斯大林报告全文》(即《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该文在《时事类编》二卷9—11期上连载后,引起了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等人的关注。

1935年2月,在胡愈之的推荐下,张仲实进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任总编辑的上海生活书店,出任《世界知识》半月刊主编,从而揭开了上海时期大量翻译马列著作的序幕。

上海时期,是张仲实翻译事业最有成就的历史时期之一。从1934年4月到1940年5月赴延安前夕,他先后翻译马列著作和其他革命读物30多部(篇),共200多万字。代表作主要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这些译著深受读者欢迎,多次在国统区再版,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促使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仲实在上述译著中忠实流畅地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广泛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初步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翻译的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和书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更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命题来自斯大林的民族问题理论。他强调指出:“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

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接着,毛泽东大段摘录了张仲实译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中的有关文字以论证这一问题。

二是延安时期(1940.5—1949.2)。就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张仲实名字、大段摘录张仲实译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有关文字后不久,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的陪同下,张仲实与茅盾经历千辛万苦从西安来到延安,开始了延安时期的翻译生涯,这件事发生在1940年5月。

张仲实到达延安后,长期在中宣部工作,先后兼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和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等职。而其主要任务,则是编译马列著作。

从1940年7月起,张仲实开始在马列学院校订《列宁选集》第19卷和20卷,翌年9月大功告成。译本曾排版并打好字型,但因条件限制未能及时出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张仲实奉命将字型坚壁在瓦窑堡附近,后被胡军挖出毁掉。

1942年后,张仲实与艾思奇、吴亮平等人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辑、校译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以“解放社”名义,翻译出版马列著作。

抗战胜利后,张仲实先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一书,为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接着,他又主编了《整党问题参考资料》(10辑10册),集中宣传了马恩列斯毛的建党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党的性质、群众路线、党内斗争、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领导方法、党员义务和入党条

件等论述。

1949年2月,为了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以适应指导全国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一套12种的“干部必读”马列读物。根据党中央指示,张仲实拟定了一个学习理论计划,并与胡乔木商定了12种书目,经党中央审批后公开发行。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等三种理论读物,均由张仲实负责编译。

三是北京时期(1949.3—1984.3)。这一时期是张仲实编译马列著作时间持续最长,成果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正如他所讲的那样,这一时期是自己翻译马列著作真正的“黄金时代”。

解放后,张仲实继续在中宣部工作,负责筹建中苏友好协会并主编《中苏友好》杂志。1953年6月,经他自己申请,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岗位工作了一段时间。

自1954年春开始,张仲实在中央编译局先后担任副局长、副书记和顾问等职,长期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译写作,在30多年内,他不仅积极参与了《斯大林全集》(1956年出齐)、《列宁全集》(1969年出齐)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4年出齐)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亲自翻译审定了部分译稿。

在长达30年时间内,出版马恩列斯三大全集,这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马列主义传播史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张仲实则是这一奇迹的主要领导者和具体实践者之一,这是他对我国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1961年,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时,苏共代表团成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伊利切夫傲慢地指责我党:“你们连《列宁全集》都没有……”然而,当中共代表团捧出39卷本的《列宁全集》中文本时,伊利切夫等人顿感语塞了。

与此同时,张仲实还独译或与别人合译了10多种马列著作。主要有《马恩列斯论妇女解放》;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独译);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和列宁《论东方各族人民的觉醒》、《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与曹葆华合译)等。

上述事实表明,张仲实在翻译马列著作,诠释革命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无愧于马列主义理论家翻译家的光荣称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中,张仲实不仅取得了卓著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坚持翻译工作要为全面歌颂和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基本方针。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因此,对内实现民族团结、对外实现民族独立遂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实际问题,如果说,张仲实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是为了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想方法的话,那么,他翻译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则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针政策。这正如他1938年12月在《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初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抗战的今日,怎样彻底实现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对外求得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对内实行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更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以此说来,斯大林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实在有着莫大的参考价值。”

全国解放后,系统而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全集,借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这是中共中央交给中央编译局的一项庄严和光荣的任务,因此,作为执行这一任

务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张仲实同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1936—1937年，在国统区学术界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无疑是当时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新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张仲实及时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部经典著作，其中前者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经典，而后者则是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的经典。这两部经典，对当时的那场论战发挥了指导作用。

在延安时期，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开展的整风运动，张仲实编译了马恩列斯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斗争、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等《整风问题参考资料》（10辑10册）。进北京后，为了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等新问题，他不仅翻译了列宁《论东方各族人民的觉醒》和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名著，而且撰写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等论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析了这一新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仲实虽已年过古稀，但仍十分注意研究新问题。1984年11月，据李长福、刘明在《把毕生献给马列宣传工作——论马列著作翻译研究专家张仲实》一文中回忆：张仲实认为，研究马列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老在书本里打圈子没有出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共产党人搞好革命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翻译工作当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由于张仲实在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中自觉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无论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译文都能力争求真求实，作到内容十分真实。

1942年8月5日,张仲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三个文件译文的校正》一文,公开提出应对《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党的纪律与民主》和《领导与检查》“三个文件译文不甚确切之处予以校正。”在文中,他提出三个文件应校正的译文多达17处,充分显示了他在翻译工作上的严肃求实精神。

解放后,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的译法上,张仲实更是坚持了求实精神。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仲实为坚持真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1959年3月28日,张仲实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此语现译做‘资产阶级式的权利’比较符合原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正确意见未被有关方面采纳。“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肆意歪曲马克思此语的原义,硬说党内存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法权”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企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最后搞垮党中央大造反革命舆论。张仲实看出了“四人帮”的这一狼子野心,并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1977年4月5日,他在《剥掉“四人帮”在“资产阶法权”问题上的画皮》一文中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歪曲马克思原义的卑劣手法和罪恶目的,再次主张将“资产阶级法权”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五个月后,张仲实的这一建议终于被中央编译局认可。

坚持信达雅原则,译文文风朴实无华。俗话说,文如其人。张仲实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他的译文文风也十分朴实。

1991年2月28日,熊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一文中写道:张仲实在翻译马列著作时一贯坚持信达雅的原则,“因此,不论他自己的译文或是他参与审定的译文,都是信达雅三全,使人读来通俗易懂,而又引人入胜,毫无迟滞艰涩之感。”熊复的这一看法

颇有道理,基本上抓住了张仲实的译文在文风上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马列著作翻译史上,张仲实是德高望重又为数不多的开路者之一。中共中央对他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这个评价发表在1987年3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

张仲实之所以能获得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的殊荣,首先就在于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这正是他毕生在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1984年9月,张仲实在《纪念〈世界知识〉创刊50周年》一文中满怀信心地预言:“展望动荡中的国际形势,人们终有一天将——行看资本主义的灭亡,共庆共产主义的胜利。”

正因为张仲实有这一坚定信仰,才能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近十年的情况下,坚持在国统区上海、武汉、重庆和乌鲁木齐等地翻译马列著作并取得巨大成就;才能在极左思潮抬头和“四人帮”横行之时,多次主张将“资产阶级法权”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在半个多世纪内将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结合起来,努力探索翻译工作规律并形成自己的显著特点。

其次,在于他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扎实。在学生时代,张仲实就喜欢阅读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出版发行的《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并从中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在苏联留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知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因此,他在翻译马列著作时能够牢牢把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

张仲实认为,翻译工作只有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才

能把马列著作准确地译成中文。他要求别人这样，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如他建议将“按劳付酬”译为“按劳分配”，将“各取所需”改译为“按需分配”，将“平安的大路”改译为“平坦的大道”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

第三，精通俄语。要想搞好马列著作翻译工作，首先就必须学好外语，特别是俄语。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马列主义四位经典作家中列宁和斯大林是俄国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当时基本上也译成了俄文。

20世纪20年代，张仲实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俄语又搞了两年俄文翻译工作，听、说、译均达到较高水平。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则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的指导，因此30年代张仲实在中国翻译界崭露头角既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他精通俄语的必然结果。

第四，任情专一。在半个多世纪内，张仲实当过编辑，搞过宣传和翻译工作。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没有停止翻译马列著作。可以这样说，在张仲实的一生中，翻译工作是专业，是主业。

张仲实对待翻译工作不是见异思迁而是任情专一。他自从1934年开始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后，50多年来始终锲而不舍，乐此不倦。而不像有些人那样，这山望着那山高，结果往往一事无成。这正如全国政协原常委、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姜椿芳在《张仲实的翻译道路》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张仲实翻译事业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张仲实同志是始终如一地、长期地从事翻译工作，而不是经常改行。

第五，专业对口。许多师友认为，张仲实的素质、性格和专长都适于译书和编书，由于专业对口，故使他在翻译工作中发挥了更好的作用，取得了更大的成绩。稽之事实，所言不虚。谈素质，从

政治上看,张仲实是中共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从业务上看,张仲实具有比较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论性格,张仲实寡言少语,谨严自重,质朴谦虚;说专长,张仲实精通俄语,便于发挥自身特长。对此,张仲实深有体会。1983年3月,他在《我的编译生涯》一文中讲到:从事编译工作是自己无愧的选择。他说:“从1926年学习俄文开始,到生活书店的实践,使我最终决定了今后要走的道路;毕生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

第六,工作作风认真严谨。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文字工作,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中,有无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更显得尤为重要。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专家学者中间,张仲实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是人所共知,人所共赞、共仰的。1988年7月7日,老革命家帅孟奇、杨献珍、王炳南等六人在《六十春秋风和雨——怀念张仲实同志》一文中写道:在他负责三大全集经典著作的部分译稿时,为了准确无误地表达经典作家的原意,他常常反复对照俄文、英文、德文原版仔细审校。他审阅过的译稿圈点勾画,纵横交错,人们看了无不惊叹他工作、治学的严谨认真。应该说,这种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既是他严肃对待文字工作的突出表现,也是他能够获得著名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家殊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实践中,张仲实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论。

其一,坚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方针。1978年10至11月,张仲实在《我的经历》一文中写道:“1956年全国提倡向科学进军时,我在编译局主张‘翻译要与研究结合’。有人就在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批评我说这是鼓励干部发展名利思想,是白专道路。”

平心而论,“翻译要与研究结合”不是“名利思想”和“白专道

路”，而是张仲实对中央翻译局翻译工作提出的指导方针，是他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经验之谈。这里的“翻译”是指对马列著作的翻译，这里的“研究”是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研究。

实践证明，坚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方针是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基本方针，张仲实的翻译生涯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坚持信达雅的原则。1978年9月，张仲实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一文中指出：“19世纪末，如何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名著，有争论。众所周知这时严复提出了有名的‘信达雅’。”张仲实虽赞同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但却不同意严将“雅”解释为“夏商周古文”的意见。同时，对20世纪30年代某些人“宁顺（达）而不信”的错误观点，张仲实也表示坚决反对。

当然，张仲实主张的信达雅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并不完全相同，张仲实认为，信达雅原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忠实流畅”原则。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译文既要准确地表达外文原意，又要做到通俗易懂。另一方面，译文既要流畅生动，又要保持原著语言的风格规范。

其三，搞好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相关条件。张仲实认为，翻译工作并不是一项纯“技术工作”，而是一项必须具备各种相关条件的“科学工作”。

事实证明，张仲实就是一位具备了上述相关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因为如此，他的译作才会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欢迎。

著书立说 宣传真理

由于一贯坚持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因此，半个多世纪以

来,张仲实在以主要精力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的同时,又努力著书立说,宣传革命真理。

张仲实一生著述颇丰。专著论文多达数百部(篇),共计 200 多万字。内容主要涉及马列主义和马列经典作家、中国抗战和中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各个方面。他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精心而独到的研究,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视的一家之言。

一是宣传马列主义,维护革命导师权威。

20 世纪 30 年代,特别是全国解放以来,张仲实以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和人物传记,全面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从而成功地宣传了马列主义,维护了革命导师的权威。

在宣传马列主义时,张仲实主要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内容、意义和方法。

1949 年 6 月 25 日,在《马恩列斯的主要著作和研究它们的方法》一文中,张仲实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学习方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社会主义。”接着,他详细论述了以上三个部分的详细内容,并罗列了有关代表作。随后,他强调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抓住民族问题等基本原理,马恩提供了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而列斯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条件,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并加以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列斯的这些著作和报告,是值得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特别注意和研究的。

对于如何才能学好马列著作,张仲实从他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总结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熟读原著;二是精读代表性著作;

三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参照对读；四是将马列著作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活读；五是在实践中运用创造性的方法掌握创造性的马列主义。张仲实特别重视最后一种学习方法。1940年12月29日，他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逝世17周年而作》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口头上的、书本上的、教条式的；另一种则是革命的、实践的、创造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坚持以创造性的方法正确把握和运用这种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他强调指出：“学习列宁斯大林的榜样，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应用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

在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的意义时，张仲实主要论述了马列主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指导意义。1959年11月7日，他在《学习列宁的理论遗产》一文中指出：“列宁的著作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各国劳动人民的革命道路，也照耀着我国人民的革命道路。在我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上，列宁的思想……使革命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与此同时，在有关人物传记和专题文章中，张仲实又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他们崇高的历史地位。

从1946年开始，张仲实先后撰写了《毛泽东传略》（1946年）、《斯大林传略》（1949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传略》（1983年2月）和《列宁传略》（1984年3月），其中第一部传略因故未公开出版，第二部传略载于《中苏友好》一卷二期，第三、四部传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以上五部传记中，张仲实简明扼要而又颇具特色地介绍了

革命导师的生平事迹，给人们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例如，《毛泽东传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论，画龙点睛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性格特点和杰出贡献；第二部分为述，生动具体地叙述了毛泽东从青年时代从事革命活动到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光辉历程。两部分相辅相成，充分展示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

在某些专题文章中，张仲实则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

1938年5月，张仲实在《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马克思》一文中，称赞马克思是“历史巨人”。1941年1月，他在《列宁的著作遗产》一文中，赞颂“列宁是无产阶级的最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现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表明了他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1940年12月29日，他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则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历史功绩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毛泽东“已经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

二是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论。

1937年7月7日，日军突然进犯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拉开序幕。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长驱南下西进，中国军队一时节节后退。在此情况下，中国抗战能否坚持到底并获得最终胜利，便成为国内外各党各派和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从1937年7月开始，张仲实撰写了大量专著论文，介绍中国抗战形势，分析敌我优劣，努力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论。

7月30日，张仲实在《国民》周刊第13期发表了题为《抗战必胜论》的署名文章，在全国知识界最先喊出了“抗战必胜”的呼声，

并从“基本条件”和“具体条件”的两个方面，初步论证了中国抗战必胜的必然性。他指出：从“基本条件”讲，敌人内部“有着莫大的矛盾”，而我国军民上下“只有一条心”，“这一条心，就是我们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从“具体条件”讲，第一，敌军“多半没有实地作战经验”而“我军作战经验丰富”；第二，敌军“出师远征，处处不便”，而我军“以逸待劳，便利不少”；第三，敌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在战时某一经济部门一发生毛病，全部经济生活马上就要受其影响而瓦解”，而我国则相反，因此，“我国抗战可以持久，敌人却不行了”；第四，“敌人的后方，并不巩固，而我毫无后顾之忧，全国只有一心一意杀敌”。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各方面说，我国的抗战是必胜的”。

张仲实坚定而执著地宣传抗战必胜论。他那锐利的目光，时而望着国内云水，时而又望着世界风雷。一方面，他既揭露了《日德意防共公约》、《美日商约》和英法美宣称保持中立对中国抗战的消极影响，又赞扬了苏联的反战立场，各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和西班牙军民抗击德意侵略对中国抗战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速决战、片面抗战、反共磨擦和某些国民党将领的不抵抗主义，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全面抗战、国共团结和全国人民的抗战言行。上述思想和主张，他在《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全面抗战的展开》和《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抗战》等论文和《国际现势读本》等专著中，都做过精辟的分析和论断。

张仲实的这一努力，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督促国民党坚持抗战和揭露日本的侵华罪行，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本质的腐朽性。

从穷学生到中共党员，再从中共党员到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这一阶级出身、革命生涯和特殊职业，决定了张仲实必然大力宣传

社会主义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腐朽性，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在上海、武汉和重庆等国统区撰写文章时，张仲实往往将社会主义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有关情况加以对比，从而找出二者的优劣。

1935年1月10日，张仲实在《苏联向何处去》一文中，通过对苏联“一五”和“二五”计划期间钢铁工业与英法美德同期钢铁工业产量和发展速度的对比分析后认为：“依苏联钢铁上发展的速度去推断，在最近一两年内，其钢的产额定可‘赶上并超过’德国的。”其言下之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1938年5月，张仲实在专著《国际现势读本》一书中，对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头一件最显著的事实，就是两者内部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么，在苏联，经济欣欣向荣，既没有危机，又没有失业，人民的文化与物质生活突飞提高，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埋头建设；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适为相反。”“第二件事实，就是两者发展的速度，相差极大。”“从1913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苏联工业生产的增加，要比资本主义各国大16倍。”

自1940年夏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张仲实在谈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雏形——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了。

1940年12月29日，张仲实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理论的新贡献。”依据这一理论建立的革命政权不是走向资本主义而是“走向共产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仲实一连撰写了三篇文章，集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等问题。

1949年7月20日，张仲实在《我们的祖国》一文中指出：“我们社会发展的前途不是走向过了时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及人类最高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月20日，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中又指出：当然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9月20日，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文中，他则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不同之点进行了分析对比，从而揭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他指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主要有二：第一，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可以“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和进行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从政治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仍然有阶级斗争……并将经过阶级矛盾的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种发展将不经过武装斗争的形式。”

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后，张仲实一直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成败。他通过组织领导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三大全集、校订某些译文失误和撰写有关纪念文章等方法，努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武器。为此，他曾与“四人帮”展开激烈斗争并受到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张仲实痴心不改，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必胜。1978年10月至11月，他在《我的经历》一文结尾中满怀信心地写道：“打倒‘四人帮’两年多以来，目睹全国形势日益大好，上下一条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我感到振奋，感到我们党大有希望，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大有前途。”

宣传中国文化，促进新文化的发展

从青年时代开始，张仲实就自觉地担负起了宣传中国文化，促进新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

1918年12月，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刘大半、沈尹默等人发起创办《歌谣》周刊，公开征集各省民谣，使之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这次歌谣运动中，张仲实是陕西采编歌谣最多的一位作者。据统计，从1924年5月到1925年3月，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为《歌谣》周刊供稿119篇（其中歌谣35首，谜语56则，谚语11则和歇后语17则），公开发表14篇。发表在《歌谣》周刊62号上的三原歌谣《你骑驴儿我骑马》，质朴无华，浑厚直率，颇具三秦风俗特点，不失为一首优秀的近代歌谣。

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后，张仲实努力将宣传中国文化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为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国统区从事文化工作时，张仲实十分注意介绍国外，特别是苏联的文化，借以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借鉴。在上海，他翻译了高尔基《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报告和评论，撰写了《最近逝世的语言学家——马耳》和《苏联的音乐家》等评论文章，积极向读者介绍苏联的先进文化。例如，他在《最近逝世的语言学家——马耳》一文中借用这位苏联语言学家的话，巧妙地宣传了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将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共同文化的思想：“未来的世界语将是一种新体系的语言，就如未来的经

济,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未来的无阶级的文化一样。”在武汉,他撰文欢迎日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访华,充分肯定了他“同情中国抗战”的做法。在乌鲁木齐,他出任新疆文化协会副委员长等职,积极宣传抗日思想文化。

张仲实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宣传先进文化呢?我们只要读读他在1938年5月19日写的《学习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文化工作》一文就一清二楚了。他在论文中简介了西班牙共和政府文化工作的概况后指出:“西班牙共和政府对于叛军和意德两国干涉者的抗战,所以能支持这么长久……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广大的文化工作和人民政治水平提高的原故。”他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学习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这种文化工作的榜样,展开我们的抗战文化了。”由此可见,介绍国际先进文化以促进中国抗战文化,进而促进中国人民政治水平提高,促进现代中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他的良苦用心和主要目的。

进入延安后,张仲实十分注意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积极致力于工农兵的文化普及和提高工作。抗日战争后期,他曾长期深入延安杨家岭机关,对后勤人员的文化学习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辅导调查和总结。1944年11月18日,他在《新的摸索——延安杨家岭机关杂务人员文化学习初步总结》一文指出:对机关杂务人员加强文化学习是一个“新的摸索”,这对于“改造他们的意识,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以便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通过学习取得了四点成绩:第一,“提高了工作效能”;第二,“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第三,“增强了杂务人员的内部团结和组织生活”;第四,“推动了节约”。

全国解放后,张仲实依然十分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努力传播先进文化。在担任《中苏友好》杂志主编期间,他大量刊登介绍苏联

文化建设和中苏文化交流的文章；在担任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并主编《理论学习通报》期间，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先进文化；担任中央翻译局领导后，他更是努力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为中国先进文化提供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无论在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在宣传中国抗战和先进文化方面，张仲实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值得指出的是：张仲实在从事上述宣传工作时，始终能够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从而得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论，这正是他之所以被称为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根本原因。

结识领袖人物

从1938年9月在武汉认识周恩来以后，张仲实又先后结识了中共领导人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和毛泽东等人。

生活在这些历史巨人身边，张仲实常感受受益匪浅。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彭德怀谦虚朴素的作风，朱德忧国忧民的情怀，毛泽东、任弼时对革命烈士的无产阶级感情，都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而他与这些伟大人物心心相印的故事，却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段革命领袖与知识分子赤诚交往的佳话。终生难忘周恩来的教诲和关怀。1937年11月下旬，由于上海失陷，张仲实随生活书店内迁武汉。在这里，他不仅与抗日七君子之一、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重逢，而且还见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中共国统区委书记潘汉年和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同学博古、凯丰等人。这对于长期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而又孤军奋战在国统区的他来说，

自然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然而,更令张仲实终生难忘的,则是周恩来的教诲和关怀。

1938年春夏之交,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张仲实将邹韬奋介绍给董必武等人。数次交谈之后,邹颇受启发,遂再求张将自己引荐给周恩来。

8月中下旬,张仲实将邹韬奋的这一要求转告凯丰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凯丰等人以为此事可行,让张仲实直接与周恩来联系。在此情况下,张仲实便给周写信告知此事。他在信中写道:邹韬奋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关于救国道路问题,他选定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态度跟党的主张没有分歧,并且总是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努力使党的主张转变为他自己的实践。他很感谢我党对生活书店出版刊物的支持帮助,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接信后,立即指示凯丰给张复信,表示同意尽快面叙。

9月的一天下午,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热情地会见了邹韬奋和张仲实。

周恩来与邹韬奋、张仲实一见如故,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谈国内外形势,谈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谈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关切地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一道走抗日救国的道路。”接着,周恩来又鼓励地说:“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诚恳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

周恩来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一年多后,他救助张仲实和茅盾

脱离虎口再次证明了这点。

1939年春，经中共有关方面同意，张仲实和茅盾等人应邀赴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讲学。由于张仲实、茅盾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新疆军阀盛世才时刻准备对他们二人下毒手。12月，周恩来因右臂摔伤经迪化赴苏联莫斯科治疗。盛世才设宴招待，张仲实、茅盾等人应邀出席作陪。在敬酒闲谈之时，张仲实、茅盾乘机将自己的危境告诉了周恩来并请求中共救助。周点头示意，嘱他们随时听候佳音。

1940年3月，好消息终于等到了。当时，赴苏联治病归来的毛泽民给张仲实带了这样一个口信：“恩来同志托我告诉你，你们可以去延安。”于是，在周的关照下，张仲实与茅盾经过周密准备，终于在5月中下旬脱离虎口奔赴延安。

赴新途中结识彭大将军。1939年1月下旬，张仲实和茅盾从武汉乘船溯江而上至重庆，准备乘机飞往新疆迪化。因等待飞机，他俩住进机场附近一个旅馆里。

在这个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小旅馆里，张仲实结识了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当时，彭德怀受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团结抗日事宜后，准备乘机飞赴西安，然后返回华北抗日前线。在重庆，张仲实与彭德怀朝夕相处数日，并同机飞赴成都和西安。

在相识相处的十多天内，彭德怀给张仲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张仲实忍不住即兴挥笔成文，对彭德怀的风度、性格和作风等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描绘：

“由渝到蓉跟记者同机的，有第十八集团军副总指挥兼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他因飞机改班，也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等机。彭先生颇有‘儒将’的风度，你跟他谈起来，不论任何学

术问题或任何实际问题,他都从理论上给你解释得清清楚楚。他的地位那样的重要,他那样的受人敬重,但是他对人谦虚,坦白诚恳,一点儿都不骄傲,不虚伪,不敷衍。他的生活,简单朴素的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照一般要人的作风说,以那样重要的地位,他至少应当随身带几个侍从,住头等旅馆,举止阔绰。可是彭将军一个侍从也没带,他跟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且住在楼底下一个黑暗的小房间里,他早晨仍吃几块由重庆带来的点心,中午晚饭他仍吃两三毛钱的菜。他是有公费的,但是他一点都不多余花费。他十分爱读书。他在重庆几天,因事情太忙,没有看报,现在他乘闲住的机会,都一字一句地补看了。记者所带的杂志,他都要去仔细地看完了,他自己还带有博古先生最近译的《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及其他几本新书,他都在两天内看完。他很喜欢小孩子,同机来的(萨)空了先生的小女、公子,总是跟他逗着玩。”

这段文字娓娓道来,感人至深。一个脱俗、高雅、谦虚、朴素、好学和平易近人的彭德怀将军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此文在国内著名杂志《全民抗战》第52号发表后,国统区各方反响极大。它对于扩大中共影响,鼓舞人民斗志,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朱总司令从西安返回延安。1940年5月19日,张仲实和茅盾等人从乌鲁木齐脱离虎口后,经兰州到达西安,住进西京招待所。第二天,他们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取得联系。“八办”负责人伍云甫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接到兰州的通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一两天,朱总司令要回延安,你们就随他走吧!”

当时,正值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其军事进攻矛头主要指向陕甘宁边区和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为击退这股反

共逆流，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经洛阳赴重庆谈判。后因军情紧急，又奉命返回延安听取指示，改由周恩来就近与蒋介石周旋。

弄清上述情况后，为了行动方便，张仲实和茅盾等人移住西安“八办”。

数日后，在西安“八办”的安排下，张仲实、茅盾等四五十人随同朱德夫妇乘坐三辆大卡车离开西安。车队在耀县、洛川和郃县（今富县）等县各住一夜，于5月26日下午2点返回延安。

途中住宿期间，朱德常去看望张仲实、茅盾等人。朱德向他们介绍一年来敌我形势变化、敌军的进攻和扫荡、八路军的壮大和胜利等情况，重点介绍了蒋军朱怀冰部进犯八路军总部被歼灭三个师的战役，愤怒揭露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朱德还将自己在途中作的一首题为《出太行》的七绝，抄写在一张马栏纸上请张、茅等人品评，这首诗为：

出 太 行

一九四零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朱 德

一九四零年五月

读罢此诗，张仲实感慨万千。朱德总司令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和造诣颇深的文学素养，使张仲实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张仲实、茅盾等人伴随朱总司令到达延安后，受到了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据《新中华报》5月31日报道：26日，朱、张、茅等人到达后，边区各界在延安南门外操场聚会欢迎。朱主要演讲了三

年来华北抗战情况。茅盾表示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创作抗战文艺作品。张在讲话中指出：“进入边区后，看到中国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儿女，中国抗战之胜利及建立新中国之伟大任务，全靠彼等担任。”

数日后，毛泽东亲临招待所看望张仲实、茅盾等人，并将自己刚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赠给张、茅等人。

不久，中共中央恢复了张仲实的中共党员党籍，并将他分配到任弼时主管的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此，张又回归无产阶级队伍，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投身到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之中。

请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题词。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一手挑起了反革命内战。于是，中国革命进入了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春，晋冀鲁豫解放区陈赓兵团和王震兵团联合作战，在晋西南战役中击败来犯之敌蒋介石、阎锡山部三个师，歼敌2.2万多人，夺取了晋西南战场的主动权。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闻讯，遂派出以崔田夫为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去慰问。慰问团1月23日从延安出发，2月12日到达晋西文水县城。

2月15日，张仲实从《晋绥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有关刘胡兰英勇就义的通讯报道。这篇通讯报道写着：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某团袭击文水县云周西村，逮捕了年仅15岁的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主任刘胡兰等七人。敌人威逼刘胡兰等人在悔过书上签名画押，刘严词拒绝；敌人以铡死相威胁，刘英勇不屈。她坚定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敌人无奈，遂将逮捕的其他六名农民铡死，借以威吓刘屈膝投降。但是，敌人的暴行并没

有吓倒刘胡兰，她厉声呵斥敌人：“死有什么可怕，我再活十几岁，还是这个样子！”说罢，她从容不迫地躺在铡刀下，轻蔑地对敌人说：“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就这样，刘胡兰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之下。这真是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张仲实看完这篇报道深受感动，立即派慰问团成员缪海棱带人前去调查落实。经查证，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完全属实。于是，张仲实建议慰问团派团员白清云等人携带白洋布一匹和毛巾一打，前赴烈士家中慰问。

几天后，在与中共晋中地委书记解学恭的一次谈话中，张仲实建议用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对党员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教育。解表示同意，并请张仲实给烈士撰写碑文。张仲实认为事关重大，应由党中央决定如何褒奖，便答应向中央的有关领导汇报后再定。

3月24日，张仲实随慰问团由山西前线回到党中央临时驻地瓦窑堡杨家园子。第二天，在向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汇报工作后，张仲实恳切地对任说：是否可转请毛主席给刘胡兰烈士题词褒奖。任弼时当即表示：“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第二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强忍心头悲痛，挥动如椽巨笔，为刘胡兰烈士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同一天，新华社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并播发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英雄名字，为党增辉，英勇事迹，可歌可泣。从此，一个英雄的名字和一段英勇的事迹，迅速传遍北国大地，大江南北，激励着解放区军民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一滴透明透亮的水珠

古语云：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君子说话办事，其品德高尚如真水之亮，无所不见；君子待人接物，其度量宽厚似大地之博，无所不载。我们认为，用这八个字来概括张仲实的人品，应该说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1991年3月，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在《纪念仲实同志》一文中盛赞张仲实谦虚和朴素的美德，他认为张“朴素得使人感觉他如水一样透明透亮。”是啊，纵观张的一生，他的确如同历史长河中一滴透明透亮的水珠：忠诚，是他的革命本色；朴素，是他的生活准则；谦虚，是他的为人之本；宽厚是他的待人之道；而勤奋，则是他的成功秘诀。

忠诚——革命本色。自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张仲实就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在陕西三原和河北唐山从事学运工运是这样，在国统区与党失去联系孤军奋战在文化战线是这样，在延安和北京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工作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1949年7月20日，他在《我们的祖国》一文中告诉我们：他坚信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及人类最高理想的社会。”

自从1934年4月翻译《斯大林报告全文》开始，张仲实坚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虽然工作地点多次变动，工作单位多次变换，专业工作多次调整，但他从未停止翻译和研究马列主义这个主业。这又是为什么呢？1983年3月，他在《我的编译生涯》一文中告诉我们：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和研究工作是自己一生无悔的选择，现虽已入古稀之年，但仍衷心祝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张仲实的上述言行表明：对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坚信不疑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他的革命本色。

张仲实的这一革命本色，得到了师友们的公认。

1984年3月，张仲实的同事姜椿芳在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50周年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向仲实同志学习，学习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耿耿忠心。”

1991年2月28日，张仲实的学生熊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一文中指出：“仲实同志使人十分感动的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品质和修养，他的精神面貌，他的道德风度，他对党的一贯忠诚老实，襟怀坦白，一生忠诚于党的理论事业。”

1991年2月，张仲实的友人顾锦屏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奋斗不息——纪念张仲实同志逝世四周年》一文中回忆说：“他殷切期望我们这一支队伍发展壮大。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支队伍来之不易，要注意培养新人，要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他的言谈处处表露出他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和耿耿忠心。”

仰慕之言，众口一词，足见张仲实这一高尚品德感人至深。

朴素——生活准则。1991年3月，邓力群在《纪念仲实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张仲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朴素和谦虚，没有一点‘知识学者’的架子。”随着交往日密，“仲实同志的朴素和谦虚，给我留下了越加深刻的印象。他朴素，衣着朴素，生活朴素，言谈朴素，举止朴素，待人接物都那么朴素，朴素得使人感觉他如水一样透明透亮。”

我们认为，朴素是张仲实的生活准则，它渗透和表现在张仲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张仲实是一个关中贫苦农民的儿子，厚实不华的黄土地和朴

实耿直的三秦民风,铸就了他朴素的美德,并成为他待人接物的生活准则。

然而,难得可贵的是,当张仲实走上社会,特别是后来名声日大,地位日高以后,他依然故我,不改朴素本色。

谦虚——为人之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知道这一点的人固然不少,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却并不多。

然而,张仲实却做到了这一点。1991年3月,邓力群在《纪念仲实同志》一文中写道:“他不是那种还没有做事就宣扬自己,或者做了一点工作就惟恐别人不知道的人。他是那种寡言少语,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做出了成绩也不声张的人。”

60多年来,张仲实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宣传马列主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论著多达数百部(篇),共计500多万字,真可谓译著等身,功德无量。但是,他却从不居功自傲,以此为资本争名于朝或争利于市。

如果我们翻开张仲实的有关回忆文章和讲话就会发现:他从来闭口不提自己干了多少事,取得多大成绩和有何重要贡献等等。相反,他总是把贡献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将成绩归于党和人民,总是不断寻找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在《我的经历》、《回忆三十年代的生活书店》和《我的翻译生涯》等自述性文章中看到的张仲实,正是这样一位谦虚的人。从苏联回国后不适合唐山的工运工作,他认为是自己“缺乏锻炼”;在上海生活书店时期译著甚丰名声鹊起,他将这“归功于(邹)韬奋的领导有方”;大家公认他是我国现代翻译界的著名学者,翻译马列著作的功臣之一,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我国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的同志愈来愈多”,并因此而“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1984年3月,在《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50周年会上的答谢词》中,张仲实讲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表示对自己的表彰愧不敢当,认为别人的卓越成就更值得称颂,而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做的一点工作”。他强调指出:“从延安到解放后,我有幸几次聆听(毛)主席关于做好翻译出版工作和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谈话,特别是主席一再指出对马列主义研究要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与不少同志,特别是在座的不少同志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宽厚——待人之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我国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在名著《原毁》中的这句名言,至今对我们仍颇有启迪。每当我们读到这一名篇名言时,便不由想起张仲实的待人之道——宽厚。

张仲实这种宽厚的待人之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自己十分严格全面。1983年3月,他在《我的编译生涯》一文中写道:在上海生活书店主编进步刊物和撰写各种文章的同时,“我给自己作了每天至少翻译两个小时的规定”。1984年3月,他在《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50周年会上的答谢词》中指出:“我虽然年高体弱,退居二线,但我决心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继续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82年后,他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先后撰写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和《列宁传略》,为中国学者撰写马恩列斯传记开了先河。

另一方面,张仲实对待别人却十分宽容简略。1991年1月,陈也夫在《忆仲老》一文中写道:1953年,我随张仲实同志由中央宣传部调中共西北局工作。当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某些青年党团员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安心机关工作,夸大个人作用和

轻视理论学习等错误倾向。为此，“1954年春，西北局机关党委和西北局团委请仲老在五四青年节给广大青年党员和青年作一次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不是板起面孔横加指责，而是满腔热情地坚持以理服人，“切实地解答了青年的问题，正确地从思想上解决了树立共产主义革命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因此，“广大青年听了拍手称快”。

张仲实之所以能够正确掌握宽厚的待人之道，正是他勇于严于律己的必然结果。

勤奋——成功的秘诀。张仲实之所以能够从“西北农村的一个穷学生”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除了马列主义的引导，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这些客观原因外，从主观原因上讲，主要得力于他个人勤奋这个成功秘诀。

实事求是地讲，张仲实不属于那种主要因“天资聪颖”而闻名的人，而是属于那种主要因勤奋成才的人。他在苏联学习俄语是这样，在中国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和研究工作也是这样。

在苏联莫斯科留学的四年内，张仲实学习俄语十分勤奋，成绩突出。1991年1月，据陈也夫在《忆仲老》一文中回忆：某次，张对自己讲起留学苏联勤奋学习俄语的往事。“他在开始学习俄语的时候，除平时在课堂认真听讲努力学习外，假日即独自一人到树林里整天刻苦朗读”。由于如此刻苦攻读，很快便精通了俄语，从而为他后来高水平地将马列著作从俄文译成中文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然，有了良好的俄语基础，并不能保证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搞好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张仲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家，这与他长年累月的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对此，他的许多师友均有同感。

1984年，姜椿芳在《庆祝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著作50周年会

上的祝词》中指出：解放后，在党中央的关怀和中央编译局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陆续出齐。“这是理论战线的重大成就。这个成就也同仲实同志含辛茹苦的工作是分不开的。”1988年7月7日，帅孟奇等六人在《六十春秋风和雨——怀念张仲实同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1955年1月，党中央将有计划地翻译和出版三大全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等人。“仲实同志以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参与了这项宏伟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始至终，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并且一丝不苟地亲自审定了部分译稿。”

总之，张仲实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和研究的工作中，“他把几乎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和思考问题。他是一个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人。”马文瑞在《张仲实文集·序》中的这句话，就是对张仲实勤奋美德的高度概括。

谚语云：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张仲实虽已悄然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他披荆斩棘走过的马列著作翻译和研究的大道上，还必将走来千万个后来者。

（庆 东 堡 弘）

张 寒 暉

(1902—1946)

张寒暉，学名张蓝璞，字含辉，化名韩元，河北省定县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5月5日，创办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剧社——五五剧社。1928年5月，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毕业后曾留校任助教。先后在北平、河北定县、陕西西安、凤翔，以及东北军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

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兼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创作的《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等70多首抗战歌曲，成为鼓舞人民抗战的号角。他还创作并导演过一批优秀的话剧、秧歌剧，被誉为人民艺术家。1946年3月11日，在延安病逝。

北方话剧运动的先驱

1902年5月5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张寒暉出生于直隶省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城东的西建阳村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祖辈曾出过七位举人。父亲张振洲，字统六，农村教书先生。1916年，张寒暉考入定县省立第九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因参加演出反对卖国贼的新剧，被校方开除，后转到保定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读书。192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私立电

气工业学校,学电工一年,后因家贫而休学。恰逢北京邮政总局招收邮务生,张寒晖参加考试被录取。1922年夏,他回乡与大鹿庄的邵金平(后改名邵锦萍)结婚。

1922年,蒲伯英、陈大悲等人创办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简称人艺剧专),倡导为人生而艺术。学校管吃,管住,还发零用钱。张寒晖毅然离开邮局,顶着世俗的偏见,考进中国第一所培养话剧人才和学校。

实习演出时,虽然实行男女同台演出,但由于世俗原因,多数妇女角色仍由男子扮演。张寒晖因在陈大悲创作的五幕话剧《英雄与美人》和胡适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中,分别成功地扮演过妇女和老太婆,被评为表演艺术优等生,初显艺术才华。

一年后,人艺剧专被当局横加“有伤风化”等罪名,遭到关闭。张寒晖搬回直隶新馆。在同学的资助下,考入太平湖畔的国民大学法科。后因厌学和家贫,离校返乡。

1925年6月,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简称艺专),并增设戏剧系。闻讯后,张寒晖借钱赶赴北京,考进艺专戏剧系,专修戏剧理论和表演,还选修京剧、昆曲、音乐、合唱等课程。

开学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艺专开展反帝宣传活动,张寒晖积极参加,并在斗争中提高。1925年10月,张寒晖由同学邓鹤泉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自觉地投入李大钊领导的“关税自主”运动。一个多月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学习。

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中共代表陈毅奉命主持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工作。张寒晖根据党的指示,跨党加入国民党,任北京西城区党部负责人,并领导北京青年俱乐部工

作。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公然开进大沽口,挑起战火,制造了“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张寒晖参加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望着3月17日被段祺瑞军政府用刺刀刺伤的请愿代表的血衣,他随请愿团前往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始终走在队伍前头。队伍遭军警镇压,张寒晖受了伤,机智脱险。

5月5日,张寒晖同黄云谷、左明、常子英、王瑞霖五人,在北京中山公园聚会,决定成立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剧社——五五剧社,专门从事戏剧事业。他们制定了《五五剧社简章》,确定五五剧社的宗旨为“研究戏剧艺术,以促成社会”;社址暂设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他们提出五点要求:(1)以戏剧为终身职志。(2)不得独占主角,不能专工一角。(3)在内互相批评,虚心接受,在外互相尊敬,表扬社誉。(4)排戏时绝对服从导演人,演戏时不得无故生气。(5)积极研究话剧,有相当基础后再整理旧戏。

五五剧社分设事务部、剧务部、出版部,建立了大会、常委会、全体会、各部会、临时会等会务制度,分工专人负责,开始了各项工作。1926年10月中旬,五五剧社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社员发展到30多人。张寒晖撰写了《五五剧社的过去》一文,阐述了剧社成立的原因和背景,总结了九个月的工作。他写道:五五剧社的社员们与恶魔辈笔战舌斗,毫不让步,颇有宁死不做无用古董之慨。也是时代潮流的动力,竟把那些廓而清之,真是一件痛快事。经过斗争,所谓“艺术至上”派终于退出艺专戏剧系。

五五剧社还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创办《戏剧》周刊,在北京《世界日报》上开辟专栏,张寒晖曾出任主编,编发了宣传话剧创作的文章。二是组织了四次公演,轰动北京、天津。他创作的独幕话剧

《你给我怎么说的》(又名《他们的爱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爱情”和道德观,曾由人艺剧专戏剧系及其他剧团排演过,并在《戏剧》周刊上连载。他还创作了揭露封建婚姻制度恶果的独幕话剧《常经》。

1926年7月,五五剧社在艺专礼堂首次公演丁西林创作的《压迫》和余上沅创作的《兵变》等短剧,张寒暉扮演女仆等角色。他既要考虑舞台布置,演出宣传;又要防备小心眼人的攻击破坏。后又赴天津演出时,还排演过莫里哀的《悭吝人》及《赵阎王》、《可悲的裴伽》、《父归》等独幕剧。张寒暉以扮演老太婆神形兼备载誉京津剧坛。

洪深根据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琼斯皇帝》改译成独幕剧《赵阎王》,五五剧社排演后,张寒暉撰写了《春夜的钟声》一文,公开发表,鼓舞搞好演出,促进话剧发展,号召勇敢地去撞我们先辈没有撞过的钟。他写道:“我们敢说,因为我们的爱戴真戏剧的赤心,誓死做她的忠臣,所以要按自己的能力去表现,甘愿把戏剧的重任自己负担。定要从第一声的‘赵阎王’起,我们飞抡着铁锤努力,重重地向着金钟撞击,逐去春夜的黑暗,人间的哑谜,顶到夜过的明天,人类得到安慰。赵阎王,昨夜的嫩芽,明日的红花。春夜的钟声!!赵阎王!”他还撰写了《化装略说》等文章。

1927年3月,张寒暉撰写长篇戏剧论文《铁锤》,论述什么是戏剧?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戏剧艺术?他主张:“艺术的见解,既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也不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是像上边所举的经过两重世界而建筑在人性上的表现。”

正当筹备北京艺术大会之际,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北京,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员被杀害。张寒暉化装成一个老头,连夜机智离开北京,回家乡隐蔽。

五五剧社的成员左明、张式沅到了上海。由于张寒晖亲手起草的《青年俱乐部计划》落入军警之手，他将蓝璞改名寒晖，返回家乡后，张寒晖以帮家务农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当晋军易帜为国民军，占据定县时，他和朋友陈质斋在县城内“考棚”（明清两代科举取士的场所，又称定州贡院）的破楼谈议 CP，后来陈质斋由张寒晖介绍入党。张寒晖用苇笈蘸墨水，创作小说《蓝布衫》（未发表）。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北京改称北平后，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改名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并恢复戏剧系。张寒晖赴北平，考入北大艺术学院戏剧系继续深造。他的同学有陕西人刘尚达、王瑞霖及张季纯、李书芬兄妹等。他们住在北大艺术学院对面的西京畿道23号。张寒晖与刘尚达同住西厢房。张寒晖因家贫，靠为《大公报》、《世界日报》写文章得点稿费接济，有时还兼任家庭教师，勉强维持学业。

在北大艺术学院，张寒晖从师于熊佛西、陈浩策、赵元任教授，还选修戏剧专家徐凌霄、瞿菊农的“皮簧昆剧研究”课，学唱《铁冠图》、《长生殿》等京剧选段。他扮演过京剧《朱砂痣》的老生、三幕剧《一片爱国心》中的日本姑娘秋子、独幕剧《醉了》（又名《王三》）中的张七、《哑妻》中的杜乐如和《怪各人》中的白母等角色。

1929年7月，张寒晖作为北大艺术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撰写了毕业论文《表演的技术》，论述表演在戏剧艺术中的重要地位，表演者的责任，表演与形体、动作、声音训练的关系及训练方法。他写道：“作为一个演剧家，必须能够按着剧本给予的冲动，唤起自己心里的诗人的丰富热烈的情感，用音乐家幽妙婉转的声音变化，跳舞家节奏的疾徐，雕刻上的宠辱恐惊的各种生动的姿态，以创造出充满了诗意与哲理的结晶，使观众发生同样深刻庄严的情感激荡。”

1929年9月,张寒晖等戏剧系六位毕业生,由熊佛西率领“游行公演团”,到天津演出了《一片爱国心》、《醉了》、《压迫》等话剧,获得文艺界和老百姓的好评。9月7日,张寒晖撰写的《真情的流露——我们今后的工作》在天津《大公报》戏剧系公演专刊上发表。这是他在天津演出后的感慨,论述了如何开展戏剧运动。他指出:“戏剧确是一种与人生最亲切而最完美的艺术,值得人们的爱恋。……我们相信研究戏剧,非‘到社会里去’,‘到剧场里去’不可,更相信‘书本上的研究’是有力的,然而到‘舞台上’去实践更是要彻底。”他总结五点经验教训:(1)继续书本上的研究工作;(2)到社会里体验人生;(3)继续文字上宣传的工作;(4)到舞台上实验所得;(5)愿“同志”来“共同努力”。他提出要求,为戏剧运动要从实地做八件事:(1)来津公演;(2)训练演员;(3)成立剧团;(4)扩大宣传;(5)加紧公演;(6)建设舞台;(7)游行全国;(8)正式创建我们理想中的小剧院。最后他写道:“渺小的我们愿以赤诚用剧中人的泪来慰藉人生;我们所愿得的报酬,就是痛快地流尽我们自己身上的汗。”

张寒晖毕业后,因学业优秀,富有话剧表演和创作才能,留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任语音课助教,从事戏剧研究。他创作了三幕话剧《黄绸衫》剧本,揭露了封建家庭虐待妇女的罪恶。

张寒晖借鉴法国安图昂创办巴黎自由剧院的经验,协助熊佛西、章泯等人发起成立北平小剧社,以“普及小剧院运动,促成现代剧艺术发展”。赵元任担任北平小剧院董事会主席,张寒晖任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张寒晖为小剧院剧团导演第一个剧目——熊佛西创作的《诗人的悲剧》,谱写插曲《诗人与爱情》;还为剧团翻译爱尔兰著名作家辛格的《骑马下海的人》;参加莫里哀的讽刺喜剧《伪君子》的演出。

经过大学教育，特别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观，通过实习与剧社演出，张寒晖开始强调艺术的人民性，反对院方的“艺术至上”的观点。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启发下，他对话剧的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革命化有了新的见解，形成一套想法。为了更好地普及话剧运动，他更加明确提出话剧地方化，主张开创方言话剧。由于艺术主张发生冲突，学校决定不再延聘张寒晖，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家乡。

致力民众教育与西安话剧运动

1930年夏季，张寒晖离开北平回到定县。这时，定县的“社会教育办事处”刚改为“民众教育馆”，馆长徐九皋，他是张寒晖的老朋友，他被邀请到民众教育馆帮助工作，住进了民教馆。民教馆人员经常到乡间去举办农民夜校，宣传卫生知识，接种牛痘等。张寒晖利用这一机会，频繁出入于贫苦农民的家庭。每逢集市，借周围数十里村庄的农民进城赶集之际，张寒晖常在民教馆的讲堂上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科学卫生知识。整理民间艺术也属民教馆的工作之一，徐九皋知道张寒晖是位戏剧专家，又熟悉定县秧歌，就从自己村里请来一位秧歌艺人，让张寒晖记录并修改民间秧歌。张寒晖根据艺人的演唱，记下了《老少换妻》等几出秧歌戏文，并进行了整理加工。到晚上，他还在民教馆导演话剧《王三》。由于他的出色工作，深得民教馆人员的尊敬和爱戴。这期间他赴北平，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并任定县“左联”负责人。

不久，张寒晖结识了定县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省三。张省三也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京加入共产党的，这时也暂时隐蔽在定县。

他们两人经徐九皋介绍在民教馆认识以后，往来不断，当彼此了解政治身份后，张寒晖认为在定县应占领一个阵地作为立足点，把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们经过商定，抓住定县职业中学急需换校长之机，通过斗争与四处活动，张省三被教育局任命为职业学校校长，张寒晖担任职业学校的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师。他们重建职业学校。张寒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教学生唱歌，编演秧歌剧，还经常利用课堂这个阵地，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为了启发和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张寒晖把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起来，秘密成立了课余读书会。他们经常去保定买回来一些进步书籍、报刊分给学生私下传阅。他们还组织学生写学习笔记，组织讨论会，交流读书心得。1931年5月间，张寒晖秘密召集读书会的同学们在定县雪浪斋开讨论会，谈《苏俄视察记》的读后感，他借此机会向同学们介绍苏俄社会的情况，介绍列宁、斯大林的革命主张。张寒晖的读书会不仅推广、扩大到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和九中，而且对启发青年学生的革命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使他们开始接触到革命道理。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立即唱起抗日救亡歌曲，张寒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他根据旧军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调，填词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歌曲《可恨小日本》。几天后，张寒晖根据《满江红》曲调，又填词创作一首抗战歌曲《告我青年》。

在上街游行示威时，同学们唱着这两首爱国歌，行进在定县的大街上。在县政府的大门前，随着这两首歌的节拍，学生们使劲地跺脚，恨不能跺出一次毁灭性的地震，震坍不抵抗政府。很快，这两首歌传到定县的其他学校和农村。

1932年，张省三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张寒晖也恢复与党组织联系。职校成为党内秘密活动中心。由于张寒晖进步面目暴露，一

些反动分子暗地告状,说他“赤化青年,危害地方”,又说:“职业学校是共产党的老窝,”政治迫害再次降临。

1931年2月,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委任刘尚达为陕西省教育厅第四科(社会教育)科长。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寿亭(字百龄)委任刘尚达兼任陕西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刘尚达当即写信又发电报,急邀张寒晖来陕工作。张寒晖应邀并同在河北民教所的学生都啸峰到了西安,就任民教馆总务部主任,民教馆位于马坊门,两位学友重新合作,在北大街设立了群众阅览处及体育场;在钟楼设立演讲厅,组织群众体育爱好者进行篮球、网球比赛;召集爱好拳术的老年人定期举行表演;开办社会失学青年补习学校;联络音乐爱好者举办音乐研究会,在馆内学习、研究、排演话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爱国主义。1932年7月2日,张寒晖和民教馆同仁乘汽车进行了防疫宣传,同年8月24日,他们乘汽车进行了科学教育宣传。这一系列群众欢迎的社会文化活动及爱国举措,却遭到了别有用心者的攻击,大肆指责刘尚达在馆内重用亲信,对张寒晖、刘尚达进行极尽污蔑辱骂之能事。但张、刘毫不示弱,由张寒晖执笔,并带领馆里同仁拟成民教馆七大教育目标和七大事事业活动。这套完整的民教工作计划被选登在当时出版的《教育年鉴》上。张寒晖讲课就用此作教材。

他们在民教馆内创办西安早期话剧团体“民众剧社”,两人同为导演,又同为剧务,张寒晖是剧作者又是演员。他创作了陕西方言话剧《不识字的母亲》,并扮演剧中母亲。民众剧社第一次公演前夕,反动分子恼羞成怒,竟不惜工本铅印黑传单四处散发,对张寒晖、刘尚达进行人身攻击,并扬言要砸了他们演出的摊子。顿时,演职员工情绪不稳,张寒晖历来是作思想工作的高手,他用那幽默的语言、沉稳的神态,安定了大家不宁情绪。刘尚达四处游

说，并到教育厅厅长李寿亭处呼吁。当时杨虎城将军正好也在座，听刘尚达述说后，他斩钉截铁地说：“演吧，没问题。”得到了杨将军及李厅长的有力支持，全体演职员工欢欣雀跃，集中排练，迎接公演。演出那天，杨虎城将军早早就派出人员前往剧场“坐镇”，那些预谋捣乱的家伙们一看阵势不对，就溜掉了。那次演出，台上表演精彩，台下观众热情，更重要的是“坐镇”有力，剧场气氛热烈而有序，“民众剧社”在古城西安第一次公演话剧大告成功，成功的消息在古城不胫而走。

1933年夏，蒋介石免去杨虎城将军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并派人取代李寿亭教育厅厅长职务。刘尚达也被免去第四科科长和民众教育馆馆长职务，张寒晖被迫离开了民教馆。

张寒晖住进莲花池街朋友家中，打算教书。秋季，他旧病复发，朋友们凑钱作路费，让他坐火车回到定县。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张寒晖无法找到党组织，在家中养病隐蔽。他团结地方戏剧爱好者，发起成立定县戏剧研究社。在《醒民日报》上，他以笔名“青山野次朗”发表《宁要改良》文章，主张对旧剧改良。

1934年春节，他看到小朋友穿新衣过年，顺口编了一首儿歌：“过年了，哈哈笑。穿新衣，戴新帽。妈呀，你抱抱。”

恰逢此时，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在定县搞重点平民教育试验，张寒晖待病体稍好后即参加了平教会平民文学部的工作。他利用平教会提倡深入民间的机会，并以接近民众为掩护，开展一些地下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平教会，张寒晖参与了平民文学部的《平民识字课本》的编辑工作，编写过多种农民通俗读物，被当地人誉称为“平民状元”。在此期间，定县爆发了大规模的扫盐土、熬小盐、打盐巡、逐盐商的扫盐斗争，还曾组织起2万余农民的请愿队，到县政府示威请愿，迫使国民党县长撤消

了禁盐令，恢复了农民刮盐土、食小盐的自由。张寒晖目睹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颇受感染，一鼓气创作了《盐潮》和《听候审判》等小说，以犀利的笔墨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鞭挞了剥削的残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农民的斗志。

1934年7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德仲来到定县、无极等县恢复党组织，李德仲按照省委的指示，到定县后，与张寒晖接上了关系，并一直与张寒晖住在一起。接着又根据张寒晖提供的线索与其他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从此，张寒晖在党的领导下，以平教会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担负起了党交给他的各项重要工作。平教会平民文学部《平民识字课本》编写组设在东朱谷村，东朱谷村一时就成了开展整顿、恢复定县地下党工作的中心。在这里，他们有一台油印机，张寒晖经常趁别人回家之后，深夜在油灯下刻蜡纸，刻完后又亲自油印。张寒晖白天认真做好平教会的本职工作，晚上就通宵达旦地印发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辛勤地为党工作。经过一年对定县和其他县的地下党的整顿、恢复、重建之后，1935年10月成立了以李德仲为书记的中共定（县）无（极）藁（城）中心县委，领导17个县的党组织。定县的工作，在中共定县县委未建立前，暂由张寒晖、叶德光等负责，直接受中共定无藁中心县委领导。陆续与隐蔽下来的地下党员建立关系，基本上恢复了处于瘫痪状态的党组织，中共定县地下党又开始了正常的组织活动。在这一时期，一批进步青年由张寒晖介绍加入了党的队伍，后来都为抗战和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创作抗日救亡歌曲《松花江上》

为了加强东北军的抗战工作，1936年8月，张寒晖由河北定县

来到西安,做地下工作。在时任西安省立二中(现陕西师大附中)教务主任刘尚达的推荐下,他担任西安二中初秋二八级(即1939届)级任教师(班主任),并教国文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学课本统一变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文》(傅东华主编),收录不少爱国抗日救亡的篇目。张寒晖很快熟悉教材,结合抗战救国运动的形势和党的抗战政策,向学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和抗战救国道理。

进步电影《桃李劫》、《大路》、《风云儿女》等上映后,张寒晖利用自己对戏剧、音乐方面的特长,为西安二中的学生教唱这些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声在西安二中校园传唱,激发着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在西安二中,张寒晖常常对同事和班上学生解囊相助。多次到新城北门外的东北难民区(今西五路)学生家里访问,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和东北百姓苦难经历及思乡感情。他的这些工作,为后来创作传世歌曲《松花江上》打下了基础。

西安二中有着一流文艺传统,学校剧团的演出在西安小有名气。早在张寒晖来校工作前,教务主任刘尚达就组织了学生课余剧团,并兼任团长。课余剧团排练过不少进步话剧。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曾多次在社会公演,并为北平学生募捐2000多银元。

1936年秋季开学后,在教学之余,张寒晖利用自己的戏剧专长,担任导演,组织二中课余剧团排演三幕爱国童话剧《鸟国》。他强调,要让观众看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与鸟国命运差不多了,要用自己的演出和激情去唤醒民众的爱国心。

12月6日《西京日报》刊登《看二中〈鸟国〉预演》文章,文中说:“在这‘寇深矣’的时候,我身虽在剧场,实在就如在战场一般。”

在排练《鸟国》的同时,张寒晖、刘尚达等人发起成立了西安实

验剧团,刘为团长,张为导演,排演曹禺的话剧《雷雨》。

《鸟国》的排演成功,尤其是《恨恨恨》10首插曲的创作成功,使张寒暄的歌曲创作插上了翅膀,他找到了更有效的文艺武器,鞭策自己贴近抗日救亡运动,反映人民的爱国愿望,更激励他的创作灵感,促使他投入抗日救亡歌曲创作中。

一天,张寒暄曾对同事赵文杰说,他要写一首表现东北同胞流亡的歌曲。这是由于当张寒暄在北平、在定县看到东北同胞的苦难,尤其是从定县来西安途中,在车厢里,他看到比比皆是的东北逃难同胞。在西安东北人难民区,听到他们诉说的一幕幕惨剧,从而产生了创作念头。每天夜晚,张寒暄批改完学生作业,当人们已进入梦乡时,他用手敲着桌子,打着音节,一字一字,一遍一遍地在创作他的新歌——《松花江上》。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历了多少次修改润色,《松花江上》诞生了。

1936年11月末的一天。张寒暄得知有位学生骂东北学生是“亡国奴”。他上课时痛心地说:“东三省是祖国的大地,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耻辱……”他接着说:“我编了首新歌,给大家唱一唱。”张寒暄第一次如泣如诉地公开演唱《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张寒晖完全沉浸在诗与情、凄凉与悲愤的旋律之中。泪花伴着歌声，全班同学沉浸在无比悲哀和奋起之中，恨不得拿起枪杆，上前线 and 日寇拼命。

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其历史的形成与官兵的成员都具有浓厚的东北地方色彩。九一八事变后，亡省亡家的悲惨命运加重了这种特点。东北军主力集中西北，他们的家属也跟随来到西安，流离颠沛，生活艰难，又被迫参加内战，世世代代生活在美丽富饶土地上的东北同胞，自然非常怀念家乡故土。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反映了这种气氛，表达了这种情绪，首先在东北军中传唱。

1936年冬，张学良将军的卫队二营学兵队驻扎在西安东城门楼，其成员大都是参加过“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学生和地下党员、团员。教唱救亡歌曲更是东北军地下党普遍开展的工作。《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学兵队中广为流传，发挥了应有的战斗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学兵队改为宣传队，分赴东北军部队，《松花江上》很快传唱到东北军各军各师。在一次东北军的军官会上，周恩来发表演讲，赞扬东北军官兵逼蒋抗日的爱国行动，强调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演讲结束后，军官们不愿离去。周恩来应邀指挥大家唱起《松花江上》。歌声引起共鸣，有的低头哭泣，有的热泪盈眶，有的紧握拳头，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忱。东北军东调后，又把这首歌传唱到江苏、安徽等省。《松花江上》成为东北军集会、行军、朋友聚会必唱的爱国歌曲。西安事变后，王林把《松花江上》歌谱寄给北平地下党负责人黄敬，黄敬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歌咏队

用歌曲卡片印发流传,从北平迅速传唱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寒晖被任命为东北军政治部宣传科游艺股股长。为了宣传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八项主张,张寒晖在东北大道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二·一二剧团,并兼任团长。王林创作了话剧《在火山口上》,张寒晖物色男女主角,参与导演、团结来自各方的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者,首次在易俗社演出成功,轰动了古城。他还率领剧团到东北军中演出,特别是到咸阳后,专程到红军贺炳炎师慰问演出,处处受到热烈欢迎。

1937年2月,张寒晖随东北军一部调往陕西邠州(今彬县)。北风呼啸,漫天飞雪,还有那扶老携幼的家属队伍,痛苦地一步一挪。在那黄土高原上展现了一幅活生生的民族灾难凄凉画卷。他目睹了民族的义举——西安事变,耳闻爱国将领张学良被囚禁的冤屈,一面走路,一面哼唱,到了邠州,一气呵成,谱成了《士兵怀念司令歌》:

拿起枪来想起司令他,人性正直眼光远大,我们怎能忘记他哩!他对我们不说空话。

端起碗来想起司令他,抗日反奸解放中华,我们怎能忘记他哩!为了祖国犯了什么法。

躺在床上想起司令他,牺牲自己挽救国家,我们怎能忘记他哩!他令我们打回老家。

司令你回来吧!司令你回来吧!我们需要你领导,解放民族打回老家。

这首歌表达了东北将士们为张学良被无理扣押,惨遭囚禁鸣不平!这首歌控诉蒋介石背信弃义,违背诺言。这首歌激发了东北军官兵发扬西安事变精神,誓死收复东北三省的决心。

1937年三四月间,东北军被东调到苏皖地区。张寒晖率一二·

一二剧团，跟着总部差遣队开到安徽怀远县。5月，差遣队被遣散，张寒晖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使一二·一二剧团留在东北军内活动。

不久，张寒晖率剧团转移到江苏淮阴县城。在县城北门外淮河北岸的一个小店里，张寒晖想起几个月时局的突变，目睹亲日派的猖狂，感受军人们的悲观失望，心想应该写一首鼓劲的歌曲。他一手打着节拍，一手拿笔很快编写出一支新歌《前进曲》：

快向前走，不要往后溜！攥紧你的拳头，对准汉奸走狗，一个不要留！他们都是野兽，花言巧语迷魂酒，不要听他们瞎胡诌。解放要奋斗，挺起咱的胸膛来！眼睛都向前瞅！不达目标誓不休，黑暗有尽头！管他机关枪，杀人刽子手，不牺牲怎能得到自由？管他机关枪，杀人刽子手，我们要流血，才能够换来自由！

6月，一二·一二剧团被迫遣散。张寒晖先到上海，看望他的同学左明、张季纯等。

导演抗战戏剧 创办《老百姓》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张寒晖返回西安二中，继续任国文教员。此时二中校长由教育家、中共党员江隆基担任。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生工委书记董学源以西安二中训育员身份住在校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部也设在二中，总负责人是二中学生朱平。张寒晖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

张寒晖以极大热情投入抗战宣传。作曲，排戏，一个暑假也未休息。9月21日，《春风秋雨》（阿英编剧）由张寒晖导演，成功演出。他还为主题歌《抗日军进行曲》作曲。9月29日，西安戏剧界

召开“双十节”公演大会，实验剧团、学生剧团、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等参加，张寒晖与左明、周伯勋为执行导演。10月，“保卫卢沟桥”专场演出也成功进行。

1937年冬，在江隆基的支持下，张寒晖以斧头剧团的名义，组织二中近20名学生，又请来西安女中和西安女师各一位女生（当时二中只有男生）参与排演。主要节目有《流亡曲》、《在酒楼上》、《松花江上》等，斧头剧团的演员多是十四五岁，这些小演员大多没有离开过城市。12月，斧头剧团由张寒晖带领到达陕南汉中、城固、西乡等地的街头、村镇演出。张寒晖安排衣食住行，顺利完成党组织安排的农村演出任务。在汉中地区，斧头剧团还与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联合演出，扩大宣传，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张寒晖在陕南巡回演出过程中，创作了《去当兵》、《夯歌》等歌曲，鼓舞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家乡。

1938年春，张寒晖和梅君组织学生宣传团，奔赴大荔、朝邑（今属大荔）等河防前线巡回宣传演出，又创作了《干吗要悲伤》（即《回答松花江上》），以坚强不屈的斗志、高亢雄壮的曲调、雄壮有力的歌词鼓舞人民：“同胞们！咱们干吗要悲伤？同胞们！咱们干吗要颓丧？看吧！咱有四万万颗顽强的颅，咱有八万万只有力的臂膀，咱有亿万万把镰刀和锄头，咱有无数量的刀枪！”“快擦去眼眶的热泪，要作一个杀敌猛将。”这年夏天，张寒晖创作歌曲《游击乐》，当年就传唱于华北各抗日武装：“肩上挎着枪，手榴弹挂胸膛，挺个胸脯儿，前进，前进！……”

张寒晖在西安二中期间共创抗战歌曲20多首，张寒晖的歌曲激励着中华儿女的抗战斗志，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力量。

1937年10月，张寒晖和李敷仁等在西安二中召开筹备会议，决定创办一种通俗报纸。寒晖主张：“咱们专为老百姓办报！”用老

百姓自己的话,说老百姓自己的事。把抗战的故事,政府的法令,简单具体地告诉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痛苦也写出来,叫政府经常地“洞悉民隐”。大家每人每月捐款5元。报纸定名为《老百姓》报。

1937年11月12日,《老百姓》报创刊,编辑李敷仁,发行人田克恭,出纳人武伯伦,文书和交际张寒晖,校对余达夫。张寒晖为报纸先后创作诗词《中秋谣》、《找娘亲》,撰写快板《金娘缝军装》,长篇鼓词《冷头青抗战》、《遗臭万年歌》等。他的专著《歌谣概观》以“老百姓丛书”名义出版。1940年1月出版的《老百姓报社论集》一书,发表张寒晖写的序,他在总结《老百姓》报的内容、形式、特点时写道:“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老百姓的苦愁,并且把天下大势,国内军政也说给老百姓听,这是我们的内容。报纸杂志化,杂志报纸化,歌谣、谚语、鼓词儿、梆子腔、新诗、老文章都有,这就是我们的形式。”《老百姓》报的特点以讲老实话取胜,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但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眼中钉,1940年4月被扼杀停刊。《老百姓》报共出版113期,行销13个省区,国外也有订户,成为当时有影响的爱国进步报纸。

1938年6月,西安二中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反对省教育厅解除江隆基校长职务,解聘张寒晖、刘尚达等一批进步教师,开除进步学生100多人。

7月23日,西北教育界抗日救亡大同盟在西安召开代表大会,张寒晖当选为第二届执行委员。

这年夏天,张寒晖为中条山抗日游击武装创作《游击乐》歌曲,表达抗日将士的爱国乐观精神和游击战士乐天的性格。他创作儿童歌曲《小刘栓》,赞颂13岁的中条山小英雄刘栓英勇杀敌的事迹。创作《游击战》歌曲,宣传毛泽东的游击战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1938年8月,张寒晖接受车向忱的聘请,到东北竞存中学任教。东北竞存小学是为了解决流浪在西安街头的东北失学儿童,由东北著名教育家车向忱1935年秋在西安创办,1936年4月正式开学,得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秘密资助。1937年秋,又创办竞存中学,校名意为在竞争中生存。在九一八纪念日时,张寒晖指挥学生们唱《松花江上》和《干吗要悲伤》,激发抗战斗志。张寒晖指导竞存歌咏队排练一批抗日救亡歌曲,在“保卫祖国”、“保卫大西北”的口号声中,带领竞存中学宣传队,走上西安街头,以活报剧、歌曲、舞蹈、漫画、讲演等多种形式,控诉日寇侵略暴行,发动群众做好抗日支前工作。

同年10月,在西安通济坊金城旅馆,张寒晖拜会音乐家冼星海夫妇,交流抗战歌曲创作经验,探讨中国民歌创作道路。冼星海到延安后,在长篇论文《民歌研究》中,称赞《松花江上》和《夯歌》都是在抗战中最进步的歌曲,都是研究民歌的结果。

武汉失守后,张寒晖利用陇东民歌《拉骆驼》,改编曲调,填词创作《长期抗战》歌曲,宣传持久战。日本飞机不断轰炸西安,学生们被迫到南门外树林里上课,后带着干粮(午饭)到南郊张家村上课。张寒晖多次经过草场坡,看到拉车的农夫爬坡的艰难,创作了歌曲《奔波》,后修改并改歌名为《爬坡》。同时还创作《努力,咱们战斗下去吧!》等歌曲。

在竞存中学培育抗日青年

1938年11月,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竞存学校迁到凤翔县纸坊街。竞存中学设在城隍庙,竞存小学设在火神庙。张寒晖先住在庙内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耳房里,东墙跟放着一架旧风琴,神

台上摆放着书籍。

学校调整房子时,他又搬到老百姓家中住宿,他的小屋里,总是挤满了学生。他教唱抗战歌曲,秘密教唱《延安颂》,给同学们讲哲学,讲故事,教育学生,追求进步,被称为“北上精神”老师。

张寒晖生活简朴,吃饭简单,经常买个烧饼算一顿饭。用节省的钱资助贫苦学生,替他们交伙食费,购买学习用具。他根据党的特别支部的决定,积极协助车向忱校长以抗大和安吴青训班为榜样,制定:“创造、团结、耐苦、奋斗”的校训,创作《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校歌。

张寒晖和同学们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打地基,拉石头,运木料,搬砖瓦,他创作《夯歌》、《拉石头》歌曲,教唱后,边劳动边唱这两首劳动号子,鼓舞士气,活跃劳动生活。经过一个多月辛勤劳动,在老乡的帮助下,建成15间厦房,车校长命名“众志斋”。

1939年春节上午,张寒晖和竞存中学校长车向忱一道,带领竞存中学宣传队给纸坊街群众拜年、唱歌、演戏。张寒晖把看热闹的儿童组织起来,亲自教新创作的《骂汪精卫》、《三劝》两首抗日儿歌。《骂汪精卫》的歌词是:汪精卫,卖国贼,甘心投降日本鬼,胡说八道卖油嘴,暗地拉着抗日的腿,这东西,不要他,扔到海里喂王八,扔到海里喂王八。后来这首儿歌在纸坊街和附近的农村儿童中流传开来。

他结合纸坊街造纸的特点,利用造纸家庭经常唱的西府小调《莲花落》,给纸坊街群众编写了一首具有造纸生活气息和抗日爱国内容的歌曲《纸工歌》:“清早起来把麻剝哟,莲花儿落哟,一剝剝到那大晌午。……解放民族,我整山河。”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一遍又一遍吟唱,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1939年9月18日,竞存学校举行了隆重的九一八事变八周年

纪念大会，演出了文艺节目，还为竞存小学创作了校歌。第二天，张寒晖率领竞存中学宣传队到凤翔城内药王洞露天剧场演出了傅勤华老师创作的《正路》、《代用品》等话剧。张寒晖导演这些话剧，从物色演员到排练演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话剧《代用品》深刻尖锐地揭露了日寇侵华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国内的一切东西都被军队征走了，物资匮乏，什么都是代用品，使人们看到了日寇的穷途末路，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正路》是表现一群绿林好汉参加抗日队伍的曲折过程。这些戏剧在校内外演出，使凤翔城乡的许多观众流下了热泪，提高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思想觉悟。当傅勤华老师不幸去世后，他创作了《悼勤华》挽歌，颂扬傅老师的优良品德和才华。他还组织学生排演了自己创作的大型歌舞剧《原始人》，自己动手做道具和服装，演出后轰动校内外。国民党的特务一再追问拍戏的动机。

张寒晖带领竞存宣传队，除到附近农村进行宣传外，东到横水、周公庙、岐山县城，西到陈村、柳林镇进行宣传。距县城 20 多里的太尉村、申都村都是他们常去的地方。

竞存学校所唱的歌曲，多半是张寒晖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而创作的。在凤翔的三年时间里，他创作了《努力，咱们战斗下去吧》、《团结起来》、《合作运动》、《庄家汉抗战三部曲》等近 30 多首抗战歌曲。

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早在 1939 年 1 月在竞存中学就健全了党的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特支书记钱一粟，特支下设教师、学生两个支部。10 月，又改为竞存总支，张寒晖是总支委员兼教师支部书记。他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又是教学骨干，除音乐课外，他经常顶替上其他课。他与校长车向忱关系特别密切，受总支指示，做车校长的工作。他就利用这层关系，利用学校中层领导和教学

骨干开会的机会,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意图,在研究学校工作中提出来,渗透到学校工作中去。他们先后开展学习抗大吴青训班、勤工俭学、整顿学校等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多次进行斗争。车向忱在他的自传中写道:“由于竞存中学教员张寒晖同志介绍给我一些马列理论和毛主席的一些思想言论,使我在理论上、政治上有了依据和方向,逐渐走上革命的正轨。”车向忱的自述,不仅反映了张寒晖对他的引导,也反映了中共地下党对竞存学校的支持和领导。

三年内,竞存学校先后培养了1800多名青年学生,他们有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的投笔从戎,参加杨虎城将军的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在河南前线抗战。他为毕业班的同学题词:“做人不易,唯是是宗。”他创作《送别》歌曲赠送毕业的同学们:“别了!别了!前途珍重!……高高地举起革命旗,左斩荆棘,右劈藜,跌倒在地上再跳起,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1941年7月14日下午,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把张寒晖的房东刘致锡叫去查问:“在你家住的张寒晖是不是共产党?”刘答:“我只知道他是教员,其他一概不知。”来人把刘训斥了一顿又说:“你要监视张寒晖的行动。”刘回家后及时把这个情况透露给张寒晖,张寒晖即去学校与党组织主要领导商议后,把学校和他住处的进步书刊转移密藏。当晚,张寒晖外出躲避。就在那天夜里,警察到学校和张寒晖住处搜查,由于事前得到消息,做了准备,使国民党警察扑了空,张寒晖免遭逮捕。

7月15日、7月22日,国民党县党部、县警察局,两次出动武装军警,进校搜捕共产党人,先后将共产党员滕靖东老师和进步学生时保泽等六人抓进看守所,严刑拷打,经学校多方营救,虽具保释放,但仍勒令不许离校。在不到10天时间里,一连两次进校抓人,乱捕无辜,对此,张寒晖悲愤不已,即以犀利的文笔,写了一首

《云雾里》，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歌词是：

七月里，西北天，一团云雾一团烟。云雾遮住了光华日，
腥烟染黑了人世间。走也不敢走，话也不敢谈，乖乖儿地看着
鬼跳舞，静静儿听着鬼叫唤。这样的生活谁能过得惯？咬钢
牙，怒气发，满肚子闷心滚疙瘩，眼前头飘舞起血红花！……

这首歌既是对国民党腥风血雨黑暗统治的控诉，也是对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和边区文化建设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斗争形势日益复杂残酷。竞存中学党总支遵照上级指示，除留王宪之等少数党员外，其他党员有计划地撤离学校。

8月，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派交通员冯和骏接张寒晖到边区，张寒晖带着刘音琴秘密离开竞存学校到三原。离校前，他将历年编写的歌曲本交张铁生保管，张铁生又转交给党员学生胡锦涛保存。解放后转给王汶石，由王汶石交给河北省文化局，现珍藏在河北省博物馆。到三原后，刘音琴改名刘芳，住三原东里堡老同学刘尚达家。在冯和骏的带领下，8月下旬，穿越封锁线，到达边区的照金，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分区地委机关设在这里，省委对外公开称一一五师留守处。张寒晖改名韩元，留在省委机关工作。刘芳被安排在淳耀县第一完全小学教书。经组织批准，张寒晖与刘芳结婚。

11月，省委机关迁往马栏镇，刘芳到机关搞青少年文化。张寒晖常到西北剧团教唱抗日歌曲，讲表演和导演的知识，并向他们学习秦腔、眉户和民间音乐。不久，省委安排他到经济建设委员会

工作,在黑牛窝创办纸厂,利用马莲草,试制生产“马莲纸”,缓解了边区纸张困难。

1942年4月,张寒晖调至向往已久的延安,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或文协)任秘书长兼文协组织部长,刘芳也调到文协管理图书资料。文协主任、诗人柯仲平和张寒晖第一次见面高兴地说:“我听到你这《松花江上》作者到了边区,马上请求组织调你来,都半年多啰!”柯仲平满口云南人的普通话。他的下巴上留了一撮山羊胡子,大家都尊称他“柯老!”他和张寒晖同岁。柯仲平和张寒晖都主张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交谈起来便滔滔不绝。

边区文协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的领导部门,地址在新市场的河对面,宝塔山南边的一个名叫龙儿湾的小山坳里。1941年在那里设立文协后,聚集着丁玲、欧阳予倩等一批文化名人,大家称那里为“文化山”。张寒晖夫妇搬进了总支书记旁边的窑洞里,投入到秘书长的行政事务工作中。

5月,春风拂面。张寒晖参加了在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的文艺工作者对当代文艺运动有许多争论。他听到某些人的发言非常生气,直到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才舒展了眉头,高兴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文艺方向。”

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整个边区生活都非常困难,所有的机关团体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边区文协直接领导着群众日报社、西北文艺工作团(简称西工团)、民众剧团等文化团体,身为秘书长的张寒晖既要抓生产,又要操心所属各单位的事务;既要抓文协的生活,又要关心所属单位的创作。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简称边区艺校)。柯仲平兼任校长,实际负责的副校长是张寒晖的同学张季纯。张寒晖为这个艺校筹得有限的经

费和一头三条腿的瘸驴。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张寒晖带着勤务员田崇和西工团、民众剧团、边区艺校以及文协的侯安国、王炳元等20多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冒着严寒到李家渠开荒。他们住进被农民遗弃的窑洞,窑里铺上谷草,可是窑门被拆走了,只好挂起谷草帘子挡风。静悄悄的夜里,传来“呜,呜,……”的狼嚎。年轻人惊慌地念叨着:“狼!狼!”张寒晖摆了摆手说:“我们河北有句俗话,‘麻秆打狼,两头害怕——人怕麻秆不结实,狼扑过来对付不了;狼知道自己的腿最容易断,怕人用手里的棍子打它的腿。’”他提着镢头,到洞外巡视了一番,回到窑洞后,又给这伙年轻人讲了一个英雄小八路的故事。

第二天,张寒晖把这些青年分成了两组,一组开荒地,顺便打柴,一组打井。又派刘庆云找来白灰,在崖壁上大大地画了许多白圈圈——这是当年北方农村吓唬狼的一种方法,狼看到白圈圈会误以为是人们用来猎取他们的圈套,便会夹着尾巴离去。天寒地冻,镢头挖到地上,砍不进几分,在一个地方要连续挖几镢头,才能啃下来一块冻土。打井的到井下以后,只能用短把镢头,当然不如开荒的抡长把镢头得力,井下又有塌方的危险,张寒晖总是自己率先下井,手磨烂了,咬紧牙关,忍住疼痛。

开荒的人,每天供应一斤小米,青年人正在成长发育期间,饭量本来就大,出了大力气,饭量就更大了。开饭的时候,张寒晖总是尽先让大家吃,他给青年人讲长征的同志当年吃的苦,对大家说:“咱们今年吃点苦,明年丰收就好了!”

每晚,张寒晖组织大家学文化,演算术,教识字,耐心地辅导。侯安国病倒了,张寒晖背着他,顶朔风,踏积雪,去柳树店的八路军

医院诊治。往返 20 多里路，回到李家渠，张寒暉已经筋疲力尽。

张寒暉带领青年们，学习三五九旅的经验，得到了收获：黄瓜、豆角、莴笋，还有那红色的西红柿和尖尖的辣椒。陕西人有句俗话：“一辣解三馋！”延安的各单位都在搞生产，偏偏西红柿格外丰收，灶上吃不完，拿到市场上也卖不动，张寒暉想办法做成番茄酱。这时，他的创作灵感完全发挥到生产上去了。

整风运动中，中央总学会的康生也发挥了他的“创作灵感”，在 7 月 15 日作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 1939 年以后到边区的同志都列入了特务范畴；更耸人听闻地宣布：“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我们的头在敌人刀子下滚来滚去”。这个报告掀起了大搞“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张寒暉被召回文协，停止他阅读党内文件的权利，每天和柯仲平一同去西北局接受审查。晚间，还有人悄悄到他的窑洞外，捅破窗户纸监视他的行动。康生宣布：《松花江上》“散布悲观情绪”。已有“汉奸文艺”的罪证，决不能忽视这敢于公开破坏抗战的“汉奸嫌疑”。

这时，全延安的外来干部人人自危，彼此见面连招呼一声也不敢了。张寒暉和总务科长赵四兰都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平时谈起往事，彼此钦佩对方忠诚于革命的赤胆忠心。赵四兰在日常工作中处处为革命着想，张寒暉身为他的直接领导，心里非常清楚。因此，张寒暉根本不相信康生之流给赵四兰横加的罪名。他听说赵四兰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散步走到关闭赵四兰的窑洞外，趁看守人远离时，隔着栏杆匆匆安慰赵四兰说：“我根本不相信你那些罪名。可是我也成了‘汉奸嫌疑’，没办法替你说句公道话。”

赵四兰被送到保安处正式的牢房里，审查结果是一桩大的冤案。无罪释放后，张寒暉见到赵四兰说：“咱们的心虽然红，如今都

成了黑线人物啦!”开饭时,走进小灶的窑洞,赵四兰百感交集,泪如雨下,哽噎得吃不下去,站起身走出窑外,张寒晖跟了出来,劝他说:“到我家去下碗疙瘩汤吃!”

张寒晖接受“抢救”告一段落,留在机关处理日常事务。晚上和机关的同志点着小油灯,摇着纺车纺线。他帮助刘芳制成了加速轮的纺车,每天纺的线比过去增加一倍。

1943年冬,陕甘边区文教工作模范柯仲平领着西工团去关中分区宣传拥军爱民,张寒晖仍留在机关。他在日常工作之暇,在文化山上开了一些荒地。柯仲平领着西工团回到延安时,张寒晖已在这些地里种上了土豆、南瓜和西红柿。柯仲平对他说:“寒晖啊!不要捉住了锄头,忘记了你的笔杆子哟!”其实张寒晖并没有忘记他的笔,只是不知何故,创作灵感差劲了。他曾对当时文协的领导赵伯平谈起这一情况。赵伯平的回答是:“过去你是鹤立鸡群。如今,延安人才济济,你是鹤立鹤群的缘故吧!”

西工团的苏一平,在西安时曾是西师学生剧团的团长,原名浦望文。张寒晖为这个剧团导演过《走私》、《赵家店》和《本地货》。苏一平对张寒晖很尊重,请张寒晖为西工团的同志们讲课,题目是“学习民间音乐问题”。张寒晖讲:“对待民间音乐要持正确态度。一是‘钻进去’,二是‘顶出来’。有的人整天说学习民族音乐,可是不去钻,或者钻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他对民族音乐爱得不深!你对民族音乐有了深厚的感情,自然而然就能钻进去了。钻进去之后,可不要死抱着老一套,要摸出它的规律,再顶出来,发展它。”张寒晖还比喻:“钻进了民族音乐的土壤中,如果顶不出新苗来,就会腐烂在那块土地里。”

6月的一天,张寒晖抱着一岁零三个月的儿子小玉林转到了西工团,走进王汶石、戴临风和几位青年同志聚集的一孔窑洞。恰

是这些青年接受了一项任务：要为苏联红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协约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打击德、意、日法西斯的轴心国，召开庆祝大会写一首歌。大家正在冥思苦想不知如何着手，张寒晖启发他们展开想像的翅膀，打开了他们的想像之门。在延安市场后沟的庆祝大会上，他们唱出了自己编写的《反法西斯战歌》。

1944年7月，边区文教会议筹委会组织文教工作组下乡调查边区的文教工作情况，张寒晖随蒋南翔率领的小组前往陇东分区。这个小组一共9个人，张寒晖的年龄最大，42岁。西工团的沈双（韦韬）是作家茅盾之子，年纪最小，还不到20岁。旅途中，张寒晖对蒋南翔谈到：陇东是曲子之乡，因而陕西的行家有“曲不向西行”之说，表示陕西唱曲子的不去陇东“班门弄斧”的意思。张寒晖叮咛沈双：“在陇东搜集些曲子，带回西工团去。”他们进入陇东，白天行路踏着贫瘠的土地，夜晚宿在人畜同住的农民家中。陇东专员公署马锡五专员建议文教工作组去华池县。

他们到华池县便分头去农村。张寒晖、沈双和三位当地干部负责城壕村附近的几个村工作。沈双固定在城壕村，张寒晖到几个村奔走调查。他们和农民们一同下地劳动时，做细致的工作，几个村都办起扫盲夜校。在城壕村的两个月中，张寒晖找来几位民间艺人，请他们唱曲子，沈双记谱。沈双发现：同一支曲子，几名艺人各自的演唱有差别。张寒晖说：“他们每个都在原有唱腔的基础上进行着创新。”

他们听了几位艺人演唱同一首叙事长诗，其中有一段《磨炒面》，唱的是：生活艰难，丈夫要出远门去谋生；恩爱夫妻即将分别，不知何时才能重相聚首。

艺人们演唱这一段小媳妇为丈夫上路磨炒面时的心情时格外扣人心弦。张寒晖反复比较几种唱法，反复吟唱着这段《磨炒面》。

文教工作组在华池县进行两个月的调查工作，回到延安汇报工作。张寒晖建议柯仲平去城壕村搜集素材写个剧本，让西工团去搜集曲子之乡的民间音乐。柯仲平受到张寒晖的感染，带着西工团去了华池县，一面宣传演出，一面搜集素材，回到延安后写成大型歌剧《城壕村》。西工团的同志们为此剧谱写了陇东风格的音乐，演出令人耳目一新。

11月，张寒晖被文协选为边区文教工作模范，参加边区文教大会。他在大会上见到已经调往绥德的杨公愚，听他谈了绥德成立西北文艺工作第二团（简称“西工二团”）的概况。

1945年春，张寒晖总算从诸多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他下乡前往关中地区的八一剧团指导工作。八一剧团是1943年由七月剧团与关中警卫团宣传队合并而成的。演员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年轻战士，思想上单纯，有的想去打仗；有的由于社会上的习惯势力看不起“戏子”，担心娶不上媳妇。张寒晖找到剧团后，便帮助团里做这些演员的思想工作，和他们谈心。团里照顾他，为他腾出一匹马，青年演员王群定把马牵到他身旁请他骑，张寒晖微笑着对王群定说：“走路能锻炼身体，我要活80岁哩！”他始终和大家一样跋山涉水，不肯骑马。

演员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请来的老艺人做教练只知生搬硬套。张寒晖在行军休息时给他们分析剧本，讲如何创造角色。巡回演出结束，回到丰子梁，仍旧常在窑洞里给小演员表演技巧。

张寒晖在八一剧团，和刘采石、王依群同住一个窑洞。刘采石是毕业于鲁艺的青年音乐工作者，在八一剧团任教育干事。王依群和张寒晖都是1941年穿过封锁线到达边区的。这位渭南青年爱拉板胡，能唱秦腔，来到边区分配在七月剧团，后又并入八一剧团，在乐队工作了四年，钻研秦腔音乐，也喜欢搜集眉户曲调和民

歌。张寒晖以切身体会，启发他们搞音乐创作。在张寒晖的鼓舞下，王依群为新编秦腔戏《出路》，大胆地谱写秦腔风格的合唱曲，迈出了改革秦腔音乐的步子。

淳耀县普选试点工作中出现了一桩工作组未料到的事情：乡亲们公推一位正直的青年当村长，那青年反倒发了脾气，认为大家日弄他得罪人，硬是不干。群众心明眼亮，看准了这青年公正的品德，坚持选他，发生了纠葛……张寒晖为配合普选，以此为素材，编导秧歌剧《选举》，又名《从心眼里看人》。音乐除采用陇东民歌外，主要用的是眉户调，由西北文工团排演，在延安街头演出很受群众欢迎。《自己的乡长自己派》、《想起过去叫人心酸》等歌词都是张寒晖创作的。他的《没有共产党那有今天》，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开会到天明我不心烦，没有共产党那有今天，有吃又有喝
不受人糟践，人在世讲良心，饮水思源，饮水思源。

今天的会上嚷破了天，个个心里都喜欢，我说赵五好，你要选张三，还向那军政机关批评一番，批评一番。

……

秧歌剧《从心眼里看人》，是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的缩影，边区先后三次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地进行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这个剧具体生动反映边区基层选举的情景。

张寒晖每到一地都深入了解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八一剧团所在的淳耀县马栏镇，地处边区边缘，地委机关和部队时刻警惕敌人进犯，同时也遵循着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开荒生产。农村中组织起变工队，比起张寒晖初进边区时别是一番景象。下乡巡回，张寒晖把那首在陇东学会的《磨炒面》改变了节奏速度，填进了新词，1945年上半年创作了流传至今的《军民大生

产》。

7月21日，国民党五十九师、骑兵二师向淳耀县的爷台山八路军驻军发起进攻，又向旬邑、耀县等地袭击。8月10日，八路军彻底击退胡宗南部队，收复爷台山全部失地。歼灭敌人五个连，俘虏1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19挺。张寒暉随八一剧团同往爷台山进行慰问，演出他写的秧歌剧《拥军》，《军民大生产》一歌也首次和观众见了面，受到热烈的欢迎。

文协成立了一个大众文化工作委员会，张寒暉为主任。经张寒暉和柯仲平研究，组织盲艺人说书训练班，由林杉任组长，著名盲艺人韩启祥任副组长。训练班的宗旨是：破除旧艺人的迷信思想，鼓励他们多说新书，改编旧书。

1945年秋，开办为期一周的第一期训练班。在训练班结束前，让大家研究筹备一个陕北说书艺人的群众组织，张寒暉参加讨论，大家为这个组织的名称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张寒暉说：“就叫‘说书改进会’好了。‘改’是改编旧书；‘进’是要团结进步。”他鼓励艺人们在训练班结束后，为边区人民多说书，说好书，改编旧书。并讲了一些刮风下雨等自然科学道理，破除传说中的风神、龙王主管风雨等迷信思想。张寒暉还当场为说书改进会编了八句书帽：

一声三弦人声静，二声三弦人满堂，
三声三弦不枉响，好像百鸟朝凤凰。
中国有了共产党，红日当天照万方，
领导人民大生产，春耕秋收冬满仓。

艺人们当场学会这八句书帽。在陕北说书改进会的带动下，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等县都陆续办起说书训练班。林杉帮助韩启祥编写了《刘巧儿》等新说书，艺人们在文化干部帮助下改编了《牧羊曲》等旧说书。同时，是否会唱张寒暉所编的八句书帽，很自

然地成为艺人进步与否的标志。

延安成立说书改进会后，张寒晖创作了秧歌剧《太平车》、《打开脑筋》等。他把《军民大生产》用进《打开脑筋》之中，并增添了几段歌词。西工团搞音乐的同志们在剧本里看到了这首歌如获至宝，立即把这歌抽出排练，演出。从此，《军民大生产》传遍了陕甘宁边区，随着全国解放又传遍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鼓舞着人民在振兴中华的大道上奋进！

张寒晖由于长期患有结核病，又始终奋不顾身地致力于革命工作，于1946年春并发了肺水肿。同志们劝他住院，他还拖着病体坚持工作说：“不要紧，过几天就好了。”直到实在无力支持，才被送往延安和平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1946年3月11日11时，这位坚贞不渝，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离开了人间！年仅44周岁。

延水哭泣呜咽！宝塔肃穆致哀！

党和人民为了纪念他，在文化山上他的墓前，竖立了一块镌刻“人民艺术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寒晖在河北定县老家的儿子张林格，从《晋察冀日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噩耗，背着母亲蒙头大睡了几天。痛定思痛，悲痛又激起他对敌人的仇恨怒火。他猛地掀掉了被子，跳下炕来，冲出家门，参加军队，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张寒晖诞生地——西建阳村的苹果园旁，汉白玉的烈士纪念碑上，闪耀着张寒晖、张林格两代烈士的光辉名字！

2002年4月，在张寒晖诞辰100周年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艺术家张寒晖》一书，河北省定州市在张寒晖文化广场，举行了张寒晖铜像落成典礼，以纪念人民艺术家张寒晖。

（宋新勇 刘天虹 郭振修 韦成枢 巨明堂）

本文参考资料：

- 1.《人民艺术家张寒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 2.刘冀：《人民艺术家张寒暉传》，发表在《人民艺术家张寒暉》一书。
- 3.梁茂春：《张寒暉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 月第 1 版。
- 4.张寒暉：《履历表格》，保存在陕西省档案馆。

李 妙 斋

(1903—1933)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化名王之宪、王桥山、李华锋等。山西汾西人。高小毕业后曾在家乡任教,后因遭受当地恶势力排挤回乡务农。1927年离家出走,到陕北驻军高双成部当兵,历任连事务长、营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高部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随军开赴河南。后任邓宝珊部警卫营长、卫士班长。1932年随邓宝珊到甘肃,任邓部干部补习队

队长。同年10月,与李艮等人组织领导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队长。兵变失败后进入陕甘边区,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后在耀县照金一带组织游击队,参与领导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3月,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任总指挥。同年9月,国民党地方武装进攻照金根据地。20日,在保卫薛家寨战斗中牺牲。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曾用名王之宪、王桥山,化名李华锋、李妙斋,山西省汾西县城关镇店头村人。1927年离开山西老家到陕北,在驻军高双成部当兵。曾任连司务长、营长等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03年5月16日(农历四月二十日),李妙斋出生在山西省汾西县店头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王连玉是一位老诚憨厚的农民,有三个儿子,李妙斋为长。

少年时期的李妙斋，在当地堡子庙初小和甘河高小读书。由于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几乎辍学。好在他有一位舅父，生活较宽余。在舅父的大力资助下，才读完了高小。毕业以后，经人说情，多方送礼，在本县天平小学当了教员。教书一年多，常遭受有钱有势人家的欺压和排斥，只好回家务农。李妙斋的字写得很好，当地人称他为才子，谁家有红白喜事，常请他去写礼簿，他从不推辞。加上他谦以待人的品德，很快在当地有了点名气。

1927年11月，李妙斋和郭庆祥从山西过黄河到达陕西的清涧和绥德县落脚，并找到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陕西反动当局大肆清杀共产党的形势，陕北共产党组织开始把有为青年和一些党员骨干派往国民党驻陕北部队中做兵运工作。李妙斋被派到高双成部当兵，不久任事务长。1928年初，经马济仁介绍，李妙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就在高双成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斗争环境十分复杂，李妙斋的活动曾引起高双成的怀疑，一度被关押。

1930年3月，李妙斋在高双成部李亚军团任一营营长。在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蒋战争打响后，他随军驻防河南省许昌市，任邓宝珊的警卫营长。讨蒋战争失利后，又随邓宝珊返回西安，任邓宝珊的卫士班长。

1932年2月，邓宝珊任甘肃省绥靖公署主任，李妙斋随邓宝珊又到了兰州，任邓宝珊干部补习队的队长。10月，邓宝珊派李妙斋去平凉接枪。返回途中，李妙斋和共产党员李良等组织领导了“蒿店兵变”，拉出26人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李妙斋任队长，李良任政委。几经战斗，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李妙斋化装成脚夫，徒步到陕甘边，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

1932年11月间,李妙斋跟随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的游击队辗转到旬邑县清水源、三原县武字区和耀县照金、芋园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以特派员的身份,被留在了芋园村。

李妙斋初到芋园时,同一贾姓伤员住在芋园附近的婆爷洞中。芋园一带革命条件较好,刘志丹带领游击队曾多次到这里进行革命宣传,打富济贫。习仲勋、周冬至也来过这儿发动群众,建立农会组织,筹集冬衣,救助饥民等。这里的群众觉悟高,基础也好。李妙斋很快在芋园村结识了山西老乡韩天成弟兄,又通过他们结交了黄登交、邓克勤、王金海、何乾福、思德发、马长发等人,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串联,革命火种由芋园扩展到房上、窑儿沟、北梁、金盆、老爷岭、韩家山、黑田峪、陈家坡等广大山区乡村。不久,组织起了一支40多人的芋园游击队,李妙斋任政委,刘世荣任队长,王金海任副队长,下编三个班和一个少年先锋班,后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

当时,武器缺少,只有李妙斋所带的一支手枪和当地民间狩猎用的六枝步枪。李妙斋一面让邓克勤和黄登文等秘密打制马刀、长矛等武器,一面派人侦察周围敌情。经过20多天的准备,李妙斋率领游击队首战川口,打击了离芋园村最近的一支地主护家武装。首战告捷,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大大激励了士气。接着攻打孙家山、张家山、龙家寨、土儿梁的守山土匪,占领了土儿梁和龙家寨的险关要隘。使照金地区的众多守山土匪失去了巢穴,到处流窜。李妙斋针对这些小股土匪无统一组织、无政治目的、拦路勒票具有破坏性,但其成员却多为受苦较深、生活无路,或因躲债上山,或因杀人避难而入伙,或因逃避官府追捕而走险的各种情况,发动游击队员对其展开政治攻势。对那些杀恶霸、除官吏、抗租抗债的多数穷苦人,与他们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争取团结过来;对

极少数同官府有勾结，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的，则给予坚决打击。这样就使处在雏形阶段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山区站住了脚。

在开创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李妙斋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经常在外线作战，照金地区只剩下他所领导的游击队在当地活动。在敌强我弱，四面又被敌包围的情况下，李妙斋为了分化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他采取了同驻庙湾最大的土匪头子夏玉山（外号夏老么）交朋友的方法，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夏玉山有一支近千人的武装，在瑶曲、马栏、焦坪、宜君等地设关制卡，进行勒索活动。夏玉山窠居庙湾要险，悬崖断壁，有地道、有岗楼，还有沿山所筑高塔瞭望哨棚，易守难攻。李妙斋同夏玉山交上朋友以后，让其为红军掩护伤员，代购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同时，还把一些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土匪武装，加以说服教育，然后收编为游击队。

这些措施在初建照金根据地时期，对稳定形势，分化敌人，扩展革命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妙斋有勇有谋。1932年12月24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宜君县（今旬邑）转角镇成立。红二团成立后，决定首先扫清根据地周围的敌人据点，开辟苏区工作新局面。26日，红二团要去攻打焦坪国民党驻军。为了不打草惊蛇，以防夏玉山与敌有勾结，杜衡以军政委名义派李妙斋去稳住夏玉山，同时，要求李妙斋侦察清楚庙湾夏部的火力配备及军事防御情况，以便做好下一步攻打庙湾的准备工作。李妙斋对红二团攻打国民党驻军是支持的，但对攻打庙湾夏玉山有不同看法，不仅有个人感情关系，还因为夏玉山占山为王，掩护过红军不少伤员，做过不少好事，眼下还有16名伤员正在那里养伤，吃住全由夏玉山供给。尽管如此，李妙斋还是服

从了组织,接受了任务。他牵着两匹骡子,作为晋见夏玉山的见面礼,只身入庙湾。李妙斋走后,红二团攻打焦坪,这对只身去庙湾的李妙斋人身安全极为不利。然而李妙斋从容镇定,在庙湾说服了夏玉山,答应在红军与国民党作战时,不去增援。李妙斋机智地完成任后,安全脱险回到了部队。刘志丹见到李妙斋后风趣地说:“你侥幸回来了,我们正准备给你开个小小的追悼会呢!”

焦坪战斗后,根据李妙斋的侦察报告和各方面情况分析,红军暂时不宜攻打庙湾。利用红军同夏玉山已经建立起的统战关系,红军完全可以派党代表,对其教育、利用和改造,将其逐渐改造为一支革命的力量。可是,“左”倾错误思想严重的杜衡却一意孤行,以军政委的名义坚持要打庙湾。结果红军失利,骑兵连长曹盛荣牺牲,张秀山等二三十名指战员受伤。这次行动不但破坏了党的统战政策,使红军在庙湾养伤的16名战士人头落地,而且造成红军大批伤员无处安置和医疗上的极大困难,还导致了夏玉山无休止地向红军进犯。1933年1月27日夜,夏玉山在依食村偷袭了红军。继而又尾随红军到芋园,直至发展到夏玉山联合地方反动民团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迫使红二团北撤。在这十分危难之际,李妙斋又受命留守照金,掩护伤员,坚持斗争,继续与敌周旋。

在一片白色恐怖下,李妙斋带着少数几名游击队员费尽千辛万苦,依靠照金人民的支援、掩护,凭借桥山林区的自然屏障,使大批伤员得以幸存,多数人很快伤愈重返到部队。往往是敌人上午从这里清查过,李妙斋下午把伤员迁进来;当敌人进村后,他又把伤员隐蔽在梢林中。这全靠他十分严密精细的组织工作。此间,他还以红二十六军特派员的身份,在掩护伤病员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建党、建政和建军等工作。原发展的六名党员中有三人返回游击队,建立起了六个农联分会,游击队也很快发展。为照金根据

地形势由初创到逐步扩大做出了贡献。

1933年2月23日,李妙斋在大崖子宋有富家召开了各支队长联席会议。会议针对各游击队队员的增多,武器装备缺额过大的实际情况,重点研究建立统一指挥机构和武器装备调运问题。当时,各游击支队长矛大刀居多,土枪少,特别是射程较远的快枪更少。会议开了一天,李妙斋给大家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得到了多数支队长的赞同。当具体研究到决定调陈连声支队少数快枪给其他支队,以增强游击队战斗力时,从国民党部队中哗变过来的陈连声本位主义思想严重,流寇思想作祟,不服从决定,不听指挥,不同意调枪。李妙斋说:共产党人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顾全整个革命的大局。我是总指挥,你难道不愿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吗!陈连声说:“老子有枪就有一切。”他依仗枪多上了龙家寨,李妙斋只好率其他支队走上薛家寨。

薛家寨比龙家寨地形更为险要。山崖石质坚硬,四周悬崖断壁,与党家山两个地段只有架设栈道才能通行。山上有水,土地肥沃,天然洞穴很多,与龙家寨一沟相隔。山上的四个岩穴,大者可容纳百人,小者可居十多人,民间称一、二、三、四号寨。传说当年薛刚反唐下长安,曾在此厉兵秣马。故而三号寨中塑有薛家神像,由朱氏后裔供奉,名曰薛家寨。李妙斋在向导朱大仙和朱吉祥父子的带领下上山后,将薛家泥神像搬出山门,暂住了下来。以后通过农会干部动员群众在后沟巴和党家山拓修道路,架设修复了古栈道、筑堞墙、固哨所,逐渐使薛家寨成了红军的大本营。不仅可以堆积粮草弹药,还可以安置伤病员。

3月7日,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建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耀县、淳化、旬邑一带的游击队,并任命李妙斋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

3月15日,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在照金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和庙院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为了执行省委的指示,李妙斋带着警卫员多次到大崖子召开群众会,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同时成立了大崖子土改小组,让贫雇农老张任组长。当时,广大贫苦农民渴望得到一份土地。但是,由于人们受数千年封建主义佃租制思想的束缚,虽然对红军的土地改革政策从内心拥护,但在公开场合却不敢接受。特别对红军无偿地给自己划拨土地不敢相信,怕红军走了,地主老财反攻倒算。曾有过几次,李妙斋带领农会干部按照人头把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并按各户的人口多少划分地块,栽上了界石或在地界上打上木桩桩,还将新户主的姓名写在石头或木桩上。结果,却有不少农民把写有名字的界桩、界石在晚上偷偷地取掉。还有不少人跑去让地主老财请求宽恕,不要土地。李妙斋针对这种情况,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思想动员。他理直气壮地说:“土地者,天下人之土地。我们穷人其所以穷,就是因为地主依仗权势霸占了大片良田,穷人没有土地所有权。片片土地,皆是穷人在耕种,为什么要给地主老财交地租。我们共产党是专为穷人谋幸福的,就是要把地主所霸占的土地夺回来,重新分给农民,归还给农民。”他还号召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红军家属和农会干部带头分地,带头种地,带头抗租。

为了把土地改革工作深入持久下去,李妙斋派游击队员深入农村协助农会干部开展工作。先后在黑田峪、秀房沟、大崖子、芋园、陈家坡、北梁、窑儿沟、房上、老爷岭、韩家山、碌碡平等地建立健全了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少年儿童团、赤卫队等组织,肃清了敌特,废除了国民党地方保甲制。使土改工作越做越细,由起初的人头平分,发展到人劳搭配,好地坏地搭配,川地山地搭配的形式,基本使以照金为中心的广大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初步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劳者能得食。铲除了千百年以来的地主租佃制。同时，李妙斋还带领游击队对恶霸地主进行了镇压，烧毁了地主的地契地约，并没收了地主家的粮食、牲口、农具及部分房产，就地分给农民。不少农民感激地说：“不是我们不要土地，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现在有红军给我们做主，我们什么也不怕了。”这一年夏收时，群众皆把麦子收获放家，再不给地主缴租了。

革命解放了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游击队，主动接受李妙斋的领导。一些小股民间武装上山投奔李妙斋，要编制、要番号、要红旗、要红军印章，请李妙斋给他们布置任务，分配防务区。这样以来，游击队很快地发展到 18 支，队员发展到 900 多人。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迅速扩展到东起香山，西到土桥、石门关，北迄薛家岔，南达官庄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 2500 多平方公里。由于有红二十六军二团主力军在外线作战，这块红色根据地内党、政、军、群组织较为齐全，根据地内较为稳定和巩固。敌人虽有过多大的“围剿”，然而组织和地盘始终没有被敌人摧垮和占领。

为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巩固，李妙斋还很重视后方基地的建设。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积极创造条件，在薛家寨办起了修械所，修配枪械弹药，制造麻辫手榴弹和土地雷；成立了红军医院（也叫医务所），保证伤员能够及时得到治疗；办起了被服厂，有女工近 30 名，平时为红军缝制军服鞋袜，战时又都是女游击队员；还设立了物资仓库和监狱。同时，号召大家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在薛家寨山上放牧猪、羊、牛，以解决部队给养的不足和改善伤病员生活。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调节群众余缺，李妙斋特请照金人冯颜升在亭子沟开设粮食市场，通过公买公卖的形式，为红军筹集粮秣。不久，就把红军的大本营扩大到党家山。

1933 年 4 月 5 日，陕甘边苏维埃民主政府成立。红二十六军

协助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对各个游击队进行整顿。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游击队员成分复杂,组织严重不纯,组织纪律涣散和党的政策贯彻不力等情况时有发生,也有在群众家里吃饭不给钱,把家中有三五斗粮的群众当地主打击等情况。经过整顿后,暂时免去了李妙斋的总指挥职务,红二十六军任命黄子文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

5月下旬,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重新开辟新苏区。李妙斋又复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他同习仲勋等同志担负起了保卫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这时候,整顿过的游击队只有七个支队。李妙斋和习仲勋在加强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和壮大队伍,游击队又迅速扩大为23个支队。7月,习仲勋在陈家坡负伤。不久,省委派张秀山前来陕甘边任游击队政委。此间,红二团南下失败,杜衡叛变革命,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照金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险。在这危难时刻,李妙斋、习仲勋、周冬至、王满堂等把苏区军民迅速动员起来,以游击战、运动战、麻雀战等形式,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并派出不少人到土匪武装陈连声、杨老石部去做地下工作。

在革命危难的关键时刻,中共陕西省委幸存的人员和三原中心县委对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非常重视。一面派高岗到照金加强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一面指示国民党驻防耀县的骑兵团长王泰吉起义,成立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第三路总指挥部。同时指示中共耀县县委组建耀县游击队。接着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从7月下旬到8月初,已经起义的王泰吉骑兵团余部从辘轳把进入照金;耀县张邦英、陈学鼎、张仲良率领耀县游击队转入照金;红二十六军四团在黄子祥和杨森的带领下也进入照金;省委从西安逃出的人员在照金得以保护;南下失散归来的

人员在照金得以休整。李妙斋、习仲勋、张秀山等为迎接各支革命力量会师照金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李妙斋、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高岗、黄子祥、杨森、王泰吉、王柏栋、黄罗斌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把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和各个游击队及抗日义勇军统一起来，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从此以后，陕甘边各支红军有了统一的行动，成了保卫边区的拳头部队。李妙斋在协助王泰吉、高岗统一指挥各个部队方面做了很多维护团结统一的工作。在陈家坡会后，他协助红军主力首战让牛村，继而攻庙湾，歼灭耀县民团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然后袭击了柳林民团，使照金民团张彦宁部龟缩在后沟据点，不敢贸然进犯苏区。一天上午，李妙斋协同王泰吉向照金后沟寨的张彦宁发动攻击，要张彦宁缴械投降。张彦宁见势不妙，化装逃往小丘。余部在王泰吉所带小炮的轰击下，乖乖地全部缴了械。从此，张彦宁失去了后沟据点，成了丧家之犬。

9月中旬，李妙斋协助王泰吉智取了旬邑县张洪镇。击毙了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和两个县党部书记及三个科长，缴获枪械100多件，布匹9驮子，大洋上万元，缝纫机12台，全部运回照金。

9月20日早晨，国民党刘文伯部纠集耀县雷天一和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县民团及夏玉山部等千余人，乘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之机，从黑田峪、鸡架山、后沟巴、南趟、桢树岭等地，向苏区发动“围剿”，企图占领根据地的中心区——薛家寨。这天拂晓，李妙斋和张秀山撤出老爷岭战斗，刚回到秀房沟还未来得及休息，看见黑田峪冒出一股敌人，就立即投入战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鏖战，红军以少胜多，击败了黑田峪方面敌人的进攻。此时，大雨滂沱，

高岗在薛家寨山上告急，敌人近千名从后沟巴方向袭来。李妙斋和张秀山立即率游击队冒雨增援薛家寨。他们翻山越岭，爬上前哨门，迅速到达后沟巴。只见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的同志、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医生和妇女游击队的全体同志，正在集中全力同敌人酣战。来敌轮番推进，红军凭险力守。李妙斋和张秀山率游击队立即又投入紧张的战斗。石雷滚滚，枪弹齐鸣，阻敌于后沟巴石门之下。战斗持续到下午四五点钟，进攻之敌看红军越战人越多，难以支撑，便扔下一具具尸体开始撤退。狡猾的敌人撤退时，在梢林中埋伏了几名暗探。李妙斋站起身吹哨组织追击时，被敌人射来的冷枪击中，不幸壮烈牺牲。

(郭清文)

欧阳钦

(1900—1978)

欧阳钦，字惟亮，曾用名杨清。湖南宁乡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6月回国，被派往叶挺独立团当见习军官，参加北伐。1927年初，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科长。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武汉、上海等地工作。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兼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2年调任瑞金红军学校总支书记，不久任政治部主任。1933年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934年任六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5年12月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长。1936年夏任中共陕甘工委主席。西安事变后，参与重建中共陕西省委，任省委常委兼西北军工委书记、统战部长、宣传部长。1939年5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41年6月后，任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局副局长，西北局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秘书长，中共旅大地委书记，旅大区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旅大市市委书记兼旅大市市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黑龙江省省长，中共东北局第二书记，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78年5月23日在北京病逝。

(一)

欧阳钦，字惟亮，曾用名杨清、杨文渊。1900年8月3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邓家冲。

欧阳钦的父亲欧阳玉池，是个读书人。母亲李氏系普通的家庭妇女，靠自学初通些文字，在欧阳钦刚满周岁时不幸病逝。欧阳钦七岁时，外祖父送他入当地私塾馆读书。

欧阳钦八岁时，父亲把他接回宁乡县。为了不使欧阳钦荒废学业，又亲自在家教他二三年，直至欧阳钦11岁时，才将他送入高小学习。父亲“望子成龙”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支持欧阳钦继续读书，以实现他自己没有实现的志向。所以，少年时代的欧阳钦在外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下，勤奋好学，具有顽强的毅力，因而赢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1915年，欧阳钦考入长沙市的湖南省立长郡中学，被编入23班学习。他勤于动脑，善于思考，逐渐对枯燥的孔孟经书和八股文章不感兴趣，每每在背诵完先生指定的课文之后，便偷偷地广泛阅读古今小说，并被书中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所激励，尤其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辛亥革命的一些文献、宣传品，更使他在思想上萌发了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

在全国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欧阳钦的视野更加开阔。对比当时社会现状，他不仅为宁乡县父老同胞的命运担心，更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人民怎样才能得救？国家的出路又在哪儿？欧阳钦苦苦地思索着。然而，那时的欧阳钦，虽然倾心救国，渴望改变这种黑暗的现状，却还没有找到救国的真正出路。

(二)

1918年,是欧阳钦在长郡中学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虽然他在全班又取得了优等生的成绩,可是毕业就是失业的命运也同样摆在他的面前。此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不但自己要糊口,还要养家度日。面临升学无力,作事无望的境地^①。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华法教育会在北京创办了高等法文专修馆工科班,专门招收中等学校毕业青年,学习一年法文和工业技术知识,可以赴法国勤工俭学。不但有工作,还可有书读。这使欧阳钦欣喜无比,于是他毅然肄业离校,准备赴京。

7月,欧阳钦告别亲人,到达北京,经同乡戚成湘的推荐介绍,进入高等法文专修馆工科班(亦称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当时的北京是新思潮、新文化孕育、成长和传播地。特别是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学习社会科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潮。欧阳钦和专修馆的其他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在学习法语和工业技术知识的同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潮的杂志和小册子。在这里他有机会结识了毛泽东、肖三等优秀人物,受到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看了北大出版的新思潮杂志等,思想起了大变化。”^②

1919年3月中旬,他和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乘日本远洋轮船“因幡丸”号离沪,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于5月4日到英

^① ^②《杨清自传》(1941年9月30日),存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档案室。

国伦敦。10日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受到华法教育会的热情欢迎。

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要找条件较好的工厂去做工,很不容易。因而,欧阳钦等湖南籍、四川籍同学,被一起分配入蒙塔尔纪中学读书。他们在学校学习了三个月法语之后,欧阳钦和赵昂、孙杰等人一起,被介绍到李石曾主办的都尔中华印字局,做排字工兼做其他活计。

由于受进步思潮的影响,欧阳钦到法国后思想比较活跃,经常参加勤工俭学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1920年,他被吸收加入了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肖三等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组织的进步团体——工学世界社。

在这里,欧阳钦阅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对他影响很大。他在《旅欧周刊》第23、24号上连续发表的《社会改造观》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好的社会”,有“很多错误,很多的罪恶”,必须“彻底的改革”。但怎样才能实现改革,他在文章中认为“只要先使人类都受平等的教育,把知识与能力的阶级打破了,那其他的各种的阶级都会迎刃而解的”。他还设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类都受平等的教育”,“人人都来劳动”。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欧阳钦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已有了一定认识和批判,但也明显看出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

1921年2月28日,欧阳钦参加了中国旅法勤工俭学历史上著名的“二八运动”。在工学世界社的组织领导下,他同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高呼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用遣送勤工俭学学生回国的经费来暂时维持大家生活;同时无条件开放里昂、中比两所大学;由北京政府津贴每人每月400法郎,以四年为限。结果,请愿群众被中国驻法公使陈

策召来的法国警察强行驱散。在斗争中,欧阳钦看到陈策等中国官员那种蛮横狡猾的态度和在法国警察的镇压下同学们的伤痕和鲜血,逐步认清了自己原来的那一套改造社会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同年9月,欧阳钦又参加了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9月6日,蒙塔尔纪勤工俭学学生,为了解决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争取里昂、中比两大学无条件地向勤工俭学学生开放,遭到学校当局的拒绝,迫使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进占里昂大学的行动。于是,勤工俭学学生先后两批到达里昂共125人,于9月21日进占了里昂大学校园。学生代表曾与吴稚晖磋商,吴拒不答应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的问题,并勾结法国警察,把一百多勤工俭学学生拘留在里昂兵营。10月14日,除欧阳钦等少数人趁看守疏忽而逃出外,其余被拘禁的勤工俭学学生被法国当局于10月间全部押送离法。

由于欧阳钦思想激进,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翻印了陈延年等人的革命文章,又由于参加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护照被没收,1922年1月都尔中华印字局也以减员为由,将欧阳钦辞退。于是,他不得不去乡间做杂工。数月后,他又设法回到里昂,在里昂中法大学勉强谋得一个旁听位置,学习了近一年。后因经费不支,又停止了学习。

1923年,欧阳钦到巴黎,进入雪铁龙汽车工厂做磨工。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又经过就业——失业——再就业这种艰难生活的磨炼,特别是他投身于大工厂同产业工人一道参加生产劳动,不仅增进了同工人的了解和友谊,而且还亲身体会到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和伪善,他在工学世界社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述及宣传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书籍,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时,他彻底批判和清除了自己在旅

法初期思想上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4年2月,由林蔚、张增益介绍,欧阳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比映谷团支部的训练干事,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欧阳钦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1925年6月14日,欧阳钦与旅法爱国华人一起,积极参加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镇压。7月初,法国当局宣布欧阳钦等许多同志限期出境,他被迫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1925年8月,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旅欧组织决定派欧阳钦去苏联学习。到莫斯科以后,他被送往郊外莫洛霍夫卡营地(即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在那里,欧阳钦与朱德、王佩璜、唐兆铭等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一起接受军事训练。主要学习军事侦察、巷战、爆破和军事理论等,为迎接即将来临的大革命的实际战斗进行必要的准备。

(三)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前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欧阳钦离开苏联,途经香港回到上海,被派往北伐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

欧阳钦一入伍就投入攻平江、打岳阳的战斗,随后,又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和战斗。同年9月,他被调到聂荣臻主持的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任秘书。

10月下旬,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名义,奉命从广州去四川,推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他在赴川途中到达上海,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加强四川方面的力量,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暴动。

此时，中共中央在军事问题上“是很持重的。……国民政府得武汉后，只求守住武胜关以南，从容统一西南诸省，以准备攻奉之军力”。根据“从容统一西南诸省”的考虑，中共中央对四川军事更加重视，决定派欧阳钦去四川协助工作。

1926年11月上旬，欧阳钦与刘伯承到达万县。在原宝隆洋行朱德办公处开秘密会议，分析万县形势和全川军事。朱德介绍了在杨部的工作情况，他说杨森秉性奸诈，直到北伐军占领武汉，迈出武胜关，才表面上归服革命。欧阳钦听后气愤地说：“杨森不听话，就让他把印交出来。”朱德看透了杨森的本质，严肃地说：“杨哪能交印。”

第二天，欧阳钦随朱德参加了杨森召开的会议。会上，杨森表示，只有有利可图，方可倾向北伐军，没有一点合作的诚意。事实证明，试图用较为和平的方式建立革命武装的设想，是实现不了的。于是，朱德、刘伯承、欧阳钦一起讨论了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想。之后，欧阳钦迅速返回武汉汇报，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杨部的动向。

次年初，欧阳钦担任了汉口《国民日报》编辑，并兼任中共湖北省省委负责人张国焘的秘书。出于工作需要，他经组织批准加入国民党。4月，组织调欧阳钦到中共中央军事部任组织科长，下旬，他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严重关头，欧阳钦根据党的决定，立即转入地下，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寻找失掉组织联系的同志，帮助他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帮助暴露身分的同志脱离险境，把一些同志秘密掩护到南昌，以准备参加南昌暴动。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欧阳钦留

在武汉,在罗亦农主持下的中共长江局任秘书,继续完成秘密转移同志的任务,并妥善地处理了一部分被捕和牺牲了的同志的善后事宜。由于他辛勤积极的工作,使党减少了许多损失。11月,欧阳钦到上海,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任科长。

1928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欧阳钦担负秘密护送六大代表从上海到哈尔滨一段的任务。由于他布置周密,使全体代表都安全到达莫斯科。

六大后,欧阳钦在中央军事部先任组织科科长,后任秘书处秘书^①。当时,中共中央为实现在白色恐怖下工作方式的转变,进行了很大努力,很多领导同志到工厂、农村和社会上寻找职业,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开展革命工作。欧阳钦的家也以开咖啡馆为掩护,成为中央军事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各方面的同志看文件,找领导同志谈工作,都要到他家里联络接头。他还担负中央的秘密交通,冒着危险传递信息和文件。欧阳钦以惊人的记忆力,清楚地记住许多同志经常变化的姓名和地址,保证联络及时无误。他靠敏锐的眼光,无数次躲过特务的监视。凭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机警果断地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

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欧阳钦被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秘书长。初到中央苏区,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近一年时间,领略了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每当回忆这段往事,他都十分感慨地说:在与毛泽东接触中,“所得教益颇深”。1931年5月,欧阳钦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英明正确。

^① 解放军后勤学院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的组织演变情况》,《军史资料》1986年第1期。

为使中央了解第一次、第二次反“围剿”的情况，中共苏区中央局派欧阳钦去上海作汇报，他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热情地赞扬了中央苏区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功绩，称颂了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汇报了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对他的汇报和苏区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说：“根据××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欣喜地知道最近八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情形。”又说：“在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深入，在最近一年多红军的英勇战斗中，在苏区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进攻中，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的伟大成功。”

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不断非难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同时，也排挤了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同志。1932年春，因有人认为“欧阳钦受毛影响很深”，他被调出苏区中央局，到瑞金红军学校，初任中共总支书记，后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服从组织调动，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献给了红军建设。他经常在学校办的刊物《红色战士》上发表文章，给红军学校的学员和部队的战士作报告，分析形势、传授知识，取得了学员和战士们的信任和爱戴。

1933年冬，欧阳钦调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任组织部部长，后改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夏，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长征途中，当部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行到广西白水镇时，欧阳钦不幸被敌机将左肋及左膊上部炸伤。剧烈的疼痛，使他几度晕厥，醒来后，只在伤口处敷了点药，又顽强地跋涉在长征路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六师被缩编到其他部队，欧阳钦伤

已痊愈，又重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聆听了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更加坚定了长征胜利的信心。

同年9月，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继续北上，欧阳钦任由红三军团改编的第二纵队供给部政委。当时军需物资供应极端匮乏，部队生活极端艰苦。军队后勤供应工作困难极大。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为保证和改善部队供应作出了贡献。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毛泽东直接指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对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后改中共中央局），负责领导全国苏区党的工作。欧阳钦调中央局初任秘书长，后任组织部科长。他为了适应党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新局面下工作的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干部调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不久，欧阳钦调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翌年5月陕甘省委撤销，他改任陕甘工委主席^①，并兼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当时，中共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积极响应，也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中共中央为了利用矛盾，实现“逼蒋抗日”，加强了对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所部东北军和西北

^① 《杨清自传》（1941年），《七大代表资格审查结论》（1941年10月），《八大代表履历表》（1956年），三件均存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档案室。

军的团结和争取工作,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工作机构——中央工委,而且在有关地区还分别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各地工委遵照中央指示,将工作重点纷纷转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同时,为保证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地工委还加强了边区的群众工作、武装工作,以及征粮、筹款等工作。陕甘工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做驻防在陕甘一带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作为工委主席,欧阳钦采取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去做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他派与东北军上层军官以至下层班排长有亲属关系或者有同学、朋友关系的十几位同志,以会亲访友为名,向其晓以民族大义及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中共的主张。如派刘培植打入到驻防洛川的一〇五师,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与该师师长和参谋长结识,并就如何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终于使对方赞同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表示决不与红军为敌,共同携手,一致抗日。对于那些经过工作还坚持与苏区和红军为敌,不断骚扰、挑衅的部队,欧阳钦则利用工委所辖的两个独立营、五支游击队,采取武装争取的方式,向对方游击,以牙还牙,对捉到的俘虏,经过教育再放回去,屡捉屡放,以达到对其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目的。对连排长以下的广大士兵,则采取了宣传教育的方法。欧阳钦领导的工委有关部门,还办了个小型印刷厂,印刷标语、传单,他经常亲自撰稿,拟定标语口号。他主持办的《打回老家去》的小册子,在东北军下层士兵中,反响颇深。经过工作,东北军的一些官兵对我军的态度日益转变,在红军驻肤施(今延安)、顾丕、甘洛石门子、傅村等办事处,经常有东北军往来,与红军关系友好。许多东北军士兵,对于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宽大胸怀深为折服。此后有的部队经常将蒋介石对红军作战命令通告红军,作战时向空中放枪。

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共中央利用矛盾,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欧阳钦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到陕甘工委所属地区检查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及各地党组织的发展建设情况。他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制定党的组织发展与党的工作计划,并亲自与东北军中的党员谈话,告诉他们: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营堡必然发生破裂,我们的同志要遵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和矛盾,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在解决认识的同时,他布置了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在有条件的部队中建立中共组织的任务。在欧阳钦的耐心帮助下,广大党员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和任务,坚定了信心,掌握了工作和斗争方法,更加愉快地工作。经过努力,在东北军的一些部队中很快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若干个党的支部。由于欧阳钦能把争取上层与争取下层结合,把党的统战工作与党的组织发展工作结合,使党的统战工作在东北军中收到了积极效果。

欧阳钦除抓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外,还调动工委的各职能部门,如财政部、粮食部等,在工委管辖的三个苏区县、两个白区县的范围内,积极完成征款征粮等项任务,以保证全工委的后勤供给及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此期间,欧阳钦对于工委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党的策略方针,工委工作的情况、问题及经验教训等,都经常向中共东线工委和中共陕西省委报告。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他还多次,有时甚至两三天一次,以工委或个人名义给周恩来、叶剑英写信请示汇报,及时地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上级机关的指示和鼓励。周恩来曾写信给欧阳钦并转陕甘工委,表示:中央嘉奖陕甘工委的工作及所取得的成绩。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上级党组织决定调欧阳钦去做杨虎城所部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他从陕甘工委驻地行至中央所在地保安

(今志丹)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上级又改派他随同周恩来一起赴西安,致力于中共陕西省委的恢复工作。12月25日,在中央代表的帮助下,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重建,贾拓夫任省委书记,欧阳钦任省委常委、西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重点负责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和西北军中党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的疯狂镇压和叛徒出卖,陕西省的中共组织曾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与组织失掉了联系。因此,中共陕西省委重新组建后,把恢复全省各地各级党的组织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抓。欧阳钦全力以赴建立省委与西北军党的工作联系,通过在西北军中工作的杨信,很快了解其所在地区驻防的西北军中党的组织状况及党的工作情况,并通过杨信将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及时传达到西北军党员中去。他还派专人去寻找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党员和在作战中负伤失散的同志。董学源就曾受欧阳钦的委派,前往甘肃接收秘密发展的党员。欧阳钦指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些人尽快找到”^①。在各方协助下,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终于使那些一时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同志很快回到组织怀抱。陕西省中共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壮大,西北军中秘密党员很快达千人以上。这与欧阳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当时,西北军中一些党员,对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中采取的方针政策很不理解。欧阳钦便积极耐心地做这部分同志的思想工作,并派人深入到部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中,进行宣传教育,使同志们提高了认识。

^① 访问董学源记录(1983年),存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五)

1938年初,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出版《西北》周刊,宣传组织广大军民,为完成陕西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而斗争。

此时,欧阳钦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具体负责主管《西北》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经费少、编辑人员缺、印刷发行条件不很具备的情况下,他发动同志们出主意见办法,经过半个月奔走和努力,克服了困难,《西北》周刊于1938年1月21日正式出版。在创刊号上,欧阳钦发表了《加强抗日力量的团结,保卫陕西》一文,提出了陕西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力量,统一救亡运动所应做的三点努力:一、制定一个适合陕西环境的共同救亡行动纲领;二、统一救亡运动组织;三、把救亡运动从城市发展到农村去。文章还明确地指出了影响两党团结抗日的具体障碍,以及克服障碍的措施。从此,《西北》以它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成为西北地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

欧阳钦不是周刊的主编,但实际上代行了主编的职权,做了大量的编辑、审稿工作,并亲自动手为周刊撰写社论和文章,据出版的40多期《西北》周刊的不完全统计,仅以杨清笔名发表的理论文章就达28篇之多。这对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欧阳钦以《西北》为园地,以笔做刀枪,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冲锋陷阵。他的文章论战性强,言简意赅,旗帜鲜明,常常使一些丑类无地自容。在《西北》周刊第12期上,他发表了《取消一切派别小组织与执行抗战救国纲领》一文,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统一战

线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自抗战救国纲领颁布之后,切实执行者,固然不乏其人,而对纲领怠工或阳奉阴违,甚至做出与纲领精神相违反的事,随处还可以见到,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统一意志,统一组织的一个大损失。”1938年5月18日,国民党公开登报下令解散陕西13个救亡团体,并于5月30日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三名领导人;7月,又分别逮捕了这些组织中的另外两名领导人。事件发生后,欧阳钦根据省委确定的方针,在《西北》周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意见》一文。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被捕者,恢复被解散的抗日团体,并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在《西北》第41期上,他发表了《从实施宪政谈到抗战中的民主》一文,论述了实行抗日民主与抗战胜利的关系,痛斥了那种认为“战争时代是军事时代,军事与民主有不相容性”为国民党摧残抗日力量辩护的反动观点。他指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保护人民打击外来侵略,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全民族的利益,依人民公意而进行的,是会受到人民拥护的,人民群众会自愿参加,用不着统治、压迫,而应充分发扬民主,发挥人们的作战能力。只有那种非正义的主持战争的军阀资产阶级才对人民实行严格的统治,压迫人民去作战,实行独裁,这种战争是非民主,是反民主的,是和民主不相容的。文章说,人民群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着民族的利益踊跃参战,难道这样的战争也需要统治,需要限制民主吗?文章认为:这种战争是民主的而非反民主的,和民主是相容的。不仅不应该限制民主,而且应当扩大民主。这种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大长了爱国群众的志气。在中共的领导下,为营救被捕的爱国群众,人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召开座谈会、讲演会,到监狱慰劳,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斗争。后由周恩来出面交涉,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五人,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中原,威胁武汉,也威胁陕西和西北地区。面临这种形势,欧阳钦以杨清的笔名于7月19日在《西北》发表了《保卫陕西,保卫西北》一文。8月1日,他又与陕西省委其他领导人关烽(贾拓夫)、张德生、汪锋等共同署名,以《我们对第三期抗战中保卫西北的意见》为题,发表文章。这些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面前陕西与西北的严重形势,批判了侥幸苟安思想,从陕西与西北的实际出发,分析取得战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全面动员,武装民众,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原则,宣传解释了中共的有关政治主张和改善人民生活等经济工作方针。文章呼吁:一切党派,在当前的形势下,都应该把相互之间的成见,自私自利的观点,互相产生的磨擦等,都需在当前是保卫陕西的神圣战争中完全消除,真正实现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西北》周刊在陕西民众面前高举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高举坚持抗战胜利的旗帜。使国民党顽固派大为恼火。他们采取了不予登记,勒令停刊,逮捕承印者、销售者和读者等卑劣手段,竭力阻挠刊物的出版发行。但是,广大群众深深喜爱这个刊物,它的订户不仅遍及省内外,甚至发行到国外,“在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抗战,以及进行党内教育等方面相当地尽到了党报的责任”。在它创刊两周年的时候,毛泽东为它题词:“要把西北上的事办好,人民必须有言论自由。”

(六)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欧阳钦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这时,陕西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从外部与内部对中共进行破坏,公开取

缔群众团体的抗日活动,统一战线与抗日群众运动处于“消沉”状态。中共陕西省委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把两年来所开辟的阵地巩固住,特别是如何使迅速恢复、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得以巩固。欧阳钦以极大的努力抓住巩固党组织与转变斗争方式这一中心环节。他首先主持召开省委全体会议,讨论确定了“以巩固为主”的建党方针。同时,他又主持起草发布了《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的通知》,要求所属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以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组织纪律性。不久,省委又下发了《党员须知》和《秘密工作规则》,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促进陕西省中共组织的巩固和工作方式的转变。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遂决定一般地停止发展党员。10月,欧阳钦又主持起草了《省委关于开展党内教育运动的决定》,经省委讨论后发布。这个决定强调:巩固党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而巩固党最中心的一环,是开展党内教育。为把党内教育运动搞得深入透彻,他撰写了《论巩固陕西的党》,指出“陕西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中,重新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这是陕西党的干部和党员过去工作的巨大成绩。但是,陕西党还是一个新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说已是相当巩固”;“陕西党正处在反共逆流中,顽固分子正在利用一切方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以至特务工作方面来打它与破坏它”。文章在叙述党内存在的政治、思想、组织不纯的种种表现后,明确地提出了巩固党的措施。即:加强党内教育;改变党的成分;审查选拔培养干部;增强党的纪律性;注意秘密工作;防止奸细;密切同群众联系等。为促使工作方式的转变,欧阳钦主持省委作出了《省委关于外地来省委处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1月,他根据中共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主持省委具体讨论部署了巩固党的工

作；召开了有省委全体委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各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传达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并在会议上讨论决定，改变一些组织形式。是年底，省委机关从泾阳云阳镇移至淳化安社寨。欧阳钦主持召开的这些会议和发出的文件及所采取的措施，使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落到了实处，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方式的转变，使陕西的中共党组织更加巩固。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伙同地方顽固势力，于1939年12月先后侵占陕甘宁边区的旬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为正确认识全陕形势，明确党的任务，194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欧阳钦在会上作了《从陕西与西北事件说到目前时局与任务》的政治报告。他指出：今天中国时局的特点是：还在继续抗战——但在抗战中，发生了严重的投降危机；还在继续团结——但在团结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现象；还在继续进步——但在进步中发生了严重倒退运动。报告列举了陕西以至全国不断发生的武装反共摩擦事件，暗害进步团体，逮捕、杀害共产党员，以及进行反共教育与反共宣传等破坏国共合作、不利团结抗日的现象，要求全陕党员要认清形势，揭露黑暗面，千万不能悲观失望，一定要争取时局好转，达到抗战胜利。欧阳钦代表省委，提出了陕西党的具体任务：一、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一切抗战与民主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领导他们进行各种有利于群众、也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改善的斗争；二、坚持武装斗争，做好参战的准备，不仅为了防止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而且也要防止顽固分子投降反共的突然事变；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这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他提出巩固党要搞好以

下八项工作,即:党内教育,清理认识;审查干部;加强群众工作;了解具体环境;改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警惕性;严密注意秘密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等。这次会议贯彻后,陕西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9月,为了检查对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隐蔽精干”方针的落实情况,欧阳钦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的结论报告中,告诫大家不能歌颂成绩,满足现状,而要强调缺点,要追究产生缺点的原因及纠正的办法。他认为陕西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以至造成党“极不巩固”的原因主要是:对时局的估计,有些不周到不充分不精密,缺乏远见;环境好时未充分准备到环境坏时的工作,工作方式虽有改变,但不彻底。所以对贯彻“隐蔽精干”的政策抓得不紧。在一些地方,由于对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群众的核心等建党理论原则,缺乏深刻具体的了解,甚至出现了某些地方党组织大于有组织的群众;党的秘密工作与领导方式很差,甚至在某些地方党竟变成了半公开的。就此,欧阳钦在会上作了检查,并深刻阐述了将党变成“隐蔽精干”的地下党的战略意义。他将这一方针作了通俗的解释。他说:什么是“隐蔽”呢?隐蔽即是组织上的隐蔽,不是政治主张的隐蔽;要做到在广大群众中隐蔽,在社会中隐蔽,也即群众化、社会化。就是表面上与广大群众是一样的,实际上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的周围有广大群众作掩护。什么是“精干”呢?精干就是少而有力。精干就易于隐蔽,使组织严密、质量提高,使党成为有群众、有统战工作、有朋友、有适合环境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地下党。使敌人破坏不到,打击不易,真正成为巩固的堡垒。总之就是要“内无奸细”,“外不孤立”。他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工作上爱铺张,有名无实,好大喜功等易使自己暴露的工作作风,强调发扬“有实无名”,埋头苦干,地下生根,做“后台老

板”的风格。

会议以后，欧阳钦领导省委各部门抓了22个中心县委、工委的整顿，把各级党组织领导权都掌握在政治上坚定，有工作能力，会适应环境，懂得新的领导方式，能以社会职业、地位做掩护的同志手中；省委直接审查的干部就有80人。省委还抓紧了干部培训，加强对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的策略教育，并教育干部学会联系本地区实际情况开展工作。经他提议，省委还储蓄了一批后备干部，以备发生意外时接替工作。除此，还把“红了”的干部调送延安学习，不能离开的，也设法使之改业；对接受国民党训练的干部，不无故怀疑，而是区别对待，查无问题的恢复了工作，情况不明的继续考察；把已被“溶化”的90多人清除出党。将一般的县委领导区委、区委领导支部的党的领导方式，改变为一般每个负责人联系不能超过两个单位，取消了总支部，化成小支部。在党内开展了防奸细工作，规定了明确的政策界线，清除了暗藏在党内的坏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就“隐蔽精干”问题，对陕西发出指示，完整地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2月，欧阳钦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并在会上做了《目前时局下的陕西工作》结论的报告。报告论证了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意义，就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提出了10项措施。他还提出要“打入要害”（即主要对象），“打入心脏”（即深入内部），对国民党的工作要从外部摩擦转到内部摩擦。会后，他派人到各地采取谈话、写信等多种方式传达贯彻这一精神。各级党组织都按省委要求，在国民党内部，在国民党中央军、西北军、地方武装、在乡军人、财政经济部门以及青洪帮中，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以合法形式深入地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了一批

同情者和积极分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使陕西省委有所依托,并同中央联系方便,将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划归陕西省委领导,并组成新的省委,欧阳钦仍任省委书记。5月12日,他主持召开了新省委第一次会议,作了《新形势下陕西党的任务》^①的结论报告,还代表省委对今后工作作了部署,提出了全省党组织的八大任务,并对国统区提出仍要执行组织上“隐蔽精干”,多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对关中分区的工作、对军队,以及对文化、教育、出版、干部培养等方面工作,欧阳钦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他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领导工作的方式。这使全省各地和新省委各工作部门都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工作。

1941年7月,欧阳钦在将要调往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之前,对自己在陕西省委的工作做了全面总结。在西北局召开的常委会议上,他以《关于四年来国民党统治区我党工作报告》^②为题,作了很长的书面发言。他详细地介绍了陕西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全面分析了陕西社会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及对中共的态度,系统地汇报了陕西省委四年来的工作。他把陕西省委的工作分成两大战略阶段:即1936年西安事变起至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止是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陕西从没有党或基础薄弱的党,建立起普遍的党组织;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工、农、青、妇、文化界及各方面的群众运动;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是:党的组织还很不巩固;群众运动开展的根基不深;宣传多于组织,表面工作多于实际工作,统战工作范围狭小单一。从1939

^① ^②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年初到 1941 年 7 月是巩固时期。这一时期党的基础较前巩固,国民党全力来破坏我党,我党避免了大的破坏;国民党打击我党的外围组织,破坏我党统战工作,我党不仅保存了已有的统战工作基础,而且开辟了新的阵地;国民党解散了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但我党与群众的联系仍然保持着。存在的问题是:党的巩固工作还做得不够,做得迟缓,办法还少,因此使一些地方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他在发言中还对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组织、宣传、统战等方面的工作逐一作了汇报,并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这是欧阳钦在中共陕西省委工作期间所作的最后一次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在陕西省委工作的一个全面回顾。

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 月 1 日又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成立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第四分局既是中央调研局的一个分局,又是西北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欧阳钦奉调离开陕西省委,到西北局筹组调查分局。他一到任就开始着手筹备工作,经努力,至 12 月,办公地址、工作人员等问题都逐一解决落实,西北局发出任职通知,他被任命为调查研究第四分局副局长。是月 16 日,在西北局会议室召开了成立大会,全体工作人员,西北局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来宾参加了大会。胡志主持会议,欧阳钦作了报告。他首先宣布调查研究第四分局正式成立,然后介绍了成立经过,编制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制度、会议制度、计划检查制度,对外联系、经费以及调查方法、学习问题等。他明确宣布调查分局要在中央西北局常委的领导下工作,要成为西北局的一个助手,要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作好调研工作。

第四分局下设四个研究室,即: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欧阳钦兼任友区研究室主任。他主持

友区研究室与调查站组长赵伯平一起对陕西国统区的经济如银行、资源统计资料,政治如省党部和省府各厅的秘密与公开的出版物,以及地方报纸、思想文化、地图游记等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他深入地调查了群众的生活状况,逐项对农产品、工艺品、医药品的价格,以及编织、铁路、金矿等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与劳动时间作详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战前作对比分析,为中央西北局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943年1月,欧阳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后又任秘书长,在西北局书记处领导下,主持办公厅工作。他继续负责主管调查研究工作,并具体准备常委会及西北局委员会的活动日程,组织西北局常委会决议的贯彻执行。他除处理西北局常委、书记处的大量日常政务、文电、会议、上下联系外,还在大生产运动中集中抓生产,保障蔬菜、烧炭、饲料的供给,对磨房磨豆腐、商店经营项目等具体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并用取得的赢利改善机关伙食,弥补办公费的不足。由于欧阳钦工作作风深入,西北局机关干部都很尊敬他,爱戴他。当时,“杨秘书长”在延安广为人知,而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

1945年4月,欧阳钦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大会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路线,使欧阳钦深受鼓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决心为实现党的七大确定的路线和任务而努力奋斗。

(七)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欧阳钦任中共冀察热辽

分局秘书长。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正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美帝国主义又出面进行所谓和平“调处”,许多人对美蒋的反动本质和进行内战的阴谋一时还认识不清,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还抱有某些幻想,欧阳钦和分局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抗日战争后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教育党员和干部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清内战的危险,进一步明确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6年10月,国民党先后占领了承德和张家口,在军区和分局的领导下,欧阳钦率领武装队伍转战于赤峰、凌源、叶柏寿等地,领导群众进行清匪反霸的斗争,恢复社会治安,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配合游击队清剿土匪和反击国民党的武装进攻。经过努力,冀察热辽边区各县成立了民主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在进行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边区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党在冀察热辽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

翌年春,欧阳钦任冀热辽中央分局土改工作团南团团长,到热东地区领导土地改革。他每到一地都深入调查研究,然后再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对于上级的指示,他总是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具体贯彻执行。当时,热东地区的土改工作,也出现了对地主“扫地出门”,对基层干部“搬石头”等一些“左”的做法。他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土改工作离开党的基层组织领导,踢开区村干部,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错误的。他多次写文章,发表讲话,统一干部的思想,抵制了那些“左”的做法,保护了一大批农村干部,使党和政权的基层组织得到了加强,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48年,为辽沈决战做准备,党又派欧阳钦到羊山地区做了一段对驻守锦州的国民党滇军的统战工作。

1948年7月,欧阳钦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翌年2月改任旅大区党委书记。

旅大当时由苏军军事管制,中共的活动还没有公开。在这种情况下,对旅大是做长久打算,还是仅仅作为暂时支援前线的临时阵地,看法不尽一致。欧阳钦首先分析了旅大的特殊情况,指出,旅大是苏军控制下的解放区,是工业城市,是战略要地。既然是工业城市,就要抓发展生产,既然是战略要地,就要和苏军合作保卫城市。他针对旅大“应以苏军为主”的说法,提出“以苏为主即是我为主”。在他的建议下,党委制定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方针,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又妥善处理和苏军的关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使旅大地区成为最早掌握在中共手中的工业城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工作欣欣向荣,在生产和支前方面都作出了显著成绩。

全国解放后,欧阳钦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去莫斯科访问时,由于要签订关于旅大市的协议,欧阳钦也奉命随同前往。在毛泽东举行的答谢告别宴会上,斯大林特地同欧阳钦喝了一杯酒,对他在旅大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对中苏友谊所作的贡献表示赞许。

欧阳钦在主持旅大工作中,除重视生产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外,还注意从理论上教育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政治理论水平。他曾对干部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只是马列主义沧海中的一粟。至于对马列主义‘登堂入室’的了解,那就只有指望着今后的努力。”他常说:学习马列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问题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有的同志曾这样评价过他:“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咬得

很死,用得很实”。

1952年,为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诬蔑旅大市的干部队伍是“山高林密,虎多而肥”。欧阳钦等同志坚决抵制了这种错误论调。他们严格掌握政策,保护和挽救了犯有轻微错误并已接受了教育的同志。

欧阳钦进到大城市以后,仍和战争年代一样,保持着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子女亲属,他都从严要求。有一次,他急着出去,已经上了车,忽然想起那天是党小组活动时间。于是马上叫司机停下车,先向党小组长请了假,然后才乘车外出。1951年,欧阳钦在湖南农村的一个亲属远道而来,想在旅大市安排一个工作。欧阳钦拒绝了这个亲属的要求,耐心说服了他,给他拿了路费和一些零用钱,又把他送回了湖南。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曾赞扬欧阳钦“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

(八)

1954年8月,欧阳钦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是由原黑龙江、松江两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合并而成,干部来自两省一市,还有一部分人来自辽西、旅大等老解放区。如何把这些来自各方面的干部团结好,统一他们的思想,是搞好全省工作的关键。欧阳钦一开始就抓住这个环节,亲自主持起草合省后《黑龙江日报》第一篇社论《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号召全省干部“主动地团结合作,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集中智慧和经验,作好当前及今后紧张而繁重的工作”。

欧阳钦特别重视抓省委领导班子的团结。他要求大家互相学

习,和衷共济。他以身作则,尊重班子成员意见,重大问题总是拿到会议上研究讨论。他主持常委会,同志们可以互相展开坦率的争论和批评。一旦作出决议,就放手让每个成员大胆主持各自分管的工作,使合省后的黑龙江省委工作很快呈现崭新的局面。

当时,中央把黑龙江作为贯彻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国家很多大型项目如发电设备、飞机、机器制造工业等都正在黑龙江上马,这使欧阳钦十分受鼓舞。他立下“建设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的宏大志愿,并为实现这一志愿,不懈奋斗了12个春秋。

欧阳钦专门召开省委全会,认真分析研究全省形势和任务,把全省同志的注意力由一向主要抓农业,引向在抓好农业、林业的同时,大力支援大规模工业建设上来。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指出:“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谁抓住这一条,谁就会得到一切;谁对这一点动摇,谁就会失掉一切。”

欧阳钦坚决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根据全省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在合省之初,就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发出尽快实现“三个一千万”的号召,即年产一千万吨粮食,一千万吨煤炭,一千万立方米木材为主要指标的全省工、农、林业发展设想。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紧张努力,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个设想,为进一步搞好黑龙江省建设和支援全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因为黑龙江基础薄弱,所以随着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与副业这几个方面的不平衡。欧阳钦及时发现了这一矛盾,明确指出农业、轻工业和副业是黑龙江的三条短腿。为了保证经济平

衡发展,他提出了“保证重点、补长短腿”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实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发展繁荣全省经济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农业方面,黑龙江解放较早,土地改革的任务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即基本完成。广大贫农、下中农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纷纷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欧阳钦到黑龙江后,又进一步狠抓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省委的领导下,到1955年,全省基本实现了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为黑龙江农牧业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

(九)

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大规模开发北大荒,把黑龙江省建成一个商品粮基地。1958年,王震率10万官兵开进了一望无际的荒原。欧阳钦对农垦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高兴地说:“‘北大荒’要变成‘北大仓’了,让千年沉睡土地翻身的人应该立碑。”他要求各地从各方面对农垦工作大力支援。全省各地向垦区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木材、农药、农机具、日用品等必须物资;输送了许多大专毕业生和农业干部;有关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专家,也纷纷参加了考察。

1961年,垦区遭受了严重灾害。在最困难的时候,欧阳钦来到垦区看望干部、战士,送去了党的关怀和温暖。根据欧阳钦的建议,这一年省里不但没有向垦区征粮,反而拨去了大批粮食,帮助农场渡过难关。他还提议让地方干部参与垦区的领导工作,这对协调双方关系,加快开发北大荒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6年9月,欧阳钦出席了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就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做了专题发言,并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8年,由于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产生了骄傲急躁情绪,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开始,欧阳钦并未意识到这是错误的,也是执行了的。但是,当张春桥发表一篇文章反对“条件论”,为“左”倾错误推波助澜的时候,欧阳钦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批判这篇文章违反辩证唯物主义,鼓吹唯心主义。他说:“一切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没有条件怎么能行?”当年秋天,全国普遍搞“小土群”大炼钢铁,到处放“卫星”,对黑龙江压力很大。全省已经抽出20万人炼钢,钢产量还是上不去。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有的同志提出再上一二十万人,欧阳钦坚决反对,他说:“矿石一时挖不出来不会烂掉,但粮食收不回来就会烂在地里,大炼钢铁的人一个也不能再加了。”正是由于欧阳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才使黑龙江大大减少了损失。

欧阳钦虽然抵制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他也曾经执行过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如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等,但他能较早地察觉错误,扬汤止沸,避免错误发展得更严重。

50年代末,中央决定在黑龙江开发油田。欧阳钦和省委其他同志一致决定“全力以赴、全力支持”。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在各种物资极为缺乏的情况下,省委领导全省人民节衣缩食,把油田急需的粮食、蔬菜、副食、帐篷、汽车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动员了大批医务人员、筑路工人、机修工人和电力工人到油区支援会战。在建国1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第一口油井出油了,欧阳钦亲临祝贺。那时油田还没有正式命名,欧阳钦风趣地说:“老百姓家添了个孩子都高兴得不得了,叫大庆,我们在庆祝建国10周年的时候,开辟了这么个大油田,更是大喜事,就叫它‘大庆’吧!”他

的建议被采纳了。从此，“大庆”这个名字随着滚滚的石油，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欧阳钦一贯重视抓经济建设和生产工作，同时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1956年4月，他主持省委适时召开了文教工作会议，强调“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与之相适应地进行文化建设，使两者互为保证，互相促进”。并指出：必须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切实地从上到下地给知识分子以信任和支持，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59年在省市干部会议上，他又一次号召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大力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文化建设事业，建立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掌握尖端技术，攀登科学高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大力支援全国的任务，同时把黑龙江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幸福、美丽的地方”。他还与其他省委领导同志一起，经常会见全省工业、农业、科技、文教各界的专家、教授，具体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欧阳钦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非常重视思想理论工作，他认为：“思想战线从来就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线，没有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思想工作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但最根本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此，他不但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同时也关心工农群众的学理论、学哲学活动。他经常对大家讲“不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多么神秘和高不可攀的事情”，“广大群众不但能够学，能够用，而且可以学得好，用得好”。

60年代以后，在理论学习上，林彪的所谓学习方针盛极一时。欧阳钦对此很反感，他说：“立竿见影，怎么见影法？学习是个慢工夫，今天学了，不知道啥时候用得上，怎么能立竿见影？”他认为学

习方法应“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他看到有的工厂交接班时背诵毛主席语录，批评道：“这有多少用处？还不是形式主义！”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什么都联系，随便联系，表面看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了”。他反对那个“顶峰论”，他说：“顶峰了，再往上怎么上？”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欧阳钦号召别人学习，自己更带头学习。他经常发表学习理论的体会文章，在他身体和精力许可时，《黑龙江日报》的社论他都要亲自审阅，有的重要社论，他还亲自主持研究起草和修改，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全省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黑龙江省的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理论活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十)

1964年“四清”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当时在黑龙江也有人把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说什么“现在的干部摸一个烂一个”。欧阳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平时说干部啥问题没有，现在又说都不好，这是形而上学，如果真把干部通通搞掉，反动派会高兴，那就只好请蒋委员长回来了！”

欧阳钦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在关键时刻能头脑清醒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稳定地掌握工作发展进程。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对错误不姑息迁就，批评人很尖锐，其严厉程度，往往使被批评者无地自容，接连几天睡不好觉。但是只要你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从不“记旧账”。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欧阳钦的批评是“其势汹汹，其心融融”。

欧阳钦生活十分俭朴。在黑龙江工作12年，人们很少看到他

添置新衣服,但对组织上派来照顾他生活的服务人员,他却十分关心。他常对爱人讲“他们(指服务员)有了困难一定帮助”。每年春节,他都要请全体服务人员和他一家人聚餐,用家中最好的烟、酒、饭招待他们。

1966年5月,欧阳钦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仍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在养病。得知举国上下都在批判《海瑞罢官》时,他深为忧虑,说:“这样批判,以后谁还敢研究历史!”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搞的那一套持有不同看法。当“打倒”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的时候,他异常愤慨地说:“把老革命家都打倒,不是要孤立毛主席吗?”他对这场所谓的“革命”不理解,他要顶,但是又怎么能顶得住呢?“造反派”轮番到医院与他纠缠,强迫他承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次威逼中,他发现他们手中有一本印着《三反分子欧阳钦的反革命言论》小册子,立即竖起眉头,狠狠地抢过来摔在床上,气愤地宣布:“这写的不对!我不是‘三反分子’,我是共产党员,你们这样写是错误的!”不久,他病重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转到北京住院治疗。1969年,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欧阳钦被迫离开北京回到黑龙江被软禁起来。各种各样的折磨使他病情加重,经医护人员一再要求,才允许他就地住院治疗,以后又转到北京治疗。但是,住院也不得安宁,“专案组”时时缠着他。他虽然身体和精神上受折磨很厉害,可是在原则问题上,却从未屈服。让他承认是“走资派”,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哪一条证明我是走资派?把别的书记打成走资派我也不同意。黑龙江的工作,是黑龙江的干部和人民的,黑龙江省委是好的,我如果说黑龙江资本主义复辟了,就对不起广大干部和人民!”整整10年,欧阳钦一直坚持进行着斗争。

中共十大召开前夕,好心的同志为了欧阳钦不受折磨,早日“解放”,并得到工作,都苦苦地劝说:“你就认了吧!”但是坏人的威逼不能使他骨软,好心的劝告也不能使他心动。他说:“我不是为了做官,我是来革命的!”

在那内乱的年代,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陷害欧阳钦还不够,还对他惟一的儿子欧阳湘下了毒手。欧阳湘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果敢的搏斗,1968年12月22日,在酷刑下,被迫害致死。为了欧阳钦的健康,人们把欧阳湘牺牲的噩耗对他严加封锁。可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年,两年……年迈的欧阳钦无数次问:“湘湘怎么总不回来?”亲人们忍着悲痛哄他:“到外地搞尖端工程去了。”“怎么连封信也没有?”“那个地方不让写信”。亲人们的搪塞,使他半信半疑。一天,欧阳钦在房中踱步,无意中发现桌子上有一封未及发出的信。这是他的爱人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要求查明欧阳湘之死的真相……当他爱人从外面进来时,老人已瘫坐在沙发上。他异常平静,只是喃喃地说:“湘湘是在延安枣园长大的……湘湘是个好孩子……”他把巨大的悲痛和愤怒强压在心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喜讯传来时,欧阳钦无法自制。他双手剧烈地颤抖,露出笑意的脸上,老泪纵横。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上,欧阳钦当选为人大常委和政协副主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欧阳钦虽年高体弱,仍然要求要为人民继续工作。但是因为十年动乱使他从身体到精神都遭到严重摧残,未能如意。1978年5月15日,欧阳钦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不幸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武尚文 孙雅坤)

赵 镛

(1906—1941)

赵镛，陕西省府谷县赵家寨人，1919年受到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39年1月，赵镛任鲁西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会书记。1940年4月，任中共山东分局鲁南区党委书记。1941年9月27日，赵镛被国民党顽军逮捕，在敌人审讯他时，他泰然自若地说：“我是

赵镛，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告诉你，抗战无罪。”是年11月19日，赵镛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在刑场，赵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35岁。

赵镛1906年生于陕西省府谷县赵家寨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在本县县立小学读书，刻苦用功，成绩优异；1919年受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山西汾阳一所教会学校——铭义中学读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他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从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于1926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府谷县立小学校长是个反动腐败的家伙，极力阻挠和破坏学校师生的革命活动。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学生们正在酝酿驱赶

这个校长的时候，赵搏从外地回到家乡，并来到自己的母校，见到高克亭等许多同学。他讲了各地的革命形势，高克亭等向他介绍了校内的斗争情况。他就帮助师生们出主意想办法，共同揭发校长治校无方、误人子弟、贪污腐化等罪行，开展广泛的宣传、罢课和请愿活动。在广大师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赶走了这个反动校长，斗争取得了胜利。

不久，党组织派赵搏去黄埔军校学习，他欣然接受，并立即动身。高克亭一直把他送到黄河边，一路长谈，依依惜别。赵搏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五百里到达太原，乘火车到北平后，发现路费不足，就租了一辆黄包车，风餐露宿，日夜在北平市里奔劳，直到挣够了路费，才于1926年5月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六期的学员。

赵搏在黄埔期间，除了认真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积极参加当时已很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他曾任连党支部书记，并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他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当时校内常举行各种讲演会，各派政治力量也借此表演。在一次会上，有个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大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是国民党的，而是共产党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和孙中山的进步主张。赵搏当即起立发言，系统地讲述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驳斥了那个家伙的错误观点，使其当众出丑，受到共产党员和左派群众的称赞。

1927年4月15日“广州事变”时，赵搏由黄埔军校机智脱险，前往武汉。

赵搏来到武汉以后，被党派到天津、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被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入狱。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毫无结果。两年后他被释放，继续在平、津工作。

1931年6月25日，赵搏在北平再次被捕，关押在宪兵司令部。在连续40天的审讯中，敌人施行了种种手段，他始终坚贞不屈。后将他转到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又经多次审讯，两月后判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反省分院在北京草岚子胡同，院内设南监、北监，每监有东西两排，每排有10间牢房，按顺序编为10个“号筒”，每个号筒只有一个窗子，两个号筒的隔墙上有个小孔，合用一个电灯，两排号筒中间是走廊。住在各号筒的“犯人”，除集体到食堂吃饭和三次短时间“放风”外，平时各号筒牢门紧锁，大小便也在房内。敌人对政治犯施行长期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妄图迫使他们自首叛变。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党在监内成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赵搏（监内名赵朴）曾任支部组织干事。他被关在南监东排一号筒，靠过道有个窗口，牢方人员从东边楼上下来，或看守来查监，他首先可以看到。支部宣传干事杨献珍在病号监“照顾”病号，来回打水、倒马桶经过这里，便于和他联系。薄一波、刘澜涛等支部负责人关在二、三号筒，联系也方便。赵搏实际上是狱中党组织联系的中枢。他不大引人注目，却机警健谈，和牢方人员混得很熟，常利用他们进行工作。

当时在党支部领导下，有个学习委员会，赵搏是委员之一。他们通过被争取过来的看守，可以从监外带进党的文件，购进马列著作和各种报刊，英文的杨献珍翻译，俄文的殷鉴翻译。开始他们把厚书拆开，分夹在《红楼梦》等书里，利用壁孔传阅，后被敌人发觉，便不伪装，有人借窗孔放哨，看守来了就用举拳或敲墙的方法示意收藏；看守走了，又用伸掌或敲墙表示解除。赵搏除自己认真读书，并积极参加细致的组织领导工作，把监狱变成马列主义党校，加上严格的组织生活，所以大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一直坚持斗

争。

敌人不断开展政治进攻，派人讲“四书”、“五经”；派天主教“修女”给治病，派教徒讲上帝创造世界；派佛教徒讲唯实宗等，妄图从思想上征服这一批共产党员。每逢这时，赵搏总是站在前列进行反击，而且很能掌握政策和斗争艺术。例如对天主教，他不去讲有无神鬼，也不讲谁创造世界，而是讲现实的抗日救国道理，问他们谁见到“天主”，它能救国吗？谁去过“天堂”，那里能安民吗？教徒们常被问得无言答对。敌人还要每人每周写一篇学习感想文章，诱骗大家上当。赵搏和其他同志坚持不写，并说对政治犯不能强迫写文章。1933年后，国民党配合第四次“围剿”，派何应钦任北平行营主任，带来宪兵三团，插手监狱，改变了对政治犯的进攻方式，规定半年“审查”一次，不管刑期长短，只要在其预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即可释放；三次“审查”仍不悔改，就加刑或枪毙。党支部及时指出：“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动员党员坚持斗争，并研究了应付“审查”的办法。赵搏在每次“审查”时都表示：要杀就杀，我没有错，谁抗日救国我拥护谁；那些不抗日，把东三省奉送给日本的人才有错，应当悔过的是他们。敌人三次审查都告失败。

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另一个组织是生活委员会（亦叫生活“公社”），赵搏是主要负责人。委员会把难友按牢房编组，任务是领导反剥削、反虐待，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改善生活等斗争。譬如生活费规定每人每月3.8元，实际只能吃2元，将近一半被克扣；有时饭里掺沙子、菜里浇明油等。发现这些情况，他们就在吃饭时当场提出，叫牢方答复。赵搏有时先发言，有时在中间或最后收场时发言，每次都积极领导，坚持斗争。赵搏还负责按“公社”原则，统筹管理经济。当时狱中100多人，监外援助的钱或物都交给他。这

些钱,无论是寄给谁的,除了对本人适当照顾外,其余都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精心计划分配,就是几个烧饼,也切成小块分给大家。这样,就使监外无经济来源和体弱、生病的难友,在衣服、用品、营养、药物等方面,都得到适当照顾;还有利于培养共产主义精神,保证健康,坚持长期斗争。

监狱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绝食斗争。当时敌人对政治犯百般摧残,脚镣重的达8斤,轻的也有3斤;最难熬的是冬天,煤炭被克扣,牢内阴冷潮湿,90%的人患关节炎,其他疾病也很多。1934年12月,党支部研究开展绝食斗争。赵搏在重病情况下,也毅然参加。19日早晨宣布绝食,各牢房选出代表,赵搏带病作代表,由人架着去谈判,向敌人提出了六项条件,敌人不答复。第三天,敌人在院内架上机枪,强迫复食,结果无效,只好同意病号去脚镣,体弱的换小镣,看书报自由,每号筒增加两个火炉,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各监房可以走动等项条件,斗争取得重大胜利。25日晚(绝食第七天)宣布复食前,赵搏说话已很困难,但他以共产党人的顽强意志,与难友们一起坚持到最后胜利。

1936年春,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党支部决定要当局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出去抗日,并派出代表交涉。牢方答复:“登报是制度,不登不行。”经党组织决定,不写“反共”字眼,只写某某启事,出去抗日或教书,或务农,由杨献珍起个草稿,报到军法处。第二天,敌人忽然把张永朴(即薄一波,党支部书记)叫去,换上他们改写的带有“反共”二字的启事,叫张永朴盖手印。张坚决拒绝:“你们要我按这个反共的手印永远办不到,你们的把戏骗不了真正的人。”他的话声音很大,有意让大家听到。敌人见他不屈从,便把他带到另一处关押;又造了一张张永朴已按过手印的假启事,叫别人跟着按手印。赵搏知是骗局,坚决不按,其他同志也不约而同地

拒绝按，敌人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1936年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党急需大批干部。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做出决定，营救这批长期保存下来的骨干及早出狱。这时，赵搏任支部书记，负责具体安排难友们先后分批出狱，一共分了九批，9月上旬第一批出狱，他是最后一批出来的。出狱后，他仍善始善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将所有出狱的人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详细作了介绍，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①。

1936年10月，赵搏出狱。多年监狱生活，使他身上伤痕斑斑，两腿走路发板，但他却精神焕发，迅速奔赴新的战斗岗位。他先到冀东特委，不久调任津南特委书记，化名王元，住景县城东北之大刘庄，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活动于天津以南、津浦铁路两侧各县，主要任务是恢复党组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形势突变。党中央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面抗战，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展武装抗日。国民党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各界群众抗日热情很高，纷纷成立种种救亡自卫团体。赵搏对全国出现的大好形势极为高兴，认为党掌握枪杆子的时机已经到来。但他才到津南不久，人地生疏，力量单薄，困难很多，很想找一位帮手。这时，他想到了房东的族叔刘建章。他到大刘庄后，听这里的党组织介绍，刘建章早年在家乡即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后曾任中共景县县委书记，如今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经河北省委同意，赵搏于1938年初化装去北平，找到刘建章后，又一起化装去天津，同河北省委具体研究组织抗日武装问题。省委决定刘建章以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抗

^① 以上据薄一波等谈话整理，并经薄一波等审阅。

日自卫委员会冀南特派员及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九区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在津南特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赵搏对此十分高兴。

赵搏斗争经验丰富,且有以前在黄埔军校学得的军事知识。他同刘建章回到景县后,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北方局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与战略战术,紧紧依靠群众,和原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以景县为中心,积极发动、联合各地自发的零散的群众自卫武装,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正式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三个支队。

在大刘庄东三里路有个孙镇,驻有一股三四百人的武装,自称民众自卫团,实际受国民党掌握,又和日伪勾结,头目叫徐子和。孙镇离日寇据点不到二十里,赵搏考虑到这股武装一旦投降日寇,对开展抗日工作威胁极大,后患无穷,因此便商定由刘建章去动员他们参加我抗日联军,委徐子和为营长。但徐不干,企图参加伪“忠义救国军”。赵搏说:“看来非打不行,但仍要先礼后兵。”于是,便先派部队将其包围,由刘建章再去说服。徐子和等仍不转变。赵搏遂下令攻击,一举将其消灭,除了一大隐患。在武邑一带还有被国民党改编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号称万人,上将总司令叫赵云祥,部队盘踞四五个县,也和日寇勾结。赵搏等派人去争取其参加抗日联军,他们不干,还想“吃掉”抗日联军。这时,徐向前、陈再道、宋任穷等领导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已进驻冀南南宫一带,帮助地方党开辟工作。赵搏、刘建章的党组织关系已由秘密驻天津的河北省委转到冀南区党委,他们考虑到由八路军主力去解决赵云祥部队不够策略,便决定由抗日联军部队去打,终于把他们击溃,其残部逃到冀县。从此,开辟了冀南北部大片抗日根据地。

1938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奉党中央指示来到鲁西,建立太肥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区,以控制平汉、津浦铁路间

这一战略要地。1939年1月成立鲁西区党委，赵搏任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会书记。

赵搏经过长期地下斗争的锻炼，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坚持原则，果断坚定，善做思想工作。党校学员史端楚年轻纯洁热情，赵搏常给她讲革命故事，讲革命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变化，有的不断前进，有的被风浪淘汰。他说：“为了应付复杂斗争，你用个化名吧！”小史明白他的意思，就问：“什么名字好？”他说：“你叫史轮吧！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永远革命。”小史很高兴，一直念念不忘。有个同志失恋，情绪不高，觉得没脸见人，想自杀。赵搏亲自找她耐心谈话，要她别悲观，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可以另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以便更好地工作。这个同志终于想通了，变得很坚强。

太肥山根据地建立后，日寇深感不安。5月初，驻山东的日军头目尾高郎纠集济南、泰安、肥城等14个据点的日伪军8000余人，分九路向太肥山区大举“扫荡”。区党委和党校由赵搏具体领导，随一一五师师部，统一指挥开展反“扫荡”。敌人包围圈越来越小，5月9日开始向陆房山区合拢，10日分别占领山外各重要路口，实行封锁。师部和区党委机关连续几天和敌人兜圈子，一天来到陆房一带宿营，命令主力六八六团一部抢占山区制高点肥猪山，凭险扼守，迎击敌人。11日拂晓，敌人从四面向盆底似的陆房及周围不到五里的目标发起猛攻。区党委和党校同志迅速冲出村外，赵搏非常沉着，很快集合大家在沟里隐蔽，鼓励大家坚定必胜信心，认真组织后勤工作。黄昏，接到师部通知，准备夜间突围。赵搏首先向党员传达任务，随后全体集合做动员，精简行装，编组班排，指定干部，宣布纪律。党校学员无武器，分编到各班排，准备战斗。夜已漆黑，赵搏手提匣枪，带领队伍按照指定路线，向西南

方向疾进。当队伍过敌人暂住的村旁时，他已完全不像患有严重关节炎的病人，带着大家跑步前进。这时，背后响起密集的炮声，团团火光腾空而起，这是蠢笨的敌人正在向陆房及其四周各山头袭击。他们哪里知道，赵搏带领的队伍早就冲出了包围，拂晓时分已到达离陆房六七十里的地方宿营了。

到宿营地后，赵搏不顾疾病和疲劳，马上开会进行动员，安排生活，布置工作。一切就绪后，才去休息。这时，他和爱人李岩刚结婚月余，这天在陆房失散。李岩换上便衣，带领群众转移。以后她找回来，赵搏抱歉地说：“看我光照顾别人，把你丢了。”李岩说：“看你说的，大家胜利突围就好，这一带我熟，敌人没法治我。”

赵搏在鲁西突出的工作是建党。1938年，党中央先后两次发出发展党的指示。赵搏在区党委的支持下，把大量发展党员作为头等大事。首先公开上党课，吸收部队、地方干部听课，他亲自讲解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原则、党员条件、权利和义务。这种方式是过去地下党时期所没有的，因此影响很大，效果很好。5月办起了党校（公开叫干训班），他亲自讲课，大力培养骨干。同时大刀阔斧地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除原太西特委改为地委外，先后建立健全了四个地委和各县县委，要求县委在各区建立区委，村内有三个党员以上就成立支部。各级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定期汇报检查。东平县原有几十名党员，从6月到10月就发展了400人。肥城、泰安、长清等许多县，都发展到千人以上。根据地内的各村都有了党支部。党的发展，带动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的发展，并为以后坚持长期艰苦斗争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教育不够、手续不严、集体入党等现象，什么父子党员、姊妹党员、抗日党员都有，

也有个别坏人乘机混入。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又发出《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赵锜认为这两个文件非常适时重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因此,他积极贯彻,一面对党校学员加强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与党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使他们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一般停止发展,仔细认真地做好党员登记、审查工作;慎重地清除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等。当他发现有的党组织在审查中,违反党的指示,不重证据,凭主观猜疑,随便捕人,刑讯逼供,把“肃托反特”斗争神秘化、扩大化时,就坚决纠正。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亲自动手,取得经验。长清县有个妇女干部,出身于一个有名的上层人物、地主家庭。她在学校接受了进步思想,七七事变后回家,在党的教育下,以后入了党,积极参加和领导宣传队、识字班、募捐等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在本地区影响很大。当时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县长,以抗日为名,积极反共,公开宣称:有“民先”队员,可先斩后奏;还经常到这个妇女干部家里拉拢、威胁。赵锜来到这个地区,听到以上情况,认为教育巩固好这个党员很重要。有一天,他在一个同志家里,同这个妇女干部亲自谈话,认真听取她汇报工作情况和反动县长的罪恶,以及她个人的思想、家庭情况;对她在困难的环境里积极工作,给予表扬,并希望她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站稳立场,做好家庭工作。这次谈话,使这个干部很受鼓舞。以后她工作更积极,家庭也为抗战做了不少事情。

1940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成立鲁南区党委,赵锜任书记,加强对鲁南地区各项工作的领导。

鲁南区北迄蒙山,南到陇海铁路,东达沂河,西至运河,地域广

阔，是联系华中、华北、西北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境内群山连绵，又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但这个地区处在日伪军重重包围之中，境内国民党、地主武装很多，土匪猖獗；山区贫困落后，生活艰苦；党的基础、武装力量也很薄弱。1939年夏天，一一五师来后，才初步打开了局面，着手创建根据地。

赵搏到鲁南后，在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等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健全了区党委机关，并相继建立了三个地委。他先支持创办了《鲁南时报》，又主持创办了党刊《先进》，亲自写《发刊词》，要求党员认真学习，搞好团结，克服各种不良倾向。他兼任组织部长，筹办了党校，并兼校长，还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章，讲党课。他讲课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回答问题，讲得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大家经过学习，坚定了革命意志，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成了各部门的骨干。

赵搏还兼任鲁南军区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军区机关和三个军分区，建立健全了各县的地方武装和基层群众武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他针对当时军队和地方之间存在的问题，经常告诫大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主力部队。”他经常向罗荣桓等同志汇报工作，请示研究问题。在他的影响和教导下，军政、军民之间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一一五师来鲁南后，经过郟马、白彦等一系列战斗，减员很多。赵搏动员各地展开拥军参军活动，数千名青年光荣参加了一一五师，增强了部队战斗力。

赵搏在抓武装建设的同时，还抓了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他来鲁南后，经过积极筹备，于6月中旬召开了抱犊崮山区（后叫鲁南区）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次会议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了专员，组成了专员公署；还选举了参议长、参议员，组成了参议会。随后又相继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政府和参

议会,颁布各种法令,进行战备,禁毒、禁赌,开展民政司法、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工作。他发现各地有乱捕、乱关、乱罚、乱杀等现象,临郊地区最为突出,就和罗荣桓亲自去检查处理,及时制止了这些错误做法。郟城县县长翟兴亚贪污腐化,经查实立即撤职、开除党籍,并指示专署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批评各种挥霍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党和政府威信,战胜困难,都有重大意义。

赵搏十分重视群众工作。他每到一地,都亲自深入村庄调查访问,并耐心教导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郟马、白彦等战斗后,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马上抽调干部,组成两个工作团,开辟沭河两岸平原和天宝山区工作。他亲自和工作团的同志谈话,指示他们,除了依靠武力打掉地方反动武装,还要重视发动群众。根据赵搏的指示,鲁南工作团的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发展党员,工作很有成效。后来天宝山区封建头子廉德三叛变,勾结日寇,欺骗群众,抵抗我军时,广大群众依然站在我们方面。在各地群众发动起来后,赵搏推动召开了鲁南区工、农、青、妇各代表大会,分别成立各团体领导机构和各界救国联合总会。他到会讲话,鼓励加强群众运动统一领导。赵搏对违背群众利益的现象深恶痛绝。当时根据地财政很困难,有关部门曾组织向敌占区出售耕牛换东西。赵搏知道后严肃批评,说这是“饮鸩止渴,慢性自杀”,后果严重。他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保护了根据地的生产力。还有一次路过敌人封锁线,赵搏见路旁有马在吃豆棵,就问饲养员为何不制止?这位同志说:“这里是敌占区,吃点没关系。”他就耐心启发这位同志:“敌占区的庄稼也是群众种的,敌人不会种,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爱护群众利益。”

赵搏对干部更是爱护备至。专署有位同志,工作忙忙碌碌,脾

气又大,有人称他“官僚”。赵搏多次找他谈心:革命不能靠一个人啊,工作不放手,人家的积极性怎么发挥?批评人不择方式,别人怎么受得了?你这个样子别人都不敢接近、不敢说话,岂不成了聋子瞎子。赵搏还用斯大林的一段话,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效率愈高,愈有成效;反之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愈可能受到挫折和失败,工作人员愈可能庸俗化和成为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一席话,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区党委有位同志路过敌占区被捕,赵搏闻讯,立即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当他知道该同志在敌方未暴露身份时,就及时指示当地组织设法营救。两个月后,这个同志受尽折磨,胜利逃回。赵搏见到十分高兴,对其热情鼓励和安慰,亲自筹办食品,帮助他恢复健康。这位同志感动地说:“我真像到了母亲怀抱一样。”

赵搏对别人体贴入微,对自己却非常严格,从不特殊。写报告、起草文件,都是自己动手。党小组开会,他认真汇报思想,听取批评意见。有一次,机关党支部书记总结工作时说:“向首长请示不够……”他立即纠正说:“党内都是同志,不要称首长。”赵搏有肺病、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很弱,上级发给他一瓶鱼肝油,他说:“这药病号最需要”,就马上派人送到医院。有一次,部队打下一个敌人据点,缴获了一些小麦,就悄悄留下200斤,要总务部门照顾赵搏身体。他知道后,想到党校学员过年吃不上白面,就把这200斤小麦派人送去,磨成面,让大家好好吃了一顿面条。赵搏对爱人李岩要求也很严格,每次出外,他总要嘱咐不要特殊,注意影响。李岩听得多了,就说:“你就是老一套。”赵无限深情地说:“这老一套做到可不简单啊!要夺取胜利就是离不开这老一套。”

赵搏以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艰苦

朴素,忘我工作的精神,不到一年时间,就赢得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使鲁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为坚持长期抗战打下了可靠基础。

但是这却引起敌人的极端仇视。不仅日寇进一步加紧了鲁南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也极力争夺这块地盘,调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三七旅来鲁南,并以六八三团驻鲁南中心区——临郯费峰四县边区(简称边联县,今苍山县)北部九女山一带,专门对付边区。斗争极其尖锐复杂。

1941年又遇严重春荒,人们多靠糠菜、草籽、残果、地瓜秧叶充饥,乃至吃酒糟、树叶、树皮、花生皮。干部战士往往早饭中午吃,午饭晚上吃,有所谓“三黑”之说,即黑天、吃黑豆窝窝、喝黑豆汤。这年春节是1月27日,区党委住在边联县车庄,除夕还没搞来给养,大家先把搞到的一点猪肉分开煮煮吃了。赵搏亲自到各部门看望并鼓励大家,直到深夜才归。惨无人性的日寇、汉奸,竟乘大年初一拂晓发动突然袭击,赵搏未及歇息,就带领大家迅速冲上山头,迎着刺骨的北风,打击敌人。有位同志打趣说:“这个春节不错,五更吃大肉,天明放鞭炮。”这一天,他们一直在山上坚持到黄昏,敌人撤退了,方才下山进村。春节后,赵搏要求部队机关大力帮助群众春耕。一天,区党委机关住在房家村,赵搏带着大家给群众拉犁耕地。群众过意不去,悄悄煮了点地瓜和绿豆汤让大家吃。赵搏知道群众也很困难,再三谢绝。群众着急地说:“那您也别干活了。”这时他才说:“群众反对我们了,大家吃吧。”同时告诉群众再不能这样做了。

鉴于春荒严重,为避免与民争食,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首长研究决定,机关和部队分散到收成较好的地区就食,借以开辟新区;边区只留少数地方干部和武装坚持斗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

顾人民死活，竟趁火打劫。4月25日，原东北军三三四旅、三三七旅各一部及地方反动武装王洪九部，分别向边联县突然袭击，六八三团为急先锋。他们大肆逮捕屠杀我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和抗属，建立区、乡伪政权，编保甲，查户口，组织情报网，一片白色恐怖。我方成了所谓“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牵”，“一枪打透”的根据地。

赵搏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痛心。他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一一五师首长研究决定，坚决予以严惩，讨伐这些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叛逆，并迅速组成“讨逆”指挥部，他任政委，教导二旅曾国华旅长任指挥，以两团主力和边区支队组成“讨逆”大军，6月开始分兵三路全面出击。激战两星期，全部恢复了边区根据地。接着，赵搏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肯定成绩，表彰了坚持斗争的有功干部，批评了动摇逃跑行为，分析了鲁南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要求干部做好充分思想准备，经受考验，依靠群众，踏踏实实工作；迎接困难，坚持斗争。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四地委，领导临沭地区工作。赵搏还审批了两起重要案件，一是边联县三区区中队长沈文佃自首叛变，交枪投降，判处枪决；二是六区公安特派员李之秀被诬告逮捕，查明后立即释放，并对诬陷者严肃处理。从而打击了歪风，伸张了正气，振奋了人心。

1941年9月，日寇又开始“扫荡”，实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敌人先进犯临郯平原，接着进犯抱犊崮山区边联县，大肆烧杀抢掠后，又窜回据点。日寇合击时，赵搏领导区党委机关和党校机动转移，没有受到损失。敌军龟缩后，他们于10月20日住进了银厂村。正要休整，国民党反动派又乘机暗下毒手。

银厂村位于边联县中部，西北距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驻地九女山村20里。这天，国民党保山乡逃亡乡公所从银厂村坐探

处得到我区党委机关进驻的情报，马上报告了六八三团政训处主任、特务于大川。于大川又立即派秘密便衣特务、叛徒侯德俊去打探虚实。侯德俊以赶集卖柿子为掩护，到银厂村作了详细了解。赵锔住宅位于村中十字路口，南靠东西街，西靠南北街，院门朝西，门外设岗；对面街西院内安电台，对面街面是大柴园，街口西南角是水井，井后是破石墙。侯德俊在这里一面打听，一面仔细看了赵锔住处的地形、设置，又到村西看了松树林中党校学员听赵锔讲课的情况，马上回去详细报告给于大川和团长张本枝，得到了60元的赐赏^①。

于大川、张本枝一边将此情况报告旅部，一边于26日晚5时召集各营长部署次日拂晓攻击，并在银厂村内布置了内应，由坐探、闾长刘清桂扮做去坡里挑秫秸，带敌兵六人进村，藏在街南大柴园内，夜里又将各围门关闭上锁。这天午夜3点左右，当敌尖兵来到村西时，村东场上燃起火光，刘清桂打开西围门，送出一人迎着尖兵谈了村内情况。尖兵来到村外，被我岗哨发现，立即放了一枪，我哨兵遂被打死。此时，敌兵相继赶到，一部自西门攻进村内，奔向各袭击点^②。

区党委机关和党校同志被枪声惊醒，分别集合或自动边打边向村外冲。但因围门紧闭，无法出去。同志们人自为战，有的越墙，有的破门，有的推倒石砌围墙，大多数先后冲出村外，只有少数仍在原地隐蔽。赵锔这夜睡得很晚，因为党校学员要毕业，有的来谈工作，有的来告别，送走他们，又忙完其他事情，睡下不到三小

^① 于大川、侯德俊的供词。

^② 敌六八三团一营营副李世祥的供词。另见燕遇明等突围同志的回忆材料。

时，忽然听见枪声。因为白天他接到一份“情报”，说鬼子可能出动“扫荡”。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为转移我注意力而制造的假情报，但当时没有识破。所以他起身后，首先向东边白山村驻军打电话，刚说了一句“可能敌人‘扫荡’”，电话线即被切断。宣传部吕志先副部长跑来问他：“是否向东突围？”他说：“可以，我随后就去。”吕志先便冲了出去。这时，由于赵搏门口的卫兵已被井旁敌人伏兵打倒，西院电台同志亦被敌人用木棍打死。赵搏在两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的前后护卫下击退敌兵，迅速向东突围。但没走多远，他忽然想起秘书刘勇调动工作交下的一个机密文件包，还没带出，里面全是党中央指示等绝密文件，就命令通讯员继续前进，自己迅速返回屋内找到文件包。为了不使文件落入敌手，他当机立断，点火焚烧，一切办妥，才又向外冲。他知道前门不能出，便去翻后墙，结果被敌伏兵逮捕。通讯员见他迟迟不来，也迅速返回屋内，只见烧过的文件余火尚红，但已不见赵搏，就又冲了出去^①。

赵搏被五花大绑，关押在敌人团部通讯连，不给水喝，只给点发了霉的煎饼，用腿夹着吃。此刻，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思考着如何进行新的斗争。开始审讯时，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说他叫王德忠，江苏人，在营部当文书。特务于大川很狡猾，没有轻信。在押的人里有个叫蔡明的，原是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在银厂负伤被俘，当了叛徒，供出了赵搏；还有党校的两个通讯员，也供出了赵搏。所以第二次审讯时，他泰然自若地说：“我是赵搏，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也告诉你，抗战无罪。”^②

于大川、张本枝见抓到鲁南共产党首领，欣喜若狂，当即向其

① 孔彬等的回忆材料。

② 于大川的供词。

上司报告。他们的上司要他们通过审讯,弄清鲁南共产党的情况,并劝赵搏投降。于、张经过策划,先摆宴席,邀请高级长官作陪,还大讲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党”、“共军破坏团结统一”等谬论,劝赵搏投降。赵搏胸有成竹,拒不喝酒,俨然以我党谈判代表的姿态,端坐首席,针锋相对地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一党专政”,坚持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动政策。他质问敌人:“你们能举出一条我党我军不利于抗战的事实吗?”敌人无以答对,又胡扯什么“你受共党欺骗教育太深啦”,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蒋委员长不允许共党存在啦”等等。赵搏说:“我自觉革命,决不盲从,我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党的最低纲领是实行孙中山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我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合乎国情,顺乎民意,一定能实现的。蒋介石过去背叛孙总理遗教,剿共十年,不但没剿灭我们,反而招来日寇侵略,半壁河山沦陷;现在若再一意孤行,发动内战,恐怕连后方老家也难保。”敌人又厚颜无耻地说:“你们军无粮饷,弹无来源,到处游击,何以胜利。素闻先生才学出众,如能悬崖勒马,可不咎既往,呈请军座保证你相当于原有地位……”赵搏轻蔑地一笑,又郑重地说:“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依靠民众,取之于敌,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关于我个人,只求民族解放,人类幸福,从不为升官发财。至于祸国殃民的官,更绝对不干。我倒奉劝你们悬崖勒马,继承东北军的光荣传统,与我军合作抗战到底。”敌人理屈词穷,宴会只好狼狈而散。

于大川、张本枝此计未成,并不甘心,又要新的花招。他们派了一个年轻女子,劝说赵搏招供投降。赵搏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德告诉她:我有爱人、有孩子,现在也想念她们;但决不

能为此而出卖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样遗臭万年，也对不起妻子后代。同时赵搏对她进行教育，劝她不要出卖灵魂，做反动派的工具。这个女人回去暗地夸赞赵搏真了不起。

于大川、张本枝恼羞成怒，妄图以严刑使赵搏就范。一次审讯中，张本枝凶相毕露，未说几句话，就拳打脚踢，破口大骂。赵搏以政治家的风度讽刺说：“你有话讲话，有理说理，像你这样岂不有失‘国军’团长身份。”于大川是国民党团党部总干事，他明知赵搏“理论高深，说不服，驳不倒”，又故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问赵搏：“你们既然也实行三民主义，我们信仰一致，何不归顺国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赵搏反问他：“你读过《中山全书》吗？三民主义宗旨是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你们干些什么？”于大川自知理亏，便说：“这些理论问题可暂不谈，依你身份可谈些别的。”“别的谈什么？”“譬如你们的组织系统、驻军情况。”“这是我党我军的秘密，怎能对你谈。”“你知道你已是俘虏，由不得你。”“那好，就由着你，我告诉你，我代表鲁南共产党，共产党员就是我，怎么处置都可。”于大川图穷匕首见，就命令喽啰把赵搏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赵搏昏过去了，他们又用冷水泼醒。接着，又用吊打、压铁杠、灌煤油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折磨。赵搏被关押20天，先后刑审十多次，每次都被拷打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机密。

银厂被袭击的当天，突围的同志未见赵搏，心中十分沉重，经多方查询，证明他已被俘，更是心如刀绞。但他们仍然保密，以免敌人发觉。当大家知道赵搏的身份已经暴露，并和敌人顽强斗争时，无不深为感动，同时又提心吊胆，总希望他能转危为安，逃出虎口。为此，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和区党委一起研究，千方百计进行营救。不少群众还冒着风险，举行集会、请愿，要求国

民党当局释放赵搏。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置正义呼声要求而不闻。当他们经过反复较量，知道赵搏稳如泰山，不可动摇，从他身上不能获得任何东西时，便采取了更卑鄙的手段。11月19日零点左右，赵搏被敌运输连押出村外，带到村西河西岸、沟北崖的小土台上，土台中间已挖了坑，四周警戒森严。赵搏心里明白，敌人要秘密处决他。对于死他早有准备。此刻他不但非常从容泰然，而且好像并非体弱多病，也未受过摧残折磨，显得特别精神抖擞。他要用生命的最后一息为党工作，要把刑场当课堂，教育国民党官兵。他要求讲话，开始连长不允许，赵搏就说：“我就要牺牲啦，还能剥夺我这点权力吗？”连长只得答应。赵搏屹立坑旁，迎着寒风，从容不迫地讲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大感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只要广大军民坚持抗战，渡过困难，最后一定会胜利。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准备投降，真是天怒人怨，不得民心。讲到这里他说：“当然国民党广大下层官兵是爱国的，是不愿做亡国奴的，特别是东北军，有着光荣的抗战历史，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三千万同胞拱手让给日本，使你们背井离乡，抛开父老兄弟姊妹，流落关内，困难重重；现在还欺骗你们，不去抗日，反而枪口对内，屠杀自己的同胞。大家想一想，你们哪个是地主，哪个是资本家，你们打仗还不是替他们卖命。应当赶快觉悟，调转枪口，同我军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他又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为了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但是我没想到，大敌当前，日寇还占领着我们的国土，蹂躏着我们的同胞，我没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死在中国人手中，这是十分痛心的。当然我知道这是上边的事，你们是被迫的，

迟早你们会觉悟。请记住：中国人民是杀不绝的，我死了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为我报仇，抗战一定要胜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说到这里，他把钢笔、怀表取出，大衣脱下，告诉大家：“现在天冷了，这大衣给你们穿着打鬼子。钢笔给你们，好好学习，揭露鬼子和反动派。表给你们，掌握时间休息好……”

赵搏句句动人的讲话，慷慨无私的行动，士兵们听着、看着不禁热泪盈眶，有的抽泣出声。

特务于大川非常狡猾。他领受“秘密”处决赵搏的旨意后，开始没有直接出面，但他又不放心，便带着喽啰，手提匣枪，随后赶到刑场。见赵搏还在说话，就暴跳如雷，责问士兵：“为什么不快埋?!”赵搏毅然跳下坑去，士兵们还不忍心向他身上填土。于大川吆喝着：“快埋！快埋！”赵搏最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35岁。

赵搏壮烈牺牲时的地方，附近有个小屋，住着一位孤老大爷，名叫李安起，这夜他从睡梦中惊醒，隔窗目睹了反动派的罪行，亲耳听到赵搏的铿锵讲话。他悲愤交集，彻夜未眠，天不明就悄悄去告诉别人，并要他们永远记住共产党的这位好干部。接着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后来逢年过节，善良的老人们就偷偷捧着纸香供品，到赵搏就义的地方悼念。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赵搏的英雄事迹，依然神话般传颂着，成了人们敢于斗争、坚持真理、正直做人的榜样。

当时被迫执行任务的运输连士兵，亲眼看到了这位真正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再看自己的官长和国民党员们争权夺利，一心升官发财，压榨兵民，残害忠良，是何等卑鄙齷齪。两相对比，便开始觉悟，内心感到无限内疚，因此他们纷纷相约“开小差”，有的跑回老家，有的直接投诚我军，不到一个

月,全连从士兵到连长全部跑光了。这个团其他连营的士兵受到影响,也跑了不少^①。

广大干部群众听到赵锜牺牲的噩耗,真像晴天霹雳,悲愤之情难以形容。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无比惋惜地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各机关团体部队纷纷召开追悼大会,悼念赵锜。边联县在银厂村召开的追悼大会上,群情激昂,当众枪决了坐探刘清桂、刘清环,告慰烈士。

鲁南区党委、专署等机关在白山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赵锜的爱人李岩抱着八个月的小凯英讲话时,全场一片抽泣声。

鲁南广大军民以烈士为榜样,咬紧牙关,渡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1943年春,在新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王麓水领导下,展开全面反击。1944年10月,“银厂惨案”三周年时,赵锜烈士遗骨被移到风景优美的文峰山之阳,砌墓安葬。群众自动捐献铜钱,很快凑了整九斤,溶化后铸了铜像,嵌在墓前,并立碑纪念。这天,万余军民抬着祭品、花圈、挽联,齐集烈士碑前,隆重举行纪念追悼大会。鲁南区党委的巨幅挽联写道:“从容就义,共产党人本色!扫除奸丑,慰英灵于地下!”烈士遗孤、赵锜惟一的儿子、四岁的赵凯英喃喃地说:“报仇!报仇!”

但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赵锜烈士依然怀恨在心,1946年冬,他们进攻鲁南时,又用大炮轰击烈士碑和墓,还有赵锜烈士的铜像弄到马庄广场上,当靶射击,妄图把烈士遗迹彻底毁掉。但这是万万办不到的。1947年初,人民解放军两天一夜就全歼了进攻这个地区的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活捉师长马励武。赵锜烈士的铜像,又被武工队抢回来,并请巧匠修复。接着,七区军民隆重召

^① 房永一等回忆投诚士兵谈话的情况。

开庆祝胜利大会，鸣礼炮，吹喇叭，给赵搏烈士的铜像披上红绸，兴高采烈地抬上文峰山，重新嵌在墓前。

革命愈胜利，人们愈加怀念曾为夺取胜利而献身的烈士们。解放后，党和政府花大力进行了破案工作，将当年直接杀害赵搏的特务于大川和侯德俊、李世祥、迟天民等缉拿归案，依法给予严惩。临沂地区烈士陵园重立赵搏烈士碑，永远纪念。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像赵搏这样将一腔热血献给人民，对党忠心耿耿，先后三次被捕入狱，一直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残酷杀害的光荣烈士，林彪、“四人帮”竟将其列入所谓的“六十一人”案内，扣上“叛徒”罪名，欲扒其墓、扬其骨、砸其纪念碑。这些无耻之徒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何不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1979年1月25日，在北京为胡锡奎等五位同志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在悼词中说：胡锡奎同志“在狱中同殷鉴、赵搏等同志一起，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以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英勇不屈的献身精神，开展了监狱内的革命活动，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夺取了对敌斗争的胜利。1936年出狱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从此，赵搏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陈华鲁）

赵伯经

(1903—1959)

赵伯经,原名文鳌,又名幼麟。陕西麟游人。1921年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曾参加进步学生组织渭北青年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建中共乾县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1926年冬在国民军联军甄寿珊部教导队做兵运工作。1927年夏回麟游从事建党工作。1929年10月组织武装力量打入甄寿珊部,任营长兼麟游县长。1932年8月组建麟游游击队,任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麟游特支书记,县工委书记,西兰工委军事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关中军分区教导团团长,麟游县常备队队长,中共西府工委书记兼西府支队司令员,西府游击总队司令员,西府分区行署专员兼西府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彬县军分区司令员、行署专员,政协陕西省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9年12月1日在西安逝世。

(一)

赵伯经,原名文鳌,又名幼麟,曾用名赵鳌、王治国、赵忠言。1903年生于麟游县城北街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赵运昌,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赵伯经受父亲思想熏陶,幼年就有继承父志,投身革

命的思想。1921年他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参加了进步组织渭北青年社。1923年暑假，赵伯经和刘耀庭回县，在西巷高小教职员工中成立了雪耻救国会，在县城集会上喊出“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官僚”，“打倒贪官污吏”，“宁为华鬼，不作洋奴”等口号，进行爱国主义思想宣传。群众听了宣传后，把仗势欺人、高利盘剥的县民团团总琴玉卿和恶棍罗大打了一顿，并拉出去游街示众，冲破了麟游山城阴郁的空气。

1925年，赵伯经在三原县参加了声援二七、五卅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罢课示威活动，以及支援西安学生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在斗争中，经李友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初，赵伯经受中共三原特支派遣，在三原西关筹备农民协会期间，经张安人（张仲实）、赵宗润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0月被吸收为魏野畴组织的宣传队队员，先后去乾县、兴平等地讲演，贴标语，撒传单，揭露刘镇华祸陕罪行，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协助组建了中共乾县特别支部，并任支部组织干事。11月，他被组织派往甄寿珊部做兵运工作。

1927年8月，赵伯经同刘耀庭、白廷栋等回麟游开展革命活动。他在县立高小任教，不久在该校建立了中共麟游小组，任组长，先后发展王乐天、刘章天加入党组织。翌年2月，在岐山特别支部帮助下，成立了中共麟游支部干事会，刘耀庭任书记，赵伯经任组织干事。

当时县高小以校长赵步云为首的保守势力，规定教员和学生不能接触社会，无权过问政治。为了唤起民众关心国家大事，赵伯经等发动撤换校长的请愿斗争，迫使赵步云辞职，赵伯经接任校

长,聘任刘耀庭为训育主任,改进学校管理,充实教学内容,组织教师编写国耻史、工运史、农运史等教材,教唱《李大钊为民牺牲》的红色歌曲,翻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小册子,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教育,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8年4月,王泰吉在麟游起义,敌人怀疑此事与赵伯经有关,便密令麟游县长王者宾将赵伯经逮捕,关入西安军事裁判处。在西安监狱,他备受酷刑,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更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他常对同狱的难友说:“一个青年人,自从他开始投入革命怀抱,早已把坐牢当家常饭,死则死,死得光明磊落,重于泰山。”他在给刘耀庭的信中说:“我活则我幸,我死则我不幸,勿以小事而挫大气,抱定主义,努力前进。”表明他的革命气节和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在敌人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赵伯经于同年7月被释放出狱。

(二)

赵伯经回到麟游后,根据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渭华起义的经验,总结了自己几年来革命斗争的教训,深有感触地说:“今后要下决心干到底,非抓枪杆子不行。”

1929年10月,赵伯经说服叔父变卖部分家产,筹钱买了几枝步枪,联络王乐天、刘章天、高超等几名共产党员,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趁甄寿珊组织西北民军之机,赶走了县长邵攀桂,收缴了县政府和一些散兵的武装。1930年2月,赵伯经参加了西北民军,任警卫第三营营长兼麟游县长。他把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在营部和县政府工作,极力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惩治劣绅、贪官污吏。在县城处决了民众愤

恨的县政府衙役第三班的总头张耀，剿除了窜扰在桑树原等地的土匪，博得了全县人民的赞扬。

1930年11月，甄寿珊部瓦解，赵伯经离开该部。1931年夏，经王泰吉、李艮等斡旋，他进入杨虎城部驻麟游的赵慧生团，做兵运工作。因该团是甄寿珊旧部地方武装，可以自行招兵买马，他便在原警卫三营的基础上，联系魏含忠（共产党员），收编了非法武装苟飞虎部，组成第三营，被委任为营长。他的部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深得人民的爱戴。12月，赵慧生借准备移防之机，向全县群众摊派开拔费3000块银元，棉军服600套。因连年遭灾荒的百姓无力支付，即遭到鞭打绳拴。赵伯经决定乘机举行武装起义，乘赵慧生去彬县旅部开会之机，以早操比赛为名举行武装起义，击毙副团长杨德武、警卫队长陈生华，收缴了团部和机炮连的全部武器。起义部队撤离县城后，赵伯经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起义部队在王乐天、魏含忠的带领下开入县北阁头寺一带，准备去千陇山区打游击。后因遭敌民团的袭扰，魏含忠牺牲，后有追兵，起义人员分散隐蔽，王乐天去西安找到赵伯经，二人同去王泰吉骑兵团学习军事技术。

敌人在追剿起义部队时没有抓到赵伯经，便采取卑劣手段，拆毁他家房屋二十多间，严刑逼死他的妻子，不满两周岁的孩子也随之夭亡。有人对赵伯经说：“流离颠沛，家破人亡，你能无动于衷？”他慨然答道：“革命为天下谋太平，我以一家之破败，换取大多数人之幸福，何乐而不为，请勿多言！”

1932年8月，省委指示赵伯经同王乐天继续回麟游开展武装斗争。赵伯经回麟游后，联络许晓东、刘章天、陈世业等在郝家原东岭赵康家中成立了一支有30多人参加的游击队，赵伯经任队长。这一年久旱无雨，是麟游几十年罕见的凶年饥岁。为了帮助

群众度饥荒，赵伯经按照省委的指示，同王乐天一起协助县东贫苦农民建立了工农兵经济委员会，组织群众到彬县太昌、水口和甘肃灵台县的邵寨等地，打开官府和富豪的粮仓背粮。背回来的粮食，八成归个人，二成交公，用来调剂给无力背粮的群众。赵伯经还以个人名义，通过社会关系向当地有粮的友好人士借粮分给群众。另外对下乡催粮款的贪官污吏，实行严惩，使他们不敢欺压百姓。由于他们关心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建立了鱼水情谊，游击队发展很快。

随着游击队的发展，赵伯经的威名越来越大，使敌人大为震惊。麟游县保安团长侯振国发誓要活捉赵伯经，消灭游击队。

1933年10月，游击队驻申家原，当时在队的只有30多人，侯振国乘机调两个中队兵力扑来。赵伯经、王乐天闻讯，立即做好埋伏，等敌人进入埋伏区，赵伯经一声令下，战士们勇敢冲杀，打得敌人仓皇逃窜，活捉了两名中队长和一名分队长，缴获步枪100多枝，子弹3000多发。

侯振国不甘心失败，又亲自率领200多人，杀气腾腾地向游击队驻地碑子梁扑来。当时游击队只有50多人，赵伯经沉着指挥应战，少数队员占领制高点，正面迎击，其余队员埋伏在荒草丛中，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活捉了侯振国，缴获步枪100多枝，短枪三把，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侯振国被活捉后，敌人肆意报复，挖了赵伯经家的祖坟，将其祖父和父亲暴尸于野地。又把机枪架在赵母的肩上射击，赵母连震带吓被折磨而死。赵伯经并没有被吓倒，他对于母亲的死无限悲痛，但对敌人更加仇恨，对革命事业更加坚定。当敌人又调凤翔警备司令部刘文伯一个营偷袭游击队驻地申家原时，赵伯经巧妙指挥，击伤了敌营长王耀襄，打退了敌人的窜扰。

(三)

1934年,赵伯经任中共麟游总支书记。当时,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这年6月,赵伯经根据上级党委关于搞合法斗争的指示,通过进步人士刘民生、李子教等人,与麟游县当局协商,以“不调换人员,不调换武器,不进城驻防”为条件,把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党麟游县保安团崔木区团(仍为共产党领导的秘密武装),他被委任为区团长,驻防崔木镇。

1936年5月,赵伯经任中共麟游特支书记。西安事变后,中共西兰工委委员严克伦到崔木向赵伯经通报了西安事变情况。赵、严率部进入县城,收缴了县机关的武器,拘禁了一些官吏及其家眷,召集县城绅士二十多人,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西安事变的情况,揭露蒋介石集团镇压抗日运动的罪行和阴谋,号召各界同胞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团结抗日的八项主张。到会人士一致表示要同舟共济,团结抗日。

当晚,在刘耀庭家召开党员大会,传达西兰工委指示,分析了全县的政治、军事情况及各界人士的政治态度,决定加强麟游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赵伯经参与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并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团结进步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召集西巷高小师生开会,说明西安事变的情况,讲解张、杨八项主张内容,激发师生爱国主义的正义感。在县城丁字街口广场,召开农民、商人、学生、士兵等5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学生、农民和绅士代表发言,表示完全拥护张、杨的抗日主张,团结抗日,收复失地。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赵伯经、严克伦率部返回崔木,安排下一步的活动。

1937年5月,外出受训的麟游县县长杨烈回县,得知西安事变期间赵伯经等在县城的活动情况,气急败坏,请调一团国民党军队进驻麟游。党组织觉察到赵伯经在麟游难以立足,便调他去云阳等地工作。

杨烈逼走赵伯经后,全县多数绅士不满,政令难行,地方治安混乱,局面无法支持。进步人士建议:“麟游政局要稳,非赵伯经出山不行。”这时,全国已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开始,杨烈才允诺请回赵伯经。9月,赵伯经回到崔木,11月任崔木保安队队长。

七七事变后,赵伯经从崔木保安队内抽出二十多人,编为麟游县保甲游击队(又名抗日义勇游击队),自任队长,进驻两亭镇,继续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剿除土匪,并带领麟游旅凤同学同乡会组织的宣传队到县城、招贤、两亭、天堂、万家城、店子壑口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演出。

1938年2月至8月,赵伯经任中共麟游县(工)委书记。时任麟游县县长温雅儒(温重为),早年曾与共产党有过联系,思想比较开明。赵伯经根据西兰工委的指示,为了促进抗日,主动和温雅儒交朋友。温把赵伯经领导的武装从崔木、两亭调进县城,编为常备队,以赵幼麟的名字报准赵伯经为麟游县常备队队长兼兵役科科长。赵伯经又通过温雅儒联系,把凤翔军火库的一部分枪支弹药搬迁到招贤,准备战时之用。6月,赵伯经出任中共西路地委军事委员,仍在麟游从事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期间,反共顽固分子、社训队督练员邬凤鸣到处窥探中共地下组织情况和赵伯经的活动,赵觉察后,乘邬春节后从乾县家乡返回麟游途中,派人将其处决,拔掉了这颗钉子。

1941年7月,刘玉德任麟游县长,改任赵伯经为民政科科长。

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排在县、乡、保组织中任职。全县的大小组织,除警察局外,大部分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四个乡长中两个是共产党员,两个是抗日的同情者。1942年春季的一天,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宏达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指责麟游宣传抗日腔调过激,辱骂麟游人民无知。赵伯经便指示刘耀庭及西巷高小教师相继登台驳斥王宏达的滥言。王宏达尴尬难耐,偷偷溜出会场。不久,赵伯经被调任教育科科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组建了麟民游艺社(后改为抗建剧社),利用舞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演戏所得之钱,除剧团消费外,一部分捐给学校修缮校舍,一部分赠给民众抗敌后援会,作为抗日救国活动经费。

赵伯经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3年9月,陕西省政府派反共老手马绍中任麟游县长。马来麟游时,第九区(即宝鸡专区)专员温崇信叮嘱:“赵伯经是共产党,要多加留意。”赵伯经也早有准备,他在办公桌上摆着《明儒学案》、《王阳明全集》等书籍,迷惑对方。马绍中费尽心机,仍没拿到赵伯经的什么证据。10月,九区专员召开冬防会议,温崇信授意给马绍中带赵伯经参加会议,妄图在会后寻机扣留赵伯经,赵伯经意识到这是个阴谋,但他为了顾全大局,将计就计,冒险“赴会”。临走时,他告诉王乐天:“万一我出了问题,你们设法行动,不能叫敌人一网打尽。”会上,赵伯经从容镇定,敌人没有找到岔子,又经前任县长刘玉德作保,安全回到麟游。

1943年11月,中共麟游县委书记王乐天被捕,麟游党组织遭到破坏,国民党陕西省当局派兵到麟游逮捕赵伯经。赵伯经镇定自如地整理转移党内文件,直到抓他的军队到了崔木,县城已经戒严,他才化装出城,经刘民生等进步人士护送,从阁头寺、天堂到宁夏固原,寄居在高桂滋部甄炳麟处。

国民党当局没有抓到赵伯经，便在西安各报登载了对赵伯经、许晓东、刘章天、赵杰、柏少英等人的通缉令，还可笑地以全县民众名义开除了赵伯经的“县籍”。

(四)

1944年10月，中共关中地委调赵伯经回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接见。此后，赵伯经先后任关中地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分区教导团团长等职。

1945年至1946年，赵伯经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利用故交，与当时驻在旬邑土桥、张洪镇一带的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队长董策成和机枪三中队队长龙伯渊建立统战关系，策动他们举行起义。1946年8月，董策成将起义队伍带进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的接见。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王震率领人民解放军三五九旅，从中原解放区突围，经豫西南、陕南、关中西部，沿千陇地区北上陕甘宁边区。时任中共西府工委书记的赵伯经接上级党组织部署，抽调了两个加强连和一个干部队组成以他为司令员、刘懋功为副司令员的游击支队，出击麟、扶、岐边界地带，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牵制敌人，策应王震部通过西府沿北山地区，胜利进入边区。

1947年6月17日，西府总队正式成立，赵伯经任司令员。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发动了西府战役。赵伯经和吕剑人、董策成率领西府总队一、五支队及总队机关，跟随野战军总部于4月21日解放了麟游县城，建立了县、区人民政府。赵伯经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精神，代表西府总队和麟游县人民政府，在招贤杜阳

堡召集国民党麟游县没有逃跑的十多名军政官员开会，宣传共产党对旧政权人员的政策。还在全县张贴布告，宣传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和纪律，为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政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五)

全国解放后，赵伯经任彬县军分区司令员兼行署专员，后调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他进城后，继续保持战争年代那种旺盛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58年，赵伯经的儿子赵鹏程由西安到麟游县工作，他在信中告诫儿子“做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记住谦虚谨慎，不要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翘着尾巴做人。”1959年，赵伯经春、夏两次到麟游视察工作。他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和社员一起割麦，和牧童一起照相，同老汉、老太婆一起拉家常，向民主党派人士征求意见，和社、队干部谈工作，教方法，在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伯经回省委后，将视察的情况，如实向省委写了报告。同年12月1日，赵伯经在“反右倾”斗争中致死。“文化大革命”中又遭诬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赵伯经的历史得到公正的评价。1984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在西安烈士陵园为他立了纪念碑。

赵伯经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那勇敢战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忠贞不屈的无产阶级立场，为人正派、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艰苦朴素、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柏侠林 田雅儒)

南 汉 宸

(1895—1967)

南汉宸，山西洪洞人。1924年入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需、参议。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统战工作。1928年春与魏野畴等领导皖北暴动。1930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1932年冬因南京政府通缉离职，到天津、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北

做争取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1939年回延安。1940年赴晋西北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1945年任晋察冀边区财政处长。1948年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兼华北银行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67年1月逝世。

南汉宸，原名南汝箕，化名王剑秋，1895年12月14日出生在山西洪洞县韩家庄。

南家属自耕农，家有薄产。汉宸四岁时父亲故去，全靠祖母把

他培养成振家立业之人。

南汉宸有个表兄，是清朝最末一科秀才，把南汉宸介绍到自己的同学狄龙田处学习。狄龙田是小学教师、哥老会成员，全县闻名的革命党人，学问博深。他要求学生放弃《四书》、《十三经》，专读新书。1911年，狄龙田把南汉宸等二十余名学生领到太原，入官费的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还特意把他们介绍给同盟会山西负责人王用宾。王用宾除抽时间来校授课外，常送给他们一些新书和日本出版的《民报》。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太原革命后的第五天，南汉宸和十几个同学被派回晋南，到赵城、洪洞、汾西一带招兵。

南汉宸等回到家乡，很快就参加了哥老会，利用哥老会的关系，不到半月就集合了2000余人。他们把这2000多人带到太原，队伍番号是义务敢死队，接着开拔到娘子关，归新军一路统领杨潜夫指挥。这时，南汉宸肩扛毛瑟枪，已是统领100多人的队长了。不久，南北议和，阎锡山投靠袁世凯。1912年，部队遣散，南汉宸重回师范读书，后又考入官费的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

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政治空气沉闷。南汉宸身为班长兼斋长，常常组织学生们闹学潮，为此，他被学校当局视为眼中钉，在1913年间的两个月中就被开除三次。全体同学罢课反抗，并摔碎学校的除名牌，才使校方收回成命。但南汉宸已决心离开这里了。

1915年，南汉宸回乡教书。在乡下的三年中，他接触过基督教徒，读了许多基督教的书。此时的南汉宸虽有革命激情，但思想上还是一片迷茫。乡村的清静闭塞使他与沸腾着革命气氛的城市隔绝了，真可谓“拔剑四顾心茫然”。过年时，他在家门口贴了幅对联：“垆旁辍耕真面目，灯前推稿假诗人。”一个同学看了叫道：“你是要造反呀！”

1917年，晋南革命人士不堪忍受阎锡山的暴虐统治，联络陕西

革命志士郭坚攻打山西。南汉宸参加了赵城的反阎内应活动。他们在赵城集合百余人，黑夜进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的70余枝枪，又抵霍县缴枪60余枝。后因郭坚部被陕西督军陈树藩勾结阎锡山堵截惨败，南汉宸参加的赵城活动，也随之告终。

南汉宸返回家乡，欲向实业方面努力。经和友人商议，大家集资5000元，在赵城东山办起义集煤炭公司，南汉宸被推为经理。公司于1920年正式开业，同时还经营水力纺织和轧花。但由于资金不足，交通不便，又无力与大企业竞争，两年后就停办了。这期间，南汉宸曾到东山上的广胜寺里，阅读了佛经。

1922年，续西峰、景梅九、续范亭等在天津反对北洋政府，联合大名镇守使兼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参与其事。孙岳部下有南汉宸的许多旧识，屡次邀南出山。1923年，南汉宸离家抵津，参加陕军第一师，重新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军阀洪流之中。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方改编为国民军第一、二、三军，南汉宸参加了孙岳的第三军，任军需；不久，奉孙岳令在郑州招集兵马。1925年秋，南汉宸又被派到第三军训练处任处长，培训十队学员。津浦路战争爆发，国民军开赴天津，训练处的八个队随军作战，南汉宸率其余两队到河北灵寿、平山一带招募新队员。1926年春，南汉宸带六队新兵开到津浦线泊头镇参战。但时乖命蹇，国民军屡战屡败，南汉宸和训练处辗转保定等地，与胡德夫旅的训练处合为第六混成旅，续范亭任旅长，南汉宸为参议。不久，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合围国民军。第三军受命攻打蔚县，并阻击易州来犯之敌。续旅正面是敌魏益三部，两军相持数月。5月初，多伦失陷，张北告急，国民军军心涣散，南口战役失利。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欲投降阎锡山。续范亭、南汉宸坚决反对，表明即使饿死沙漠也绝不向阎某俯首！争论半夜，终于破裂。徐永昌投降了晋军；续

旅和武勉之的骑兵旅退到绥西五原，另建军部，推邓宝珊为第三军军长，南汉宸任第三军参谋处长。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到五原。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公推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由于冯玉祥此时实行亲苏政策，故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各军也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宸担任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

在国民军转战的两年中，南汉宸曾与共产党员蒋听松、王一飞、卢绍亭等一同共事，还阅读了《新青年》、《向导》上的不少文章，对共产主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926年10月，国民军联军由每个军挑选四人组成参观团访问苏联，第三军有武勉之和南汉宸参加。启程前，南汉宸找到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郑重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刘伯坚素知南汉宸追求进步，是个练达的政工干部，故毅然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和高敬轩一起作了南汉宸的入党介绍人。刘伯坚嘱咐南汉宸在路上要多同参观团团团长鹿钟麟接近，团结此人，为以后在西北活动奠定基础。

参观团于11月由五原出发，一个月后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共住三个月，参观了许多机关、学校、军队和农村，听取了苏方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报告，使南汉宸倍受鼓舞和启发。整个参观期间，南汉宸遵照刘伯坚的嘱咐，主动接近鹿钟麟。鹿钟麟对南汉宸十分信任，许多演讲稿都要南汉宸起草，直到回国后二人还保持着联系。

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在南汉宸等出访期间，国民军联军向宁夏、甘肃、陕西进军，并于1926年11月解了被军阀刘镇华围困八月之久的西安城围。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改称国民

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开赴潼关，配合北伐军北进。南汉宸回到西安时，正值冯玉祥先后参加汪精卫、蒋介石召开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公开投靠蒋介石，准备在所属部队反共“清党”之时。他赶到潼关找到刘伯坚，一起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刘伯坚嘱咐他尽力留下工作。随后，南汉宸偕同鹿钟麟到了开封。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实际由鹿钟麟以民政厅长代主席之责，委南汉宸为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主任兼第一科科长，党内受河南省委负责人任作民领导。南汉宸这时写了一本16万字的《游俄视察记》，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和革命后的建设成就，并指出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以鹿钟麟的名义印了5000本散发，影响颇大。不久，冯玉祥电令烧毁。

1927年夏，杨虎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陇海路东段与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部作战失利，退至皖北太和。杨部和原驻太和的第十七军高桂滋部的共产党员，在军内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冬，为加强党对皖北工作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派南汉宸带一批共产党员去皖北。南汉宸接到通知后，以“有病”为由向鹿钟麟告假，并让武勉之、高敬轩、刘仲华等“开小差”离开鹿部，相偕前往皖北。南汉宸等到皖北后，向驻军和地方党组织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文件，并同共产党员魏野畴一起，积极做杨虎城的工作。此时的杨虎城想摆脱冯玉祥，又不愿归蒋，正处在苦闷彷徨之中。他素闻南汉宸在孙岳处训练干部有方，又是国民军的旧部，遂热情邀请南汉宸等到第十军工作。为了改造第十军，在皖北站稳脚跟，南汉宸欣然同意。按照南汉宸的建议，杨虎城决定从全军基层官佐中选择400多名进步青年，成立革命军事干部学校，并任命南汉宸为校长。这所学校建立后，为第十军训练出大批军政干部，其中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力量的发展，使十军内的保守分子深为

恐慌，一致反对南汉宸等“赤化分子”。但杨将军深感旧军队之腐败，合作、改组之心甚诚。

1927年12月，中共皖北第二届特别委员会在太和成立，南汉宸任特委书记，第十军政治部主任魏野畴负责组织工作，第十军秘书长蒋听松负责宣传工作。在皖北特委领导下，太和等县发动农运，反帝反封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作为一个妇女领导人，也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杨虎城改组第十军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派反共大同盟的山西人韩振声到皖北，借“劳军”之名，行拢杨之实，并要求逮捕共产党员南汉宸等。杨虎城坚辞：“顾到朋友间的道义，我不能这样办”，拒不受命。由于韩振声的胁迫，杨虎城只好离开部队前往南京。这时，南汉宸等向杨虎城袒露了准备暴动的打算，杨虎城以条件不成熟劝阻，但见南汉宸等意已决，就吩咐第二师副师长、代理第十军军务的孙蔚如关照朋友们。之后，杨虎城去了南京。

1928年春，南汉宸和魏野畴等分头行动。南汉宸到了亳县，立即着手动员鹿邑、柘城一带党的力量，阜阳暴动人员及第十军官兵、干校学生共五六百人也集结起来。不料第十军党内有人告密，交出党员名单。孙蔚如根据名单，把太和的近200名党员集中送走。为减小敌人注意的目标，南汉宸也离开太和，特委书记由魏野畴继任。孙蔚如亲自把南汉宸送出太和十里外的旧县集，临别时对南汉宸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嘛！”起义于4月8日举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两日，起义失败，魏野畴、昌绍先等中共党员牺牲。

这时，河南省委也遭到破坏，南汉宸只身在开封躲了十余天，不得已又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鹿钟麟那里，等待机会。不久，河南省代主席邓哲煦任命南汉宸担任豫南赈灾委员会主任委员。1928年10月，韩复榘接任河南省主席，由鹿钟麟

举荐，南汉宸当了信阳县县长。这时，南汉宸和王友兰结为伴侣。在县长任内，南汉宸理政有序，一时传为佳话。他还利用合法职权，掩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参加皖北暴动的高敬轩在开封找到党组织，南汉宸安排他到信阳县府工作，并通过他和河南党组织取得间接联系。

1929年夏，韩复榘致电南汉宸，调他到省府供职。他两天就交待完工作，到开封就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职。当时，在开封监狱里关押着近百名共产党员，听说其中还有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任作民。南汉宸为明真像，建议省主席清理监狱。韩复榘下一道手谕，让南汉宸代理。南汉宸到了监狱，果然发现有任作民，但他们的身分均未暴露，便私下把狱中同志开了一个名单，又夹进了一些非政治犯，共100来人，与警察局送来的名单同时送给韩复榘过目。他提醒韩说：绝不能承认开封有这么多共产党，否则，这等于给南京提供了口实。南汉宸知道韩复榘幼年时曾因偷窃被官府抓住过，当官后最讳抓小偷，便对韩说：“我代主席去监狱查访过了，他们哪里是什么共产党，警察抓的全是小偷！”韩复榘一怔，大骂警察不中用，并授权南汉宸处理此事。南汉宸到高等法院把韩的话顺风一吹，法院例行公事地草草判决，一个星期时间，这些同志就安全出狱了。任作民获释的当天深夜，南汉宸把自己积攒的薪金送给他，作为重建党的省委机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期间，韩复榘回山东，鹿钟麟进抵开封，南汉宸留任河南省代理民政厅厅长，不久奉鹿命去南阳联络杨虎城。南汉宸到南阳后，同杨虎城讨论了中原战局。7月，南汉宸返回开封不久，冯、阎在陇海线失败，杨虎城乘机袭击冯玉祥，进逼潼关，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派交际处处长李光

守到开封邀南汉宸，一起经营大西北。同年10月，南汉宸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因军事牵涉，杨虎城要南汉宸先进西安，代他主持筹划省府内阁，实行初步安定措施。蒋介石为了促使杨虎城攻打冯玉祥，也就同意了这种安排。

南汉宸率部经潼关进西安时，蒋介石为控制陕西，复派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逼陕东。南汉宸获悉，立即命令杨部冯钦哉师抢先进驻潼关，并授计冯钦哉把县城里像样的公私房屋全部占据，让顾祝同意识到：陕西不欢迎他。等中央军的大部队入潼关后，果然饥寒交迫，处境狼狈。顾祝同见到南汉宸大发牢骚。南汉宸说：“县城里的住房实在困难，冯钦哉师先进城，已经住下来了，硬叫他们搬出来让给中央军住，会影响两军关系，下面还可能出乱子。再说，又让冯钦哉师到什么地方去呢？”

南汉宸进西安后，以秘书长身份和杨虎城所授之权整顿陕政。他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杨虎城释放政治犯的命令，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如潘自力、李畅英（即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王友章等，有的就被安排到十七路军和各地、县工作。1931年春，刘志丹被捕。南汉宸得知后，力劝杨虎城排除阻力，下令放人，并请陕西名士杜斌丞从中斡旋，终于把刘志丹营救出来。

杨虎城初回潼关时，陕西省府的班子已具规模。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恢复生产。经过多年战乱，尤其1929年的年馑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南汉宸协助杨虎城团结、鼓励省内外人士献计献策，突击救济。他还建议利用国际组织华洋义赈会的赈额，以工代赈，把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请到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规划并督修泾惠、洛惠、渭惠、梅惠四条灌渠，使关中平原粮棉产量获得显著增加。在整顿经济的同时，还开始着手澄清吏治，制定了安定秩序的

各项措施。

南汉宸大力协助杨虎城改革文教,发展新闻事业。为了启用有志于发展陕西教育的李百龄出任教育厅厅长,南汉宸在杨虎城赞同下,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南京政府任命的原教育厅厅长李范一的“倒李(范一)”运动,迫使李范一辞职他去。李百龄就任教育厅长后,南汉宸积极支持他的工作,教育经费概不拖欠,还委任了一批进步分子到各校担任校长。1931年到1932年,西安有了四家报纸。《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日报》,均由共产党员负责主办,《新秦日报》和《民意报》两家私营报纸,南汉宸也支持他们的工作。国民党中央为了控制陕西舆论,也在西安办了个《西京日报》,诬蔑共产党,攻击杨虎城。南汉宸、杨虎城多次劝说、警告无效,杨虎城便私下派人把社长邱元武杀了。

陕西政局焕然一新,杨虎城更加器重南汉宸,省府一般事务都交南汉宸全权负责。省府工作人员对南汉宸也十分尊重,称他为“南先生”,而反对派则攻击说陕西是“秘书长专政”。南汉宸处事十分谨慎,当地方势力李某连续三次派人送房契给他时,都被他拒绝了。

杨虎城素有统一西北的宏愿。为此目的,他于1931年派十七师师长孙蔚如部攻打兰州,驱逐了吴佩孚、雷中田等势力,改编了地方部队,并准备进攻新疆、宁夏。此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已扩展到5万余人,潼关、华阴、西安共有三个兵工厂,财政收入也自给自足了。然而,杨虎城统一西北的计划终因南京政府的干涉而受挫,孙蔚如的部队被迫撤出甘肃。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安。4月26日教育厅在民乐园召集的有1000多中、小学生参加的集会上,他大肆宣扬儒、释、道,闭口不谈抗日问题,遭到与会学生的质问和围

攻。主持会议的南汉宸感到已经教训了戴季陶，才护送戴逃走。此事震动了南京当局。CC特务说：陕西这个鬼地方红、白不分，比江西要难管得多！南京当局决定改组陕西省政府。

1932年夏，杨虎城在三原养病，陈立夫特地探病示慰。他在经过冯钦哉师驻地时遇到了南汉宸，想拉拢南汉宸到南京工作，被南汉宸婉言拒绝。不久，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电告杨虎城，南汉宸是共产党员，证据确凿。但杨虎城托病不理。蒋介石无奈，又派胡逸民携函会见杨、南。胡逸民阴险地把委任状和通缉令一起摆在南汉宸面前，并提醒说：你要么到南京当中央监察委员，要么就到南京下狱，任选一张！南汉宸一向冷静，这回却激怒了，他说：“我宁愿选择通缉令！”胡逸民碰了个钉子，悻悻而去。南汉宸知道南京方面不肯善罢甘休，就向杨虎城提出辞呈。杨虎城赠金相送，并建议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

南汉宸和夫人王友兰到日本后，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誓师，南汉宸在日本分别收到吉鸿昌和冯钦哉的电报：吉电邀他回国共商抗日大计；冯电请他回国出谋划策，脱离杨虎城。南汉宸对冯钦哉的做法深表遗憾，书信相劝大可不必；然后于8月应吉鸿昌之邀回国。但不幸同盟军失败，他暂住天津租界，一边寻找党的组织，一边聚合高敬轩、谢祥荫、张道吾等，准备迎接抗日高潮。

这年冬天，孙殿英率部去包头，就任青海西区屯垦督办，派人来津约南汉宸去包头。孙殿英是在国民军时期认识南汉宸的，这次去西北，受蒋、阎掣肘，想通过南汉宸联系杨虎城，扩大声势。南汉宸请示了上海中央局，中央认为孙殿英虽不可靠，但他毕竟有4万之众，即使暂时的联合，也会给反蒋抗日创造条件，所以批准南汉宸前往包头孙殿英处开展统战工作。孙殿英对南优礼备至，聘

南汉宸为高等顾问。南汉宸尽量争取孙，帮助他加强同红军和杨虎城的联系，并为之起草了三方合作通电，准备到达陕甘宁边界后以杨虎城名义发布。同时，在南汉宸的动员下，孙殿英决定送给陕北红军2000余枝枪，约定陕北红军派遣部队前往黄河渡口接应。可孙殿英急于消灭马家军准备西进，经南汉宸联系，陕北红军如期接应，杨虎城也派兵声援。孙殿英妄图孤军速战速决，南汉宸力劝无效。果然攻宁夏两月未下，士气大挫，部下纷纷叛离。蒋介石乘机停止军饷，撤了孙的督办公署和本兼各职，余部退回绥远，又被晋军缴械。

南汉宸于1934年四五月间回到天津。这时，吉鸿昌也在天津。南汉宸曾奉上海中央局指示，到泰山访晤了冯玉祥，共策抗日大业。很快，冯玉祥领导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同盟中央委员会由冯玉祥（徐维烈代）、李济深（任应岐代）、方振武、方本仁、吉鸿昌、张碾生、邓哲煦、宣侠父、南汉宸等组成，南汉宸任秘书长。4月，吉、南、宣准备在豫南组织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吉鸿昌等还计划把江西的两师旧部拉回河南，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另派茹志章去陕西，联合杨虎城一起行动。杨虎城十分赞同，拿出1万元作为捐助，茹志章交给了南汉宸。南汉宸这时还找到老朋友、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支应麟，做他的思想工作，终于促成支应麟率部起义。同年10月，宣侠父获悉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下令逮捕吉鸿昌、南汉宸等。11月，南汉宸奉调往上海工作。

南汉宸扮作商人登车南下。中途，他十分关心吉鸿昌的安全，曾打电报给吉鸿昌，告诉他“生意已成交，急速来沪。”可是，当他抵达上海刚刚跳下火车，就接到联络员送来的情报——纸烟盒上三个赫然黑字：“吉被捕！”他没有出站，旋即登上一列北去的火车，返回天津，营救吉鸿昌。

南汉宸一到天津,就和地下党组织商量的营救措施。接着他一边派人日夜兼程上泰山,请冯玉祥将军下山保释,一边就近活动。他通过朋友关系,先找到河北省主席、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于学忠推诿自己不敢独担此任,必须再有几个大员担保才行。他又找住在天津的鹿钟麟。鹿钟麟听他说明来意,面有难色地说:“为了老朋友担些风险也是应该的,只是我在国民党和政府里徒具虚名,没有实权,人微言轻啊!”南汉宸讲了于学忠的意思,但鹿还是叹气。正在南汉宸重作筹划时,蒋介石电令天津军警当局,将吉鸿昌押往北平,由何应钦查办。吉的旧部准备劫车,但狡猾的敌人却提前把吉鸿昌押送走了。营救吉鸿昌的活动没有成功。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英勇就义。

吉鸿昌殉国后,南汉宸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央局工作,和王世英、刘仲华等一起,负责编辑国际情报。

1935年,何应钦和北平蒋军撤走,华北又被冯玉祥系的军队统治。这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坏,同党中央、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为保存党的力量,上海中央局机关搬到天津。

1935年7月南汉宸从上海抵达天津后,根据党的决定,被派到北方局下属的联络局工作,主持情报收集和“兵暴”运动。此时,北方正澎湃着抗日怒潮。王世英和南汉宸等在学校中发展力量,吸收了40名党员,并且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黄松龄、齐燕铭、吴晗等,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东北军退入关内后,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把他的军官集中到天津由南汉宸训练,并组织了抗日同志会,由南汉宸负责。对于“蒙疆自治政府”和“冀东防共政府”的军政情况以及日军动态,南汉宸格外注意。他亲自到张家口布置、检查情报工作,把获得的秘密情报登在内部刊物《广闻通讯》上。对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南汉宸更为关

注。1935年10月，他约当年曾一起在陕西省政府供职的旧友申伯纯来津会晤，同申商议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希望促进杨虎城与我党合作。申伯纯相机去南京，见到正参加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交他看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虎城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申伯纯向南汉宸转达派人具体商讨的愿望。

杨虎城由南京返回西安没几天，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也派汪锋携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见杨。杨虎城不知真假，复派省府科长、中共秘密党员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询问。正巧南汉宸调动工作，王世英要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白区工作，遂随崔孟博到了西安。王世英见到杨虎城，证明了汪锋是自己的同志。王、汪同杨虎城经过商谈，在南汉宸早先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商订了四项合作原则。这些原则由王世英带到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从此，红军和西北军的合作正式开始。

这期间，南汉宸在天津交通旅馆向我党同志、东北人孙达生介绍了杨虎城的情况。南汉宸说：“中央红军到西北，东北军也到了关中，如果三方能够合作最好。西北地理位置好，完全可以减轻蒋介石的压力，争取苏联援助，以发动群众，反蒋抗日，转变‘围剿’红军的形势，党内同志要促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希望你为此努力。”南汉宸还把张学良的老友高崇民介绍到西安，负责张、杨双方联系。高崇民和孙达生到西安后，为东北军抗日做了很多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来西安协助代表团工作。南汉宸接到调令，于25日离津来陕。

南汉宸到西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部

处理十七路军和西安绥靖公署的公务，并参加了因事变而专门成立的设计委员会，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公务和人事的左右手。这时，张学良已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东北军和西北军统归杨虎城指挥。当蒋介石背信弃义，软禁张学良的消息传到西安时，东北军少壮派群情激愤，主张以死战保出少帅，而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则力主停战和谈；西北军也有类似情况，双方意见各不相让，杨虎城难以驾驭。南汉宸奉命前去做杨将军的工作，反复宣传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936年底至1937年初，蒋介石先以“首谋伙党，对上官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权五年。接着又玩弄阴谋，“赦免”本刑，“交军事委员严加管束”。少壮派看了报纸，更加悔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扬言要枪杀主和分子，扣捕中共代表团，在枪杀者的名单上就有南汉宸。1937年1月26日晚，杨虎城夫人谢葆真得知此讯，劝南当晚就留在杨虎城总部居住。南汉宸婉言谢绝了谢的好意。事隔一天，杨虎城亲自到南的住所，对南汉宸说：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这次你一到西安，我就对你说过，和平解决是牺牲我。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一味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现在局势很不安定，我可以把你送给我老太太家里去，你以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了。南汉宸答道：“我是共产党员，绝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丢下不管。目前的严重局势怎么处理，我马上去找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周恩来当时正准备去云阳红军司令部，同彭德怀、任弼时等研究当时的形势和策略，听了南汉宸的汇报，周恩来说：请你转告杨先生，请他放心，我们绝不做起朋友的事。

1937年1月31日，于学忠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同杨虎城、周恩来举行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和战大计。南汉宸为周恩来来参加这次会议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亲自找负责西安警备的邓宝珊，请求他一定要保障周的安全。邓宝珊对此也极为重视，亲自在会议室门口把守。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南汉宸曾动员景梅九、董林哲等人恢复已停刊的《国风日报》，配合代表团的宣传工作。他还遵从周恩来之命，代周会见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希望范长江把西安事变真像和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公布于世，以沟通西安和外部世界的舆论来往。中共代表团返回陕北后，南汉宸受党的委托，代表十七路军参加抗日联军西北委员会联合办公厅的工作，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不久，局势急转直下，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了西安。南汉宸由三原移住云阳，为红军前总培训了十余名统战工作干部。5月27日，杨虎城离西安赴沪准备出洋。临别时，陕西各界欢送杨将军，周恩来因事和杨虎城同机赴沪，南汉宸到机场送行。

此后，南汉宸按照周恩来指示，到华北开展统战工作。他帮助东北籍人士建立了东北抗日总会，还同国社党成员张东荪，“第三党”成员彭若建立联系，并在冀、察各地配合王世英工作。

七七事变后，南汉宸绕平绥路经山西到西安，见到了当时正准备由西安赴山西同阎锡山商谈抗日问题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一次会上，周恩来风趣地问大家：“在座的谁是老西儿（指山西人）？”南汉宸和程子华等举起了手。周恩来看了看，说：“好，是老西儿的跟我回山西，找阎锡山去！”9月1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程子华、宣侠父等人离开西安，前往太原。

周恩来、彭德怀和南汉宸等到太原后，在太和岭见阎锡山，商

谈有关抗日事宜，并拟在山西建立合作组织。1937年10月1日，由各党、各派、各军及晋、绥、察各省政府代表组成的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我党派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南汉宸参加，南汉宸任组织部副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部长；在北平的王世英还为动委会输送了大量政治干部。动委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根据地。阎锡山生怕共产党掌握了动委会，于是耍了个花招，委任续范亭为第二战区保安司令，勒令动委会的军队编入保安部队，企图削弱我方力量。续范亭任保安司令后，动委会实际由南汉宸主持，继续进行活动。

1938年春节后，阎锡山电告续范亭到秋林参加会议，企图在会上通过解散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以达到削弱我党力量的目的。南汉宸同续范亭仔细地研究了对付阎锡山的几项原则。秋林会议上，续范亭当面与阎锡山争执，一直拖到5月份，阎锡山才强令解散动委会。不久，党中央指示动委会的中共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南汉宸奉命处理善后，并继续同续范亭商量对付阎锡山的方针和政策。9月，南汉宸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久，他到驻榆林的东北军何柱国部动员抗日；11月又赴西安，参加天水行营召集的会议；1940年3月，受共产党中央之命又到榆林，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工作，后返晋西北，看望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帮助他筹划建立行政公署和地区经济局、银行。此间，他和冯玉祥、孙蔚如、孙殿英仍保持着联系。

当时，大后方人士不了解北方抗日详情，党中央决定南汉宸以过去的身份，给他后方的朋友写信，宣传八路军将士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南汉宸先后给徐永昌、白崇禧、李宗仁等写过信。1941年春，南汉宸又到邓宝珊部时，得知胡宗南也派人来邓部游说。邓宝珊问南汉宸是否相见，南汉宸说：“我们来这儿光明磊落，无须遮

掩。”他亲自和邓宝珊到机场接胡宗南的代表，双方进行了接触。一次路过榆林，一个曾叛变革命的人邀他赴宴，他欣然前往。他对周围的同志说：“这样的事太多了，不要记他，尽量争取他，革命还长呢。要利用一切关系。”

1941年，由于日寇的进攻和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延安，保管员硬是从地上一粒一粒捡起来散落的米粒，才给中央书记处的负责同志做了顿节日的大米饭。一次，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宸，同他畅谈了四个小时。最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南汉宸一到财政厅，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为了保证供给，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本，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这个建议当时曾遭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边区本来就物资奇缺，一发行货币，岂不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双方意见不一，一直争论到中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表态，支持南汉宸的主张，肯定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手段。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决议发行边币，并宣布禁止法币流通。同年10月17日，南汉宸在边区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所作的财政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发行边币的意义。他说：“我们发行边币的任务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财政的支出而发行的，在数量上也是按着地域的需要而发行，决不让它恐慌和膨胀，这是我们边区今天的金融政策。”后来事实证明，边币的发行对克服边区财政困难，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搞好商品流通，南汉宸注意建立与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

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商会领导,结果方法简便,税收增加,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逐渐完善了。

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十分贫瘠,党中央为了使多年受战争蹂躏的农民得以休养生息,1937年到1939年间,取之于民的很少,三年中通过劝募方式,只征收了7万石粮食,不足部分从武汉、西安、洛川等地购买。随着根据地的扩大,非生产人的增加,特别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粮食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大问题。1941年,政府已向群众借了4万石,预计1942年还需要16万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南汉宸和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商议,提出向边区农民征收20万石公粮。这个数字要占1941年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3.3%,因此一提出来,就听到各种不同的议论。南汉宸觉得,这样做确实给边区群众加的负担太重了。可是不这样做,党政机关和军队就没吃的,革命也许会因此而失败,只要讲清这个道理,群众是会谅解并支持采取这一措施的。为此,他提出财政厅由霍维德负责,并组织大批党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到各县进行调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调查的结果表明,征收20万石公粮,边区农民的生活虽然会紧张一些,但还是能够对付过去的;这个征收数字不论同当地革命以前相比,还是同当时邻近的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要低得多。于是南汉宸把自己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告,很快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南汉宸后来回忆说:

皖南事变后,外援完全断绝;财政被迫急剧走上自给。当时困难到提出饿死、解散与大家动手生产的三条道路,其严重可想而知。

在粮会上,1940年对军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还没有改变单纯的量入为出的财政方针,仅征公粮9万石。1941年春,人

数增加,缺粮太多,4月初即闹粮荒,又无通盘计划,曾被迫下令,两次借粮,一次征购。个别地方如延安、富县,借粮有达八九次的,扰民太甚。但粮食供给仍不能保证,有的部队两天没有吃上粮。

秋收时提出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政府经过很慎重的考虑,最后方获通过。我们坚持了这一方针,向群众说明,过去借粮一律归还,明年不再借,再不官价买粮,望群众能予我们以帮助。在我们广大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拥护下,终于胜利完成,这是边区人民负担最重的一年。

1941年粮会问题的解决,使边区渡过了难关。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许多机关和部队达到了粮食和副食品自给或部分自给,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则逐年减轻,很快便达到了丰衣足食。

粮食问题解决了,棉、布等日用品仍然十分短缺。南汉宸和霍维德等商量,采取了同胡宗南、阎锡山的部队以物易物等一系列特殊措施,终于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物资困难。当时,定边的食盐是边区出口换取棉、布等必需品的的主要物资,政府曾采取官督民运的政策,动员群众运盐贩卖。但由于在支付运费上卡得太紧,群众的积极性不高。南汉宸发现这个问题后,经过研究决定将卖盐所得利润的三分之一分给运户。简简单单的一条措施,一下子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老百姓连大年初一都不肯歇,完成了政府提出的运盐计划。

南汉宸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期间,手里掌握着财政、物资大权。但他常告诫工作人员,绝不能擅自占公家便宜。他自己孩子多,负担重,孩子们有时连鞋也穿不上,但从来不利用职权去谋个人私利。毛泽东知道他的情况后,特意写了一张条子,嘱咐有关同志设法解决南汉宸孩子的鞋子问题。

在工作中，南汉宸善于团结同志，并大胆使用人材。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是在陕北成长起来的干部，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十分熟悉，且有办事才干。南汉宸处处尊重他的意见，对他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南汉宸在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曾破格把一位热爱边区、有工作才干，已是中共党员的原国民党人员，调到统战部工作。后来，南汉宸出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又把这位同志调到财政厅，并委以秘书长的要职。南汉宸注意团结人，也提倡同志之间相互团结，有意识地促进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结合。他知人长中之短和短中之长，处处与人为善，任人唯贤，许多当时在财政厅工作的人都说：“和南厅长在一起工作放心。”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南汉宸冒着风险，保护了许多党内外同志。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为了总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毛泽东委托南汉宸为他准备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搜集、整理资料。毛泽东看了南汉宸提供的材料后，于12月13日和20日两次亲笔复信，说：“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会、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毛泽东强调：“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南汉宸按照上述要求，日夜突击赶写，按时将材料交给毛泽东。年底前，毛泽东向大会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这篇曾经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乃至对今天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重要著作，渗透着南汉宸的不少心血；报告中对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赞扬，无疑是对南汉宸和他领

导的财政厅卓越工作的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汉宸被派往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领导晋察冀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4月,南汉宸作为晋察冀边区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不久,应董必武的邀请,他到河北平山,任中共中央工委财委副主任,后又调任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华北银行总经理,为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统一货币的过程中,中央工委组织了一个小组,专门筹备人民币发行事宜。南汉宸带领这个小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这时起直至全国解放初期,他以主要精力投身于建立新中国金融体系的伟大事业之中,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把各根据地银行都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了各种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二、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接管加以改造。三、保持原中国银行的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

在南汉宸的领导下,经过金融战线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宏大的人民银行系统终于建立起来了。

南汉宸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家,要发展农业生产,金融工作必须深入到中国农村的最基层。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全国农村金融会议上,他深入分析了农村金融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在政治上讲,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到人民民主专政在农村的巩固,我们要巩固工农联盟,帮助农民走上富裕道路;在经济上讲,发展农村

金融,可以从出口贸易、国内市场、建设资金等方面,为发展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他提出“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金融工作十六字方针,积极支持在农村建立储蓄所,鼓励农民把猪鬃、鸡蛋、桐油、鸡毛等卖到国外,换取外汇。为了加强农村金融工作,他指出:全行80%的机构、60%的干部要为农村银行服务。

1950年8月1日,在南汉宸主持下,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方针,研究调整金融业中的公私关系,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以及金融业中的劳资关系。经过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金融界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其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在以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改造中,南汉宸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使全国金融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12月就胜利完成,成为最先完成改造任务的一个行业。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在国计民生的作用,南汉宸还做了许多工作。北平解放之初,物价曾一度不稳,投机商人乘机大捞一把,造成人心惶惶。南汉宸提出“折实储蓄”的方法,动员群众到银行储蓄,很快稳住了民心,控制了物价的起伏。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中央估计到仗打开以后可能物价波动,决定银行要配合战争。南汉宸主持银行讨论贯彻,采取各机关现金不过夜,各单位不拿现金融通等措施,对积蓄力量,为战争服务,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汉宸不但善于理财,是我党难得的金融专家,而且十分重视团结党外的专家、学者,虚心向他们学习。他在人民银行总行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室,吸收旧银行的专家、学者,如千家驹、章乃器等参加,使他们把自己的专长,用在人民银行建设的事业中来。对于银行的工作人员,南汉宸更是关心。为了提高大家的文

化水平和专业知识,他特地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一个专业班,三年学制,把科、处、局级以及市级在职干部送去学习、深造;还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二年制的大专班,专门培养金融专业人才。

全国解放后,南汉宸虽然离开了党的统战部门,但在新的岗位上,他仍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一次,香港爆发经济危机,香港金城银行的周作民想向人民银行借400亿巨款以度难关。南汉宸经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毅然借给了800亿,使周作民深受感动。后来,他把自己的银行全部献给了国家。

南汉宸在总行工作期间,十分重视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1950年,金融行业形势喜人,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及时在总行成立了检查处,调查解决矛盾。1951年5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届全国检查会议的闭幕式上,南汉宸作了《关于银行检查工作的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官僚主义作风。他指出“得过且过”、“不负责任”、“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及“雇佣观念”,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他还说:“有些老干部,遇事不调查不研究,白天晚上忙于文牍事务,不懂得掌握政策、结合实际,形成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他强调,所有这些,都必须坚决克服。

南汉宸在中国金融事业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为我国人民的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外事往来,中央决定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简称贸促会)。1952年春,周恩来委派南汉宸主持贸促会工作,担任贸促会主席。同年4月,南汉宸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会议期间,他接触了与会的三位日本议员,向他们介绍了新中国的繁荣景象,热情邀请他们来我国访问,这三位日本议员欣然应允。会后飞抵北京,南汉宸又受周恩来委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会晤。当这三位日本友人

言及旧日战事而深感内疚时,南汉宸说:“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应该往前看,以后中日两国还应当世代友好下去。”日本议员为之涕泪纵横。经过友好协商,双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一行动打开了禁锢着的中日关系的局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日友好往来,都是由贸促会负责的。

这以后,南汉宸率中国代表团多次出访亚、非各国。每次出访,他都坚持党和政府的外交原则,既增强了同亚、非人民的友谊,又维护了中国的尊严。1961年,南汉宸访问拉美国家。在巴西,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邀请巴西副总统古拉特访华。古拉特副总统于同年8月应邀来华访问,毛泽东在南汉宸陪同下会见了巴西贵宾。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往来,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外交封锁。1964年,南汉宸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身份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访日的最高负责人。他在日本会见了许多政府大臣,并同日本财界首脑松下、日立、丰田等大公司负责人进行了会谈。

建国以后,南汉宸还担任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全国工商联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中非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南汉宸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他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于1967年1月27日含冤逝世。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为南汉宸平反昭雪,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的悼词说:南汉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药 英 冯 凯)

贾 拓 夫

(1912—1967)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陕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兼西安市委书记。1931年秋调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8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年底，赴中央根据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后留中央苏区工

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三边特委书记。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陕西省委，任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统战部部长，中共西北中央局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常委、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书记。1949年5月，西安解放，任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59年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5月7日逝世。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一)

贾拓夫，乳名富喜，学名耀祖，字孝先。1912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七日)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城的一个贫民家庭里。曾使用过红光、宏光、弘光、鸿光、绍先、江子质、贾绍亭、贾元等化名和托夫、关烽等笔名。

贾拓夫七岁那年，其母卖掉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供他上学，先入神木县城模范小学，1925年考入神木县高等小学。1926年夏，在外地上学的张学静(即张友清)等探亲回家，在城镇和农村张贴标语并集会讲演，宣传革命道理，贾拓夫积极参与并受到教育。不久，经张学静介绍，贾拓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神木县建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时，贾拓夫任支部书记。

1926年下半年，贾拓夫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组织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子洲，教务主任是进步人士杨明轩。贾拓夫和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朱侠夫等在这里受到了革命的熏陶。他们经常跟随教员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播撒革命种子，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1927年春，贾拓夫任共青团绥德第四师范支部书记和绥德县学生联合会主席，成为当地学生和青年的领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传到陕北后，贾拓夫在中共绥德地委领导下，写了许多宣传材料邮寄到陕北各县中小学校，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罪行。

1927年7月，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公开反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因此时

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大革命在陕西随之失败。8月4日,以“红色的学校”著称的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查封,许多进步教职员被撤换,学生被迫回乡。1928年初,柳翰章接任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上任后,即宣布取消学生会,企图瓦解削弱革命力量。贾拓夫、朱侠夫、崔玉湖等团结同学与反动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贾拓夫严正指出:“学生自治会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其宗旨是为读好书、管好生活,也是为学校当局维护校纪、整好校风,是学校当局求之不得的事,为何取缔乎?”第四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团结一致,学校的反动分子不能为所欲为,便勾结校外反动力量加紧对学生进行迫害,以贾拓夫为首的学生会领导学生罢课进行反抗。第四师范学校再次被军警包围,学生会被取缔,贾拓夫等一批学生领袖被勒令立即离校,并被开除了学籍。从此,贾拓夫便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踏上职业革命的征途。

(二)

1928年1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任命的陕北党、团特委书记杜衡、焦维炽,在绥德龙湾小学召开各县党、团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召开陕北第一次党代会的筹备工作。贾拓夫以团绥德县委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2月,贾拓夫担任了团陕北特委的组织委员。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召开,会议选举成立了党的陕北特委,改选了团的陕北特委,贾拓夫继续当选为团特委委员,并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9月28日是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中共陕北特委决定这天在米脂县城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贾拓夫是出席会议的

代表,到会后同杜衡、焦维炽住在一个院里。由于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各地,口音与服装各异,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在中秋节早晨即突然进行搜捕,贾拓夫等四人被捕。杜衡、焦维炽被解往榆林,贾拓夫和李文芳押在米脂县监狱。年仅16岁的贾拓夫很镇静,质问狱官:“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拘押我?”狱官无言答对。由于国民党米脂县政府找不到任何证据,后经承审员王孔生(王与贾、李是同乡,又有师生关系)关照,由在县教育局任视学员的地下共产党员高仰云、王和璧具保,贾拓夫和李文芳关押半个月后被释放了。贾拓夫出狱后,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尚在榆林狱中,党特委决定由贾拓夫任团特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派赴延川、延安一带视察党、团的基层工作。

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张家岔(今属子洲县)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会后,按照党特委的决定,贾拓夫在米脂三民二中主持召开团特委的扩大会议,健全了团特委的组织领导,布置了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党在学校的阵地、分派团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等工作。这时党、团特委机关已迁往榆林,贾拓夫到榆林后,深入到中学和小学,建立团的组织和互济会、读书会、铁血团等群众组织,扩大了团的组织和党的影响。3月1日,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原团省委是2月被敌破坏的),贾拓夫当选为临时团省委的委员。同年的春夏之交,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三种形式搞武装斗争。即可以有白色的(派人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可以有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贾拓夫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7月,上级任命张文华为团陕北特委书记,贾拓夫改任团特委的宣传委员。

1930年3月,贾拓夫从榆林回神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一回到家乡,地方当局就对他倍加注意。6月的一天早晨,贾拓夫上街买菜,让菜主刘贵考(同情革命者)送一担黄瓜到他家。当刘贵考进入院子时,看到一群国民党军警正在搜捕贾拓夫,刘急中生智,把黄瓜倒在院子里就跑出来,把实情告诉贾拓夫。贾拓夫镇静自若,绕道城东,躲在火神庙里。当晚,他拜托刘贵考以要菜钱为名去他家,将藏在家中的文件取了出来,机智地躲过搜捕,化装后经绥德直赴西安。

1930年7月中旬,贾拓夫出席了临时团省委在蓝田草坪小学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临时团省委改为正式省委,贾拓夫当选为团省委委员(分管宣传兼组织)。并兼任了团西安市委书记,对被敌人破坏了的西安市的团组织进行恢复和整顿。10月10日,因叛徒告密,贾拓夫被捕入狱。10月底,杨虎城率部入陕,原陕西驻军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贾拓夫出狱,被组织调回任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不久,贾拓夫奉中共陕西省委之命到蒲城县,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领导全县党组织准备开展秋收斗争。在斗争中,由于叛徒告密,不少党员在敌人的大搜查中被捕。反动派扬言,抓不到西安派来的姓江的共产党大头子(那时贾拓夫化名江子质),决不罢休。敌人封闭城门,挨户搜查。一天刚下过雨,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杀气腾腾地闯进共产党员李忠信家开设的棉花铺。李忠信和贾拓夫机警地躺在房顶上,躲过了搜查。第二天一大早,留着长发的贾拓夫剃成光头,穿着沾满棉花的衣服,扮成卖棉花的小伙计,推上“地老鼠”车子,出城脱了险。

贾拓夫返回西安后,中共陕西省委任命他为党、团省委的特派员,前往汉中整顿党、团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秋,贾拓夫到达汉中,接任了中共陕南特委书记。不久,陈文华接任特委书

记,贾拓夫即到城固,以城固县立中学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指导城固及附近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贾拓夫的直接指导下,城固县党组织纯洁了内部,组织学生到农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发动数千群众将吸食毒品的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押到街上进行批斗,最后又送交给国民党县政府,县长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将其收监。学生又以“城固全县民众”名义向陕西全省发了“快邮代电”,控诉国民党官员祸国殃民的罪行。这些革命斗争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城固、南郑、洋县等地的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此伏彼起,特别是城固,一度成为陕南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之一。

1932年初,贾拓夫奉命返回西安,继续担任共青团西安市委委员、宣传部部长。4月25日,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召开大会,由来陕西贩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向西安市的数千名学生讲演。因戴拒绝解释国民党对日的不抵抗政策,愤怒的学生便将戴轰下讲台,并烧了他乘坐的汽车。贾拓夫参与组织领导了这次享誉全国的学生爱国斗争。

1932年8月,共青团西安市委复改为团省委,贾拓夫任团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不久,贾拓夫奉调到中共陕西省委,相继担任省委委员、常委,负责组织、宣传工作。

1932年11月9日,国民党陕西当局调集正规部队和六个县的民团,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三原县武字区,先后六次遭洗劫,新生的工农政府瘫痪,渭北游击队被冲散,数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就在这个严重时刻,正在渭北巡视工作的贾拓夫,根据省委的决定,于12月先是两次主持改组中共渭北特委,以后又主持取消特委成立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三原中心县委的成立,为

恢复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组织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同时,贾拓夫数次向省委书面报告,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建议省委妥善解决工作中的重大政策问题。

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由于干部不足,特别是领导力量薄弱,他们接二连三地向中共陕西省委告急求援。贾拓夫根据省委意见,从各方面抽调了一批党、团员,派到红二十六军去工作,加强了红军的领导骨干和战斗力。

1933年3月和4月,中共陕西省委两次改组,贾拓夫改任省委委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宣传委员。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坚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令红二团南下,去渭华一带活动。贾拓夫奉命前往拦截部队,但未追上。红二十六军在渭华地区遭到严重的失败。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店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团南下和加强对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等问题,被敌发现,省委书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贾拓夫和高岗脱险。袁、杜被捕后即叛变革命,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党、团组织和党、团员,反动派立即展开大搜查、大逮捕。在此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通知一些党员迅速转移,并于8月上旬在西安召集党、团活动分子开会。会议决定贾拓夫和刘宗沛(团省委书记)去中央汇报;高岗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六军工作;三原等地的工作由省委委员刘映胜代表省委领导;由张新发等三人组成省委工作委员会处理一些重大问题。贾拓夫对陕西的工作统作布置后,于8月15日离开西安去中央汇报。由于贾拓夫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使陕西党的组织和红军免遭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三)

贾拓夫离开西安后先到北平，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了情况。他还同中共河北省委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建议河北省委派谢子长、阎红彦返回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工作。贾拓夫又到上海，向上海中央局写了党在陕西各方面情况的书面报告。不久，上海中央局派他赴中央苏区，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年1月，贾拓夫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他先参加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又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之后他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先在中央局白区工作部工作，后调中央党校白区班当主任，6月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遵义会议后改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因战斗失利，红军又南下于2月18日至21日再渡赤水，重入贵州。红军总政治部进入习水县境，但一个重要的通道——桐梓县城为敌占据。贾拓夫奉命率一个连的兵力，迅速攻占了这个县城，为红军前进清除障碍。而敌军又切断了红军经桐梓南撤的要道。贾拓夫率领战士从东山方向突破了重围，向娄山关前进。第二次进遵义城时，贾拓夫因把马让给了病号骑，已是夜幕低垂，万家灯火了，才赶到遵义老城的杨柳街，住在天主教堂里，他即兴在随行录上写了一首诗：“北渡不能复南征，二次重占遵义城。拓夫仍宿

杨柳地，笑问英雄均健生。”

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抵达黑水芦花时，粮秣严重不足，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毛儿盖、芦花等地设立筹粮委员会筹集粮食。贾拓夫是芦花筹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筹集60万斤粮食。他带领一部分战士到瓦布梁子地区筹粮，发现藏民都逃匿于深山老林，村村十室九空。他和战士夜宿帐篷，昼不入户，尊重藏俗。一位精通汉话的藏民通司，目睹红军纪律严明，感动得落泪。经过这位通司的宣传，藏民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贾拓夫带领红军战士进一步扶植藏民当家作主，组织了藏民自治政府。

瓦布梁子的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红军筹粮熬盐。贾拓夫从实际情况出发，把在汉族中“打富济贫”的方针改为“借富济贫”。他发动群众收割恶霸地主的青稞，一半归群众，一半归红军。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超额完成了筹粮、筹草和筹盐的任务。为了及时供应前方红军将士，筹集的粮食除由几百名红军战士肩扛手提外，还组织了藏民运粮队。贾拓夫后来回忆说：“这些帮助红军运粮的藏民均表现积极热心，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打尖。甚至有全家都来为红军运粮者。此情此景，为黑水芦花所少见。”红军将要离别瓦布梁子的时候，贾拓夫还将几千斤粮食分给了生活困难的藏族人民。藏民男女老少对红军战士依依不舍，拿着酒壶来送行。后来红军总政治部流传着如下一首打油诗：“拓夫不假（贾的谐音），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8月，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

决定把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坚决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走过难以通行的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岷县的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从天津的《大公报》上看到了有关陕北根据地的报道：“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些已过了一两月的消息报道，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陕北的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陕甘地区党组织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并宣布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司令部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身边工作，随时为中央提供陕北的具体情况。

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建立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5年前离开陕北的贾拓夫，跟随中央经过11个省，走了二万五千里，又回到陕北，心情特别激动。到吴起镇后，即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长征歌》，叙述长征的全过程。歌词是：“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十一月来走湖南，宜临蓝道一齐占，冲破两道封锁线，吓得何键狗胆寒。十二月里过湘

江,广西军阀大恐慌,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挡。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九月出发潘州城,陕甘支队东北行,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中共中央到达吴起镇后始得知,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已先期抵达陕北,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后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组成红十五军团,正在根据地的南部进行反“围剿”战争。同时得悉根据地的军内和地方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大批的干部被逮捕关押,其中有些人已被杀害。情势危急,中共中央立即委派贾拓夫先行,早日与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部取得联系。贾拓夫带领先遣队,携带一部电台,穿山越岭,星夜兼程,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中共中央接到贾拓夫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于10月底到达下寺湾。接着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象鼻子湾胜利会师了。贾拓夫又奉命奔赴陕甘晋省委机关驻地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协同王首道、刘向三等接管了陕甘晋保卫

局。被关押的同志中,有的听说贾拓夫回来了,高兴地说:“红光回来了,他了解我们,我们得救了!”王首道、贾拓夫等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弄清了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事实真相,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平反的报告。中央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平反意见,立即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并给安排了工作。中央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和西北的革命根据地。

(四)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设立西北中央局,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将陕甘根据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和神府、三边、关中三个特区。

西北中央局成立后,贾拓夫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协助中央局处理有关白区工作的问题,并参加中央政治局讨论神府特区工作的会议,部署了神府工作。此后贾拓夫到地方工作,先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他到关中特区后,向干部认真传达了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主持创办了《关中小报》,结合实际宣传解释党的新路线和新政策。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兼任关中特区司令部政委的贾拓夫,同司令员江华、副司令员陈国栋一起,经过国民党军的道道防线,将关中的两个团胜利地带到瓦窑堡。6月,中共中央和新成立的中共陕甘宁省委派贾拓夫、毛齐华等组成中央巡视团,到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巡视工作。临行前,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

少数民族政策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们到三边后,配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对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回原主。巡视团反复教育干部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坚决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陈规陋习。11月,贾拓夫接替张德生担任了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在三边工作期间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仅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刊登的文章,就有《环县通讯》、《关于新区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八月份定盐赤化工作的前进》等三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应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邀请,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并决定重新组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斗争。12月25日,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贾拓夫任书记。省委机关先设在西安城内,1937年1月迁到泾阳县云阳镇。此时国民党的大军已经入陕,压制参加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和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红军。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来往于西安、云阳之间。

新的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后,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地下组织。到1937年5月,省委下辖的组织,已有一个市委、12个县委(工委)、66个支部,党员近千名。同时,新的省委还着重抓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创办了《统一战线》(从第5期起改名为《党的生活》)刊物。

1937年5月2日至14日,贾拓夫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后称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入大会

主席团。5月22日至2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云阳镇召开党代表会议，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出席了大会。贾拓夫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动员和领导千百万群众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指示精神，在会上作了《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必须采取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工作路线、方针和方法，从“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与国民党对立转变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务要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并取得领导权。会议之后，贾拓夫以“关烽”笔名，在省委《党的生活》刊物上连续发表《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任务与工作》、《关于目前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具体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七七事变后，贾拓夫主持召开中共陕西省委紧急会议，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会后，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共陕西省委为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号召西北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为了深入地动员三秦父老参加民族抗日战争，贾拓夫指导中共西安市工委组织师生暑假农村工作团，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西安市工委组织万余学生参加纪念大会，贾拓夫和邓颖超、江隆基等分别讲话，要求陕西省政府开放民众运动，改组抗敌后援会，实施国难教育，号召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坚固的抗日统一战线，会后学生游行示威，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请愿。通过斗争，学生取得了半日上课半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增加抗日救亡课程、下乡宣传抗日救亡等民主权利。中共陕西省委抓住这个有利形势，通过各抗日民主团体先后组织了65个农村工作团、70多个寒假工作团和宣传队，下乡宣传抗日。贾拓夫还撰写了《学生战

时工作团怎样工作》的文章,在省委机关刊物上发表,具体指导工作团的工作。

随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离陕奔赴抗日前线,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被蒋介石肢解压迫出陕,陕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展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于1938年初就公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秋,蒋介石的嫡系蒋鼎文代替杨虎城部将领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当局压制破坏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倒行逆施更是甚嚣尘上。根据这种新的形势,以贾拓夫为首的中共陕西省委从两个方面进行工作,把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深入。一是对陕西当局的反动行径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2月22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北青年救国会等13个抗日救亡团体,贾拓夫即于次日公开发表文章进行驳斥,要求当局立即改正错误,给抗日救亡团体以合法地位,以发挥各民众团体的抗日积极性。5月17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再次下令限期解散13个团体,并相继拘捕了西安五青年,企图以武力胁迫解散抗日救亡团体。中共陕西省委即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抗议运动,加上延安各群众团体的大力声援,被捕的西安五青年于9月获释,被下令“取缔”的各抗日救亡团体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二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充实核心骨干力量。省委主办党员训练班,抽调各地的党员干部分期分批进行训练,又将大批革命青年送往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学习(因驻址在泾阳县安吴堡简称安吴青训班)。贾拓夫在省委党员训练班和安吴青训班的兼任教员,经常结合党的中心任务给学员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学员回到各地后,转变组织形式,改变工作方法,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到1938年8

月,陕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内已有 53 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党员发展到 8000 余人。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和工作任务的完成。

1939 年 3 月,中共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西北工委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于 1938 年底在延安成立的,是中央为开展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西北工委的委员为张闻天、邓发、肖劲光、高岗、李富春、高自立、谢觉哉、李维汉、贾拓夫、王若飞。张闻天兼任书记,李维汉兼秘书长,贾拓夫兼秘书。李维汉同贾拓夫一起主持日常工作。

贾拓夫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后,进行了开拓性而且富有成效的工作。李维汉 1981 年在《回忆延安时的民族工作——纪念贾拓夫同志》一文中说:“拓夫同志主持西工委日常工作时期,对于陕、甘、宁、青、绥五省一般情况(包括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的调查研究,也是十分重视的。在资料来源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渠道,搜集了尽可能多的各种资料,并发动西工委的许多同志,参加这项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编写成了五本资料书,这就是:《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和《抗战中的绥远》。当时都由延安解放社内部出版发行。拓夫同志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这五本书的编成出版,以及贾拓夫给毛泽东写的《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对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西北各省的一般情况,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贾拓夫多次和西北工委其他干部一道,深入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和蒙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团结回族和蒙

古族共同抗日的重要意见，毛泽东在提纲上面亲笔批示“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贾拓夫建议在延安建立一座清真寺，一座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为“清真寺”和“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字。贾拓夫还建议并经批准在延安设立了两所清真食堂，为来往的回族人民提供方便。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之后，贾拓夫参加组织了蒙古族和回民两个文化促进会。白如冰从绥远回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时，贾拓夫参加了会议，并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对团结和争取蒙古族、回族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和宝贵意见，对内蒙古地区开展民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贾拓夫还在《西北》和《解放》刊物上发表了《团结中华各民族争取抗战建国胜利》、《蒙古民族与抗日战争》两篇专文，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抗日政策。

1940年夏，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座谈会讨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和工作，贾拓夫参加了这个会议，并讲了意见。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与积蓄力量”的政策。贾拓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制订了贯彻落实该决定的具体的意见和办法。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贾拓夫为西北局候补委员，6月任西北局民运部部长。7月，西北局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为主任。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经济与财政等问题,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会议期间,中央任命贾拓夫为西北局常委兼秘书长,他为毛泽东的报告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次会议后不久,中央又任命贾拓夫兼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和边区银行的政委,此后他便将相当的精力转到了财经工作方面。协助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贺龙、副主任陈云,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土特产出口换回生产生活必需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又以边区货币的发行支持生产和财政,加之,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渡过了经济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本来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自1943年7月康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整风运动一时出现偏差,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并诬蔑陕西等省的地下党是“假党”。对此,贾拓夫及欧阳钦、汪锋、赵伯平等不计个人安危,予以坚决驳斥,并在1944年的甄别平反中协助西北局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保护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一大批党员干部。

1945年夏,贾拓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云调往东北工作,贾拓夫受命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西北财经办事处是西北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关。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先是林伯渠任主任,

后是贺龙任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财经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内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松一口气”的思想，放松了生产和工作，使边区财政收入大大减少，10月份的税收仅是7月份的40%。加之，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时候，边区大批干部及部队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投降时，边区的财政积蓄本来可以用一年，但由于收少支多，五个月几乎把积蓄用光了。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的经济出现了新的、严重的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改善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贾拓夫在会上强调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并提出五项具体措施：一、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的自给自足，必须扩大棉田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产量，从全边区年产人均三斤左右提高到年产人均四斤；二、财政上要继续贯彻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消灭财政赤字，争取做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和发展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他土产品出境的税率；四、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品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在金融工作中，首先要弄清边币和国民党发行的货币（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数量与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克服货币发行的随意性，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量。1946年1月19日，贾拓夫在边区级机关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号召发展生产，减轻民负，把边区建设得更富庶繁荣。部队的生产要实现四个月以上的粮食和全年伙食、办公及杂支费用的自给，机关的生产要实现伙食、办公费和杂支费的全部

自给,一切机关单位都要精简人员、厉行节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经过全区军民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边区前,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政收入增加,并有了较多的节余。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贾拓夫随同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机关辗转陕北,率领财经各部门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的“蘑菇战术”,在坚壁清野、找空子进行贸易、组织边区人民大力支援前线等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石家庄参加华北、东北、西北财经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由董必武主持,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贾拓夫利用有限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学习调查,搜集了许多关于接管新城市工作的经验及文告等资料。此后他写下几万字《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发表在党内读物《干部必读》上。

1948年12月22日,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贺龙、副主任贾拓夫发布通令,宣布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已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1949年1月1日起发行流通“中国人民银行券”。新币的发行和流通,对于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和支援解放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贾拓夫以主要力量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战线上的全体人员,充分利用前线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边区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同时准备接管即将解放的大城市,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作准备。为了接管好西安,在中共中央

西北局的领导下，贾拓夫从1949年初就开始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他于2月9日向西北局报送了《关于准备接收西安的初步计划》，分为“西安情况的搜集与调查”、“接收西安的政策研究与准备”、“西安军管会的组织准备”、“接收西安的干部准备”、“卫戍部队的准备与训练”、“入城干部的训练”、“供给上的必须准备”、“其他若干技术问题的准备”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2月28日，西北局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任命贾拓夫为主任。贾拓夫多次主持召开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接收工作的方方面面过细地进行组织落实，制订各系统的具体接收方案，并于5月12日报经西北局批准颁布了《入城纪律及注意事项》，迎接西安解放的到来。

(六)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时，贾拓夫尚在延安。23日，贾拓夫抵达西安，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主持西安市的接管工作。

西安是西北最大的城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顽固派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枢纽。西安解放后，暗藏的敌人仍负隅顽抗，进行破坏活动。在解放后的头五天里，西安城内发生抢劫案170起，“胡宗南要杀回马枪了”、“解放军马上要撤退”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有些市民怕再打起仗来，就拖儿带女逃离西安。贾拓夫遵照毛泽东关于接管城市工作的指示，并参照陈云“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接收沈阳的经验，首先是在整体上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定局面。他以最大的精力抓治安工作，主持召开各阶层进步分子座谈会，深入到工、商、学等各界群众中了解情况和听取意见，

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西安5月20日解放，军管会领导机关23日入城，翌日宣告军管会成立，26日起陆续公告成立市府、警司、法院、银行等。接管人员3500人至27日到齐，随即陆续出发进行接管。费时一月左右，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被接管单位，虽有先接后管、先管后接或接管并进之分，但一般均迅速地达到复工、复业、复课，并开始了某些改革，生长着某些新的气象。”由于接管工作顺利，特别是由于“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一切破坏分子无立锥之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特务人员纷纷向人民政府登记，申请悔过，瓦解了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系统，土匪销声匿迹，社会秩序很快趋于安定。支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三天完成了部队要求五天完成的5万袋面粉筹集任务，提前完成了20万袋军粮的铁路运输任务，超额完成了近30万床军被、25万套棉衣、600件大衣、50万双军袜的生产任务，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西进和南下。

接管西安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市场动荡不安。这方面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而是比金圆券强硬许多倍的银元。商人囤积居奇，并拒收人民币。我们的一些干部和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也向市人民政府建议，先不要发行人民币，让银元继续流通。贾拓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样只会使市场更加混乱，使人民币更难树立信用。市人民政府果断地宣布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使人民币取得合法地位进入市场，并公布各解放区城市的物价，促使商店开门营业。不久，政府又针对银元脱离人民银行牌价在市面流通、导致物价上涨的情况，再次明令禁用银元与铜元，并提高了银元的收兑牌价。此外，贾拓夫还责令贸易公司抛售物资，税收机关除废除一些反动的苛捐杂税外一律按原税目、税率和税制立即开征各项税收，司法机关不受

理一切有关“银元纠纷”的案件。采取上述措施后,物价从波动趋于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开始扩展。可是不久,因已败退到宝鸡的胡宗南部及甘宁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反扑到咸阳一线,特务分子造谣破坏,加之外地物价上涨对西安市场的刺激等原因,又引起了一场相当大的波动,黑市上一个银元由原兑换 3000 元(旧币,下同)人民币猛升为 1 万多元,以至再次发生拒用人民币的现象,一些商店关门停业。后经市人民政府广泛深入宣传,严厉打击匪特活动,特别是原在华北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大军已达陕境,加以市人民政府继续抛售物资,开征赢利所得税,宣布公粮折收 10% 的人民币,银行用人民币汇兑,并在黑市低价抛出银元以黑市打击黑市等,才使这场波动平伏下去,一个银元的黑市兑价从 1 万多元人民币跌到 1000 余元。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元作坚决斗争,要打击银元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使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调下,才逐渐压缩银元阵地,扩展人民币阵地,最后达到贯彻本币一元化。”

1949 年 8 月 26 日兰州解放,28 日贾拓夫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到甘肃进行视察。9 月 1 日,中共甘肃省委开会讨论支援前线和稳定市场物价等问题。会上有同志提出利用部队和政府掌握的交通工具,对甘肃的石油、食盐、药材、皮毛等实行“专卖”,主张不让私人从事这方面的经营活动。贾拓夫首先发言,表示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公家统制这些物资不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公家只能做骨干,带领商人去搞,不能限制私人去搞。不让私人搞,物资金融都不能流通,结果对公对私都不利。这是一个原

则问题。”贾拓夫的意见，得到贺龙和习仲勋的赞同和支持。贺龙说：“‘包办’的思想体系是有危险的，应该让商人去搞，我们从中带头起骨干作用，这样去掌握平定物价，使市面流通，城乡交流，全国交流。否则，西安不同意，大家不同意。”习仲勋说：“那种‘专卖’的办法估计到没有什么好处，不要去试验它，否则会吃很大的亏，划不来。”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后，贾拓夫又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到新疆处理军政和重要财经问题。贾拓夫了解了新疆的财经基本状况后，认为新疆财政收入仅能满足财政支出的1/5，因此，建议新疆领导人，必须不失时机地迅速恢复生产，增加收入，同时要积极恢复交通，沟通同“关内”来往的物资交流渠道，统一货币，平抑物价，稳定金融，以促进新疆经济的稳定发展。贾拓夫还受彭德怀的委托，为新疆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山）统一问题，专程前往伊宁，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为三区的民族团结和新疆和平建设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贾拓夫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主席兼财委主任后改任副主任）。此后，贾拓夫就把工作重点转向了西北地区的财经工作上。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贾拓夫坚决贯彻执行政务院的决定，率领西北区财经各部门严格清查仓库，将所有物资全部上报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将所有公粮、税收除地方附加外全部上报由中央财政部调度。在西北，由于及时果断地建立了国家的统一收支管理制度和采取其他有力措施，金融物价逐步趋于稳定，财政收支趋于平衡。

1952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在这一运

动中,贾拓夫领导西北财经战线的广大职工严厉地打击重大的贪污腐败分子,无情地揭露和反对官僚主义。为了推动财经各部门“三反”运动的开展,他亲自为西北财经委员会主编了一个“打虎”小报,经常在上面写些小评论,强调无情地揭露和清除一切贪污现象。在“三反”进行到组织处理阶段时,他又一再强调要严格划清贪污与占小便宜的政策界限,对于那些因占小便宜而损公的人,坚持采取教育的方针,挽救了一批干部。

以贾拓夫为首的西北财委,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长期在国民党旧政权横征暴敛下濒临破产的西北城乡经济得到复苏。在广大农村,粮食生产逐年增长。在城市,首先把发展壮大和加强国营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坚决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展城乡互相帮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优惠的照顾,并欢迎在解放前夕出于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迅速回厂继续经营。这些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使了西北地区的工商经济得以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七)

1952年8月,贾拓夫调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分管交通运输(包括交通、铁道、邮电)、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日常工作。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即后来的国家计委)成立。195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原由财经委员会管理的工业、交通各部的工作业务,划由计委管理。贾拓夫改任计委副主

任。他协助陈云编制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在确定发展速度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上,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比如,在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强调发展重工业,不应忽视轻工业的重要性,无论从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还是从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看,都应当重视轻工业;在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积极发展新建工业是完全必要的,但原有工业的改建、扩建,比起新建毕竟投资少、建设快、收效大;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沿海工业企业中的巨大潜力,可以在新技术、新产品方面起带头作用,可以为国家积累大量资金,并可调出大量职工和科技人员支援内地建设,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

1954年10月,贾拓夫调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直接参加领导对私营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贾拓夫认为:生产关系的这种重大变革,牵涉到社会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应当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分期分批地进行;至于改造的步骤、方法和它们的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必须与实际生产水平相适应。他在1955年到1956年之间,先后四次到各地考察,发现有些地方由于过早过多地把手工业合并和实行统一计算盈亏,在合作化后,不仅生产没有发展,反而比自营的时候产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对此他及时向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和手工业主管部门明确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不能为合作化而合作化。他要求地方当局按照以下几项原则认真复查,对的肯定,错的纠正。这几项原则是:第一,在手工业制造和服务性行业中,一部分可以合并,但大部分不应该合并;第二,出于手工业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重,在供销业务上应以基层

社自购自销为主；第三，小商小贩各有一套传统悠久的经营办法，应予长期保存。他在考察时，还发现有些地方在合作化后，传统的手工艺品见不到了，老艺人遭受到冷遇与失业的苦闷，便告诉地方的负责人：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些特种手工艺品，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轻率丢掉，对老艺人要热情关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给他们安排青年学徒，要把传统的“特艺”都接过来。他的这些意见，受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

在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贾拓夫用了很大的精力，协助陈云研究和处理从公私合营的经营管理到生产、流通方面的各种新动向、新问题。1955年，他在各地考察时，发现工商脱节、产供销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便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长期的细致调查，最后提出以销定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解决了工商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贾拓夫在兼任轻工业部部长期间，对轻工业发展速度，协调轻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品种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轻工业，之所以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获得60%以上的发展，是与贾拓夫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轻工业也必须积极地相应地发展”这一指导思想，和采取一系列有远见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贾拓夫还非常重视轻工业系统科技人才的培养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没有一所轻工业高等院校。他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国家的轻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轻工业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为中国轻工业的发展，造就了成千上万的高级和中级科技骨干。

1956年春，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国务院所属

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中央对贾拓夫在汇报中所提出的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原有工业与新建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意见十分重视,决定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从原来的8:1调整为7:1,“一五”计划内施工的限额以上的轻工业建设项目,由原订的65个增加到99个。

1956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成立,11月贾拓夫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薄一波主任制定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和处理日常工作。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年,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太长,工人增加过多,工资增长过猛,造成投资的增长远远超过重工业的增长,而重工业的增长又远远超过轻工业的增长,从而出现了原材料供不应求、市场紧张、财政发生赤字的局面。贾拓夫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江苏等地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他明确提出:我们国家的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相适应,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就必然会出现资金和设备材料的紧张,从而会引起国家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和必要的物资储备的减少。他把这些现象生动地概括为:“基本建设上马容易下马难,国家储备出库容易进库难,职工招来容易退回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计划要留有余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贾拓夫从外地考察回京后,即和薄一波共同主持编制年度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在讨论工业发展速度时,有主张7%的,有主张6%的,贾拓夫根据1956年出现的诸多紧张局面,认为最好不要超过5%。在讨论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有主张150亿元的,有主张126亿元的,贾拓夫主张100亿元。周恩来和

陈云听了汇报后，采纳了贾拓夫的意见，将工业发展速度定为4%，基本建设投资定为110亿元。后来的事实证明，1957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是比较协调的，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市场繁荣，财政由亏转盈。

1957年冬，贾拓夫与陈云在大连、丹东、吉林、长春、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地考察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中的若干重点项目。陈云和贾拓夫一致认为，鉴于当前中国化学工业特别薄弱，必须从计划安排上对化工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就为中国化学工业后来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贾拓夫一度兼管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的反右派工作。他对整风运动以来“大鸣”、“大放”出来的一些问题一一审查后说，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上不了纲。他对机关党委的干部说：我对党委负责，有右反右，没右决不能乱扣，要实事求是嘛！正因为他爱护干部，善于团结同志，所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心情舒畅，大家亲近他，尊敬他。

1958年3月，贾拓夫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协助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全面处理计划事宜。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风迅速蔓延开来。为了了解真实的情况，贾拓夫到陕西的西安、延安、榆林、神木、吴堡和甘肃、青海、山西的一些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当他看到深翻土地挖到人跳进去看不见头，把十几亩快成熟的麦子移在一亩土地上“创高产”时，对随行人员说，这样搞法简直是胡闹，劳民伤财。当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口号时，担心地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全国人民的喉舌，怎么能这样

来宣传,来指导行动呢?这不是助长下边浮夸更加浮夸吗!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的,但总不能太脱离实际。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发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即比1957年翻一番的号召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大办“小土群”、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贾拓夫鉴于当年前8个月的钢产量只有500万吨,在北戴河会议作出翻番决定时,就同宋劭文、廖季立多次核算,认为在后4个月要生产600万吨钢是不可能的事。全民炼钢运动掀起后,他到东西南北各地,对“小土群”进行了从采矿、炼焦、炼铁、轧钢到成材全过程的系统考察,发现:到处滥开小矿,成本高,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资源;小高炉、小平炉炼出来的铁和钢,质量太差,根本不能使用;土法炼焦用煤量大,出焦量小,且质量低劣,造成极大浪费。他得出了用土法炼铁炼钢炼焦得不偿失的结论,回京后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王思华和统计局工业司干部黄海说:“目前的大炼钢铁要好好研究一下,不能光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和技术账,要全面考察大炼钢铁中的‘小土群’。你们整理个材料向中央反映反映,这样的‘小土群’,炼出的东西不能用,长期下去国家怎么受得了。不这样来考虑问题,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王思华很快整理出材料,贾拓夫看了很高兴,亲自修改后,以国家统计局和计委办公厅名义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

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相继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初步降低了1959年的工业生产指标,钢产量由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贾拓夫对这2000万吨钢产量指标究竟能否实现,心里还是很不踏实。他从武昌回到北京后,就让计委委员兼年度综合局局长廖季立重新考虑两个“低指标——1800万吨、

1600万吨或者更低些”的方案,以备一旦全党认识到必须再调整1959年钢产量的指标时,就可以马上提出新的方案。贾拓夫的这种考虑是正确的。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又将当年钢的生产指标调整为1650万吨。贾拓夫遂和宋平、廖季立交换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意见后,由廖季立写了《紧张形势从何而来?》的材料,印发工委党组并上报中共中央。陈云看了很重视,认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根源就是在于钢的产量指标过高。

中央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各方面调查材料,认为1959年要完成1650万吨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5月上旬,贾拓夫从天津、张家口等地考察钢铁、煤炭生产情况后刚刚返京,即参加陈云、李富春召集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陈云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后,感到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责成贾拓夫和有关人员起草关于调整1959年物资分配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意见。贾拓夫立即组织力量反复核算,拟将钢指标由1650万吨降为1300万吨,可分配的钢材由1150万吨降为900万吨,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从1092个降为788个,基本建设投资由280亿元降为240亿元。陈云和中央财经小组又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认为上述调整合适,交由贾拓夫组织起草了《关于调整钢铁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中央采纳了陈云、贾拓夫等的建议,并于6月13日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由于计划调整得切实可行了,到年底生产了1340万吨钢。

从1958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上,

都提倡大家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要认真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摸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做到从必然王国逐步达到自由王国。贾拓夫根据这段期间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和中央几次调整计划指标的情况，他逐渐认识到理论脱离实际的严重性。1959年上半年，他重点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想通过这些学习，总结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摸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他对现实经济生活暴露出的30多个问题，如政治与经济、理论与实践、革命热情与科学态度、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群众路线与集中领导、比例与速度、多快与好省、需要与可能以及反对所谓“唯条件论”等，作了深刻的辩证分析，写出了心得笔记。他认为当时计划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

1959年4月29日上午，贾拓夫在国家计委党组会上就虚与实、冷与热、主观与客观、见人与见物、政治与经济、速度与比例、修改计划指标与总路线等问题，敞开思想，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要虚实结合，只抽象地务虚，不结合实际，太虚，就会形成“太虚幻境”，似真非真，似有实无。我们过去虚实结合得不好，给中央的报告没有把经济形势如实讲清，以致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也造成经济工作上的被动。事在人为，这话是对的。“事”就是反映客观的事物，“为”就是人的有所作为。现在却是事与愿违，客观可能性和主观愿望不一致。计划指标修改，说明指标有虚假部分，在反映客观方面有不实之处。现在需要冷静地把问题摸清楚，不要只热不冷，也不要只冷不热，要冷热结合。他说，就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既要见人，也要见物。不见人，要犯保守错误；只注意人，不注意物，那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只注意经济技术条件，不注意精神思想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把为了完成任务、解决

困难所需的必要条件,加以否定,斥之为“唯条件论”。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经济技术是条件,政治思想也是条件,无条件论显然是唯心的。他还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作用很大,但不能唯意志论。在谈到计划工作时,他强调做好综合平衡,反对高指标。他说,计划要尽可能切合实际,留有余地,做到心中有数。不算账,没有数,是很危险的。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来算账,政治账、技术账、经济账都要算,结合起来算。只管经济技术,只管业务,要失掉方向;可是只搞政治,不管经济技术,不管业务,那要成为空头政治家。与会的党组其他成员一致赞成贾拓夫的发言。虽然贾拓夫一再声明他的这个发言只限于党组范围之内,但大家还是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听,遂决定由他给机关科级以上干部作一次报告。

1959年6月17、18日,贾拓夫以“1959年计划的调整问题”为题,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两场学习报告,讲了29个问题。他说:多、快、好、省是个整体,不能腰斩,而现在只是只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没有好省的多快,不是真正的多快,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大跃进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必然失调,不调整、巩固,就不能前进。需要与可能,两者应当兼顾,只讲可能,不讲需要,容易保守;只讲需要,不讲可能,容易盲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是主观主义。他还说,做计划工作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要努力学习理论,掌握经济规律,做到心中有数。

贾拓夫在这次干部会议后,即前往山西继续进行考察。他在太原与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畅怀深谈,交换对形势和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并应邀向太原的一些干部就计划问题讲了一些个人的看法。他指出,山西的经济建设同其他地区一样,共同性

的问题是紧张而失调。他分析了计划指标过高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着重说明编制计划要遵循以下六条原则,即:一盘棋,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两条腿,建设与生活,积累和消费要互相兼顾;三结合,政治、经济、技术要三结合;四全面,多、快、好、省四者要全面;五并举,工农、轻重、大中小、中央与地方、土与洋五个并举;六兼顾,工、农、商、学、兵、交六个方面都必须兼顾。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初期定的议题是分析形势,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针对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即以后所说的“意见书”。出席会议的贾拓夫看了会议印发的彭德怀的“意见书”后,对所反映的问题深有同感,表示赞成。但是彭德怀的信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结果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人的严厉批判。由于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上说他的材料来自国家计委的报告,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时又说过党内真正懂得经济的不多,贾拓夫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株连了贾拓夫,把贾拓夫作为“一贯严重右倾”来批判,并且还怀疑贾拓夫是所谓的“彭德怀反党地下俱乐部”的成员。其实,彭德怀的“意见书”在会议未正式印发大家以前,贾拓夫根本不知道,彭德怀也根本没有找贾拓夫要过什么材料。

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党组联合举行扩大会议,并有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党组负责人参加,批判和检查“右倾错误”。贾拓夫是批判的重点,他在国家计委和统计局科级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学习报告和以太原的讲话被错误地认为是“大毒草”,他布置国家统计局王思华和黄海写的《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的材料被指责为“反党文件”、“反党炮弹”,经常与贾拓夫一

起研究问题的一些干部被指责为“严重右倾”，并追查贾拓夫与彭德怀的关系。会议先后开了一个多月，最后把贾拓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他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职务，下放基层工作。

对于这种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贾拓夫一直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他察觉到孩子们精神上有压力，便深切地说：“几十年的战争岁月，有无数好同志为党的事业牺牲了。今天，我们有了权力、地位和待遇，若不努力把他们未竟的事业担负起来，何以告慰死难的同志？我们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还算什么革命者。”他对妻子白茜说：“我们辛苦几十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心里是踏实的。”还说：“批判我的所谓几大罪状，集中一点就是说我从1958年‘大跃进’到1959年极其顽固地反对高速度、高指标，坚持低速度。可是作为一个负责干部，无论如何我不能对党中央、毛主席讲假话。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我愿当一个愉快的保守主义者。”

(八)

1960年11月，贾拓夫被下放到抚顺发电厂代理厂长。离京前，组织上说他可以带秘书、司机和公务员，但他坚持要求只身前往。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还是派了公务员小李随去。可是到了抚顺，他又让小李去学技术，后来小李成了一名熟练技术工人，当了电厂工会副主席。

贾拓夫在抚顺电厂工作期间写过几首诗词，其中的一首《七绝》是这样的：“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京中同志如相问，早已投身在火炉。”他旗帜鲜明地表白了在庐山斗争中自己是

一个无辜者，而且也热情洋溢地抒发了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广阔胸怀。

贾拓夫一到电厂，头一件事情就是找党委领导成员询问了解电厂情况，不辞辛劳地访问厂里的干部，然后深入生产第一线，同工人促膝谈心。他走访了许多老工人的家庭，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干部、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很快就掌握了发电厂的政治、行政、技术、财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电厂由于过去两年的高指标、瞎指挥、乱操作、设备失修等原因，生产建设、企业管理和职工生活等方面积累了成堆的问题，现在又面对着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实现“第三个大跃进年”加码发电的指示。贾拓夫掌握了上述情况后说，我们再不能搞这种“大跃进”了，再搞下去，劳民伤财，真是不得了呀！

修配分场本来只有几百万元产值的生产规模，但在“跃进比武”的压力下，竟提出当年要增创产值1亿元以上。对这种根本办不到的事情，谁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贾拓夫却严肃地批评说：“这完全是浮夸性质的错误。”并教育干部要很好吸取这个深刻教训，克服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毛病。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贾拓夫为了推动电厂的调整工作，积极组织干部系统地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23个专题调查材料，亲自主持起草了《抚顺发电厂四年基本工作总结与五年工作初步规划》。他针对制度不严、职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坚决果断地减少管理层次，明确职责范围，订立了12种新的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各级行政和技术责任制，并组织全厂重新修订了运行、检修、安全三大规程。他积极协助党委从开展思想整风入手，狠抓了改进领导方法，使全厂迅速出现了设备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走上正轨，生产秩序进

一步正常的新局面。

在整个调整工作中,贾拓夫认为,抚顺电厂企业管理工作的主要问题是:党委工作事务化,政治工作简单化,经常工作突击化。企业对“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的党委工作方法,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委包揽了行政事务工作,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党委讨论才能办,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群众政治思想工作,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以致群众心情不舒畅。同时,什么工作都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必然使正常秩序乱了套。

抚顺电厂整顿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受到中共抚顺市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国务院水电部的重视,并加以推广。贾拓夫回京开会时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高兴地给予了肯定和表扬。

贾拓夫在狠抓企业管理的同时,又从多方面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他经常对厂里的干部说:“我们领导干部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意味着脱离实际,正像脱离实际必然脱离群众一样。”他身体力行,自觉地把自已置于群众之中,时时刻刻关心群众的疾苦。由于物资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许多职工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他看了心里十分难过,就请主管生活的副厂长到市里申请批拨了2300多公斤黄豆,交给食堂为职工磨豆浆喝。老工人李天福身体不好,孩子又多,粮食不够吃,贾拓夫经常用自己的粮食和粮票接济李师傅。贾拓夫还经常下食堂帮厨,同大家吃一样的“代食品”。工人们亲切地对他说:“老贾,你是长征干部,身体又不好,我们真不忍心看你吃这个啊!”贾拓夫回答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首先应是普通劳动者,不能特殊化,你们能吃‘代食品’,我怎么不能吃呢!”后来,水电部刘澜波部长到发电厂视察时,贾拓夫向他反映了因粮食紧张,工人不得不

以“代食品”来充饥的情况。刘澜波说,工人一天干活要流多少汗水,全靠“代食品”这怎么行呢?随后经过多方的努力,取消了“代食品”。贾拓夫还建议组织了“康复队”,将身体不好的工人组织起来从事轻微劳动,并分期分批疗养休整。当时职工住房也很紧张,他亲自给水电部和东北电管局领导人写信,并派副厂长和基建科科长反复到水电部请批建房资金,终于建起了3700多平方米的新住宅,解决了100多户职工的住房困难。

1962年春贾拓夫的“右倾错误”被平反,同年夏奉调回京,1963年初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在中央党校的两年多时间里,系统地阅读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1965年10月,贾拓夫被调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即今首都钢铁公司)担任副经理。他来到公司的第二天,就穿着一身普通干部制服下到基层,投身到生产实践中去。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他把自己比喻为一滴水,真挚地表达了他永不脱离群众、永不脱离实践的胸怀。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他在二个厂、三个矿、六个车间工段从事劳动,蹲点调查,写出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生产管理等方面共11万字的调查报告。当时,有些职工对推广白云石车间的经验持怀疑态度,他用15个日夜写出了《白云石车间调查报告》,肯定了白云石车间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钢出现了“一夜狂风起,百花尽凋零”的惨景。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了所谓“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被称颂为“工交战线一面红旗”的白云石车间,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贾拓夫不信这个邪,公开表示他仍然坚持认为“石钢不是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白云石’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受到迫害想不通,感到苦闷,贾拓夫给了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和斗争的勇气。一名

青年工人对贾拓夫说：“彭真来车间和我谈过一次话，我就成了反革命！”贾拓夫对他说：“彭真怎么啦？难道他讲的话都错了？我就不信！”一个同志听说“造反派”要批斗他，冒着风险去给他送信，劝他躲一躲，可他偏不，反而提前一小时到了会场。他利用批斗他的讲台，据理驳斥了对白云石车间的种种诬陷。这以后，他又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堂堂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名字贴了出去。

贾拓夫的这种为维护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震怒了林彪、“四人帮”及其顾问康生。1966年12月初，在林彪主持的一次工交口的会议上，康生诬陷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一个老反党分子。”康生的讲话给了“造反派”“尚方宝剑”，贾拓夫遭到更残酷的迫害。一次，一伙人闯到贾拓夫家里，强令他回答有关国民经济的机密问题，贾拓夫坚定地回答：“没有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的指示，我不能奉告。”还有一次，一伙人向贾拓夫收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的材料，贾拓夫很干脆地说：“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错误。就是有什么错误，也让他们自己去讲。”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诬陷和迫害，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直到他1967年5月7日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5年下半年，贾拓夫赋过一首长诗，其中写道：“过则勿殚改，衰时当忌昏，虚心党受益，自满必迷津。辩证观世界，无产化余生，事业铭心内，自由努力争。有党万事足，无私一身轻，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行年过半百，壮志奋兼程，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这首诗充分表达了他的理想、情操、品德，以及他的大公无私，献身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

1980年3月20日，首都各界700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贾拓夫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薄一波致悼词。悼词说：“贾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为

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的力量。”“贾拓夫同志在经济工作方面,具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贾拓夫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得党的信任、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尤其可贵的是,他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强加给贾拓夫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已统统推倒”。党对贾拓夫的一生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

(郑戈桓 常 诚 陈大伦 赵家梁 张 盘
张致祥 贾自新 李瑞林参加起草)

龚逢春

(1908—1978)

龚逢春，原名龚永禄，又名龚福畴。陕西城固县人。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先后任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10月，及时向长征刚到吴起镇的毛主席汇报陕北“肃反”的情况，对党中央挽救陕北党和红军起了重要作用。此后，先后任中共赤安中心县委书记，陕西省委宣

传部长，晋察冀边区宣传部长，晋绥分局宣传部长、社会部长、党校校长、组织部长等职。1949年12月随贺龙入川，四川解放后，先后任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四川省委党校校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10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轮训部主任。1978年12月1日在北京逝世。

龚逢春，原名龚永禄，又名龚福畴。1908年3月24日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上元观外北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父几辈都是文盲，仅靠几亩薄田度日，生活十分艰苦。尽管如此，吃尽了没文化苦的父亲，还是竭尽全力节衣缩食供他上学。在本村和县城读完高小后，龚逢春1925年考入汉中联合中学，开始了他革命的一生。

开展学运兵运

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汉中后,激起了学生的极大义愤,龚逢春积极投身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1926年12月,北伐军打到武汉,他想投笔从戎,但因交通不便未能如愿。1927年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在汉中招生,龚逢春毅然放弃学业,参加招生考试。录取后,他背着行李,徒步到西安正式入学,接受军事训练。在校内他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并接受了进步思想。不久,由于形势所迫,许多共产党员、进步学生纷纷离校,他便转入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此期间,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9年毕业后,龚逢春回到家乡——城固县高小任教员。反动军阀的统治,旧社会的黑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激发了他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求翻身解放的愿望。在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下,经吴定程、郑月波介绍,他于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委员,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东北三省沦陷后,全国反日情绪高涨。龚逢春在学校领导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自己编写抗日剧本,亲自上台表演,向群众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和教育。1932年初,受党组织派遣,龚逢春到驻汉中的杨虎城部五十一旅一〇二团团部任中尉文书、干事,并以此职务作掩护,积极而慎重地开展兵运工作。他在主编的团部刊物《奋斗》上多次发表文章,向官兵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由于该旅内部矛盾斗争激化,怀疑有共产党分子,龚逢春不便继续工作,遵照党的指示,于5月间离开五十一旅一〇二团,继续在汉中一带做士兵工作,并任陕南军

委宣传部长。

此后，龚逢春又通过在杨虎城陕西警备第一旅任职的同学关系，到该旅继续做士兵工作。1933年春，他趁该旅在洋县办小报的机会，创办《新民周刊》，利用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随警备第一旅到西安，并设法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参加陕甘边斗争

1933年六七月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发动和领导下，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龚逢春脱离原来部队，参与筹划了这次起义。7月21日上午，起义打响后，他和起义部队一起，高举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迅速解除了全城反动组织的武装，释放全部在押人员，开仓济贫，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

起义后，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龚逢春任义勇军政治部科长。

为了统一领导当地各革命队伍，集中力量打击敌人，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下辖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第三支队，龚逢春任总指挥部鼓动科长。临时总指挥部撤销后，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龚逢春任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

在刘志丹领导下，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开始在照金，后来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南梁建立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龚逢春参与了政权建立的准备工作。担任中

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宣传部长。

1935年，龚逢春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期间，创办了特委机关报——《西北红旗》报。由于缺乏办报人员，他既当主编，又当编辑，还当通讯员，连刻写蜡版和油印都是亲自干。他编写的稿子短小精干，通俗易懂，又有哲理性，颇受战士、群众的欢迎。他主编的这张报纸宣传了党的政策，宣传了红军，教育了人民，打击了敌人，对于鼓舞部队士气，发动群众拥军支前，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建立根据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5年2月，龚逢春被任命为二路游击队政委，率部在庆阳、环县、合水、赤安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二十六军主力红三团及抗日义勇军多次打击和消灭进入陕甘苏区的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9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认为陕甘边区等地有右倾机会主义、反革命分子，于是在党内外进行“肃反”，制造了一桩桩冤假错案。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人被逮捕入狱，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县以上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无辜杀害的革命同志竟达200多人。当时正在前线作战的龚逢春也被列入逮捕的名单，但因前线战事紧迫，他幸免被捕。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此危急关头到达吴起镇（现吴旗）。率部在三边和吴起一带活动的龚逢春，接到靖边县革委会送来的喜讯后，立即率直属部队连夜赶赴靖边县革委会驻地，把队伍暂时安顿在凤凰寺，他和马福记到革委会询问了中央红军到达和作战情况，布置了支援中央红军的工作，随即赶赴吴起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龚逢春还一一汇报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政工作、红十五团的建立以及周边敌军的情况，特别是陕北

错误“肃反”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听后十分气愤，站起来挥着手说：“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陕北“肃反”中“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得到纠正，陕北的党和革命得到了挽救。在这件事情上，龚逢春及时真实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为了表达对党的感戴之情，龚逢春将自己的名字由福畴改为逢春。

1935年12月初，由于“肃反”的隐患，靖边县警卫大队两个中队叛变，侵入赤安县内，制造了“三边事件”。叛匪和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杀害大批干部，破坏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在此紧要关头，龚逢春被任命为赤安中心县委书记。到任后，他深入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坚决打击反动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扭转了不利形势，平息了叛乱，恢复和巩固了红色政权。

1936年5月，龚逢春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七七事变后，被调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后，任陕甘边区政府驻榆林地区办事处主任、榆林地区特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搞好民族统战工作，争取蒙古上层的进步人士，宣传教育蒙古族的一般群众。期间曾争取了从绥包撤出的100多名蒙古知识青年，经教育后，使他们奔向延安。

晋绥生涯

1938年夏至年底，龚逢春任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1月，龚逢春单人匹马，从晋察冀边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晋西北的兴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晋绥根据地战斗生涯。

龚逢春刚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时，正值这里抗日斗争和反顽斗争十分复杂、艰苦的时期。以阎锡山为首的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利用一切反共手段制造分裂活动，给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军造成极大的困难。7月上旬，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召开党的第四次活动分子会议，龚逢春在会上就加强党员、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问题以及对敌斗争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号召全体党的干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统一了干部思想。会后，各地广泛开展了反逆流的政治斗争。10月，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龚逢春当选为区委委员兼区委组织部长。在反顽斗争中，龚逢春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反顽斗争胜利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40年2月7日，中共晋西区党委成立，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地区的工作。两个区委合并时，遵照中央意见，原晋西南区党委的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分别任合并后的晋西区党委的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原晋西北的有些同志对这样的人事安排有过一些不同看法。龚逢春原任晋西北区党委组织部长，合并后改任晋西区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他对工作上的变动毫无怨言，并积极做好晋西南和晋西北干部的团结工作。6月初，中共晋西区党委召开扩大干部会议，龚逢春就武装自卫队的组织建设和工作方针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他提出的一些基本方针和原则问题，为后来的民兵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10月15日，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部成立，龚逢春兼任总指挥。

1940年冬，龚逢春任晋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后又代理社会部

长。针对当时晋西北地区面临被日寇和顽固派破坏后的困难,龚逢春提出克服困难的关键是培养一批思想素质较高的干部,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并具体部署了宣传、文化教育和干部培训班等各项工作。1942年8月,中共晋绥分局正式成立,龚逢春任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任宣传部长期间为培养干部倡导举办了抗战学院、临县一中、保德二中、贺昌中学、永田中学,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1943年初,龚逢春就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校长之后,遵照分局的统一部署,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校的整风运动。他特别强调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增强党性。他经常深入到支部和小组,即席解答疑难问题。他的语言简洁,含义深刻,使人听后很受启发。经过整风学习,大家感到收获很大,特别是在增强党性,改进作风和提高思想认识方面有明显提高。

1943年冬,在整风运动中开展的“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正在健康发展的整风学习,导致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使整风学习发生了不应有的偏差。“抢救运动”的错误做法波及晋绥地区后,党校的整风学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一度出现了大搞逼、供、信和反特扩大化的错误。龚逢春对这种做法很不赞成,但没有得到支持。问题被党中央、毛主席发现后,很快予以纠正,对伤害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工作。

1944年冬,龚逢春在向全校学员作整风运动总结报告时,对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给晋绥党校造成的恶果,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当场向学员道了歉。大家都知道主要责任不在龚逢春,但他这种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的精神和诚恳的态度还是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学员和领导干部。在

随后进行的甄别工作中，龚逢春反复强调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求给每个同志作结论都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做好调查研究，绝不能把没有充分根据的问题写进结论中去。由于认真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方针，大家对甄别工作比较满意。甄别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到日本投降时，党校的甄别工作已基本完成，使绝大多数学员走上了工作岗位。

1946年初，龚逢春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长，1947年初又兼任组织部长。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进行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上。1946年底，龚逢春按照晋绥分局的安排，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分赴各地进行土改试点。在试点阶段，工作团按照政策规定充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工作比较稳妥。

1947年2月，康生、陈伯达率领土改考察团到达晋绥，分别在临县郝家坡和静乐县潘家庄搞起两个试点。他们公然违背中央政策，另搞一套。提出“搬石头”、“揭盖子”、“斗干部”等极端错误的口号和做法，形成了一股干扰破坏农村土改整党的“左”的逆流。在农村土改及整党“三查”（查立场、查思想、查作风）中出现了乱打、乱斗、乱杀、乱开除干部的无政府现象。有些情况严重的地区，甚至不要党的领导，党支部被撤销。朔县、神池、右玉等县委也被轻率地解散了。

龚逢春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但对晋绥土改中出现的某些“左”的做法特别是对乱斗干部和轻率解散某些县委的做法很不赞成。他认为晋绥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不但积极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党的干部，他积极主张把一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县以上干部送党校学习，而不采取其他过

“左”的组织处理办法。当党中央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纠正时,许多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意见还很大。龚逢春又从大局出发,深入到受害严重的地方,耐心说服这些同志,勉励大家在分局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为巩固土改成果,争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影响,晋绥分局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对边区社会情况缺乏客观的分析,主观臆断地制定政策,导致在1947年9月经晋绥分局批准、以晋绥边区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告农民书》中,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错误口号,造成一段时间土改运动离开了党的领导,划分阶级成分中,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发生了乱打乱杀情况,使一些劳动人民和基层干部死于非命。若不是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其后果将更为严重。在《告农民书》发表前夕,因龚逢春对边区干部队伍基本情况比较了解,为了防止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被夸大,他亲笔在《告农民书》上加了如下一段话:“干部是指各种出身虽不同,但还是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这些干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犯过错误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大体上又可分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有很多是因为上级的政策有错误,和他为了完成任务而不自觉地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由上级负责任;另一方面的错误甚至发展成犯罪的行为,则是由于他们为个人打算,因而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当时,如能按照龚逢春的分析,有领导地处理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干部的打击面就不会那样宽。可惜的是在那段时间里,受“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错误口号的冲击,龚逢春的意见很难付诸实施。后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曾严肃批评《告农民书》中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提法是不要党的领导的尾巴主义的错误。并在一次小会上对龚逢春所加的这

几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龚逢春遵循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从1948年起着手向西北新区调派干部，到1949年春先后共调出省、地、县及县以下干部3000多人，其中少数留在西北局机关外，大部分被派到新解放区工作。紧接着，他又筹划向即将解放的西南川康新区调配干部。在他的建议下，晋绥各地县都选拔了大批干部，各配备了二至三套应急的领导班子。在调配干部中，龚逢春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克服了选拔干部中遇到的一些思想阻力。通过一系列的工作，保证了这次向西南、西北新区调配干部任务的胜利完成。在人川前，贺龙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龚逢春在调配干部工作中做出的成绩。

参加川西民主改革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撤销后，龚逢春作为川西北临时工委和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于1949年12月随贺龙率领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入川。解放四川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委员、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兼农协临时委员会主任，分管农村工作。

1950年一二月间，国民党残余匪特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一度掀起反革命叛乱，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为了彻底平息叛乱，给实行民主改革创造条件，龚逢春冒着被敌人袭击的危险，深入有关地县传达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指示，研究剿匪、征粮的部署和做法，通过在地县召开各种会议，了解农村的情况，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他要求各地除做好对群众的宣传

工作外,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他还帮助下面纠正某些过急的做法,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平息叛乱后,川西区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川西平原地区史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旱涝保收。成都市附近的七个县的大地主,大都家住在成都市区内。他们剥夺农民的押金很多,如果他们不首先清退押金,在小城镇、农村的中小地主就会持观望态度,拖延退押。面对这种复杂的特殊情况,龚逢春确定首先突破住在成都市的大地主的退押问题。同时,龚逢春很重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强调用党的政策和法庭的力量制服敌人,依法判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镇压了一批罪有应得的匪特、反革命分子,从而打击了反动阶级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减租退押斗争创造了条件。龚逢春还直接指导成都周围七县农民协会联合办事处的工作,领导办事处收缴了住成都地主折抵押金的大批金银和实物,按当时牌价折还给各县农协,再由农协分退给农民群众。既满足了农民的合理要求,又保护了工商业者的正当利益,有原则地保护了出身地主的民主人士,大大削弱了封建势力。

1951年,龚逢春遵循中央西南局的指示和中共川西区党委的决定,在试点的基础上制订了《川西区土地改革条例(草案)》,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下发执行。土改开始后,他兼任川西区土改委员会主任,积极参与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他在区委办公厅内设立了一个由有老区土改经验的干部组成的精干的参谋班子,经常下乡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向他汇报,并编写了一份《土改通讯》,及时传播土改经验,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土改中,龚逢春特别注意对大小地主进行区别对待,调查研究中经常访

问土改积极分子、乡村农协主席，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与民主人士座谈征求他们对土改政策和做法的意见。由于借鉴了老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和解决了土改中的问题，川西区土改于1952年夏季成功结束。

领导中央党校工作

1952年9月，中共川西区党委撤销后，龚逢春被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1953年开始组建党校教研室，配备专职干部五人。西南局于1953年4月决定停办西南革命大学，与党校合并，龚逢春任书记，领导党校工作。党校设立了培训领导干部的理论班、文化班和训练宣传、理论干部的班次，先后办各种班14个，培训学员1800人。1955年1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改名为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龚逢春任校长。是年秋，在龚逢春的领导下，第七中级党校开始举办正规中级干部轮训班，累计培训1598人。1958年6月6日，第七中级党校与四川省委党校合并，改名为四川省委党校，龚逢春任校长。他到任后，首先抓了组织机构建设、职工队伍建设和校园建设。进一步健全了管理机构，充实了五门主课教研室和辅助教学的资料室，不断改善各项生活服务设施，把党校建成了基本上具备条件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学园地。从1958年至1963年，共办中初级理论班10期16个班、短期代训班5期，累计培训各类干部7269人。1959年龚逢春兼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10月，龚逢春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轮训部主任。

从1952年9月任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龚逢春在长期的党校教育工作中，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

的方针路线,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头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重视学员的学习效果,认真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学风和党风,对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岁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赤胆忠心的龚逢春竟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分子”、“黑帮”,受尽了折磨、迫害。但是,面对强暴、陷害,他横眉冷对,宁死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1966年6月5日,第一张“炮轰以林枫为首的校党委会”的大字报贴在了中央党校的墙上,斗争的矛头直指林枫、龚逢春等校委会主要成员。七八月间,中央党校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将康生企图以龚逢春为突破口,先整倒林枫,进而整倒贺龙等一大批老同志。

8月15日,在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的全校大会上,“造反派”正式发难,他们公然向林枫提出种种无理质询,故意干扰文件的传达贯彻,会场秩序大乱。龚逢春对这种蛮横无理的行径十分气愤,当即拿起扩音器对台下说:“请同志们安静下来,先让林枫同志传达文件,你们有意见等他讲完再提。”他的建议得到台下大部分群众的响应。在康生的授意和煽动下,三天之后,林枫和校委领导同志就被戴上高帽子,敲锣打鼓,在校内游斗。从此,龚逢春就被打成了“林枫的心腹死党”、“林家铺子的主要成员”。康生几次指名要龚逢春揭发交代林枫的问题,都遭到龚逢春的严词拒绝。恼羞成怒的“造反派”又给他网罗了“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对其多次进行大会批、小会斗。在这些“罪状”和压力都不奏效的情况下,康生一伙又捏造了“反革命”、“叛徒”等罪名,对其进行审讯逼供。12月23日,中央下达撤销林枫中央党校校长职务的决定后,“造反派”召开全校大会庆祝胜利,龚逢春被揪到大会上批斗示众,体弱多病的龚逢春当场被打得浑身青紫,失去知觉。就在龚逢春伤病卧床的情况下,“造反派”仍然轮番到他家,让其家人搀扶着,挨批挨斗。

随着迫害的逐步升级,大批老将军、老干部被关进“牛棚”,成了审查对象。龚逢春除要“揭发”党校和林枫的问题,又被加上“揭发”贺龙、李井泉以及其他共过事的老同志的问题。龚逢春尽管身体已经异常虚弱,但头脑十分清醒,坚持原则立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1967年初,康生就以不揭发交代罪行为由,指使“造反派”把龚逢春关进小屋,实行所谓“群众专政”、“隔离审查”。对龚逢春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

1969年冬,龚逢春被下放到西华“五七”干校,在西华县城被软禁起来,继续接受审查、交代问题。“造反派”勒令他只准交代问题,不许出门,不许会客,不许与其他人交谈。“造反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在1973年春硬给他作了结论,宣称他有历史问题。龚逢春在向“造反派”头目申请重新调查被拒绝后,按照组织原则,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1973年5月,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龚逢春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长期卧床不起,乃至生命垂危。即使如此,他每天坚持读报、听广播,经常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奉 献 余 热

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首先到医院看望龚逢春。当问到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龚逢春没有提任何困难，提的惟一要求就是阅读党内文件。龚逢春十分关心复校后的轮训干部计划，他不顾剧烈的疼痛，怀着满腔热忱，十分吃力地把计划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选读本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对送给他阅读的党内文件，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直至停止了呼吸。他关心党的事业胜过自己的生命。

1978年春，龚逢春夫人姜宝箴向党校提出给龚逢春复查平反的申请，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校党委立即派人重新进行调查，给他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复查结论，认为所谓的历史问题纯属逼供信的产物。

1978年12月1日，龚逢春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身前意愿，当日他的心脏就捐献给了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为祖国的医学研究作贡献。

（杨晓武 颜 吾）

焦 启 铠

(1904—1932)

焦启铠又名起铠、其铠、介仁。陕西潼关人。1920年考入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1924年奔赴广州，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黄埔军校中共特别支部候补干事，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毕业留校，任连长。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郴州兵站分部主任。同年秋，调国民革命军第十五

军，先后任军政治部干事，三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调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交通联络工作。1927年冬赴广州参加武装起义。后辗转到上海、武汉、长沙、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被派往驻守豫南的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准备发动兵变。事泄被捕，后经友人营救获释。1930年，由于叛徒出卖再次被捕，中原大战结束后获释。出狱后，经友人介绍，回陕到杨虎城部马青苑师任参谋。1932年9月被杀害。

1932年秋，十七路军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蒋介石的诱惑收买下，发动了叛杨（虎城）投蒋的“天水事变”，悍然枪杀了该师第一旅旅长陈养虚等军官。在这次事变中惨遭杀害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焦启铠。

焦启铠，又名起铠、其铠、介仁。1904年出生在陕西省潼关县一个开明士绅家庭。祖父焦云龙，曾为前清进士，历任陕西省富

平、长安、商州、潼关等县的同知、知事，为政清廉，颇受民众拥戴。其父焦振鸿，为人诚实忠厚。

焦启铠幼年在潼关读私塾，继之到西安上高小。1920年春考入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在进步教师蒲化仁的影响下，他很快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1924年夏，经刚从上海回到西安的武止戈的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同年冬，焦启铠怀着追求光明的热忱奔赴当时革命的大本营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当入伍生。经半年学习后升入第三期步兵队。

《革命军》中一斗士

焦启铠进入黄埔军校不久，即结识了共产党员蒋先云、卢德明、杨其纲等黄埔一期学员。革命的热情、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很快成挚友，其中尤以和蒋先云感情深笃。在这里，焦启铠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钻研古今兵法和军事技能，思想和军事技术不断提高。其间，他随黄埔学生军参加了讨伐刘震寰、杨希闵、陈炯明叛乱的战斗和声援省港大罢工的斗争，表现得机智勇敢，显示了一定的宣传、组织才能。1925年，他转为中共党员。转党后，他担任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候补干事、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共五个执委，他是惟一的学生执委），并参与了特别党部刊物《革命军》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他和中共特支书记杨其纲、委员曹素民、段子中等人一起，认真贯彻上级党组织指示，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同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公开论战，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5年9月中旬，黄埔军校国民党在选举第三届执委会和监

委会，蒋介石利用孙文主义学会排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焦启锐洞悉其奸，立即在国民党左派学生和“交叉学员”（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积极活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动员大家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票。选举结果，特别党部执、监委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多数，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焦启锐被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后，利用主办《革命军》的有利条件，撰写了许多文笔犀利、鼓动性强的文章，猛烈抨击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他在《我们对国家主义的态度》中写道：“……法西斯蒂的国家主义派，偏要扰乱民众的视听，造出许多反动的滥调！……但是只有国民革命这一条路可走的中国，绝不需要什么国家主义！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别名。”“他们反对工农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他们反对本党的联俄政策，他们反对进步的国民军，他们反对一切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我们把过去的事实上和在国家主义派的机关报——醒狮——上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真面目——反革命。”在焦启锐的笔下，以曾琦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分子被驳得体无完肤。

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病逝。此后，国民党新老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地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面对右派的猖狂进攻，焦启锐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发表在《革命军》第十期题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给我们的教训》中写道：“我们的党员在平时努力工作的过程中，只能体认党的主义、策略、宣言、议决案，毫无徘徊疑惑的余地。”“我们的同志们，需要有互相批评，有了互相批评不算够，还要互相监督……凡不批评或不监督人者及不受人的批评或监督者，都是对党和革命不忠，间接的已立在反革命的地位而不自知！”“一个革命党要实行它的使命，不在乎数量上的多

少,而在质量上的好坏。我们的同志常夸口,我们有五十万同志,究问这五十万同志都是革命的吗?靠不住!”他义正辞严地疾呼“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避开!反革命的站在面前,我们与你们决一死!”表现了无所畏惧的凛然正气。

1926年初,焦启铠黄埔三期毕业,留校工作。仍参与《革命军》的撰稿、编辑工作。不久,被任命为连长。

北伐狂澜显身手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由广州向湖南、湖北进军。攻占郴州后,焦启铠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郴州兵站分部主任。他为北伐军筹集粮秣,转运弹药、物资,接送后续部队,收容伤员昼夜奔波不息。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后,焦启铠调至国民革命第十五军,先任军政治部干事,后升任第三师政治部宣传科长。此间,经他的挚友、时任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总队长蒋先云介绍,与蒋的堂妹蒋抡英结婚。婚后不久,焦启铠升任第三师上校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十五军系鄂军第二师改编。军长刘佐龙原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旧部,倒戈后劣性不改,又秘密投靠蒋介石。他在部队中打击排挤政工干部,在社会上压制工农运动。三师的成分更为复杂,旧军官们看不起政治部和政工人员,把焦启铠看作是“摆设”、“样子货”和干涉自己为所欲为的“障碍”,充满反感和敌意。面对重重困难,焦启铠领导政工人员,从士兵和下级军官入手,从宣传组织民众入手,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采取书写标语、传单,绘制宣传画,出壁报,召开讲演会、军民联欢会等多种方式,宣传国民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教育官兵要严守纪律、爱护百姓。强调只有取得民众支

持,才能打胜仗的道理;号召工农群众起来支援北伐军,推翻军阀统治,争取国民革命的胜利。

1926年冬,第三师奉命到鄂东剿匪。焦启锐带领政治部全体人员走在前面,一路行军,一路宣传,在安抚民众、取得民众支持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战斗中,焦启锐等不但抢救伤员、运送弹药、保障后勤供给,而且拿起枪杆直接投入作战。政工干部能文能武、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能不使军官们叹服。在三师收复的地区,政治部还协助当地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了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进会,并将缴获的一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农民自卫军,使新建立的革命政权很快得以巩固。

1927年初,第二师驻防汉口。焦启锐领导的三师政治部积极支持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在反对英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屠杀工农群众的斗争中,焦启锐执笔起草了三师反英宣传大纲,印发反英宣言,愤怒控诉英国士兵枪杀中国民众、停工停产、封锁金融市场等罪行,呼吁实行对英经济绝交。1月5日,焦启锐及政治部人员参加了刘少奇等领导的武汉市场数十万人的反英大示威,爱国官兵支持工人赶走了英国巡捕,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在焦启锐的力主下,第三师派出部队在原英租界内巡逻放哨,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军队,使之逐步变为革命的武装,焦启锐曾举办了数期政工干部训练班,为全师各团、营、连培训了一批政治指导员,使三师的政治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对于那些政治上坚持反动立场,军阀习气严重,随意打骂士兵,违反军纪的坏军官,焦启锐协助时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兼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耿丹,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惩处。

1927年2月下旬,十五军在武汉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席间,焦

启铠作了《最近军事与政治》的报告，强调部队要加强军政训练，切实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由于他所领导的三师政治部成绩突出，他还在会上做了经验介绍。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武汉，焦启铠怒不可遏，主持召开了全师官兵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三大政策，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

5月中旬，焦启铠奉命和师长王贵荣率领全师到鄂西北讨伐叛变革命的张联升部和杨森部。政治部沿途书写标语，散发敬告农民书、敬告工人书，支持协助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

5月28日，参加第二次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临颖与奉军张作霖的主力发生血战，优秀的共产党员、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团长兼党代表蒋先云壮烈牺牲。噩耗传到武汉，焦启铠无比悲痛。蒋先云不仅是他的妻堂兄，更是自己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两个赤诚的共产党员的战斗友谊，是建立在矢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基础上的纯真友情。如今，蒋先云以25岁的韶华马革裹尸，不能不使焦启铠痛惜和沉重。他决心从沉痛中奋起，继承烈士的未竟之志，为先烈报仇！6月2日，蒋先云的灵柩运抵武汉，焦启铠作为十五军政治部代表与中央军校代表恽代英等到车站迎灵，并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追悼大会。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前，焦启铠接受党的指示离开军队，调往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交通联络工作。经他手曾派共产党员韩志颖、李宽等到驻皖南的胡文斗部队作政治工作。7月下旬，遵照党的指示，他又选派了一批党员军事干部秘密奔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此后，焦启铠还派党员给在上海的刘伯坚等传送文件，通知了李富春等十几名党员迅速转赴上海工作等。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一度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央十分

关切部队情况，派焦启铠前去了解。焦启铠9月下旬出发，日夜兼程，不畏艰险，于10月上旬到达广东省普宁县，找到了南昌起义的部分官兵，并通过当地民众，对起义部队的行军情况、战斗经过做了详细询问调查。10月25日，他向中共中央写了近六千字的《从广东回来的报告——八一南昌起义后行广东的经过》，向中央详细报告了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的行军情况以及壬田、会昌、汤坑等五次重大战斗的经过。报告中写道：“三日内，部队中有几团屡不能得食，给养全无，天气酷热，得急症者甚多，无药医治，死者甚伙……”“……这样行军，日不得休，夜不得寝，饥不得食，寒不得遮，物不得拿（无伏），若以平常军队，决不能维持，只有鸟散。但我军有政治思想，有战争目标，上下融洽，军心如一，虽在如此困难地步，即极苦之兵士亦无怨言，只能向前是生路……”在详尽汇报了五次战斗的经过和胜败之后，焦启铠又写了“失败中的观察”和“现保存势力”两小节，以他个人的眼光，简练地分析了南下部队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以及残存部队的去向。这份报告，不仅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情况，而且也为后来的南昌起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历尽劫波志不灰

焦启铠从广东回到武汉不久，又再次南下广州，参加了当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回到武汉。此时的武汉，反革命弹冠相庆，革命者已无容身之地。焦启铠和妻子蒋抡英一无积蓄、二无职业，又不能公开出面谋事，只能靠亲朋接济度日，生活极其穷困，经常一天两顿稀粥，有时甚至断炊饿饭。但他不减斗志，先后辗转于长沙、南京、上海等地，寻

找关系，联络同志，图谋东山再起。

1928年夏，经党组织同意，焦启铠利用社会关系，进入驻豫南驻马店的冯玉祥部岳维峻的部队中工作，秘密从事兵运活动。他公开劝阻岳维峻不要投靠蒋介石，暗地里联络、争取进步官兵，策动岳部特务团和补充队举行兵变，准备组建工农红军。由于行事不密，被岳维峻发觉，遂将焦启铠逮捕关押。审讯中，焦启铠坚不吐实，岳维峻拿不到凭据，加之黄埔校友从中斡旋说项，方使他获释离队。

1930年初，焦启铠来到河南开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冯玉祥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和共产党员贾觉一起被捕入狱。焦启铠早已作好牺牲准备，拒不招供，在狱中备受酷刑，身体受到很大摧残。直至年秋，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撤离开封，焦启铠才得以乘机出狱。他拖着伤病交加的身体回到祖籍山东长山县，略作治疗，未等伤愈，又急切地返回开封觅职。

赍志反蒋献英躯

1931年夏，焦启铠经黄埔校友、陕西同乡武纬、刘崇德介绍，到十七路军陕西警备师马青苑部任少校参谋，相机进行活动，为党争取武装。

1932年1月，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命令马青苑部西进甘肃。焦启铠安排了妻子和尚在襁褓的幼女留住西安，随军进入陇南。经过战斗，警备师赶走了马锡武的部队，进驻天水。4月，邵力子取代孙蔚如当上了甘肃省政府主席。早有叛杨投蒋之野心的马青苑以为时机已到，加紧了与蒋介石集团勾结。洞悉内情的焦启铠积极在官兵中活动，极力维护十七路军的团结，竭力反对投蒋阴

谋，引起了马青苑的极端嫉恨。

是年8月，杨虎城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马青苑心怀鬼胎，不敢赴会，派所部第一旅旅长陈养虚代他与会。陈于8月底返回天水，再三敦促马青苑到西安见杨。由于陈养虚一贯忠诚于杨虎城，使马青苑狐疑愈甚，遂加快了叛杨步伐。他假意挽留陈养虚暂住天水，暗里却将亲信部队调入城内。面对这险恶形势，焦启铠不避自身危险，不顾位卑言轻，挺身而出，一面公开呼吁官兵精诚团结，反对分裂；一面直言规劝马青苑要认清时务，不要弃明投暗。同时，密告陈养虚迅速逃离。陈养虚在向南逃往本旅驻地途中被马青苑所派骑兵追上，枪杀于娘娘坝。焦启铠也被马青苑诬以“蛊惑军心，进行共党活动”的罪名，公开枪杀于天水。

天公不公，天水成泪！一代英豪，死于叛将之手！时年仅27岁。

(张守宪 宋 登)

傅鹤峰

(1895—1949)

傅鹤峰，原名瀛，字鹤峰。陕西城固县人，爱国民主人士。1916年省立第三中学毕业后，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就读。五四运动前后，是北师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当局逮捕。出狱后在京创办进步刊物《励进》，宣传新文化，反帝反封建。1924年，先后在安徽省立贵池师范、陕西省立三中、汉中道立单级师范等校任教。在汉中筹办创立

了著名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31年秋至1938年初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处总务主任。1940年后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汉中区总干事。1944年任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副教授。1949年9月初，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接受党的任务，到汉中策反董钊弃暗投明，不料，10月5日被敌逮捕，押往成都。12月22日被杀害于成都城西。

傅鹤峰是陕南师范教育的奠基人，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曾创办了著名的汉中陕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并先后两度出任该校校长；出任陕西省立汉中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西北大学副教授、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训导长、省立兴国中学校长等职。1949年秋，为使桑梓早获解放，他欣然奉命赴汉中策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不幸被胡宗南绥靖会署特务逮捕，解往成都杀害，时年54岁。傅鹤峰先生不仅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表现了爱国知识

分子的浩然正气和为人民民主自由的献身精神。

少年立志报国

傅鹤峰，名瀛，字鹤峰，1895年10月27日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原公镇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傅次舟系私塾先生，傅鹤峰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四。傅鹤峰少年时代正值国家处于内忧外侮的时期，父亲常对他讲述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略，义和团奋起抗击，遭其镇压；腐败的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历史事件。以此教育他进学堂后努力读书，报效祖国，并且为人处世要“践履笃实”，他铭记在心。长兄傅严常向傅鹤峰说：“我系清末秀才，曾任职官府，深感仕途腐败，后弃官致力桑梓教育事业。弟聪颖过人，宜于学术上有所成就，对祖国有远大抱负。”父亲的庭训，兄长的教诲，都给幼年的傅鹤峰以极大的影响，使他初步萌发了报国雪耻之志。

1902年春，傅鹤峰七周岁时，入本村刘家祠堂读私塾。当时所学的全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要求熟读背诵。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加之家教有素，不但能背诵所学课文，而且能吟诗作词，深得老师好评。

1906年，傅鹤峰以优异成绩，考入城固县立高等小学堂（今考院中心小学）。当时学制为四年，他在学校读书用功，品学兼优。第四届毕业生中，他学业成绩名列第二。

1911年春，16岁的傅鹤峰考入西安三秦公学。因这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暂停，他辍学旋里，在家自学。1913年春，他返校就读。1915年，该校与西北大学附中合并为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他毕业于该校。

投身五四运动

同年秋，傅鹤峰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理化部就读。他经常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与进步同学谈论国家大事，使他耳目一新。五四运动前后，他是北京师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直接参加了这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前夕，当北京各大学获悉北京政府正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后，他和北师大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各大专院校学生在一起召开的会议，决定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并致电巴黎专使，决不签字。5月4日这天，他与全校师生一起，踊跃参加了在天安门前举行的游行示威集会，并在街头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与此同时，他组织在京的陕南学生联名给汉中当局和各中、小学校发函电，敦促当局并号召汉中广大青年积极响应，在汉中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的激进言行，引起了北京政府的仇视，将其逮捕。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工、学、商界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声援斗争下，北京政府被迫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傅鹤峰出狱后，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为了唤醒民众，继续开展斗争。他与同乡卢华亭等人发起组织了陕南旅京同乡会，成立了励进社，创办了《励进》刊物，以砥砺学行、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改良地方政治为宗旨，发行范围以全国大专院校和汉中十二邑学校为主，揭露了陕西督军和汉中军阀吴新田的罪行，人心称快。

历经艰辛 创办师范

1920年夏，25岁的傅鹤峰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经过五四

运动的洗礼,立志革新社会,走教育救国之路。他大学毕业,即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他身体力行,献身于振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提倡新文化,创办学校,教书育人。1921年到1924年,傅鹤峰先后在安徽省立贵池师范、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汉中道立单级师范等校任教。

20世纪20年代的汉中,由于交通封闭的自然状态和长期以来封建势力的盘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教育事业缺少经费、缺少师资,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和提高。乡村里尚有不少私塾,汉中城内仅有两所高小和三所初小,中学则有12县合办的联合中学和南郑县立中学、职业中学三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傅鹤峰在汉中筹办了著名的省立第五师范学校。

他为筹办这个学校呕心沥血,历尽艰辛。1943年7月,傅鹤峰亲自给该校写的《大事记》绪言中略述了这个学校创始的梗概:“一九二四年,陕西教育厅,为推广师范教育起见,决定设省立第五师范于汉中。是年七月,委任鹤峰为筹备员。鹤峰八月十一日就职,随即组织筹备处于南郑(文中的南郑,均系今汉中),聘请职员,勘择校址。九月呈请汉中道署,划拨南郑西门外汉中道立苗圃北段四十亩,及道立单级师范学校全部为校址。次年一月,教厅委任鹤峰为本校校长,二月二十日,鹤峰受新命,就任校长职,积极筹备成立,三月聘请教职员,招考新生两班。并选定南郑西门内罗祖庙为本校附属小学校址,附小亦同时开办。三月二十四日新生上课。四月四日,举行本校成立典礼。宣布校训五条,曰:健康、秩序、真确、宏毅、互助。当时员生每人植树一棵,以留纪念。”傅鹤峰为开创新的学风在该校成立典礼大会上宣布的这五条校训,包含了德、智、体、美的新思想,在当时尊孔忠君的封建教育信条尚浓厚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

为扩建校舍，傅鹤峰主持在1925年5月开工建筑一座大楼，6月19日举行奠基式。但8月初旬由于淫雨成灾，致使该校原有40余间平房全部塌陷，正施工的大楼工程被冲毁，各种校具多被损坏。是年秋开学时，时任校长的傅鹤峰积极带领教职员克服苦难，让老师分散住宿，将学生分在附小上课，又租附小西邻民房为附小校址，终于按时开学。他后来在回忆总结这一情景时写道：“艰难困苦，莫此为甚，然卒能按期开学，不稍迟延，实教职员共同奋斗之力也！”同时，他又呈请教育厅拨发经费，重建校舍。在修建大楼中，因经费不足，以致停工。傅鹤峰心急如焚，把家里十多亩地卖掉的钱，全部资助建校。在该校创建中，他经受挫折而百折不挠，并竭尽自己心力和财力使该校建成得到巩固和发展。创建伊始，傅鹤峰大胆革新，宣布新的校训，从京津沪等地和省城聘请才华卓著的进步人士任教，提倡民主与科学，把该校办得生机勃勃，成为汉中地区最早广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等专业学府。

傅鹤峰不仅担任着繁重的教学和行政事务，而且充当汉中旅沪学生出版的革命刊物《汉钟》在汉中的代派处的义务代派者。为使《汉钟》发挥传播新文化、宣传新思想、革新社会、改造汉中的作用，竭尽全力。

1925年，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汉中后，傅鹤峰以国民党南郑县党部主任委员的身份，立即召开第五师范和附小全体师生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工人顾正红和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组织全体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同时成立了第五师范外交后援会，在汉中最先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

1927年4月28日，北大教授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噩耗传来，傅鹤峰痛心疾首，无视当时社会的黑暗恐怖，毅然在第五师范主持全校师生为李大钊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会上，

他讲述了李大钊的功绩和遇难情况，号召师生继承先烈未竟之革命事业。因他慷慨激昂，抨击军阀统治，加之在执教期间一些言行激进，引起当时驻汉中军阀吴新田的注意和监视，傅鹤峰被迫于当年秋愤然离职。

1927年10月，傅鹤峰被陕西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督学。1929年1月，又派他回汉中，接任陕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该校是黄锡九于1928年秋，借南郑女小教室招生一班，随即开学，既无校址，又无设备。他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接任校长，日夜操劳，各方奔走，在各界人士支持下，迅即在汉中管子街（今青年路）将原昭忠祠改建为粗具规模的女师校舍，并购置了一些简单的教学设备，解决了一系列具体困难，使女师逐步得到发展。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除平常邀请爱国进步人士、教育名流来校向师生作报告外，又不断调整充实教师骨干。1930年8月，他通过陕西早期地下共产党员田伯荫的介绍，聘请了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汉中的特派员、后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的梁益堂任女师训育主任，并对梁的教学及各项革命活动给予大力支持。他俩在女师执教时，除教育女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外，还经常向学生灌输新思想、新风尚，提倡妇女要解放、要自立、要阅读进步书刊，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反对缠足、早婚等旧风俗，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他的长女，当时在该校就读的首届学生傅亦民，从小受其父进步思想的影响，反对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梁益堂来校后，他又在梁的培养引导下，于同年10月被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汉中第一个入党的女党员。同月，傅亦民又介绍同学宋玉兰、杨素芬入党，遂成立中共汉中女师支部，傅亦民任党支部书记。她们在陕南特委领导下，冲破封建习俗，走上街头，宣传革命道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一时震惊了沉睡中的汉中城。

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时任该校校长傅鹤峰的支持分不开。

联名上书拯黎民

1931年秋,傅鹤峰赴南京在国民政府于右任领导的监察院任秘书处总务主任。他到南京几个月与在南京工作的陕南同乡,均纷纷收悉陕南因横征暴敛,连遭大旱,民食树皮草根,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呼救函电。为拯民于水火之中,他与刘次枫等人联合陕南在南京同乡及地方各界因公赴南京的高翰湘、郑百愚、龙博珊、刘子勤、王丕绪、熊文涛等168人,于1931年12月24日,以《陕南旅京同乡为请求免除苛捐杂税及切实剿匪救灾并撤销政治专员第一次报告书》,及缮具《说贴》,上书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

此报告书开头历述了陕南不幸,天灾人祸相逼而来。自军阀刘存厚、吴新田以迄于今,无不视陕南人民为鱼肉,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苛捐杂税有加靡已,益以凶旱连年,资匪遍地,陕南人民,茹苦忍痛,听其宰割,水深火热,民不堪命等悲惨情景。并在《说贴》上提出了减除苛捐杂税和救灾等三大项十多条拯民的具体意见。接着旅京同乡又开会讨论决定,从陕南168名同乡中,推定刘次枫、胡超吾、高翰湘、刘子勤、傅鹤峰、熊文涛、龙博珊等16人为代表,“赴邓府巷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面杨主席虎城未遇”。后由陕西省财政厅厅长李志刚代杨虎城按所呈《说贴》逐项作了具体答复。陕南16名同乡代表在向陕南父老兄弟第二次报告中说:“答复情形如果能逐条办到,陕西人民痛苦可稍减。”杨虎城于1932年1月2日,亦函告代表:“旋陕后定即遂加严查究办”。

身在“曹营”心在“汉”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始迁武汉，傅鹤峰亦随监察院到汉口。此时他感到国难当头，应投身到抗战工作中去，于是在1938年初，决然离开监察院返回西安。被省抗敌委员会聘为民众动员督导员，他即赴汉中各县宣传观察，动员民众抗日。

1939年春，傅鹤峰曾在西安省立三中任教时的学生董钊，因率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诸多将士浴血奋战，为国捐躯，董钊抗战立功，亦被提升为第十六军军长，部队损失惨重，军部驻西安整补。此时，傅鹤峰与中共地下党员石仲伟一起供职于董钊军部任秘书，投笔从戎。董钊对傅鹤峰很尊重，称他傅先生。石仲伟曾回忆道：“他生前那热情、爽朗的谈吐，坚持真理的正气和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经常萦回在我的脑际。”“我和傅鹤峰在董部同当秘书，一起工作，关系融洽。工作之余，也常在一起谈论时事，商谈抗战救国之策。他作风正派，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富有正义感。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积极反共、镇压人民抗日运动的倒行逆施，他深表不满；而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收复失地的爱国行动，深为敬佩。有时他在董钊面前，畅谈国事，赞扬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救国的壮举，说只有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有一位从延安鲁艺学习回汉中搞地下工作的城固乐育中学教师、地下党员黄勉初，被特务逮捕，押解西安受审，傅鹤峰利用他在董钊军部供职的有利条件，会同续药斋多方奔走，终于将黄营救出狱。后还推荐黄担任了汉中师范附小校长。

1940年春，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反共高潮中，董钊奉命

率部包围陕甘宁边区。傅鹤峰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极为不满,于同年秋,毅然离开董钊的十六军军部。

重返教苑育桃李

1940年秋,陕西省教育厅复调傅鹤峰重返汉中,继任省立汉中师范学校校长。当年他创办的省立第五师范,于1934年10月,奉令改校名为陕西省汉中师范学校。原校址校舍因扩充汉中飞机场被占用,加之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汉中迭遭敌机空袭,学校于1939年4月奉令疏散,遂自汉中远迁褒城之打钟寺,附小亦随迁褒城之西郑营。

傅鹤峰此时继任校长后,面临着重重困难。他在后来亲自写的该校《大事记》绪言中说:“此校址,异常零散,共分八处,且该地僻壤穷乡,交通阻塞,柴米不易,物质条件奇艰,影响教师服务兴趣和学生日常生活,另图他迁。”为办好这个学校,他几经奔波,日夜操劳,与有关方面协商,终于勘定了“南郑十八里铺之南福安寺、杨氏宗祠、五祖庙、张氏宗祠及川主庙为新校址。”于1941年7月暑假中,将该校从褒城迁移十八里铺。此处虽废祠旧寺,因陋就简,但自然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傅鹤峰当时形容说:“迁移修理工作始告完成,人杰地灵,已兆复兴之象,巴山苍苍,汉水泱泱,本校前途将山高而水长矣!”在迁新校址后,为解决校舍缺乏,设备未周,扩充发展问题,傅鹤峰又多次赴省“面谒当局,痛切陈词,约需经费三百四十万元”。为树人百年,创造基本条件。1941年秋,他给汉师附小介绍的一位青年教师、地下共产党员唐树人,上课不久突然被捕,与此同时,汉中女师教导主任陈新波亦因共产党嫌疑被捕。这二人都是傅鹤峰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挺身而出营救,使他们脱

险。

1942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汉中中队成立,傅鹤峰起初兼总干事。1943春,王陆一在西安任国民党晋陕监察使时,他一度被王聘为使署兼职秘书。

1944年上半年,傅鹤峰任当时迁在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副教授。是年秋,被省教育厅调到西安,同郝跃东、刘海峰等教育界学者为陕西师范专科学校筹备委员,当年秋招生开学,傅鹤峰任省立师专训导长。1948年春,兼任陕西师专陕南分校教导主任。他在师专任教期间不但教学认真负责,而且对进步教师满腔热情,亲切照顾。曾在师专被他关照的地下党员教师,解放后曾任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田克恭回忆道:“傅鹤峰一生大多数时间从事师范教育……,在教育园地培育的桃李满陕西,这些学生在解放后成为我省教育的骨干力量。”“1947年,我和李一青(解放后曾任西安体育学院院长)到陕西师专任职时,他主动把师专后院他在桑园里盖的三间草房让我们住家,而他却搬出学校住在女儿处。在当时师专教职员住房困难的情况下,能如此对我们亲切照顾,实在使我们感激”。

傅鹤峰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几十年来,他为人师表,治学严谨,辛勤耕耘于教苑,培育出累累硕果。他认真负责,作风正派,一片赤诚为人民,这一切堪为后辈的楷模。

受党派遣 策反董钊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董钊与胡宗南军事集团一起撤退汉中。他们以其号称10万兵力部署了所

谓“秦岭防线”、“大巴山防线”，坐镇汉中，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汉中进军，以确保西南半壁江山。5月20日西安解放，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傅鹤峰先生，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如此迅猛，犹如在黑暗中看到了整个东方大地的黎明，兴奋不已。随着西安解放，宝鸡解放，汉中解放指日可待！为了做好配合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陕南、解放汉中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西北局曾在西安市陕南会馆召开旅省陕南同乡大会，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安市军管会副主任赵寿山在会上讲话，号召陕南旅省人士开展各方面工作，配合支持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陕南。傅鹤峰这位旅省著名民主人士面对大好形势十分激动，他与共产党员石仲伟一起畅谈全国解放形势，分析瓦解敌军的策略，急欲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在党迫切需要选派政治上可靠、熟悉汉中情况而又有一定条件进行活动的人士到汉中开展特别工作之时，他欣然挺身而出。党考虑到傅鹤峰先生爱国爱民的热忱和他与董钊的旧日关系以及董、胡间的矛盾这样一些有利条件，同意傅鹤峰前往汉中分化董、胡，策反董钊弃暗投明，为解放汉中、解放大西南立功。9月，西北局第三书记习仲勋接见了傅鹤峰，并作了具体指示。他得到了党的信任与鼓舞，满足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的夙愿。

傅鹤峰当时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他本可以在西安继续搞教育工作，过着解放后的舒心日子和安定的舒适生活。但是愿为桑梓早获解放极尽绵薄之力的傅鹤峰先生，置个人生命危险于不顾，决心赴汉，虎口拔牙！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傅鹤峰告别了他的妻子，抛下了13岁的幼子，冒着生命危险，徒步向白色恐怖的汉中登程了。9月21日到达宝鸡，夜住长安公寓，给他长女傅亦民写信说：“……宝鸡河涨大水到汉中去的大路不能通过，打算改走山路，如顺利的话，两

天可到草凉驿,然后探路途情况,如一天能到凤县,去汉中则不难矣!”可见他赴汉的急切心情。他跋山涉水,翻越秦岭,穿过敌军防线,终于在1949年10月2日抵达汉中。

当时的汉中,已是胡宗南扶眉战役失败之后,国民党西北党政军警宪特云集之处,胡宗南更加强了内外控制和监视,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小小的古城,汉中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傅鹤峰这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抵达汉中,自然会引起特务们的极端注意。他与董钊相见后,当夜被留宿董钊寓中,密谈至深夜。他向董钊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图。然而,次日胡宗南即以让董钊去向国民政府述职为由,将董钊调离汉中,用飞机送往广州,致使傅鹤峰策反董钊未能如愿完成任务。傅鹤峰即移住教育界老朋友、时任汉中师范校长熊文涛家中。

“立功自效” 壮烈牺牲

在汉中的很多朋友,纷纷前往熊宅拜访傅鹤峰先生。他把西安解放后的诸多见闻,解放军严明的纪律,共产党怎样英明伟大等等,逐一告诉大家,并解释不要听信反动派的各种谣言。他在汉中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向亲朋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揭穿了反动派的谣言,使许多人消除了疑虑,态度为之一变,对解放汉中起了积极作用。当胡宗南及国民党省政府要员多次召集汉中各校长发动强迫师生入川时,女师校长熊文涛等人,暗地与之斗争,劝阻和拖延师生入川时间,使受骗入川师生大为减少。

但是,出入熊宅的人里也混进了监视傅鹤峰的特工人员。10月5日夜,绥署二处的特务们在熊宅隔壁弹花铺放火,制造了纵火案,致使一片混乱。警宪人员遂查户口,以身份不明为由要带走傅

鹤峰。这时，熊文涛先生据理力争，不准带人！特务们慑于熊文涛在社会上的影响，以好言相劝，只说请傅先生去去就送回来，哪知此去即被逮捕关押。消息传出，汉中各界进步人士为之震怒。第二天中秋月圆之夜，敌人又相继逮捕了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派回汉中搞武装、搞策反的原杨虎城十七路军之三十八军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罗煜、张国宪、陈雨皋、李建伟、石伯瑞、陈廷杰等十余人，汉中城顿时杀气腾腾。

敌特多次提审傅鹤峰，刑讯逼供，受尽非人折磨。但他严守机密，坚不吐实。11月20日，解放军各路大军压向汉中，敌人将傅鹤峰等70多人蒙上双眼，带上镣铐，串上绳索，解往四川绵阳，关押在城隍庙大库房里。12月2日，敌人在绵阳杀害了罗煜、张国宪、陈廷杰等十余人，又将傅鹤峰、毛泽润等五人押往成都，并于12月22日夜，将傅鹤峰等五人活埋于成都西门外金牛坝。

党对傅鹤峰被捕十分重视，一得到消息，西北局便急电刚进入汉中的汉中地委，告知陕西知名人士陈雨皋、傅鹤峰及地下党员罗煜等被敌人押往四川的情报，要求速派人去四川抢救。汉中地委迅即采即行动，但敌人却先下了毒手。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于1950年3月27日，给时任陕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陕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张邦英的函中写道：“傅鹤峰先生当时因了解我党政策，决心立功自效，经我们同意并派赴汉中策反董钊，因事不慎，被胡匪逮捕，解往成都杀害。按傅为立功而牺牲，应予适当照顾。除电成都军管会帮助买棺木运回城固外，本部发给去成都之家人路费三十万元。”傅的家里接上级通知后，立即着次子傅庶和及侄子傅德楚前去成都，在成都军管会的具体帮助下，在遇害现场认领了傅鹤峰遗体，重殓后，派人护灵运回原籍。当他的灵柩运到汉中和城固时，地县分别为傅鹤峰隆重地举行了迎灵仪式，召开了追悼会。

傅鹤峰先生殉难,是国民党反动派对爱国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是维护其腐败的反动统治所作的垂死挣扎,它阻止不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史是不会放过罪恶的反动派刽子手的!1955年6月,杀害傅鹤峰的仪孟信等,在西安被人民政府处决。

1958年7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给傅鹤峰烈士的家属颁发了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光荣纪念证》。

傅鹤峰先生一生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献身民主,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人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好儿子感到骄傲。他将与为桑梓解放而献身的烈士一起,永远活在汉中人民心中。

(刘绍军 郑心田)

9 787224 066012 >



ISBN 7-224-06601-X

ISBN 7-224-06601-X/K · 1141
定价：25.00元

封面设计 崔 凯
责任编辑 许发宏

ZHONGGONGSHANXILISHIRENWUZHUAN

